

# 隆隆声 雷田

威廉·加拉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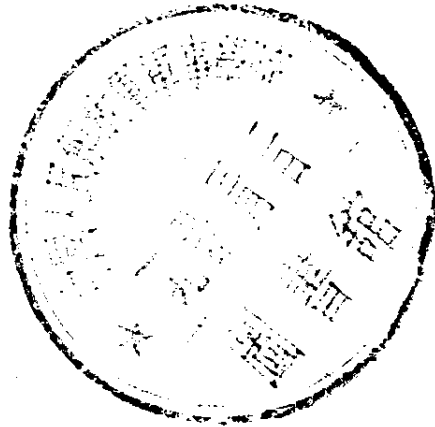
61



# 雷声隆隆

威廉·加拉赫著

崑然譯



世界知識社

1956年·北京

Long 4-7

聽啊，雷聲隆隆！

看那太陽！看普天之下

出現了憤怒、希望和奇蹟，

羣衆的隊伍邁步前進。

——威廉·摩里遜

---

##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0
第三章.....	50
第四章.....	80
第五章.....	98
第六章.....	119
第七章.....	138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93

---

## 序

作者寫了一本新書，請他的秘書作篇序，似乎是一件不常有的事。威利·加拉赫（威利即威廉的暱稱——譯者）這樣做，大概是因為他感覺到我除了打字以外，一定還要對這本書多負責任。要說這本書得以和讀者見面的理由之一，是由於我在1943年快到年底的一段時期內不斷地催促他，那倒可以算是事實。我被加拉赫在下院走廊里每次大約半小時的零碎時間中所談的那些許多政治舊聞軼事所感動，越來越強烈地覺得這些片斷舊事大多數應該記錄下來。所以，我為了像我自已一樣比較年青的同志們，向他力爭。因為我們年青人學習歷史，尤其是學習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工人階級的歷史，主要的還是靠教科書。

教科書的乾燥無味，是人所共知的。而加拉赫的文字不枯燥，也是人所共知的。有一位編纂1945年議會議員簡歷的作家，曾經提起加拉赫的“刻毒的筆”。這樣就形容錯了。他的文字的確是坦率的，而且常常是尖銳的諷刺；可是加拉赫所喜歡用的武器却是大鐵鎚。“克萊德起義”的讀者，總還記得他把1914年到1918年大戰期內的左派運動，無論在事實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寫得很生動。“克萊德起義”結束的地方，也就是這本書開始的地方——由1920年組織英國共產黨起，敘述多難的18年中的故事，直到1939年英國參戰為止。

這本書很自然地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年青的共產黨

的成長、成就和困難。在這一時期里，他和建黨工作密切地關聯着，雖然他的主要工作還是演講和宣傳。第二個時期是1935年他被選入議會而成為第一個共產黨議員后所做的比較專門的工作。書中沒有把他在議會里的工作詳細記載（因為這類材料已另行出版，而且是很生動的記錄），可是關於他怎樣和為什麼能夠抵抗下院中曾經削弱許多工人階級代表的鋒芒的那種“使人圓滑的力量”，寫得非常清楚。

我肯定地認為，由於這本書通過英國最堅定的革命領導者之一的事蹟而把歷史寫得“活靈活現”，這本書一定會幫助工人運動中年青一代了解在兩次大戰之間這一段時間內起作用的各種力量，懂得失敗和災難的原因，並且認清如果要使社會主義在英國得以實現，那末就需要更多的像威利·加拉赫這樣專心致志、努力不懈的人。

愛琳·墨萊

1946年7月

---

---

## 第一章

1920年夏天，气候正酷热的时候，我作为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了莫斯科。由纽卡斯尔到卑尔根一段，我是偷渡过来的。然后才以普通旅客的身分由卑尔根到北角，由北角到摩尔曼斯克，由摩尔曼斯克到列宁格勒，再到莫斯科。因为我不能携带行李，所以有点衣衫襤褸。可是我终于弄到一条裤子，一件俄国上衣，一双鞋。这样，我就可以应付一切了。

在一个星期六大约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到了莫斯科。我吃了一份乾的黑麵包，随后就被邀到一家翻砂厂去干了一下午工作。工作相当繁重，可是大部分时间有一个乐队演奏，让我们一面干活一面还有音乐可听。星期日我被邀到运动场去担任英美足球队队长。我一生中虽然踢过几次足球，可是像这一次的情况还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一边几乎每一位队员都没有什么经验。只一会儿功夫，俄国球队就明显地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所以我就改守球门。大半个下午，他们简直一直是在打球门，间或把我这守球门的也踢两下，好像比踢球更有意思似的。他们踢进11个球，我们这边毫无办法。我沉不住气，就从我们这边一直把球盘过整个球场，踢进了唯一的一球。这一下博得“满堂采”。等到最后吹哨停赛，我被抬出球场。正合适，因为我已经走不动了。深夜里，我去找医生医治身上的许多创伤。在候诊的时候，

我遇見一位優秀的法國青年同志，名叫勒菲弗爾，他的英語說得相當好，人非常熱情，他希望在回到法國以後干一番大事業。

第二天，我和一班人同到克里姆林宮，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在那里舉行。傑克·唐納和大維·蘭姆賽比我先到，他們介紹我和許多國家的代表見面。在這些著名的優秀代表中間，同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合得來的一位是美國代表約翰·里德，他是“震動全世界的十天”那本名著的作者。我還很高興地會見了我早已聽說過的卡爾·拉狄克。他口若懸河而且十分刻薄。在會議期內，他不止一次地發揮他這種本領而使我受窘。介紹以後，當我們穿過一個接待室的時候，忽然有人說：“列寧同志，來見見加拉赫同志。”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同許多人一樣，我一向讀列寧的書，思念列寧，也談論列寧。現在他就在我身旁，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謙虛、和善和熱情的同志。我們握了握手。我什麼都不會說了，只說了一聲：“你好”，他說：“歡迎你到我們這個蘇維埃國家來，加拉赫同志。”

過了一會，我們四週的鬧鬧嚷嚷多少平靜一些了，他說：“加拉赫同志，等你有功夫的時候，我要和你談談。”我對他說，“好的，列寧同志，我也想和你談談，當你有功夫的時候。”當時我想起了我到達列寧格勒這個名城的時候所經歷的一件特別的事情。我被帶往斯摩爾尼學院去領取前往莫斯科必需的證件——要知道，我由紐卡斯爾到列寧格勒，一路上是什麼證件都沒有的——那里負責的同志們給我一本書，並且說：“我給你辦證件的時候，你可以看看”。這本書的名字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當我讀到英國部分的時候，我十分驚異地發現我受到了很尖銳的批評。事情原來是這樣：在我離開英國的幾個月以前，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來找我，告訴我她將要到大陸上去看



几位同志，請我給她寫一封信，簡略地說明我對於當時英國情況的意見。我寫了一封信給她，不但批評了麥克唐納一班人，也批評了英國社會黨（我也是該黨黨員），並且很堅決地陳述了我自己反對參加議會的意見。隔了些時候，我收到英國社會黨寫到培斯利我家裡的信，問我肯不肯和伯爾納·貝爾斯爵士在倫敦金斯威大廳辯論，為布爾什維克的立場辯護。關於這一問題，我曾經和蘇格蘭副檢察長在伯斯辯論過，也和薩羅利亞教授在愛丁堡辯論過，所以這次毫不遲疑地應戰了。當我將參加辯論會、代表英國社會黨為布爾什維主義辯護這件事公開宣布的時候，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立刻把我給她的那封信刊登在她的“工人無畏艦周刊”上；这样就使人們認為我是在答應參加辯論以後，跟着就寫信給“工人無畏艦周刊”的。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在談到這封信的時候，是这样說的：

“關於參加議會問題，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証了登載於該期周刊上加拉赫同志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赫同志用格拉斯哥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名義寫的，他寫道：

‘本委員會肯定地反對議會制度，而且各種政治組織的左派都是贊助這委員會的。

我們是蘇格蘭革命運動的代表，這個革命運動的目的是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並建立以全國各處社會委員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正式的議會議員吵鬧得夠久了。我們認為不必公開向他們宣戰，而他們也害怕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情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部戰線上正在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的普通黨員羣眾，一想起議會制度，就愈加覺得討厭；幾乎一切地方團體都完全贊成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

當然，這對於那些吃政治飯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先生們，有極嚴重的意義，因此他們用盡一切方法，說服他們的黨員回到議會主義方面去。

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擁護這伙匪徒。我們在這一方面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於革命利益的人們的叛變。

對於議會主義的任何擁護，簡直就是幫助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里去。亨德孫、克略英斯之徒已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到資產階級自由黨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在麥克唐納、斯諾頓這伙人的營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黨員羣眾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這都不過是幫助上面這班先生們。

英國社會黨在這方面毫無作用……

這裡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顯明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來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那我們便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分子來叛賣革命，那麼，就請千萬不要干預此事，這種反動分子非常貪圖攫取議員的“尊號”（？），如火如荼地想證明他們也和“主人”階級中的政治家一樣，能夠有成效地統治國家。

這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

剛剛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普通工人的情緒和觀點，表現得異常透澈。這種情緒最值得歡迎，最有價值；應當善于重視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會是沒有希望的。善于表現羣眾這種情緒的人，善于在羣眾中喚起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未喚醒的）情緒的人，應該加以愛護，應該關心地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公開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羣眾，單靠情緒是不夠的；最忠實于革命的人們所將要犯的或已經在犯的某種錯誤，乃是足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赫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所犯着的和俄國‘左的’布爾什維克在 1908 年和 1918 年所犯過的一切錯誤的萌芽。

該信作者義憤填膺，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階級政治家’的仇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老百姓’都了解和切近的一種仇恨）。被壓迫和被剝削羣眾的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任何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但是，這封信的作者大概沒有估計到：政策乃是一種科學，乃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自空而降，不是可以白白得到的；無產階級若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種政治家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該信作者明白了解，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只能是工人蘇維埃，而不是議會，凡是至今尚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最有學問的，是最老練的政治家，還是最誠懇的社會

主义者，是最淵博的馬克思主义者，是最誠实的公民和謹守家風的人，但他总是一个最凶惡的反革命。然而不讓‘苏維埃的’政治家加入議會里去，不从議會內部來瓦解議會制度，不由議會去准备苏維埃將來勝利解散議會这一任务，这样是否能够使苏維埃战胜議會呢？——这封信的作者連这个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曾想到提出这个問題的必要。但同时該作者却說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党必須根据科学的原則來行动。科学所要求的是：第一，要估計其他國家的經驗，尤其是这些也是資本主义國家所正在經歷或不久前已經歷过的很类似本國情形的經驗；第二，要估計到在該國內部活动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階級和羣众，絕不能僅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願望与見解、覺悟程度与斗争决心來决定政策。”

这件事真有点令人震驚。就是用最委婉的态度对我說，我的意見代表德國“左派”所犯过一切錯誤，我也有点吃不消。我必須坦白承認，当时我对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都有点估計过高。因此大家就可以理解，当我發現自己竟然被列入革命运动中幼稚分子里的时候，就覺得非有所申辯不可了。所以在莫斯科这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間举行會議的政治委員會上，我就得到一个机会把我的观点坚决地表达了出來，同时又表示反对列寧在“共產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中关于我的意見。我在發言的时候对列寧同志說，当我在英國而他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幼稚分子看待，但是“我現在已經到了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我是干这种工作的老手”。几个月之后，在莫斯科代表剛剛組織起來的英國共產党的威廉·保罗和列寧談話的时候，列寧用相当不錯的苏格蘭口音告訴他：加拉赫同志

說，“我是干这种工作的老手”。这使保罗不禁捧腹大笑了。

可是，一般地講，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間獲得了很有意义的經驗，也經歷了一些風浪。杰克·唐納、約翰·里德以及其他几个人和我一同組織了一个“左翼集团”，在每个問題上都为維護最左的观点坚决地進行斗争。有一天，当我正在大会上發表演說反对参加議會的时候，來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交給了大会的主席。主席打断了我的演說，向大会宣讀这份电报。电报是从英國拍來的，它說：“在与工党联合的基礎上，共產党已經在英國成立。它向第三國際伸出它的手”。坐在台下的拉狄克还是用他那种典型的刻薄口吻說，“加拉赫同志这可高兴了。”

“对了，”我回嘴說，“我希望这份电报會讓拉狄克同志高兴。可是你要注意，电报上說向第三國際伸出它的手，而不是伸出双手。他們是一只手伸向第三國際——另一只手通过工党伸向第二國際，如果拉狄克同志就因为这一点而滿意的話，那就隨他的便吧。”

又有一次，英國社会党的一个代表（現在他是我國某工会的干部，又是工党議員候选人）發表演說，他給听众一个印象，好像共產國際接受并且听从了英國社会党的領導。随后我在發言的时候就把列寧和他的同伴們形容得好像生活在政治愚昧的黑暗中，由英國社会党的这位代表來用智慧的光輝照耀他們，使他們走到真正認識英國政治的境界。我講話的时候，“左翼集团”鼓掌欢呼。我一講完，列寧就立即要求發言，他說：“加拉赫同志說了一段笑話，代表們好像很喜欢听。可是这不是說笑的事，它太嚴重了。”接着，他就說明为什么他認為参加議會活动以及同工党联合這兩件事，是英國革命政党工作中的必要部分。他說英國社会党的这位代表的結論是正确的，可是他举出

來的論点是錯誤的。(我插嘴說，“他的論点向來是錯誤的。”那个代表高声喊叫“我抗議”，但是沒有一个人理会他的抗議。)

在开会期間，在大歌剧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主席台上坐着各國党的代表。大部分代表，像意大利的謝拉蒂和德國的保罗、列維，都是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在他們本國的社会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除此以外，很長時間以來，不同國家的代表团，如包括斯諾頓夫人(現在已經是有爵位的夫人)以及那些和她同类型的人的英國代表团，曾先后到苏維埃俄國參觀訪問。这些代表团，都是一班庸俗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俄國工人對他們實在不勝厭煩。这次在大歌剧院中的示威大会上的主要發言人只有托洛茨基，可是在他發言以前，先由別的人發言。英美代表团，不論左派右派，一致同意由我代表它們發言。輪到我講話的時候，主席季諾維也夫叫拉狄克先致介紹詞。拉狄克的發言，正如美國人所說的，“給我大捧一頓”。他說我是純粹由工厂出身的無產階級。等到我站起來的時候，來了一個动人的場面——許多人高呼：“工人，工人，工人同志。”他們看見工人的時候是何等喜歡！听众里面，只有一个人沒有用任何方式參加这种热烈的表示，那就是那天晚上發表演說的托洛茨基先生。他板着臉坐着，不声不响。

散會的時候，人們都來找我談話，可是托洛茨基沒有來找我。他从我旁邊走過去，好像根本沒有我这个人似的。以后我在大會和委員會里遇見過他不少次，但他從來沒有和我交談過，也從來沒有同我握過手——大家知道，在俄國同志中間，這是一種很普通的習慣。托洛茨基代表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突出的類型，這一類人只有在為了要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而需要利用工人階級的時候，才肯費一點時間在工人身上。毫無疑問，

他自己的那一套花样玩得很漂亮。可是关于他在革命和建立紅軍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近年來却有人提出了一些極其荒謬的意見。有人認為他攻击斯大林是出于革命者对錯誤趋向的一种憤怒。但是，我們应当記得，就在革命以前，他也同样攻击过列寧。下面不过是一个例子：

“举一个关于托洛茨基对列寧、对布尔什維克党、对布尔什維克的‘真理报’的看法的典型例子。1913年4月，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給孟什維克領袖吉黑澤說：‘專門以利用俄國工人运动中的一切落后現象为業的、特長于挑撥离間的列寧处心積慮地挑撥起來的腐朽的不和睦現象，看來是如何無聊的紛爭啊……列寧利用“真理报”做工具來進行宗派主义的陰謀和毫無原則的腐化活动……’”（魯·弗·安德魯斯著“托洛茨基真象”）

托洛茨基虽然有他自己的小集团，却一向是靠近孟什維克的，他恨列寧，恨布尔什維克，恨他們所执行的工人階級政策。直到1917年7月，整个潮流变得有利于布尔什維克的时候，托洛茨基为了避免完全孤立，才加入了布尔什維克党。对于准备力量來貫徹革命這項工作，他並沒有真正地参加進去。这可以由一件事实証明：全俄苏維埃大会在6月3日开会，孟什維克領袖澤列捷利在会上替那时还存在的臨時政府辯护的时候強調說：

“目前俄國沒有一个政党會說‘把政权交給我們。你們走！我們代替你們。’俄國並沒有这么一个政党。”

（当他說這話时，会场气氛是極其緊張而沉靜的。）突然，像一声霹靂似地有人回答說：“有这样一个政党”。瞌睡的代表們好像触电似地醒了。当列寧从大廳中間走上講台的时候，孟什維克的主席团大为驚慌。列寧說，“澤列捷利說俄國沒有一个政党會說

它願意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說有。沒有哪個政黨能夠拒絕政權，我們黨也不拒絕它。我們黨準備隨時接受全部政權。”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呼聲，是為了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而建立起來的革命政黨的呼聲——這個政黨里沒有托洛茨基的地位。他不但沒有幫着把它建立起來，反而聯合孟什維克盡力阻礙它的成長並摧毀它。

在那次代表大會期間我所結識的最好的同志之一是礦工領袖謝爾蓋耶夫(阿爾基奧姆)。他曾經在澳大利亞和美國作工，會說流利的英語。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時候，他才18歲。他是那一次跟隨列寧一起進行鬥爭的多數黨人(布爾什維克)之一。他告訴我自從那一次歷史性的事件以來的黨的許多歷史故事。在這許多故事里面，我經常聽到一位同志的名字——我是從謝爾蓋耶夫嘴里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這就是斯大林同志。令人奇怪的是，出席第二次大會的代表竟沒有幾個人知道約瑟夫·斯大林。當我們在莫斯科進行共產國際的工作的時候，他正在各處戰線上指揮作戰。謝爾蓋耶夫表示對這位同志有最高度的信任。他說：“屢次三番，我們政治局遇到似乎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望着斯大林同志。他就會站起來，平靜地說很少幾句話，就對我們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提出了很容易解決的辦法。”謝爾蓋耶夫是政治局委員之一，他所說的都是他知道的事。也許他的話使我对煥赫一時的托洛茨基更有意見。因為他對於這位所謂“革命(?)領袖”的評價是非常低的。總而言之，1920年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听到了許多關於斯大林的事，可是沒有見到他。直到1923年我才和他見面。

大會快閉幕的時候決定派遣代表團到巴庫出席正在那里舉行的東方人民代表大會。約翰·里德和我被選為說英語的國家



的代表团的代表。我和約翰·里德一样对参加这个会议有着極大的兴趣和期望。巴庫对我是一个新奇的地方，我想我一定会遇到从來沒有遇见过的各种类型的人。当我们正在積極准备的时候，我在旅館里接到通知，說列寧要見我。

我就先去找我的老朋友波里斯·萊恩斯坦。他是从美國來的，是社会主义工党的老黨員。然后我去見列寧同志，看他要講些什么。因为列寧說的英語和我說的英語有些不同，我恐怕語言上會發生困难，所以平常总帶着萊恩斯坦同去。我到了那里，和平常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因为在代表中間和在俄國党的同志們中間，大家都知道列寧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在委員會里我常和其他同志激烈爭辯。有一次，一个代表極橫蛮地攻击我，說了一些伤害我个人尊嚴的話。列寧就打断他的話說：“不行，不容許对加拉赫同志說这样的话。他現在犯了錯誤，他將來还会犯錯誤，可是他始終是忠于革命的。”

我們坐下來，列寧对我說，英國國內發生了大事。阻止对苏战争的行动委員會已經成立。然后問我：“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國？”

“回國嗎？”我叫了起來，“暫時还不。我要到巴庫去出席農民代表大会。”

他搖搖頭。“不，不行。”他說，“誰都可以做代表去出席農民代表大会。可是現在英國那边需要你。你什么时候可以走？”

“要是你这样說，那好吧，反正我没有什么衣服行李需要收拾，也没有什么別的事。只要拿到票子，明天晚上就可以动身。”

“明天晚上？”他用他那种探索的神气望着我，“今天晚上走怎样？还有你們三位同志也要走。”

“今天晚上？”我又叫起來了，“我怎样也拿不到今天晚上的

車票。”

“我去弄車票，”他說

“好吧，”我說，“可是你得催促管理处的那家伙。”

“这事交給我吧，”他說，“你今天晚上走嗎？”

“如果你要我走，我就走，”我說。他拿起電話，接通了管理員，叫他們趕快。等我回旅館。我的票子已經在那里等我了。這真爽快。

我离开格拉斯哥的时候，蘇格蘭的同志們正在商量建立蘇格蘭共產黨是否合適的問題。他們很反对最后建立英國共產黨的聯合委員會。聯合委員會代表着英國社會黨、社會主義工黨的大部分黨員和很小一部分獨立工黨黨員。可是蘇格蘭的同志們認為這個聯合組織是極端機會主義的，除少數人以外，大家都不願參加它。經過在政治委員會和大會里的激烈辯論，我痛切地認識到我的立場軟弱不穩。列寧同我談了許多次話，有一次他向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你講過，”他說，“所有進議會的工人階級代表早晚都要腐化。我要問問你：如果英國工人把你派到議會里去為他們作鬥爭，難道你也腐化嗎？也會出賣他們嗎？”

“啊！”我說，“這問題問得不很恰當。”

“這是一位同志可以向另一位同志提出的問題，”他說，“如果你進了議會，你會腐化嗎？”

“不會，我想我不會，”我回答說。

“那末，”他說，“你難道還不明白這樣你就更應該到議會去向人們表明革命者是怎樣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鬥爭的嗎？這話你同意嗎？”

“這個，”我有点勉强地說，“這倒有点道理。”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回到英國以後，你要參加新成立的共產黨嗎？”

“回去以後，最好先和我那些蘇格蘭同志們談一談，”我回答他。

“你錯了，”他說，“假使你這樣回去，那就是讓他們來影響你。你的任務是回去影響他們。你回去以後參不參加新成立的共產黨？”

“參加，”我說，“一定參加。”

“那末，你是不是還要到蘇格蘭去，”他問，“讓你的同志們也參加？”

“我要盡我的力量，”我說。

“那好極了，”他說，“你會感覺到這並沒有什麼困難。”

“好罷，”我說。

我和他分手以後，就乘火車到摩爾曼斯克去。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傑克·唐納和大維·蘭姆賽都在車上。我們傍晚離開列寧格勒。機車的燃料是木柴，走起來非常吃力。到了後半夜，我們覺得呼吸困難而醒過來，原來我們坐的車廂被機車上噴出來的火星燒着了。火車停了下來，乘客下了車。西爾維亞在一個煙霧弥漫的臥鋪室里喘氣，我跑進去把她抱出來，放在鐵道上。從那時起，直到我們和她在北冰洋海岸一個叫維達古巴的小地方分手為止，照顧她的責任一直是由我負擔的。一路上她相當狼狽，很需要人照顧。

我們在北冰洋上的捕魚小汽艇里度過的第一夜實在是可怕的一夜。船簡直像翻筋斗似地上下顛簸。西爾維亞病得很厲害，我們讓她躺在小艙口的頂上，給她蓋上防雨布。我把自己嵌在艙口和上舷中間，整夜扶着她。這一夜，好傢伙！海水向我們

这只孤立無援的小船猛冲，每一次都有把西尔維亞和我冲到大海里去的危險，可是我們終于坚持過來了。后來西尔維亞害了一点受伤感的病，她背誦了她小时候寫的一首詩，寫她在暴風雨中怎样爬到一棵橡樹下面，“橡樹怎样保护了我”。接着她哭着說，“加拉赫，你是我的橡樹！”我一生被人家比过各种不同的东西，我想再沒有比西尔維亞把我比得更絕的了。

到了早晨，我臉上像盖了一層雪似的那樣白，因为海水干了粘在我臉上。我只有刮掉它。我們被顛簸得非常难受，只得轉舵順着海水流到一个小港灣里，这地方叫齐普諾瓦洛克，是俄國的一个信号站。我們在站上停了一天，信号站的軍官們招待了我們，給我們馬鈴薯和罐頭牛肉吃。他們从哪里得來的罐頭牛肉呢？这件事很有趣。一支英國軍隊在阿尔漢格爾登陸，很困难地向南往彼特拉薩沃德斯克前進，一路上有游擊隊追趕着他們，接連不斷地由四面的森林里向他們攻击。當他們接近彼特拉薩沃德斯克的時候，向这个城下了最后通牒，命令当地居民集合在城中廣場，并把所有的武器堆在廣場中心，等候英軍在次日中午12时進城接收（我在当地的博物館里看見了這張布告）。可是游擊隊有通訊員，把这事預先報告了彼特拉薩沃德斯克的苏維埃。当地苏維埃又報告了強大的紅軍部隊。半夜里，侵略軍为了准备第二天勝利入城而正在休息的時候，遭到了打击，他們被打得从原路逃竄回去，一路不停地一直逃到船上，向英國海岸駛去。他們所有的粮食和大批物資都丟下來了。你很难想像有多少北方的農民穿着用最細致的英國卡嘰做的漂亮衣服，而且，就像我剛才所說的，还有一部分罐頭牛肉等我們在1920年秋季去享受。

在信号站就擱了一天一夜以后，我們又开船出海。开始的

时候还平安無事。可是等到初秋的暮色籠罩我們的時候，海上波濤洶涌，又是一夜驚恐——同前一天相比，只能說更糟。到了早晨，我們还是不得不听任船身随波逐浪地漂流。这一次我們在維达古巴村的海灣中靠了岸。蘭姆賽、唐納和我三人睡在一間沒有人住的草屋里面，西尔維亞由一对漁民夫妇收留了，她得到很好的照顧。而我們就只好尽量想法照顧自己了——这里我們大可以振振有詞地提出男子应当享受平等待遇的問題。次日早晨起身，我們出去散步。轉了一圈就到漁民家里去看西尔維亞。这时我們才知道那天早晨有船出海，开往挪威北部瓦尔多，西尔維亞拋掉我們，坐那只船走了。这实在叫我們感到遺憾。中午以后，我們又把小船开出去。結果我們發覺前兩次風浪不过是北冰洋同我們开开玩笑而已。这一次可真够受的！北冰洋似乎因我們坚忍不屈而老羞成怒了。这一回唐納、蘭姆賽和我嚴肅地握了手，期待着最坏的命运。有一位有鬍子的比利时老头兒和我們同行，我永远忘不了他。他先和負責駕駛的水手談了一下，然后到我們蹲着的船头甲板上來。他張大着眼睛，喊道：“現在沒有法子知道我們是誰了。”他說的話虽然顛三倒四，不合文法，可是我們懂他的意思，他是用报警的声音告訴我們航海罗盤坏了，我們沒法針對着瓦尔多校正方向，因此就不知道我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我們前往俄國的途中，航海到摩尔曼斯克那一段路程可以說全部都在日間，而由瓦尔多到摩尔曼斯克，也不过才走了 27—28 小时左右；回來的时候，我們是星期日下午三时由摩尔曼斯克出發，而第二个星期日早晨六时半才到瓦尔多。这段航程是那样艰苦危險，以致我們不得不在上岸以后就打电报給莫斯科，告訴他們不要再讓代表們走这条路。可是不幸又有兩個法國代表已在途中，其中一个就是我在莫斯科比賽

足球以后遇见的勒菲弗尔同志。他们已由摩尔曼斯克出发了。船上除他们以外，还有驾船的三个渔民。这只船结果下落不明，从此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因为没有护照，我们只好艰苦地穿过一道峡湾到德伦的英，再从那里到奥斯陆（当时叫作克里斯提阿尼亚）。在克里斯提阿尼亚，我们隐蔽着自己，等候取道回国。可是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大维·兰姆赛出去散步，被警察逮捕，关进监狱，后来就被驱逐出境了。这件事给我们一点烦恼，同一天，我们又遇到更烦恼的事。奥斯陆党组织有一位同志慌慌张张地赶来找我。他交给我一份电报，并且叫我赶快行动起来。我看了电报，是卑尔根党组织拍来的，上面说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已经到了卑尔根，遇到困难，要求加拉赫立刻到那里去。我安排了一番，就由奥斯陆乘火车前往卑尔根。到了卑尔根，有一个会说英语的同志在等着我。他找到了我并介绍了自己。

“西尔维亚出了什么事？”我问。

“喔，”他回答说，“她很好。她昨天晚上乘船走了！”

所以，就那样吧。再会，西尔维亚——我还会在党内见着你的，可是只有一个很短的时期。

但是，我虽没有见到西尔维亚，却见到了别的人。在卑尔根，我遇见一个美国籍的爱尔兰人伊门·麦卡尔平和爱尔兰无产阶级领袖杰姆·康诺利的儿子罗迪。我们在开往纽卡斯尔去的一只船的煤舱里找到三个人的铺位。天毛毛亮我们就从码头上溜下船去，趁看守人朝前走的时候我们爬到后舱，一声不响地沿着甲板进到下面的煤舱中。我们带着两个面包和五及耳水（一品脱等于四及耳——译者）。舱里非常黑暗，加以继续不断地由下往上铲煤，因此很自然地，当我们把面包撕成一片片吃的时候

候，牙縫里就会有煤屑，格格地發响！我唱歌从來沒有得过獎，而且，事实上現在当我一唱歌的时候，只能惹起人們的抗議。但是那次橫渡北海，我的旅伴們不断地要求我“再來一个”，給他們消愁解悶。

我們平安地到了紐卡斯尔，不过只能躺在艙里，要等到甲板上一切寂靜的时候才能上岸。大約清晨三点鐘，我們从碼頭溜到了紐卡斯尔市区。我們的样子很难看，黑得像扑克牌的黑桃爱司。我們找到了朝聖街，走到一个救世軍招待所。招待所的大門是鉄格大門，里面还有一扇玻璃門，透过玻璃門可以看到一道好像是在欢迎着人們的灯光，我們按鈴，一个沒有同情心的家伙开了玻璃門，隔着鉄格大門打量我們。我們沒有引用聖經上的話，沒有說“看哪，我們站在門口叩門”；我們只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們進去盥洗一下，弄点什么东西吃。“根本沒有办法，”他說。我們向他央告，可是他板着一副鉄青的臉帶着猜疑的神气，掉轉身就進去了。“你們說他算什么？”我問我兩位同伴。他們的回答过于坦率，無法見諸文字。我們回轉身來奔向警察。很明顯地，他也在怀疑我們。我想，先下手为强，就用極端憤怒的声調說：“这可笑不可笑！因为机器坏了，他們这时候叫我們回家，現在又沒有办法乘火車。就是我們不做工，他們白給錢，也不过几个先令的事，他們这样办，为的省錢罢了。現在这个地方的人又因为我們干活干得太起勁，搞成这个样子，就叫我們走。你看怎么办？”警察很同情我們，他好像并不怎样贊成救世軍。他把我們帶到一家客店，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在那里洗洗澡，吃点什么。果然，客店的侍者讓我們進去。我們洗过澡，吃过早点，身上略为刷刷，就乘火車由紐卡斯尔到爱丁堡。我把那兩位留在那里，独自乘第一班火車到格拉斯哥，回到培斯利我的家里。

---

---

## 第二章

要不要对年青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公开宣战呢？疯狂叫嚣的丘吉尔坚决主张这样干。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恨之入骨，愿意支持可以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土上找到的任何军事冒险者，他也愿意把英国投入任何疯狂的冒险，代价如何，在所不计。但是工人们的意见却不是这样。早在十月革命刚一爆发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发生了一件真正重大的事。在所有国家里，他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尽管从讲台上、报纸上和教堂里不断散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谎言，他们还是坚决地支援这个革命。他们知道干涉者是俄国人民的敌人，也知道其他国家那些与工人阶级为敌的人在支持这些干涉者。就在这个严重关头，他们表明：已经到了制止政治和军事冒险者的时候了。

在国内每一地区，工人们都起来了，而且表明自己的意见。我记得，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到格拉斯哥的圣安德烈大廳去参加一次盛大的集会。会场里挤满了人，外面也潮水似地拥挤着很多人。这一次的主要演说人是已故的菲利普·斯诺顿。那时候有些报纸认为他是布尔什维克，现在看来这当然是很奇怪的。马克斯顿先生在台上说了几句话，他说：“我们今天讲话的人被人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好吧！他今天在此地可以随便了，因为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呀。”他这些话是顺着当时潮流说的。就连显赫



一时的、現在搖身一变而成为爵士的派特里克·杰·道倫，那时候也不反对以布尔什維克自炫，而且时常喜欢俏皮地把格拉斯哥称为“英國的彼得格勒”。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有多少人会跟着你走一程，随后又改途他往而讓你反而覺得高兴呢！

另一方面，軍火正在运送給苏俄境內的每一个冒險者。可是，尽管劳合一乔治、丘吉尔、寇松等人費尽了力气，年青的紅軍在斯大林的領導下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白軍，把他們赶出了他們夢想控制的土地。

好像一切都已过去，苏俄人民可以有一个和平时期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法西斯分子的先輩畢尔苏斯基率領的波蘭軍隊又來攻击年青的社会主义共和國。現在看來，代表着欧洲“旧政权”的最落后、最無知、最殘暴的势力的畢尔苏斯基和波蘭貴族，当时毫無疑問地是在为英美資本家效劳。波蘭軍隊有一个时期曾經有不小的進展。可是，就在報紙上登載着波蘭軍隊占領基輔、英王乔治五世致电畢尔苏斯基元帅祝賀（据報紙上的宣傳，我國的皇家貴族都是偉大的民主主义者）的同一天，英國工人对反动派進行了最沉重的打击。倫敦碼頭工人拒絕把运往波蘭的軍火裝上“水手乔治”号輪船。假如說英國工人当时需要新的鼓舞，那末从这件事他們就獲得了鼓舞。英國各地經常有示威运动，每一面旗上都寫着“不許干涉苏俄”。各地所通过的決議，像潮水一样地涌向工党和工会运动的領導机构。碼頭工人工会正式表示支持倫敦碼頭工人的行动，并且宣布反对僱用碼頭工人裝运軍火給苏俄的敌人。

波蘭人的勝利不过是曇花一現。紅軍將領們慎重地准备了進攻的部隊，展开了行动。不久波蘭人就被赶了回去，直到華沙的門口。英國資產階級看到紅軍西進，决心要阻止它！7月21

日勞合一乔治在下院發言，暗示英國要參加戰爭，同時英國海軍則奉令在波羅的海待命。一想起無產階級政府就把他那富于表情的、具有貴族尊嚴的鼻子翹得高高的寇松勳爵，在8月3日向蘇聯提出了蠻橫無理的照會，維護波蘭走狗，進行戰爭恫嚇。8月4日工黨總部通電各地方組織于星期日（8日）舉行示威。這次示威波及全國各地，其規模是前所未有的。由清早到深夜，各城市的街道上，都是此响彼应的示威者的脚步声。工人大軍在行動了。這支大軍準備向前邁進，一定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停止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的戰爭。

在這種形勢之下，工黨和工會的領導人物于星期一（8月9日）在下院舉行了會議。他們一致決定向政府表明：“有組織的工人要用自己在工業中的全部力量來擊敗這個戰爭”。

四天以後，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中央大廳舉行了特別會議，這次會議完全支持關於建立“行動委員會”並舉行罷工以“反對以任何方式用海陸軍干涉蘇俄政府”的決定。

對蘇俄宣戰並沒有實現。勞合一乔治面臨着工人階級大起義的威脅，撤銷了這個提案。寇松和丘吉爾也就不情願、十分不情願地跟着他這樣做了。戰爭製造者被迫退却了——等候命運之神賜給他們下一個機會。英國和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一個奇特的、不穩定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一時沒有戰爭，也沒有和平。但是，戰爭是避免了，這一切要歸功于工人階級。在這一次，和其後許多次一樣，他們表現了對於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全世界工人的先鋒隊——的認識和忠誠。

我回到家裏的時候，這些事已大部分完成了。需要我立刻注意的問題就是蘇格蘭同志們和新成立的英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我是9月初的一個星期三到家的。星期四我和最接近的同

事联系了一下。我听他們說，在星期六要开会，是第二次这样的會議，討論成立蘇格蘭共產主義工黨問題。我設法参加了这个會議，这是一个性質非常複雜的會議，有的代表英國社會黨，有的是獨立工黨，有的是社會主義工黨，還有約翰·麥克里恩的蘇格蘭工人共和黨。但是占優勢的還是從各工廠來的克萊德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大會的主席是我的老同事約翰·維·勒基，他是那一時期最優秀、最堅強的宣傳家之一。他向大會建議，在採取任何步驟建立新組織之前，必須先讓我作報告。社會主義工黨和蘇格蘭工人共和黨人竭力反對，因為他們想左右會上的提案。幸而主席不但掌握會場時十分堅決，而且他有絕大多數代表的支持。因此，雖然少數人還想阻止，我終於獲得發言機會，作了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工作的報告。在報告中我促請聽眾注意：每一國家只能有一個共產黨。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都應當明了這一點。單是舉出任何這樣一個黨的缺點並不能成為一個革命者不參加這個黨的理由，因為他的責任是加入這個黨，如果黨真有缺點，就加以糾正，使它成為真能擔當它必須貫徹的偉大任務的黨。我又告訴聽眾，我已經告訴莫斯科的同志們我要加入這個新成立的黨，還要努力使我的蘇格蘭的同志們也加入這個黨。所以我建議他們放棄另行組黨的主張，而成立一個協商委員會，和倫敦的執行委員會接觸，採取必要措施來實現統一。

一等到我坐下來，憤怒情緒驟然爆發。社會主義工黨同樣猛烈地攻擊新成立的共產黨，攻擊主席，攻擊我。約翰·麥克里恩的主要助手杰·德·麥克杜加爾把什麼罪過都推在我身上，說整個問題都是主席和我兩人的陰謀。可是會議終於因為約·魯·坎貝爾發表的一篇非常出色、理直氣壯而使人信服的演說

而又回到了现实問題。对于这篇演說反应使人清楚地看出大多数代表的态度和願望。大会通过決議，决定联合起來，并立刻为此進行协商。少数不滿意这个決議的代表离开会场之后，會議就开始选举代表此次會議的协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約翰·維·勒基領導。我因为不是与会代表，不能当选为委員，可是他們建議我可以以“顧問資格”参加这个委员会，这样就解决了这个問題。

不久，协商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开始了商談。結果决定召开一次新的統一會議，以消除协商委员会所代表的組織和共产党之間的分歧。會議于1921年1月29日在里子的勝利飯店举行。在接洽这个地点开共产党的會議的时候，我們說我們是經營水菓和食品的商人，这样才得到了允許。为了要真正有效地联合起來，又决定以公开投票方式重选全部統一會議代表、所有党的負責干部和党执行委員。共产党本來有一位最重要的干部，党的主席。主席是阿瑟·麥克曼納斯，他是一个能干的宣傳家，在党内很孚众望。协商委员会的苏格蘭同事要提名我为党主席，我劝他們不要这样做，指出共产党的代表占極大多数，他們当然要选他們很喜欢的現任主席。但是我的同事們坚持要把我的名字提出去，結果还是把我提名了。我得到所有协商委员会的代表的支持，其余的人都支持阿瑟·麥克曼納斯，他留任主席，票数超出很多。由于他們坚持提名我担任这个特殊的职位，他們有效地阻止了我参加执行委员会，因为會議有一条規定，任何人被提名为一个負責干部的职位的候选人，就不能被提名为执委候选人。統一會議閉会时情緒非常热烈。所有被选担任負責职务的人員在回到他們的崗位上去的时候都决心做好工作，來推進这次會議所要完成的事業。

但是这时已經种下了分裂的种子(这还是比較溫和的說法),尽管当时我們并不覺得;我們不久就会嚐到这些种子所結的苦果。不过,先不談这个,我們应当談一談工人运动中出現的別种形式的联合。鐵路工人处境很困难,已經在罢工。运输工人那时还不如現在坚强,可是已經在向前迈进,積極活动。礦工在战后受到惡劣待遇,正在集結他們的力量准备進行斗争來击退資方的進攻。这三个工会的領袖們联合起來,組成大家知道的三角联盟。不論是誰在遭到攻击时或者因为提出要求而需要支持时,他們都并肩站在一起。

1921年2月政府宣布准备制定法案,終止对礦山的控制。3月24日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礦主立刻張貼布告,以七天为限,提出要大大削減礦工工資。3月31日开始停工。

礦工向三角联盟的盟友求援。鐵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領袖于4月8日举行會議,号召工会會員于4月12日罢工。这件事对整个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各处的情緒都很高漲。那些还没有行动起来的人也随时准备响应号召。失業者不断增加,新成立的“全國失業工人运动”組織了各地的失業工人示威,保証失業工人支持礦工和他們的盟友,保証不做破坏罢工的工賊。大家認識到对礦工的攻击就是对全体工人的攻击,如果礦工被击败,其他的工人也会随着被击败。

我在全國各地羣众大会上演說。关于工人的情緒和决心是一点也沒有疑問的。4月12日將是一个偉大的日子——从來沒有过的最偉大的日子。在那一天,鐵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將“放下工具”与礦工并肩進行抵抗。这些巨大的力量一旦起來战斗將要發生什么事情呢?这对政府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但是对于三角联盟的領袖說來,这甚至是更加嚴重的事情。他們开始感到恐

慌，他們勸告礦工領袖通電各礦區，通知已經離開礦井的抽水機手回去保持礦井的安全。憑借這個理由，他們安排了政府和礦工領袖間的一次會談，定於12日舉行，把他們自己號召的罷工日期推遲到15日。與政府會談除了對於想破壞罷工的人有利以外，沒有其他結果。

“偉大的日子”現在改到星期五，4月15日那天早晨，托馬斯和貝文將代表他們的工會發出會員們迫切等待着的號召，也是整個工人階級正在等待的號召。星期四(14日)晚上，弗蘭克·霍奇斯，英國礦工聯盟的一個年青的、野心勃勃的書記“碰巧”在下院里面。他被“勸請”在議員(多半是保守黨議員)的集會上演說。他在演說中提出了解決辦法。他這個舉動並沒有經過執委授權，而且完全違背他們的意思。當然，他們拒絕對他的話負責(究竟他說了些什么話也從來沒有搞得太清楚)。這件事使得三角聯盟的其他領袖有了他們所需要的借口。第二天，他們經過激烈的討論之後，沒有發出罷工號召；杰·赫·托馬斯由團結大廈全國鐵路工人工會的總部出來，看了看聚集在那里的殷切地等待着新聞的記者們，說：“罷工取消了。”完了！工人階級的“黑色的星期五”是資方巨大的勝利，他們得到了最大的收穫。杰·赫·托馬斯、弗蘭克·霍奇斯、羅伯特·威廉斯(這三人後來都脫離了工人運動)和歐內斯特·貝文是使工人階級遭到這次慘敗的人。

我在這段時期曾經到全國各地進行宣傳工作，爭取團結起來支援礦工。我一度被邀請到伯明翰演說，後來又到墨西塞德各碼頭講演了一星期。應該指出，這次宣傳運動是由全國車間代表委員會所組織的。我到伯明翰的時候，只有布里斯托爾街學校的大廳(那時伯明翰的普通集會地方)可供我們開會。由於

傳單早已發到各工廠，那次到會的人十分擁擠。當時伯明翰的任何集會都有刑事偵察處的人前來監視，這一次來了三個人。我的格拉斯哥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約·維·勒基也來了。他早已經在考文垂進行了一些時候的鼓動工作，聽說我到了伯明翰，就來看我，互相問好。這次集會的主席在作過簡短發言後便介紹我同聽眾見面，然後我開始講話。我講了55分鐘，說明一般工人特別是礦工的情況，而且竭力說明必須團結起來作礦工的后盾才能確保整個工人階級的前途。我演說完畢，主席說：“我在聽眾里面看到一位老朋友，我想我們應當請他說幾句話。”然後他請約·維·勒基發言。勒基走上前去，激昂慷慨地發表演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演說。他的話使聽眾的情緒非常激動，最後大家站了起來，看樣子好像要把那幾個刑事偵察處的人撕得粉碎。那三位先生面臨火山爆發的危險，坐在一旁，面色發白，渾身直抖，直到散會才高興起來，因為他們可以出去再呼吸一下自由空氣了。

下一星期我到了利物浦。由星期一起在幾次集會上發表了演說。碼頭上貼出廣告，說我星期三中午去講話。我去的時候，中途被利物浦刑事偵察處的兩個人員攔住了。他們只說接到伯明翰的電報，要把我逮捕看管，等伯明翰的押解人員前來提取。這沒有什麼說的。我只好不去碼頭，而到利物浦拘留所。我竭力忍耐，等候押解人員來把我往南押解。等到押解人員到達，我發現就是伯明翰刑事偵察處的一個人員。他對我很客氣，告訴我本來應當把我銬起來，可是他不這麼做，他不把我當犯人看待。在火車上，我从他的談話中看出他對工人運動並不是毫無同情。同車廂還有幾個乘客，其中一個老年人和我們談了不少話。談到美國的時候，我說我去過。談到德國，我說我去過。談

到俄國，我又說我去過。這位老先生不勝羨慕地望着我說：“你好像到過許多地方。”

“是的，”我回答他，“很不少。”

“現在大概你又要到哪兒去旅行吧？”他說。

“對了，”我說，“我是——我這一次大概要離開這兒很長時間。”

他搖搖他那蒼老削瘦的頭，說，“你是一個幸運的人。”我的押解人員幾乎失聲笑出來。幸而我們已經到了斯塔福德。他說，“來吧，威利，喝杯茶好嗎？”我們走了出去，看見點心店在車站頂那頭，有不少路。我們這節車在列車的前面一部分，列車後面幾節是一連串的郵車。我們進了點心店，我的押解人員替我要了一杯茶和一個圓麵包，自己要了一瓶黑啤酒。我們還沒有吃到一半，就聽到開車的哨聲。他急忙趕到門口。“來呀，威利，”他喊道，“車要開了。”我放下杯子就跟着他走。他沿着月台飛跑。火車已經開動，當他跳進那扇還沒有關好的車廂門的時候，火車移動的速度越來越快了。車上的一個侍者走到車廂門口想要關門。我大叫：“喂！我要進來。”這使他怔了一下，我就乘這一剎那的機會跳了上去。我進了車廂，看見那位押解人員已經走入過道。我跟着他走，他走到過道的盡頭，像一個礦工那樣蹲下來喘氣休息。他說“可跑壞了！”

我說，“是呀，我总算趕上了。遲一秒鐘侍者就把門碎地關上了。”

他突然明白過來。他用驚慌的目光盯住我，驚叫說，“天哪，威利！要是你沒有趕上火車，那怎麼得了呀！”

“我不知道，”我回答說，“可是既然我們趕上了，我們還是不要提這件事吧。”



“我永远不会忘記你，威利，你原是可以把我的飯碗打破的。”

到了法院，我为我自己辯护，一位参加了工党的律师吳·赫·湯普遜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幫助。他一貫为被控犯“政治”罪的工人階級战士辯护，又热心又有能力，因此对整个运动有很大的貢獻。審訊席上坐着的是一个有薪給的推事。我不曉得他的出身，可是我可以發誓，他决不是我的朋友。檢察官首先对我提起公訴：案情是被告威廉·加拉赫在布利斯托尔街学校的一次共產党集会上發表煽动性言論等等。我立刻反駁，要求撤銷这个案子。我并没有在起訴書中所說的那一天在共產党集会上發言，因为那天我是在全國車間代表委员会召开的集会上講話。我把傳單提出作为証明。推事望了望檢察官，看他有什么話要說。接着檢察官作了一个驚人的宣告，他說全國車間代表委员会是共產党的分支！我說，“再沒有比这更加荒謬絕倫的了，因为全國車間代表委员会是1917年成立的，而共產党是1920年才成立的。”我又說：“根据我的辯护律师的意見，我要求把这件案子撤銷，因为起訴的理由是錯誤的。”推事說了很少几句话，接受了公訴。檢察官繼續陈述他的理由。他說加拉赫的演說是很聪明而又很謹慎的，他没有什么想要引証的地方，但是为了了解这篇演說的煽动性，必須联系繼加拉赫之后另外一个人發表的一篇演說來看这个問題，所以他建議从那个人的演說中引証几句话。我勃然大怒地插嘴說：“我反对！我一輩子也沒有听到过这种办法。”我向法官說：“如果閣下再看一看傳單，就可以知道在傳單上宣布的是只有我一个人演說。要是还有別人講話，我不能負責，不能引証他說的話來控訴我。”信不信由你，推事竟決定檢察官可以引証別人的演說辞。檢察官就引証了兩三段比

較激烈的話，還帶進來一個刑事偵察處的人做証人，叫他陳述開會時的情況。據他說，我講的時候有很多次掌聲，可是沒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而臨到那一個人講話的時候，情況就可怕極了——他講了一些極其野蠻的話，並不斷地威脅他（刑事偵察處的人）和他的同伴。聽眾跳起來拚命喊叫。過了一會，他又提到聽眾“拚命喊叫”——這是他愛用的字眼。審訊結束的時候，推事一本正經地判我三個月監禁。出庭的律師吳·赫·湯普遜和別的朋友都勸我上訴，他們認為這種判決一定不能成立。但是我當時還是很左的，我說，“不，我拒絕到一個資本主義的法庭去上訴。”

“可是你剛才就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的法庭裡面，”湯普遜說。

“是的，”我說，“但是我是被拖到那里去的”——這句話和實際情況很難符合！——“這和自己到一個資本主義法院或向資本主義的法官上訴完全不同，要是這樣做，就違背了我的原則。”湯普遜想勸我，他說我是一個傻子——在這一點上，我向來是難於說服的，而且他始終沒有說服我。我服了三個月徒刑。現在我才確信完全不應當這樣做，真是經一事，長一智。

我出獄的時候，礦工對礦主的鬥爭已經進入高潮。我直接到了費夫，幫助那里的同志們處理他們當前的繁重工作。這時候另外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對我的前途有決定性影響。共產黨辦事處被搜查了，黨書記阿伯特·英克平被捕，被控煽動罪，判處六個月監禁。黨的處境非常惡劣。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請我寫一篇短文。這篇文章的篇幅占一欄半。文章登載出來以後一個星期，我在培斯利的家中接到報館一封信，我折開一看，上面說：

“威·加拉赫先生

親愛的先生：

信內附 31 先令 6 便士匯票一張，是你刊登在‘共產黨人’報上文章的稿酬，請查收。”

我的妻子看出我的神情不對。她說：“什麼事？壞消息嗎？”

我回答說，“從來沒有這樣壞的了，”我把信遞給她。她看過後說：“退回去。”

我立刻坐下來寫道：

“親愛的先生：

我為‘共產黨人’寫那篇短文時，我是以一個共產黨員（我是個共產黨員）而不是以一個鬻文者（我不是個鬻文者）的資格來寫的。

威廉·加拉赫謹啓”

負責人接到我的信和退回的匯票，就拿給黨的總部里的一些人看。這件事立刻在黨里面傳開了。在這件事以後，同時由於阿伯特·英克平被捕而發生的一些困難，執行委員會在一次會議上便決定要我擔任黨的副主席，請我到倫敦去協助辦理黨的改組工作，並解決當時的一些困難問題。

我進黨部不久就發覺有很多不良分子在黨的各种活動中玩弄多少有點惡毒的手段。直到那時候為止，革命運動還是相當高漲的，但後來就開始低落，像潮退以後在海灘上東零西散地剩下了許多東西。黨的代表大會在準備中，在黨內，大家都深深感覺到必須徹底清洗一下。在大会開幕的前一天，老友約翰·維·勒基正在倫敦。黨的某些“操縱者”去找他，邀請他去參加那天晚上的一个小集會。他們迫切希望他能支持他們想要做的事情。不

用說，約翰先到我這裡來，告訴我關於小集會的事，徵求我的意見，看是否應該去參加。“你應該去，”我說，“我跟你一起去。”我們到了約定的地方，約翰敲開了門，很熱烈地被歡迎進去。他走進房間——我跟在後面。許多人都張開嘴招呼約翰，可是看到他帶了我進去，張開的嘴說不出話來了。那里有好幾個執行委員，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許多所謂“知識分子”。關於第二天上午的大會，他們早就擬定了一個議程。他們坐下來沉默了好一會。後來，他們里面一兩個主要人物低聲商量之後，有人建議對於要在黨代表大會提出的某些問題作簡短討論。我說：“這裡不談大會的事。”

有一個人回答我說，“但是，一些同志在一起商量一下要在大會上提出的問題，肯定是沒有害處的。”

“一點沒有害處，”我回答說。“我希望今天晚上全倫敦的代表三五成羣地討論大會的事。但是你們各位在這裡可不是代表，而是同執行委員在一起，執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也不知道這件事——這只能說是對自己的同事不忠實。有這些執行委員在場，我們就不能討論。我走的時候他們也走。那末，你們要討論什麼都可以。如果他們不跟我一起走，我明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件事向大會報告。”他們終於同我走了。但是約翰·勒基不但把這次小集會的事告訴了我，還和一兩個別的代表談起過。那天的深晚，密德蘭斯代表團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準備對參加小集會的人提出抗議。由於這一切，大會上終於給了“知識分子”巨大的打擊，把他們全部由執行委員會和黨的領導機構中清除出去。這是他們末日的開端，我們立刻把他們這批人，“連操縱者在內”，完全驅逐了。①

礦工在經過三個月的單獨鬥爭失敗後，已經在悲慘的情況

下回到礦井中去工作。現在大家的注意轉移到機械工人身上。我記得在克萊德河畔的機械工人大會上作過演說，我叫他們注意一個事實：有充分準備的殘忍的資方已經迫使沒有幫手也沒有聲援者的礦工進入拳擊場。資方讓機械工人坐在最前排觀看。這是一場偉大的鬥爭。一個回合又一個回合，機械工人關切地注視着。最後，礦工筋疲力盡，縮到角落里倒下去了。機械工人想不到却聽到資方說：“把礦工拖出去，把機械工人帶進來。”是的，下一場就該他們了。

1918年，當時的混合機器工人協會（機械工業聯合工會的前身）主席在格拉斯哥的一次集會上對會員說，他已經和政府談判好了，由於機械工人的忠誠愛國，等到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將獲得新的崇高“地位”。可是戰爭結束以後不久，機械工人就發現他們的工資又將降低——連“地位”也被否定了，因為在爭取“管理權”的鬥爭中，資方使他們認識到，無論是車間里的工人或者是代表他們的工會，對於工廠應當怎樣經營的問題，都沒有任何發言權，“管理”權只有資方才有。從快到1921年年底時起一直到1922年，調整工資的談判始終在進行中。除了機械工業聯合工會（經過新的聯合後所改的名稱）以外，別的工會也受到

① 阿伯特·英克平在監獄里的時候，黨主席阿瑟·麥克曼納斯和全國組織委員湯姆·貝爾到莫斯科去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黨的助理書記弗萊德·皮特和我這個副主席極力想把工作做好，我們發起設立一個執行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這就是後來的政治局的前身。因為黨內情況的發展，決定請麥克曼納斯和貝爾立刻回來，所以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共產國際主席，電報原文如下：“麥克曼納斯和貝爾必須立刻回來，英國黨內有嚴重困難，加拉赫、皮特（簽字）”。這個電報必須譯成俄文給共產國際主席看。譯電的人是一位蘇聯同志，他的英語相當好，可是他不知道弗萊德·皮特這個人。不幸的是俄文里“喝醉了”這個字的聲音和“皮特”差不多。電報給主席的時候，正在開會，他就照俄文唸出來，通譯員再譯成英語，就成為：“麥克曼納斯和貝爾必須立刻回來，英國黨內有嚴重困難，加拉赫喝醉了！”這一下可把他們給驚醒了！

了影响。起先机械工業的全部48个工会好像会团结在一起，但是由于工党領袖們大肆活动，結果其他47个工会都离开了机械工業联合工会而各自为政。像礦工們一样，机械工業联合工会只好孤軍作战。

罢工進行了几天之后，工会的一位担任全國性职务的干部通过劳工研究所的領導人罗宾·佩奇·阿諾特的介紹，要和我見面，商討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会見了他，听了他的陈述。他痛罵工党領袖們对机械工業联合工会的态度，又詳細說明他們是怎样用詭計和花样使其他工会脱离这个工会的。他还說：“我們現在不能靠‘每日先驅报’給我們什么支持。我們除共產党人之外沒有朋友，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們不能公开地和共產党人联合。我要問你，可不可以把你們党組織和党报交給我們支配。我們將供給我們需要散發的材料，但是在你們方面，則完全非正式地做这件事。”我告訴他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工会效劳，我們將充分發揮全國各地的党机关和報紙的作用；我願意每隔一个时期就和他見面一次，向他征求意见，索取材料。我可以对他保證不讓任何人知道我們見面的事，他可以信任我和我的同志們的審慎态度。我們那一次給机械工業联合工会幫了大忙。工党的領袖們則力圖陰險地破坏它。等到机械工人像礦工一样遭到失敗而复工以后，工党在爱丁堡举行會議。我以观察員身份列席这个會議，由旁听席上看他們投票表決共產党参加工党的問題。我看見那一位和我見過面的机械工業联合工会的干部手里举着机械工業联合工会的卡片，原來整个机械工業联合工会都投票反对共產党参加工党！他迫切希望台上的人看見他以致几乎站了起來，尽量把手举得高高的。如果他举手的时候还有些迟疑的样子，或者把那張卡片交給別的代表去投票，我对

他的看法还不至于太坏。他曾經告訴过我別人怎样出賣机械工業聯合工会，現在又是哪些人在反对共產党参加工党。我一想到这些事情，再看到他自己这样热心地表示和台上一致，我就忍不住了。我离开了會場，寫了一篇文章把我們兩人之間的一切經過情况在党报上發表。不久我遇見他，他很懊惱地責備我，說我“把他搞慘了，他從來沒有想到我会背棄他”！我本來也不應該这样做，但是我想我在这种事情上背信是可以原諒的，我气憤極了。

在工党會議發表反共演說的兩位主要人物，是与“黑色的星期五”有关的弗蘭克·霍奇斯（現在是英格蘭銀行董事）和已故的杰·蘭·麥克唐納。霍奇斯說共產党人是“莫斯科的奴才”，指導他們的是“亞洲思想”——这种反國際的、种族主义的話受到會場上一部分人相当热烈的欢迎。麥克唐納怀着“奸詐的心”用他的“騙人的嘴”說共產党人是不能信任的，說他們要插足到工党里來“暗箭伤人”。关于这位麥克唐納的傳說很多。我們聽說他能用催眠術控制會場。告訴我們這句話的人忘記了这种催眠術只能用于表示同意的对象。他長得很漂亮，仪态动人，說話声音悅耳，但這些都不是要点，主要的是大多数代表都是一些穩健而自滿的工会干部，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希望有人能引導他們离开工人階級斗争的崎嶇道路，而走上腐朽的自由主义那条比較舒適的道路上去，而麥克唐納就是全心全意干这个工作的人。后来赫伯特·摩里遜干着同样的工作，尽管沒有人說他是“漂亮人物”，或者說他有催眠的嗓音。不，他沒有。在台上的麥克唐納的同事們，和許多代表团里的同事一样，都知道他利用每一个机会玩弄和欺騙整个运动，也玩弄和欺騙他們自己。但是他們都心照不宣，瞞着各个組織的成員。

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使麥克唐納在羣眾看來是唯一的領袖。他們也知道他有一個最大的願望——踏進“上流社會”並為“上流社會”所接受。

由於共產黨人要使這個運動為工人的利益服務，所以不能不用掉他們。麥克唐納則要使這個運動為麥克唐納的狹小的可鄙的利益服務。他最親近的伙伴都知道這一點，並且贊成他這樣干。因為他升“上”去了，他們也就“上”去了。

但是九年以後，當他們全是他的內閣閣員的時候，他決定要一個人單獨“上”升。在唐寧街十號辦公室里，他用最輕蔑的態度命令他們辭職，叫他們離開他這個高貴的權威人物。

工黨會議沒有討論共產黨參加工黨的問題之前，這個問題已經在工黨執行委員會代表和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上討論過了。阿瑟·麥克曼納斯、阿伯特·英克平、湯姆·貝爾和我組成了共產黨的代表團；阿瑟·漢德遜、悉尼·韋伯和另外一兩個人組成了工黨代表團。我們去會商的時候，抱有很深的成見，不過有些成見無論如何只能算我們自己的成見。那時候南威爾斯的卡爾斐萊正在舉行補缺選舉，工黨提名摩根·瓊斯為候選人。共產黨決定參加競選，提名鮑布·斯圖爾特為候選人。鮑布本來是社會主義禁酒黨的黨員，又是領袖，在第一次統一會議時加入了共產黨。這就意味着從埃德溫·斯克里姆戈爾所領導的禁酒運動中分裂出來（斯克里姆戈爾大約一年後還做了一個短時期代表鄧地的議員）。鮑布·斯圖爾特是一個非常能干而有風趣的演說家，他對馬克思主義很有研究。早年我做鼓動工作，總喜歡在工作中的閑暇時間去聽他演講。好了！我們卡爾斐萊有了一個很好的候選人，我們有了許多熱誠的年青的工作者和演說家了。巴哥德有一個青年礦工，在鮑布·斯圖爾特一次演說時担



任主席，会上有一个支持摩根·瓊斯的人說的一些关于共产党候选人的話使他很生气。他是相当熟悉“高尚藝術”(指拳術——譯者)的，他走下講台，把这个支持摩根的人揍了一頓。但是有这么多人在支持，打敗一个又算什么呢？

如果僅僅發生这么一件事，以后的事还是好办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当时所說的話，对工党大小領袖的描寫，在被攻击的人的心里成了長期的隱痛。事实上甚至1939年大战爆發都还没有把卡尔菲萊事件所造成的創伤完全医治好，我还听到有人提起那些混乱日子里所說的話呢。

此外，我們在給工党执行委员会要求参加工党的信里面，沒有說我們要接受和执行工党的政策，而是告訴工党执行委员会說，我們准备根据下面这样的諒解來参加工党，就是我們主張“用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并建立苏維埃式政府，实行無產階級專政”。这真叫告訴了他們一些东西！而且这封信，是我們都讀过、或者是应当讀过偉大領袖列寧專为英德兩國同志撰寫的“共產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才寫了送去的。很明顯，我們出席那次會議的时候，我們的毛病还很嚴重。

由于这些事情，工党在爱丁堡會議上便得以極其猛烈地攻击我們。他們在要求采取坚决行动阻止共产党破坏工会和破坏工人运动的时候得到了所有主要工会的支持。他們攻击我們以后博得了很大的聲譽，这对我們的党是絕無好处的。同时我們党內的情况也还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我寫了一篇报告給执行委员会，說明党处境的嚴重，并建議成立一个小組委员会，徹底審查党的組織、政策和人事，然后提出意見。

經過多次討論，并經過一定的爭吵以后，我們在这个問題上达成了協議，指定帕姆·杜德、哈里·波立特和哈里·英克平(阿

伯特的兄弟)担任这项工作。这几个同志没有一个执行委员,也没有在党内担任任何正式职位。帕姆·杜德是我不久以前在一次大学社会主义者大会上遇见的同志,我对他的才能、毅力和诚恳的态度有很高的评价。我坚持要他参加这个委员会。哈里·波立特那时候是一位很活动的工会同志,他是由兰开夏来的,在伦敦船塢被雇用为制造锅炉的工人,他在鼓动码头工人拒绝为“水手乔治”号轮船装货的工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哈里·英克平是一位廉洁、直爽和可靠的同志,对运动中的事务工作具有丰富的知识,所以非常适合于这一方面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完成了巨大的工作,它写的报告把党的组织工作的薄弱和工作方法的拙劣作了惊人的暴露,并且清楚地说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因此委员会能够建议大刀阔斧的纠正办法,并且毫不迟疑地把这些办法提出来。建议通过了,党经过了一次从上到下的彻底改组。自成立以来这才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真正的、自觉的政党的性质。委员会的工作由1922年工党会议以后开始,直到1923年初党进行改组才停止。这次报告和改组之后,执行委员要到莫斯科去作一系列的商讨。我的妻子决定和我同去。不久以前我曾劝她到伦敦来住,因为在我旅行和几次入狱这段时间,很少有看见她的机会。现在,她到伦敦来了,而我又要离开她,她不願意,所以她也成了同行者之一。到了那边她就成为党同志们的特别厨司了。

我们在莫斯科会同那里的其他同志,把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揭露的事项彻底审查了一下。我们决定,党如果要胜利完成当前的任务,必须深入群众。这可能是给党的最好的指示。当时还对工会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一些讨论,并对怎样推动英国工会运动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对这件事有一些看法,有人建议

等我們回國后由我把意見寫出來，然后召开一次會議，为工会組織一种“奋兴”运动，在运动中訓練一班年青的、比較活躍的工会同志，使他們自己能負起責任。我同意这个办法，在回国以后，便尽快地進行这件工作。但是我一到倫敦，立刻發現又有了一件立待处理的事。我的格拉斯哥的老友約翰·韋特萊（代表希特爾斯頓的議會議員）聽到我回國，立刻派人來叫我到南安普敦大街他住的旅館里去。下院發生了爭吵，結果韋特萊、馬克斯頓、坎貝爾·斯蒂芬斯和布克曼被停止議員特權。这件事引起了全國的極大轟動，他們無論走到哪里，廣大工人羣眾都出來歡迎他們。这一班人和許多工黨黨員，都在1922年的选举中回到了議會。这次选举是克萊德的工人在1919年爭取40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以及隨着發生的事件和克萊德河畔的羣眾轉而拥护工黨之后第一次有机会來表示自己的意見。不但如此，那天晚上他們選出來的代表要動身到倫敦去的時候，格拉斯哥又舉行了一次在其長時間的鼓動歷史上空前的大示威。聖伊諾克車站廣場上擠滿了情緒高昂的羣眾，連阿吉爾等街道上也都站滿了人。多麼高興熱烈的場面呀！他們對這些新代表的希望是多麼大啊！馬克斯頓不是說過：“我們要到下院去大鬧一番！”正是要有這種精神啊！現在我們看到就要發生事情了。我們現在就要朝某些目標進發了。你們這班資產階級惡狗，你們嚇得發抖了吧。你們剝奪我們、剝削我們太久了，把我們害得要死，但是你們的死期近了。你們看，“野蠻人”逼近你們了，他們高舉着反叛的旗幟。你們從前挑唆別人，腐蝕別人，這一回你們可應付不下了。在一陣又一陣的歡呼聲中，他們走了。那時候，倫敦方面都怀着驚奇而又不是毫無恐懼的心理等待他們的到來。這几个人中間，最卓越的當然是約翰·韋特萊，他是天主教徒，几年前

在格拉斯哥創辦了天主教社会主义协会，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最反动的天主教神父們猛烈攻击的对象。但是，他給別人的还击和他所受到的打击同样厉害，有时候甚至更加厉害，所以攻击他的人漸漸少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当选議會議員以前，是格拉斯哥市議會里的有力人物。他有气色清新的圓臉，配上寬闊微笑的嘴和一付厚片眼鏡，使人看上去就是一个和藹可親的匹克威克<sup>①</sup>——可是他在展开斗争时，他的微笑的嘴像捕獸机似地閉攏了，朴实的面貌一变而为生鉄似地頑強不屈。

我看見韋特萊的时候，他把情况对我說了，并且叫我注意一件事：假如别的蘇格蘭議員力爭撤銷停止議員特权的处分而遭到拒絕，或者因此而使自己也被停止議員特权，那会有什么影响。我同意这件事影响很大，而采取力爭的办法也是很应当的。我应他的請求，到下院去找一兩個别的蘇格蘭議員談談，我想把这个主意告訴他們，可是他們一个都不接受。但是我很幸运，發現这时有人力圖“遏止乱萌”。我在下院的那天是星期五，下一个星期三，也可能是星期四，下議院就开始夏季休会。韋特萊、馬克斯頓和其他一些人想利用夏季休会的時間，大大地鼓动人們的情緒，尽量針對被停止議員特权这件事進行宣傳。有人悄悄告訴我說，由于杰·蘭·麥克唐納的請求，下星期二首相要提出建議，撤銷停止議員特权的处分，讓他們在夏季休会前回到下院。我急忙赶到宇宙飯店，把这个消息告訴韋特萊。他当时就想到他們在夏季几个月里進行廣大宣傳的希望恐怕要归于破滅。他征求我的意見，問我这件事应当怎样办。我建議他們

---

① 逸夏司著小說的主人公——譯者

几个人准备一篇經過縝密考慮的声明，扼要說明他們作为已經担負了和还要担負着沉重負担的男女劳动人民的代表的責任，說明他們是为了保衛劳动人民而在下院爭吵的；然后声明是这些选民受到了处分，受到了錯誤的、不公平的待遇，他們（被停止議員特权的議員）拒絕接受这种待遇，并且用他們有权代表的选民的名义，声明要在星期一到下院去出席會議，看誰敢阻止他們！

我說，“你可以把这篇声明及时在星期日的報紙上登出來，这样就会得到廣泛的宣傳，这样一來，你們就不会受窘，而他們倒要受窘了。假使他們不提出动議撤銷停止議員特权的处分，你們就進行夏季的运动；如果他們真是在星期二提出了动議（麥克唐納一定会竭力要求这样做，因为他害怕讓你們到全國各地進行鼓动时对运动可能發生的后果），那末，不管他們怎样解釋，也沒有办法叫人民相信他們这样做不是出于你們的压力”。

韋特萊望望我，在眼鏡里面霎霎眼睛。他說，“你的話有点意思，但是我要和馬克斯頓談談，他今天晚上來，我九点鐘見他。”我們正在談的時候，尼尔·麥克里恩帶來了下院最近的消息，証明我的話是正确的。因此在等待馬克斯頓到來的时候，我們急忙准备那篇声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尼尔·麥克里恩草拟的。我离开他們去参加另外一处會議，第二天（星期六）上午，我又遇見韋特萊，他告訴我馬克斯頓热烈贊成，还說声明已經用“致議長的一封信”的方式送到報館。声明說：

“我們以下院的自由和权利的監护人的地位，为了一件我們相信不但对于我們所代表的选民、而且对于我們英國民主政府的原则也是很重要的事，寫这封信給你。

6月27日下院辯論兒童福利問題时，我們被停止了議員

特权，理由是我們触犯了議会的規則而事后又拒絕撤回我們的發言。因此我們已經被停止議員特权四个多星期，在这个时期內，我們的选民在下院里沒有人代表。

我們認為，假如我們是保守黨議員而不是工黨議員，待遇就会不同。为了証明这种看法，我們請你們注意穆尔先生的事。他是代表北亞爾馬的議員，統一黨<sup>①</sup>黨員。1913年3月26日穆尔先生指責財政大臣‘無恥欺詐’，而且絕對不肯撤回这个控告。現任首相鮑爾溫先生投票反对停止他的議員特权。4月10日又暗地通知別人提出恢复他的議員特权的問題。就在这时候，他宣布拒絕道歉。4月16日，当时的首相提議終止对他的处分，并且說这是筹款委员会主席(你自己)要求他这样做的。首相認為：‘为了遵守我們的傳統和議事規則而使一个选区的选民在下院里沒有代表，超过必要期限，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他又說：‘按前例來說，下院过去一直認為处理这类过失时三星期是最長的处罰。’有人指出，被停止議員特权的議員曾經公开誇口說，他蓄意抗拒議長的权威，不管后果怎样也决不收回他的言論，决不向下院道歉。首相再一次說，‘三星期的处罰也足够了。’邦奈尔·劳先生同意这种意見，他还补充說：‘不管哪一位議員犯了这样的过失，都应当采取这种办法。我确信今天立下前例，將來是要援用的。’筹款委员会主席(你自己)說：‘我完全同意首相所說的一切……我肯定地認為不論誰是議長，都会是这样的看法。’

星期一下午四點鐘，我們要到下院去要求我們的出席

---

① 主張英愛合併的政黨——譯者

权。我們相信你会使我們不受任何阻碍。”

每一种星期日的报纸都把这篇声明醒目地登载出来。这是一件轰动一时的事，处处地方都在谈论这件事。他们到了下院要怎样办？会发生些什么事？他们是不是要闯进去？会不会被逮捕？星期一早晨，“泰晤士报”和别的全國性报纸就这件事发表了社论。“野蛮人”使他們捉摸不定。他們的行动是完全無法預料的，所以社论作者只能劝告和緩一点并且放理智些。下午2点45分下院开门，外面已經拥挤了很多人，新聞記者在老皇宮大院里注視着站在大門口的增加了人数的警衛，其中还有一个警長。由白厅那边开来了一輛出租汽車，在大門口停下來，馬克斯頓先下車，韋特萊跟在后面。馬克斯頓向大門走去，警長迎上前去說，“你不能進去，馬克斯頓先生。”

“什么？”馬克斯頓非常憤怒地喊道，“不能進去？那末我的选民怎样？他們說我一定要進去。”他大声說下去——事实上他是在对羣众講話，不过借警長做擴音器罢了。当他說話的时候，老皇宮大院里面有人喊叫。議員們冲上來，手里搖幌着一些文件，“你已經勝利了，”他們喊，“明天就撤消停止議員特权的处分了。”四面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新聞記者和議員們都走过去同馬克斯頓和韋特萊握手，同警長握手，同每一个人握手。战斗結束了，勝利者可以由戰場凱旋了。我們到附近一个茶室里去，“随心所欲”地吃点喝点，等到身心爽快之后，就向嘉陵十字路走去。我們沿着白厅走，馬克斯頓和我兩人走在前面。他对于事情的結果感到相当得意。他把这件事稍稍談了一点，然后說：“这是誰的主意？”

究竟韋特萊对他說了多少話，我可沒有把握，我想搪塞过去，于是說：“哦！你知道韋特萊，他是时常在轉念头的。”

“我正在这里猜想，”他微笑着說，“因为韋特萊告訴我这是你出的主意。”我原是应当知道韋特萊会这样說的，因为他从來沒有放棄过一个机会把功劳讓給和他共事的同志。是的，这是一次大示威，不过“野蛮人”的声势已經到了最高峯了，从那时起他們的血液开始冷下來，直到他們沾染了議會里的惡性貧血症。不錯，还可以試試把火再挑起來，可是只能挑起一点微弱的閃光——再过一下，就成死灰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 1922 年的选举中，我也是个候选人。党决定在鄧地競选，并選擇我担当这个任务。鄧地是一个有两个名額的选区，那时是由溫斯頓·斯潘塞·丘吉尔先生这位大人物和另外一个人代表着。鄧地的禁酒党有几次在鄧地选举中提名它的領袖埃德溫·斯克里姆戈尔先生参加选举，工党提名埃·德·摩雷为候选人，后来又和禁酒党“非正式”联盟，以爭取摩雷和斯克里姆戈尔二人的选举勝利。但是真正的斗争，是在我們和丘吉尔党人之間，我猛烈攻击他支持俄國白党分子和驅使英國对苏俄作战的活动。当时情緒極为激烈，尤其是在鄧地的青年活动分子中間，他們有許多人沒有选举权，但是他們虽然不能投票，在丘吉尔或者任何拥护他的人試圖在任何地方开会的时候，他們都用坚决的方式表示意見。“試圖”这个字眼适用于許多場合。当丘吉尔本人露面的时候，就是示威的信号——完全不是一种友好性質的示威。“打倒丘吉尔！”“我們要威廉·加拉赫！”“加拉赫！加拉赫！加拉赫！”这个可怕的名字一定已經深深地銘刻在他的心上，使他神魂不安。另外兩位先生——摩雷和斯克里姆戈尔在我們一班人進行斗争的时候，只是退在一旁，泰然自若。听听当时的欢呼声，我应当很容易獲得勝利，但是等到宣布結果，摩雷和斯克里姆戈尔領前，差



不多各得三万票；丘吉尔和他的同僚落在后面，大約各得24,000票；我是一个“配角”，得了6,000多票。計票結果宣布的时候，丘吉尔神色悽然，我看他心里一定很难过。摩雷和斯克里姆戈尔由楼上監票員房間里的窗口向羣众演講。摩雷是学外交的，學習的成績很好，他向选民道謝，謝謝他們对他本人和对工人运动所表示的信心。斯克里姆戈尔滿面虔誠的样子，他感謝上帝終於承認了他这个人物——他几乎要朗誦伯恩斯的詩了：

天上的主呀！

完全随你自己的心意，

送一个上天堂，十个下地獄；

这都是为了主的榮耀，

他們在主的面前所作所为，

并非是为了什麼善惡。

我感謝、讚美主無比的权力，

千万人被主在黑夜里拋棄；

我这时來到主的面前，

主的賞賜和恩典

如火似茶地

照耀各地。

他發洩一通以后，監票員轉身对丘吉尔說，“你高兴講几句话嗎，丘吉尔先生？”丘吉尔把头垂到胸前，滿臉不乐意的样子，悽慘地回答說沒有話講。我乘这机会，就說，“喂，先生，我要說一兩句話。”監票員回答說，“好，加拉赫先生。”又是加拉赫！丘吉尔往前移动了一下，好像他自己要到窗口去，然后用怨毒的眼光盯住我，这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說明了他对这次失敗感到多么懊喪。現在虽然事过多年，可是丘吉尔先生还没有忘記1922

年的鄧地选举，怨毒依然存在，这倒不只是因为我是議會里的共產黨議員。

1923年我又在鄧地競选，得了一万多票。同志們相信下一次我們可以出头了，但是在这个期間費夫的同志們遇到很多困难。以前有一个很長的时期我曾在費夫煤礦区花过不少時間，因此那里的同志坚持要把我調到費夫去作为議員候選人。經過党的領袖和費夫的同志們長时期的悬切協商，我成为西費夫議會議員未來的候選人。1929年和1931年我在西費夫競选，都失敗了。到了第三次，1935年，由于大批同志們不倦地努力以及礦工們对阿布·莫法特(現在是蘇格蘭礦工工会主席)、波希尔的約翰·苏瑟蘭、布克海芬的約翰·麥克阿瑟和东威密斯的吉米·霍普(这些人現在都是費夫郡議會議員)的信任，我們終於獲得了共產黨第一个議席。

現在再回过来叙述我当时手头的工作——組織一次會議來替工会运动建立一个“奋兴組織”。这项工作很費時間，因为需要同各方面联系，需要准备各种宣傳品并散發給整个工会运动。我找到一位青年同志——一个很能干的速記員來帮助我做这件事。他是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年青小伙子，仪态动人，对于决定和处理事情似乎很果断。他到我办公室工作不久，就認為我的簿記和档案制度都需要大大改進，并且把他心里的想法告訴我。有一天早晨我走進办公室的时候，他說，“坐下吧，威利，我要和你談談。”他解釋給我听，假如我寫信不用口述而自己學習用打字打下來，要好得多，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騰出時間來做簿記档案工作，从而把办公室弄成一个管理得很好的办公室应有的样子。我不願伤这孩子的心，于是开始學習打字。过了几天，我很有進步，能用兩個指头塔拉塔拉地在鍵盤上打了。有几位同志把事

情看得很嚴重，他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聽到這個聰明的青年人很高興地說：“看這老威利，他不是搞得很好嗎？”他們常常勸我要管管他，想辦法教訓他一下。但是我從來不忍心這樣做，他那樣活潑，而且工作效率那麼高。

最後要開會的時候，我們租了法林頓路的紀念堂。我們談好在會上我將讓年青、熱情和能干的工會工作者哈里·波立特接替我領導將從會議中產生的運動。在開會前一星期，有一家倫敦的日報對我個人和我在組織這次“非正式”的工會會議方面所做的事情，作了一次“驚人的揭露”。紀念堂是我的青年助手去租的，紀念堂的管理人員知道了運動幕後人的身分以後，決定取消租約。我的青年助手就去找他們，他找到了紀念堂的看守人，通過了看守人又見到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假如不能算全國的要人，至少是教會里的要人。他和這位要人“推心置腹”地談話之後，取消租約的成命就收回了，紀念堂每一個房間都交給我們支配，並且給我們一切幫助，使會議獲得成功。青年助手興高采烈地跑回來，他很得意地告訴我，“你知道，威利，我的話還沒有講完，他就給我牽着走了。他告訴我，要是他們早知道有加拉赫那樣一個人參加這個運動，他們做夢也決不會想到把紀念堂出租的。我不讓他講下去，就說：‘我完全贊成你的看法，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有他。你可以信任我一句嚴肅的話，一開會我們就立刻把他趕掉，我們要做到不讓他再參加這個運動。我們已經找好一位全國最優秀的工會工作者，他是任何團體都贊許的人，由他來接替這個討厭傢伙的一切責任。’”“威利，”他又說，“我對他講那句話的時候，你應該看見他那個樣子！他站起來說，‘這話當真嗎？’我說，‘句句是真’。他大聲說，‘好罷！紀念堂交給你們用了，我還要告訴看房子的人，樓上任何房間，你要，

就讓你用。我希望你們的會議完全成功！’你看怎樣，威利？”

“你真是一員戰將，”我回答說，“如果沒有你，我真不知道怎樣過下去。”

但是在開會之前，我和莫斯科一位工會朋友之間有不少麻煩。他幾次寫信給我，說他不懂為什麼要拖延這樣久，並且告訴我，要是他做我的工作，會議早已開成了。有兩次我用對同志般的客氣態度回復了。可是到了第三次，我忍無可忍，又寫了一封回信，在信里說明了我已經完成的一部分工作的某些方面之後，對他多少有些自誇其能的地方，加以譏笑諷刺。我說我時常聽說莎士比亞的著作在蘇聯比在英國更流行。假定這句話是對的，他可以回想到霍茲帕爾和格蘭道瓦爾兩人輕鬆的談話。後者是一個非常自高自大的威爾斯人，他急于要使霍茲帕爾覺得他本領大，嚷着說，“我能從幽深地獄里把鬼魂叫來。”霍茲帕爾就駁他，“我也能，人人都能。但是你叫他們，他們真來嗎？”我還接着這樣說了一句：“我親愛的同志，如果你在我這裡，我肯定認為，像格蘭道瓦爾一樣，你是能夠召開一次會議的”。

不管怎樣，會議還是按時舉行了，全國少數派運動發動起來了，哈里·波立特當選書記，我回到黨部負起我本來的責任。

召開會議的過程中還有一件趣聞，就是我們大奧蒙德街會議辦事處的竊案。當時所有文件都被偷去了。我們報告警察，他們派來了兩個警探，驗看了被沖開的門，四面張望，像是找指紋的樣子。我的助手說，“我想，威利，這些傢伙在這一方面比我們知道得多。”

有一個發怒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他平和地回答，“我在和威利說話。”

“哼，你說話小心点，”这个警探回嘴說。他們草草地看了看就走了。从他們臉上的笑容，我們斷定了究竟誰是破門而入的人。如果有什么人对于这件特殊窃案有任何疑惑的話，到了1925年審訊12名共產黨員时，看到据說是从英王街16号搜到的、送到法庭上的材料里面，有我黨給莫斯科同志的信的副本，就可以明白了。

---

---

### 第三章

1914到1918年大战期間，牺牲是很重大的。有些人作了很多的諾言。不管这些諾言使人們產生了什么样的希望，但当时發生的实际情况是極其悲慘的。一羣貪婪的狼——暴發戶——出現了，他們和旧时代的貴族集团联合起來，肆行劫夺，使羣众遭到失業，陷于窮困，許多人处于半飢餓状态。

1921年2月，全國失業工人的許多团体举行了一次代表會議，結果產生了全國失業工人委员会的运动。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失業的普遍性，这种失業現象是在停战协定簽字后曇花一現的繁荣过去之后出現的。全國失業工人的領袖是杰克·霍尔特、華利·漢寧頓和佩西·海伊。華利·漢寧頓直到这次大战开始，始終是全國失業者的領袖，从那时起他又是机械工業联合工会的組織部長。他是一个適合担任这种繁重工作的同志，身体健壯，很容易叫人親近，是全國最优秀的宣傳家之一。他從來不隨便發言，每次演說，都經過很小心的准备，很好地蒐集資料，仔細地核对。他的卓越的、在艰苦的失業时期內始終和他形影不离的同事是格拉斯哥的哈里·麥克善(現在是“工人日报”的蘇格蘭代表)。我一直和這兩位同志有密切的联系，結果他們时常为了失業工人示威运动來找我。1922年，全國失業工人委员会运动决定組織該运动的許多次大規模飢餓游行的第一次游行。这次游行預定在1922年11月16日到达倫敦。到那一天，代表各

地区的一个代表团，將要求見首相，提出下列要求：

(一)夫妇二人每星期补助36先令；每一个子女，直到16歲为止，每星期补助5先令；房租每星期15先令，煤一担(112磅——譯者)或相当数量的煤气。

(二)18歲以上的單身人每星期补助30先令；煤每星期一担，或相当数量的煤气。

(三)16歲到18歲的單身人每星期补助15先令。

我們可以看出，这些要求是很低的，这些要求也說明失業工人非常困苦。我和哈里·麥克善走遍蘇格蘭各地协助准备第一隊动身。可以理解，蘇格蘭隊出发必須比別处的游行隊伍早得多。蘇格蘭的每一部分都响应号召，我們很容易地找到所要人数的兩三倍。但每一次隊伍的人数都有限制，因此每次都挑选最好的。我們这一次和其他次都選擇得很好，这可以从这个事实証明：几乎从來沒有隊員在中途退出去，他們都是自动地、有效地維持紀律，所以在这方面沒有多少困难。蘇格蘭隊动身后，我只陪了很短一段路程。我从來不可能和隊員們在一起太久。在我做宣傳員的40年中，我很少有時間來做別的事，我想我在这时期內，我在會場里和街道上演說的次数，的确比参加运动的任何人多。我相信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大小示威游行中，我是很有經驗的。有一次有十万人，可是另外一次，当运动比較消沉的时候，我和哈里·麥克善举起旗帜勇敢地在格拉斯哥街上游行，后面只跟着百把人。

但是我各处約会的時間都安排得很妥当，使我能够迎接到达倫敦的隊員，并且在他們居留期間內，我能不时和他們在一起。这次游行轟动了全國。游行者無論經過哪个村鎮，都受到工人运动各方面很好的接待。地方当局大多供給公共場所作为

他們休息安睡之處，各團體都勸募或者自動捐助足夠的錢保證他們有充分的給養。事實上可以說無論游行怎樣艱苦，而且時常要冒着最惡劣的天氣，可是隊員在路上的伙食比他們在家里靠着少得可憐的“施舍”所獲得的伙食總要好些。

倫敦舉行了一次驚人的示威來歡迎他們。無論他們住在哪個地區，都使他們同住在自己家里一樣。他們到達倫敦后，就排定時間到唐寧街十號去，這件事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但是首相却拒絕接見代表團。我到下院去，見到了喬治·蘭斯伯雷、韋特萊和格拉斯哥來的幾個老友。他們告訴我工黨要向下院提出這件事。喬治·蘭斯伯雷是波普勒市議員和波普勒救貧局委員，后者在發放救濟費的時候，超過了政府規定的標準。因此1921年年底時，委員們被罰款，他們拒付罰款即被逮捕入獄，男子被押在布里克斯頓，女子被押在霍洛維。六星期后他們恢復了自由，但是他們却轟動了整個倫敦，並為英語創造了一個新字“波普勒主義”。“波普勒主義”是保守黨員所痛恨的，它是照顧失業工人家庭的一種初步措施。

在下院里，新任工黨領袖蘭姆賽·麥克唐納親自寫信給首相邦奈爾·勞，請他接見代表團並給失業工人一些希望，也就是告訴他們政府將採取措施解除他們巨大而明顯的困難。首相答复說他不準備接見代表團，因為失業問題和處理辦法是勞工大臣的事，他叫代表團去見勞工大臣。

首相雖然拒絕在唐寧街接見代表團，但他在格拉斯哥的一個集會演說時，却不得不在那里接見哈里·麥克善所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他想避免因出席這次集會而引起麻煩（他原是想盡辦法要避免這些麻煩的），便聲明他是以格拉斯哥議會議員的身分而不是用首相的身分來接見代表團的。很明顯，他不過是脫掉



官員的袍褂，換上了“工作”短裝吧了。這班反復無常的機會主義者逃避責任的行為是多麼卑鄙！但是，這次遊行激起了羣眾的情緒，政府不得不作某些讓步，使失業者的情況略為好轉。可是失業工人繼續不斷地增加，全國失業工人委員會運動也加強活動，示威愈來愈堅決，許多羣眾代表團前往倫敦唐寧街，各地區的羣眾紛紛組織示威隊伍向地方當局請願。當局對於這些被剝奪了工作權利、也就是被剝奪了生活權利的男男女女的唯一答復，一直是警察手里的警棍。騎警經常出現，向示威者猛沖，揮舞着長棍，亂打一氣。在這個失業工人示威期間刊登的照片，有些實在可怕——飢餓的男女被警察一棍打得半死，在街道上被拖到附近的警察局去。但是每一次這樣的攻擊，非但遠不能削弱示威力量，反而提高了失業工人的戰鬥精神，並且取得了有組織的就業工人對他們不斷增加的援助。華利·漢寧頓在這些重大事件中一直站在最前列，在倫敦和其他各地，他都證明自己是一個堅決而有毅力的領導者，既不會被人離間，也不怕威脅。

1922年還有一個特殊的問題與我有關。愛爾蘭在復活節起義的時候，康諾利、皮爾斯和他們的一兩個同事率領了市民軍和少數愛爾蘭志願軍，帶着武器，在都柏林街上宣布成立愛爾蘭共和國，從此愛爾蘭的情況就不斷發展，使愛爾蘭共和軍與英國軍隊之間處於戰爭狀態。除瓦列拉以外，羣眾心目中代表新芬黨<sup>①</sup>和愛爾蘭共和軍的是阿瑟·格里菲斯和邁克爾·柯林斯。到了1921年，局勢變得十分嚴重，勢必發生公開戰爭——全國羣眾是決不支持這種戰爭的——而要避免戰爭，就必須取得諒解。結果在倫敦開始談判，愛爾蘭代表團的領袖就是上面所說的格里

---

<sup>①</sup> 愛爾蘭的一個以爭取獨立和文教復興為目的的政黨——譯者

菲斯和柯林斯。英國報紙對這件事的態度的大轉變是令人吃驚的。因為柯林斯和他的同事多年來一直被報紙稱為“瘋狂的無賴漢”、“殺人凶手”等等。現在他們竟開始有“政治家”的氣味和尊嚴了。我同愛爾蘭運動無論在工人運動方面或民族主義方面一向保持友好的關係。柯林斯等把克萊德的車間代表運動看做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的盟友。倫敦談判只進行了幾天，就在11月30日星期三透出消息說準備簽定協定，把愛爾蘭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小些的是北愛爾蘭政府，大些的是愛爾蘭自由邦。同日晚間，瓦列拉在恩尼斯演說時聲明，雖然給予代表們某種談判權，但新芬黨堅持一些基本原則，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逼迫代表們在這些原則上讓步。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愛爾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有一位“知道內幕”的人在黨部里對我們談了經過情形之後，就決定叫我當晚動身，到都柏林去把這些情況告訴那里的朋友。我到都柏林的第二天，12月1日，星期四，就和工黨領袖們取得聯繫，說明情況，然後會見了愛爾蘭共和軍和新芬黨政府的一班領袖。共和政府里面著名的愛爾蘭共和軍領袖是卡塞爾·勃魯哈。我是和馬爾基維奇夫人同去的，她是共和政府的勞工部長，本來是當選英國議會議員的第一個婦女，因為遵守新芬黨的政策而拒絕了議員職位。會見時在座的還有幾個共和軍領袖，列姆·麥洛斯也在其內，他是運動中最優秀、最進步的青年領袖之一。我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他們，又說明談判正在進行，要把愛爾蘭劃分為二。卡塞爾·勃魯哈不相信有這種可能，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堅定、勇敢和誠實的民族主義者之一。對他來說，愛爾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自由的，獨立的，是值得生死爭取的一件事。因為他不懂政治，結果在他應該為這事而活着

的时候，却为这件事而死了。不！他是不相信我的話的，可是当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官方消息傳來，說爱尔兰划分为二的协定已經簽字了。这样，我們的談話有了新的轉变。卡塞尔·勃魯哈、洛利·俄柯諾和列姆·麥洛斯是帶領軍隊的。当前的問題是他們是否要在格里菲斯和柯林斯到达爱尔兰时把他們立刻逮捕，然后繼續为自由独立的爱尔兰進行斗争？在这次討論中，我說他們应当立即拟訂一个使社会進步的方案向人民羣众宣布，号召他們支援軍隊和政府。我把我认为完成这种任务所必需采取的办法說了一个大概。卡塞尔·勃魯哈对我說：“加拉赫，我們無論什么时候都欢迎你，我們永远欢迎你和我們在一起，但是不要把你的共產主义帶到爱尔兰來。”

我回答他說：“我不是來迫使你們接受共產主义的，我是要讓你們懂得政治的重要性。我知道你对于使用槍炮非常在行，柯林斯也是这样。假如兩方面都有槍炮，誰的政治知識高，誰就勝利。”事实証明這句話給他的印象并不深。后來他們决定格里菲斯和柯林斯到达时應該怎样办的問題，是不是逮捕他們，否認他們所簽訂的协定嗎？卡塞尔·勃魯哈当时說：“我不願意做使爱尔兰人自相殘殺的罪人。”

“好，”我說，“如果你不做，柯林斯就会來做。那就要叫不应当付代价的人來付这个代价了。”

馬尔基維奇夫人对我說：“加拉赫，你劝迈克尔·柯林斯反对和他并肩作战的人，这簡直是胡鬧！”

“沒有希望了，”我說。我就和那位工党領袖一起走了，他是和我同去的，但他沒有参加談話。

我們到了外面，那位工党領袖对我說：“从來还没有人用这种态度向他們說过話！”

我回答說：“很明顯，他們不知道什麼事在等着他們。他們有的是共和軍，可是格里菲斯和柯林斯的背后是丘吉爾、勞合—喬治和英國軍隊的力量。現在準備在他們回來時歡迎他們的是愛爾蘭所有的反動力量。”

格里菲斯和柯林斯回來了，他們對舊同志非常巴結討好，他們什麼都不要，只要和諧，只要好感——但是，愛爾蘭自由邦政府立刻成立了。卡塞爾·勃魯哈這時候把他的部隊駐紮在奧康納爾街的几幢房屋里面，洛利·俄柯諾占了“四大院”。但是格里菲斯和柯林斯似乎並不十分介意，他們的政府漸漸行使職權，他們開始建立自己的軍隊，他們把大炮安置好。等到一切準備完畢，就露出猙獰的面目，命令愛爾蘭共和軍投降。共和軍加以拒絕，他們就轟擊“四大院”和卡塞爾·勃魯哈的大本營，手段的毒辣，英國人從未見過。他們對卡塞爾·勃魯哈部隊的攻擊十分猛烈，以致勃魯哈不得不命令他的大半已遭殘殺的部隊冒着危險由後門逃出。他下了命令之後，自己走出彈如雨下的前面大門，中彈倒斃在他心愛的街道上，其餘的人都投降了。洛利·俄柯諾、歐斯金·奇爾德斯、列姆·麥洛斯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押入監獄作為人質，以後如果非法的愛爾蘭共和軍有犯罪行為，就把他們處死。几个月之後，格里菲斯因心臟麻痺症逝世，柯林斯被愛爾蘭共和軍兵士槍殺。但是自由邦繼續行使職權，直到1932年被瓦列拉和菲亞納·費爾政府廢除為止。

1923年秋季，我被邀請到德國去參加一連串的示威活動，有許多次是在“占領區”組織的，也就是在魯爾工業地帶。這時德國情況悲慘，馬克天天貶值。工人領到工資，必須立刻化完每一文錢，否則就會貶值。例如：假定星期五晚上領工資的時候是10萬馬克換1英鎊，留到星期六，可能馬克已經貶值到20萬馬克換1

英鎊了。這就是說，一夜之間他們的工資打了对折。這種情況把最穩健的人也弄得頭昏腦脹。我記得乘火車旅行時和一個同車旅客談話，他是德國人，能講一點英語，談話中我請他看看報，告訴我馬克的市價，我說明我要到車上餐室去吃點東西，需要兌換一個英鎊，不願意受侍者欺騙。他全神貫注地望着我說，“如果你要兌換一個英鎊，好不好換給我？”我很願意，他把報上登的馬克兌換率給我看，掏出他的荷包，給了我兌換一英鎊所需要的馬克。我把一英鎊的鈔票給他的時候，他雙目含淚。我先以為他要對我抱頭痛哭，後來他和我說話，才把他的這種情緒沖淡了。他說他的“小孩子下星期過生日”，他想節省一點錢到那一個重要的日子化，可是他越節省，損失就越大。現在他很高興了，這張一英鎊的鈔票，到了那個好日子，連酒席和生日禮物都夠了。

誰都知道，那次貨幣貶值，後來發展到100萬馬克的鈔票在英國小販手中當作紀念品賣。德國工人的情況更加難堪，所有協約國的代表都派了經濟專家來工作，考慮恢復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辦法。但是在全國各地舉行的工人階級大示威中，支持社會主義解決辦法的人越來越多。在示威運動中，我每次講演都看到會場內擠滿了人，看到德國工人的情緒不斷高漲。我在魯爾區的漢波恩演說時，餓得半死的羣眾進行了驚人的示威。演說完畢的時候，幾個法國和比利時軍官大模大樣地走進了擠滿德國同志的后台休息室，問我要護照，並把我逮捕起來。我把護照交給他們之後，德國同志激烈地責問這些軍官，這就把他們惹惱了，他們對這些德國同志大吼。我們這邊的人故意鬧得亂糟糟的，乘着正亂的時候，一個矮胖的德國同志悄聲輕步走到我的身邊，又悄悄地把我帶出去了。我是由後門溜出的，

他讓我坐在機器腳踏車的后座上，從下着雨的茫茫黑夜里很快地把我送到鄉間。駕車的是一位很好的青年同志，他把我帶到他家里，他的年青的妻子正在等他回去。我們靠着廚房里的桌子坐下來，這是一間很小的廚房，里面家具很少，烹飪用具只够烹調一頓尋常飯菜——假如有足够的食品的話。但是，可憐得很！碗櫥里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只剩一小塊黑面包，一點人造奶油代用品和一點咖啡代用品。這是極簡單的食物，可是這就是他們的最好的食物了，他們熱誠地請我吃。我們坐談很久，至少我們是很想談話，因為他們不懂英語，而我又只會一兩句德文，我們只好回到古代的象形語言。最後，他提議我們應當睡了，我表示同意。廚房除了進來的那扇門以外，還有一扇門，通到一間臥室，里面有一張很大的床。這位同志和我開始脫衣服，我當然是跟着他脫的，但我一直在想他那位漂亮的年青妻子怎麼辦。在廚房里，我沒有看到可以睡的地方。不管怎樣，他和我上床睡了。這位年青的太太進來，由壁櫥里取了一點東西，回到廚房，過了幾分鐘便穿着睡衣回到臥室里同我們睡在一起。不用說，我是睡在離她較遠的一邊，但這已經是我從來沒有過的最奇怪的一次經驗了。德國同志的招待真正周到，不管他們自己的生活多麼艱苦，他們總是準備把最後的一點一滴和患難中的同志共同享受。

次日晚間，我必須到科隆演講。會場照例擠滿了人，外面還有許多人嚷着要進來。我到了會場後，有人告訴我說三個英國軍事情報員在后台休息室等我。“天呀！”我說，“這種干涉怎麼老是沒有完呢？”我走進去後，有一個高大而漂亮的典型英國紳士，穿過房間伸出手來歡迎我。我們握了握手，他說，“加拉赫先生，我遇見你，真高興。”我著實有點懷疑，我問他們為什麼會到

这里來？他說：“我們要知道昨天晚上發生了什么事？”我告訴了他發生的事。他便破口大罵。他說：“他們太過分了。”他指的是昨晚那兩個法國和比利時軍官。“他們經常搗亂，這種事情早晚要制止的。”

他這樣怒罵，使我十分驚奇。“啊！”我說，“我還以為你也來干這種事的。”

“決不是的，決不是的，”他說，“我們不是來搗蛋的，我們是來幫助人的。我們要把你的護照取回來，你不必着急。我希望你們開一個真正圓滿的會。”以後我們彼此很客气。因為會場已經擠滿了人，他們也要參加開會，所以商量結果是讓他們坐在台上。一切都很好。這一次集會非常成功。我在演說中號召英、法、德三國工人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僱主，我號召他們用一切強大力量反對壓迫他們的人。翻譯是德國國會議員，一個說話有力而能使人感動的演說家，他並非單純把我的話翻譯一遍，他像一個熟練的鼓動家一樣，把他自己的意見參加進去。演說快完時，他喊着說：“加拉赫同志號召德法英三國工人集結自己的一切強大力量起來反叛。”在后台休息室里，這句話成了這位德國國會議員和那位軍事情報主任激烈辯論的題目。情報主任懂得德語，指出了我說的話和我的翻譯所說的話不同的地方。“你要叫加拉赫受累，”這個軍官說。“他沒有說什麼反叛。站起來反對壓迫者是一件事，站起來反叛是另外一件事，這是煽動。”我站在一邊沒有說話，可是他們兩人還在爭。那位國會議員想讓這位“英國紳士”明瞭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使他認識這兩句話的實際內容是相同的，不過他們沒有得到諒解。第二天，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軍事情報處去取護照。這個護照因為他們的要求已經由法國當局退還，可是在退還之前已

經在主要的一頁上橫蓋着“不良分子”印戳。我回國后只得另外申請了一個護照。

這時候德國好些地方發生了幾件大事。在北部，漢堡成了無產階級活動的中心。在南部，薩克森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已經組成聯合陣綫，建立了政府，其中三個委員是共產黨員。這個政府想用非常果斷的措施來應付薩克森的危機。但是德國政府一點不喜歡這樣做。薩克森所發生的事可能要影響當時正由英美兩國磋商的借款。德國政府為了保持英美的好感，決定鎮壓薩克森的聯合陣綫政府，派繆勒將軍帶領裝備精良的部隊前往。當這支軍隊出發的時候，聯合陣綫政府定於星期日（10月24日）在薩克森重要工業中心開姆尼斯召開會議。有人建議要在這個會議上向德國全國發出總罷工的號召，來抗議武力鎮壓薩克森政府的企圖。人們都知道事實上這是工人起義推翻德國資產階級的信號。我被邀參加開姆尼斯會議。一路上無論經過德國哪一地方，在電車里、火車里和咖啡店里所聽到的談話全是關於未來的革命，未來的“共產主義革命”。沒有人提起社會民主黨人——顯然社會民主黨人算不了什麼。這是一個大錯，他們是起了作用的，不過起相反的作用罷了。差不多所有關於未來的革命的談論，總是受到熱烈的支持。一般男女都確信共產黨會改進現狀。那天星期日早晨，天氣晴朗，整個開姆尼斯充滿着極其熱烈和興奮的情緒。許多“無產階級衛士”在街道上遊行的時候都有樂隊奏着戰鬥的無產階級樂曲。在會場里，代表們很早就到齊，他們一簇簇地聚在一起談話，揣測這一天會有什麼事發生。全德國的工人組織都眼望着開姆尼斯，他們只是等待信號以便行動。會議開始時雖有一點遲延，但終於按議程進行。會議由政府的一位共產黨代表任主席，他並不是我們的一



位最优秀的同志。會議前半部是一連串的報告：政府想干些什麼，它怎樣制止德國政府當前所采取的威脅薩克森生存的舉動，全國其他地區所表示的支持。中飯以後，要討論号召總罷工的議案問題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發言，他在一種奇特的寂靜氣氛中，對會議當前的危機和全德國當前的危機提出警告，建議作進一步的協商。其實，後來事實證明，社會民主黨某些領袖早已和繆勒將軍在談判了。到會的人當時陷入極度的混亂。政府的另外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接着講話，他表示運動沒有一致團結起來，因此不能採取提案所建議的行動。情況越來越壞，在會場的好幾個部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在辯論、爭吵，那樣子好像預示“革命”的凶兆。我問我的幾位同志，布蘭德勒和台爾海麥在哪裡？他們說在樓上起草一篇宣言。我就上去找，看見他們兩個和另外一個叫雅各的同志在一起。我不記得這位同志的姓，不過1939年大戰爆發前不久他曾以托洛茨基派的姿態出現於倫敦。他們三人在忙着搞一個文件。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到會場里去把秩序穩定一下，我告訴他們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破壞這次會議。他們向我保證：一切都無問題，議案會通過，革命會進行，他們正在準備一項文件給我帶回英國“向英國工人呼吁：不要干涉德國革命。”這是寫得很好的文件，因為台爾海麥是一個很能干很聰明的作家。他把這文件讀給我聽的時候我看出他的神氣似乎對他的大作非常得意。但是我當時仍舊堅持他們應當下樓去挽救會議。可是他們却說不要忙，當他們下樓的時候，會議快結束了，一切都失敗了。号召總罷工的議案被否決了，革命流產了。不過德國有幾個地區，尤其是漢堡，起義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積極，並且對於開姆尼斯會議寄予很大期望，以致真的起義了，接着就發生了激戰，死傷很多，參加的人輾

牲很大。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就同繆勒將軍和德國政府取得諒解，撇开共產主義者而另行組織了一個德國所能接受的政府。

慘嗎？是的，但是整個工人階級的歷史就是一部悲慘和失敗的歷史——然后是取得部分的勝利和走向較高鬥爭階段的新進展。假使我們早把所有反對我們的力量全部計算清楚，我們對於德國這次革命決不會這樣過於自信。不錯，德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解決他們周圍所發生的問題的力量。不錯，他們已經不能再來對付團結的、堅強的工人階級。但是在他們背後給他們撐腰，供給他們錢財來散播腐化、混亂和離間的種子的是英美兩國有力的財閥。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會有怎樣的意義，他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他們用所有的惡勢力來阻止它，來阻撓歐洲工人階級的進展，並且要進而採取一切手段消滅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腐敗的領袖的協助下，他們終於分散了革命的力量，阻止了革命的潮流。可是他們企圖阻止社會主義共和國在蘇俄獲得進展，却徹底失敗了。蘇俄經過長期的內戰和反抗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之後，又遇到了1921年悲慘的災荒，但是還是於1923年在恢復國力方面獲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就，在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面有了偉大的成功，這真是驚人的事。只有具備堅強信仰和決心的人民，只有牢不可破地團結着的人民，而且他們的領導是在無產階級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才能有這樣強大的力量，才能有這樣震動全世界的成就。這種品質，在以後的年代里還會更加輝煌地表現出來。

雖然在大陸上運動受到了一時的挫折，在英國却發生了一些對工人階級的進步有利的變化。大戰之後，工黨決定宣布以社會主義為自己的目標，在此以前，它是向來避免宣布任何目標

的。同时，工会运动势力原很龐大而且不断擴張，这时要求把这种势力組織得更加嚴密。对于中心領導的需要漸漸明顯。职工大会議會委员会常和工党議會党团联系，按期商談，不过还觉得需要更好的、像“參謀总部”那样的机构。自从三角联盟在“黑色的星期五”垮台之后，这种需要更顯得清楚了。因此，这在随后举行的职工大会上成为一个很尖銳的問題，大会議决建立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進步，但是它所規定的最高委员会对于各成员工会的領導权太小，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失敗的。縱然如此，这已是一个可喜的重要發展。

同时，全國失業工人运动在全國各地的人数和势力都在不断增加。它变得非常坚强，它的活动又是那样有价值，那样具有深远的效果，尤其是当任何部分工人在任何時間罢工时它有力量防止工賊進行破坏，因此职工大会便和華利·漢寧頓以及他的同事們進行协商，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來处理失業問題。这次协商由1923年1月开始。同年9月职工大会批准协商，議决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代表职工大会和全國失業工人运动为失業工人進行全國性的活动。可是一直到1924年1月，联合委员会才举行第一次會議。职工大会的总書記弗雷德·布蘭姆萊患病，他在联合委员会的职务由副書記代理，这个人是一个希望被認為是左派的青年，名叫華尔特·西特林。联合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失業工人公約，这是由華利·漢寧頓和他的同事起草的。在進行一系列的活动的同时还規定了6月1日（星期日）为全國失業工人示威日。这一切对整个工人运动有很大影响，对1923年选举时工党獲得很多票数也有很大关系。英國似乎已經吸取了德國的經驗教訓，不管英美財閥的势力怎样大，怎样橫行不法地干預德國內政，英國的工人，像別國工人一样，都很明了一樁事实：如

果德國的運動曾經是團結一致的，如果混亂狀態得以消除，如果像蘇聯那種團結精神和領導精神能在德國表現出來，那末，革命就早已貫徹，全世界也可以不至于因為它的失敗而受到重大犧牲了。無論如何，我和黨內的同志們，經常把這件事當做我們大家的經驗教訓。

6月1日的示威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全國各城鎮的羣眾，不論男人女人，就業的或失業的，都揮舞着旗子，走在失業工人公約標語牌的後面。但是就在這個時候，英國已經成立了第一個工黨政府。雖然政府對失業者作了一些讓步，例如稍微增加一點福利，新的困難却在發生。這種困難，不久就使人明了英國的“社會主義”領袖們正是走着德國最惡劣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路線。1923年12月，鮑爾溫決定向全國呼喚，於是舉行了一次普選。工黨在許多地方獲得了極大的勝利，以191席取得下院第二大黨的地位。鮑爾溫政府繼續執政，直到1924年1月才下台，這才實現了麥克唐納自負不凡的大志。英王召見麥克唐納。麥克唐納的最高慾望得到了滿足。全世界屏聲靜氣地看到一個“社會主義者”現在做了英國的首相了。他在組織內閣的時候表現了極度的狡猾。一開始他就抱定主張，不去攪擾上流社會那種浪費奢侈的日常生活“規律”，因為在他那個虛榮的庸俗的小心眼兒里，他們給他一點小惠就感激不盡了。他選擇一些人來擔任政府職位的時候，並不是用其所長，而是用其所短。他用這種操縱的方法來決定所有比較高的職位的人選。現在可以拿兩個次要職位來做實例。弗蘭克·霍奇斯在“黑色的星期五”事件里立了“大功”，現在是議會議員，不再做礦工聯盟的書記了。伊曼紐爾·辛威爾是工黨卓越人物之一，這個人是不容小看的，許多年來他是一個海員組織者。他對於海洋的知識一向非常淵博。麥

克唐納先生把伶俐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礦工弗蘭克·霍奇斯派到海洋上工作，給他在海軍部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同时把辛威尔这个海員組織者派到礦井里去，任礦务大臣。他的用意在于使他手下的各部大臣，不論大小，都要听命于常务官。

当前有兩樁特別困难的事。一件事是关于埃·德·摩雷的，另一件事是关于約翰·韋特萊的。埃·德·摩雷是民主監督聯盟的著名領導人員。在1914到1918年大战以前，他曾公布了一些关于虐待殖民地人民的材料，尤其是关于比屬剛果盆地种植園的許多悲慘事件，非常觸目驚心。他也曾經揭露过許多令人震驚的秘密外交和秘密条約。1917年9月1日(星期二)，他被判違反國防条例，監禁六个月。釋放后麥克唐納陪同他來到格拉斯哥。摩雷受到格拉斯哥工人空前的如醉如狂的欢迎。他在挤滿了人的會場里演說的时候，我便在外面主持另外一个拥挤不堪的集会，因为挤不進會場的人太多，超过會場人数的兩三倍以上。1922年摩雷当选为代表鄧地的議員，当工党政府成立的时候，一般人都認為摩雷的學識經驗那末丰富，一定会任命为外交大臣。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麥克唐納最恨他身边有能力比他强并且按照公認的道德标准去生活和工作的人，而埃·德·摩雷的忠誠廉潔則是毫無疑問的。他这样的人原可以对抗最有权力的常务官，我还相信，他也不会受腐化的引誘。可是从麥克唐納的观点看来，他是一个極危險的人物。他怎么办呢？說來这故事是很卑鄙醜陋的。他去找埃·德·摩雷，他裝出对朋友滿腔热情的样子(他原是一个道地的伪君子)，对摩雷說明他遭到了很大的困难。他說他本來要請摩雷当外交大臣，可是有几个工会权威人士要求派托馬斯主持外交部。他說，这样就会成为一樁很嚴重的事。暂时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他自己除了担任首相以外，

兼任外交大臣，等到事态稍为和缓时，再来更调。摩雷的意见是，托马斯不适宜这个位置；如果派了他，就不能由工人运动来决定外交政策。所以，他很容易地同意了麦克唐纳所建议的办法。可是麦克唐纳又进一步劝摩雷写一篇文章，登在“每日先驱报”上，说明因为看到国际情势棘手，发生了许多问题，外交大臣一职最好仍旧由可尊敬的兰姆赛·麦克唐纳这样可靠的领袖担任，后来摩雷发觉自己上了当，这对他是一个最重大不过的刺激，无疑地，这也影响了他的健康。1924年11月12日他因心脏病逝世，这时他正当壮年，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至于韋特萊，麥克唐納本來不想要他在政府里工作，但是又不能丟開他。他是克萊德評論家集團的領袖，太危險了。因此，麥克唐納非常勉強地給韋特萊在政府里安插了一個職位，一個次要職位。韋特萊很大方地、溫和地微笑着，對着麥克唐納搖搖頭，說：“不，不要為我操心。我不要在政府里找事做。你只管干你的，我只須看看事情怎樣發展，就感到很高興”。麥克唐納知道，儘管韋特萊可能會感到高興，可是韋特萊那樣的“看看”，使他一點也不高興。他像對付別人一樣，也對韋特萊說了一套花言巧語。但是韋特萊曉得他的為人，因此他不斷地說：“你用不着為我操心，你只管干你的。你可以丟開我，我並不难受。”麥克唐納退出來考慮這個難題。韋特萊已經明白表示只準備考慮一個位置，就是衛生大臣。30年來他在全蘇格蘭鼓吹房屋和衛生問題，他已經被認為是這些問題的最高權威之一。麥克唐納實在碰到了對頭：這個人既曉得他要做的什麼工作，而工作到手之後又知道怎樣去干。可是他不能撇開這個人，否則他首相的位子就會坐不穩。像那樣厲害而能干的批評家會使他寢食不安的，因為韋特萊徹頭徹尾地知道麥克唐納的一切，關於這一點，

沒有人比麥克唐納自己再明白的了。因此，除了向他屈服，沒有別法。於是，衛生大臣的職位給了韋特萊。他一到任，就立刻忙着制訂一個大規模的房屋建築計劃，他因為從來沒有和工會領袖接觸過，所以請我介紹建築業的領袖。我替他們約定到下院來見他，和他磋商房屋建築計劃各方面的問題。在這時期，我夫妻倆住在馬奇蒙特街，那里靠近南安普敦街，韋特萊就住在南安普敦街的宇宙飯店。所以我們在閑空時候，很方便地互相來往，談談他的工作和工黨政府中的一般趨勢。他原來的房屋計劃是一個遠大的改革計劃，可以獲得人民對工黨政府的極大支持，但是後來他知道，這個計劃不可能通過“社會主義者”財政大臣菲利普·斯諾頓樹立起來的財政壁壘。除了麥克唐納之外，斯諾頓是工人運動中最壞的人物。他曾經使人認為他是堅決的社會主義者，不論反對的力量怎樣大，也決不會更改他的社會主義路線。這是工人運動中普遍存在的看法。他做了財政大臣以後，工人運動中有許多人期望着偉大的事情發生。偉大的事情的確發生了，可是方向相反。斯諾頓變成了英國有史以來最惡毒的、面目最猙獰的財政大臣之一。他借口節約，固執地要韋特萊縮小計劃，削減費用。韋特萊堅決地為實現他的原來計劃而鬥爭。我勸他不管怎樣，堅持原案，我向他保證大多數工黨黨員和英國羣眾會支持他。我竭力請他不要放過斯諾頓，使這件事得到結果。但是他不預備冒全部失敗的危險，寧肯做些必要的修改，使房屋建築議案得以在下院通過。實際上修改過的韋特萊房屋建築法案，已經是空前的一個巨大進展了，以後提出的法案也都趕不上它。

但是，雖然他痛恨斯諾頓，他認識到在背後支持斯諾頓的是麥克唐納。有一天晚上，他在我馬奇蒙特街的房間里喝茶，他

對我說：“如果保守黨員有一點頭腦，他們就會公推麥克唐納做保守黨的領袖。”對的，他知道這家伙的為人，也料到未來的情形。其他的人也是知道的，不過自始至終大家都心懷鬼胎，保持緘默，把麥克唐納的真正卑鄙的性格很小心地瞞過了羣眾。他還利用他門下的狐羣狗黨，替他這個危險的奸詐人物粉飾遮蓋，稱他是一個可靠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在人前炫耀。一個星期日晚上，韋特萊來看我，我們一同喝了茶之後，我說：“約翰，我不得不離開你了，我要到芬斯布里公園去在黨的集會上講話。”

“你並不離開我，”他回答說，“我和你同去。”

我們夫妻倆就和韋特萊到芬斯布里公園去，那里已經有很多人聚集開會。韋特萊走入聽眾羣，我上了講台。照例把一些問題談過之後，我們就散會。我們三人乘公共汽車到安琪爾的里翁角餐室。我們坐下來後，韋特萊說：“你曉得，威利，在我經歷了種種事情以後，站在那里聽你講話，好像是呼吸新鮮空氣。”那些日子他過得太不舒服了，所有麥克唐納喜歡的那種浮華虛榮和儀式禮節，他都非常討厭。他從來沒有帶他的妻子到過光怪陸離的典禮或酬酢場合，他的妻子也從來不要到那些場合去。有一次一個權貴問他是否可以帶他的妻子去參加一個特別的盛會。他說：“不，這是不可能的，她洗衣服太忙了。”由此可見他有時到我家來跟我和我的妻琴閑談，不受什麼拘束，也沒有內閣開會時那種限制，他是多麼感到喜悅呀！

但是麥克唐納和各前任首相一樣，在選擇閣員之前，必須先去謁見英王。不難理解，白金漢宮方面對於他這一次謁見是覺得有點不安，也可能有點震驚的。一個社會主義者當了首相，對於英帝國的前途預兆些什麼呢？他是不是會任意擺布和欺壓陸



下呢？他会不会鄙視那充斥着王室的許多欽賜官爵和一切宮庭禮節呢？英王和王族对所有这些問題都感到焦急。可是麥克唐納到达皇宮的時候，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使王室祛除所有的疑慮。他会不会吻陛下的手呢？他会不会向陛下屈膝呢？事实上就是叫他伏在地上，他也肯干，而且不会有半点怨言！他讓英王知道，他比任何別的首相更拥护那套宮庭的繁文縟節，非但不会遺漏，如果可能，还准备加些花样。他这次觀見使英王非常高兴，我相信英王后來向家族报告时，大家一定会感到放心而大声欢笑。

麥克唐納在朝拜英王和選擇閣員之后，就發出了“全体盛裝”的喜訊。宮庭的男服女服裁縫空前忙碌。工党准备表現它能有全國最美观的服裝，也能有全國最恭敬的禮節。如果这方面有任何缺点，可以立刻加以消除。信不信由你，工党的自命風雅分子，竟組織了一个俱乐部——半圓俱乐部——教練不諳禮節的工党閣員如何文雅地弯腰鞠躬，如何在吃东西的时候沒有声音，如何用叉的时候不会有齜牙裂嘴的样子。这俱乐部被巧妙地說成一个教授工党閣員和工党議員“儀節”的俱乐部，它也教授麥克唐納如何神气十足地穿大礼服，如何歪戴着有美丽羽毛裝飾的帽子。假如下流社会的粗魯市民胆敢吐一点他所不乐意的口沫在他那双合脚的鞋子的銀帶扣上，他是会像古代武士那样來惡斗一番的。这簡直是一幕啞剧！結果却使得議會里一般的善良工党議員可憐巴巴地替他們領袖們的这种惡劣的行为進行辯解。

工党政府是少数党組織的政府。正如上述，这恰恰適合麥克唐納的心意，同时也適合保守黨員的心意。保守黨員要完成兩件事。第一件是承認苏联。对于这一件事，全國人民的情緒

非常激昂。最高委员会所領導的工会运动（那时候領導人物是阿·阿·柏塞尔和弗雷特·布蘭姆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强硬。工党把这个问题放在它的计划的首要地位，但这并不是由于工党領袖們的热心，而是由于全国各地紛紛送來決議書，要求立刻承認苏联。保守党知道承認問題不能再拖延下去，但是按照当前情况，他們不願意自己來办，因为他們想要保持自由，得以在他們認為欧洲局势有利的时候和苏联絕交。他們既然心里这样想，那末最初的承認最好由別人去办。而做这件事沒有再比少数党工党政府更合適的了，因为無論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它去掉，并否認它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但是麥克唐納是首相兼外交大臣，要他自己來办这件事就有極大的困难。当时大家都期望着第一次內閣會議討論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認苏联。但是工会运动后來知道，第一次內閣會議完全沒有討論这件最緊要的議案，这使它非常震驚，全国各地紛紛抗議。議會議員尼尔·麥克里恩向來参与承認苏联、支持苏联的运动，他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每日先驅报”上，对迟迟不承認苏联提出抗議。鄧肯·卡迈克尔当时是倫敦工会理事会的書記，他寫信給麥克唐納，揚言要發動倫敦羣众，举行抗議示威。全国各地开始劇烈騷动，各处都在准备游行用的乐隊和旗帜。麥克唐納覺得大風暴即將到來，于是屈服了，終于办理了承認苏联的事——可是非常勉强。他把鼻子高高仰起，仰得比敏感的寇松勳爵的鼻子还要高。事实上，承認不过是局部的，因为兩國之間沒有交換大使。議會議員詹姆斯·欧格雷第早已被內定出任这个位置，麥克唐納也已經認可，后來却封了他爵位，派他去做塔斯馬尼亞总督，借以补偿他的大使职位。

工党政府当时的另一件事是要貫澈臭名远揚的道斯計劃。

这个计划和工党关于凡尔赛条约和赔款的整个政策完全相反。不过麥克唐納若是要把道斯计划加在德國人民头上，并無困难。保守党需要这个计划，他們知道这是一个澈底反动的重建德國資本主义經濟的惡毒方法。当然，这就是他們所要的东西，可是他們也知道这东西極端危險，对于英國、对于整个欧洲，都会帶來很嚴重的后果。所以这件事如果由工人运动來做，对保守党比較有利得多，因为这件事对工人运动本來沒有好处，同时在外交方面却使工人运动受到反动政策的約束。因此，道斯计划終于为了德國資本家的利益而强加在德國人民的头上了。正如所料，这个道斯计划在英國引起很坏的反响，它嚴重地打击了我們自己的經濟，增加了很多失業工人。保守党正期待着工党在这个失業問題上垮台。

对于失業工人的一点極菲薄的津貼，虽然稍稍調整了一兩次，可是沒有用劇烈的方法或者从根本上解决這個問題。有一次劳工大臣湯姆·蕭譴責那些提出質問的工党和自由党議員，說他們不能希望政府像一个魔術家从“帽子里变出兔子”那样拿出計劃來，保守党議員听了這句話便發出了最热烈不过的欢呼声。工党政府在解决失業問題方面所做的就是这样。

工党議員們和全國各地的工党領袖提出來原諒自己的理由，总是說：“我們是在办公，不是在执政。”这个理由就是說工党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必須先得到下院的同意。這句話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錯的，因为從來沒有檢驗过。可是世界上或任何其他地方沒有一种权力能够阻止工党政府提出最進步的方案，交付下院。如果工党政府提出这种方案，自由党就不敢貿然加以反对，即使反对而使政府制定的進步法案遭到失敗，那末毫無疑問，全國对这件事必然会有反响。可是政府並沒有为進步改革

而斗争，反而因为逮捕当时“工人周报”編輯約·魯·坎貝尔这个錯誤的措施而倒台了。

在工党政府时期，各產業部門都有驚人的騷动。鐵路工人、工程师、礦工和碼頭工人都在行动，表現了他們要对資方進行斗争的深切願望。在欧內斯特·貝文和运输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的領導下，倫敦碼頭上發生了一次特別嚴重的罢工事件。工党政府为了要引用緊急权力法案，便以最大速度請英王頒發布告，实施这个法案。这就是說，由軍隊來控制当时的局面。貝文很嚴厉地提出了批評，認為如果是保守党政府，反而比較容易進行这次斗争。因此，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撤銷罢工，免得整个工人运动被粉碎。

这种事件發生了几次之后，“工人周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要求軍人們不要受別人利用來对付工人。倫敦警察廳派人到編輯部把該报負責人約·魯·坎貝尔逮捕，并决定对他提起公訴。但是工人运动，包括許多工党議會議員，以乔治·蘭斯伯雷为領導，憤怒地提出了抗議。在各方面紛紛抗議的情况下，經過一番協商，才撤銷了公訴。这件事曾經在下院提出討論，工党閣員支吾其詞，陷入極為狼狽的境地。自由黨員提出这事时，也抗議政府干涉司法。他們說，这件事無可掩飾地違反了我們所愛护的憲法。替政府辯护的人最初說在搜查逮捕之后，他們才知道沒有充分根据提起公訴。這句話說出后，又覺得不安，于是他們就說了許多偏重感情的話，說是对一个在大战中(1914年到1918年)有很大功績，在服兵役期內得过勳章而且因伤变成殘廢的人提起公訴，是怎样不適合的事。他們說了种种逃避責任的話，不肯直截痛快地依照原來的說法承認逮捕是一个錯誤。結果是自由黨議員提出不信任投票，因为有保守黨員的支持，这个动議終于

通过了。麥克唐納面对着許多困难問題，而又不願意依靠自由党(他心里还有更遠大的計劃)，就決定辭職。事實上他並沒有辭職的必要，因為政府的整個政策沒有失敗，只不過在總檢察署單獨一個部門遭了挫折。但是，他辭職了，這次工黨政府只干了九個月，問題又一次交給全國人民來處理。

政府雖然表現了許多弱點，但各工會所領導的各種運動却使羣眾的政治思想和願望有了進步。工黨領袖們在未來的選舉中希望取得多數議席。當時有這樣一種希望，就是即使他們得不到多數，無論如何也能使議席大大增加。但是正在準備選舉的時候，那臭名遠揚的“赤色信”就被麥克唐納自己用作競選工具。很明顯，麥克唐納並不要工黨取得多數席位。這一封“赤色信”據說是那時候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寫給英國共產黨主席阿瑟·麥克曼納斯的，實際上是一個露骨的無恥詭計。這封無實據的信的抄本——正本從來沒有露過面——以前是在一家著名的保守黨報館手里，後來轉送給外交部——很可能是轉送一份抄本的抄本。工人運動的每一個人都盼望麥克唐納揭露這封信，指出它是偽造的，是一個騙局。但是麥克唐納在那個關係重大的週末保持緘默，一聲不響。忽然間，全國主要報紙登載了外交部給蘇聯政府的一個照會，認為那封信是真的，要求蘇聯政府給予圓滿的答复。這件事使保守黨歡天喜地，使工黨懊惱沮喪。這事對於選舉影響之大，現在已經不能回想，也不能描寫出來了。當時的情景好像是野蠻、粗暴、殘忍的布爾什維克準備侵略和吞并英國。這是從來沒有的一次卑鄙醜惡的競選，影響了比較胆小而世故不深的選民，這對於工黨的競選運動打擊尤重。儘管如此，在工業區的票數仍增加了不少，可是很多增加的票數是給已經任下院議員的黨員的。1923年總票數是440萬票，

1924年增加到550万票。票数虽然增加了，議席却减少了42个。自由党全軍复沒，它的200多个席位减少了150席。这就是說，唯有保守党風平浪靜；保守党是由骨子里奸刁狡猾表面上一团和气的鮑尔溫先生把着舵的。

选举結束之后，工党派了一个特別委员会調查季諾維也夫那封信的來源。經過最慎重的審查和徹底地訊問了証人，特別是審查和訊問了阿瑟·麥克曼納斯（他在这个惡名远播的抄本“發現”的前几天剛由莫斯科回國）之后，工党公布了一篇文告，毫不怀疑地說明季諾維也夫那封信顯然是伪造的。麥克唐納想逃避他那部分的責任，坚持說他自己沒有批准那个給苏联政府的照会。他說这个照会曾交給他，他也曾在上面以縮寫字簽署，这不过表明他已經看过这件照会，却想不到在沒有和他進一步商量之前竟被發了出去。負責起草和發出这个照会的那位先生是外交部一个著名的反苏官員。他在几年后因为做法郎投机買賣而失敗，处境很悲慘。英國有一些偉大的民主人士，在这个國家里，我們的全部政治都好像是从天上剛剛洗滌后直接送來的干淨东西。

但是鮑尔溫和丘吉尔对于工党揭露得不及时的季諾維也夫信件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們自始至終都曉得信是伪造的。但是这封信使他們獲得了他們所要的多数議席，只有这一点对他們是重要的。這兩位先生現在親自發表演說，这些演說的性質簡直等于給麥克唐納下命令。他們用粗魯率直的口气，叫他必須把工党里的共產黨員排除出去，然后他才能有取得信任而重組工党政府的希望。因为麥克唐納与保守黨員之間，对于將來發展的途徑早已就有了很大程度的諒解，所以麥克唐納的回答的實質是：“我是你們卑微忠实的僕人，你們可以把要

办的事交给我，我一定很好地完成任务。”为了准备于1925年召开工党会议，驅逐共產黨員，他和一班同事到外面去竭力制造混乱，激起对共產黨員的一切可能的惡感。

他們想法把这个有麥克唐納簽名的著名伪造文件說成应由共產党負責的东西。無論如何，假使沒有共產黨員在那里，就沒有伪造文件的必要！連处置失当的坎貝尔一案，也被用來反对共產党，說第一次工党政府的失敗，应当由一个共產黨員負責。这种毫無价值的宣傳大量地散布各处。進行散布工作的不但是麥克唐納四周的主要人物，所有独立工党的一般黨員也都参加。独立工党是麥克唐納長期進行欺詐的主要依靠。

不过，虽然工党自始至終越來越右傾，而有組織的工会运动則同样迅速地趨向左傾。以弗雷德·布蘭姆萊为書記的职工大会最高委員會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國際里面展开了一个强有力的运动，爭取和苏联的工会团結一致。它派了一个代表团，由团长阿·阿·柏塞尔率領訪問了苏联，回國之后还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最高委員會的進步政策有1924年的职工大会做后盾，工人階級的精神越來越高昂了。

就在这时候(1925年6月30日)煤礦礦主們通知礦工联盟，終止現行合同，建議大大削減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取消全國性合同，实行地方性合同。礦工联盟声明要以全力來反对这些建議，并且請求最高委員會支持工会运动。最高委員會于7月10日开会，声明如果礦主進行威脅，它准备完全支持礦工。最高委員會又成立了一个特別委員會和礦工保持联系，并作一切必要准备，保証給予当前斗争充分协助。7月30日(通知的限期为31日)，礦工領袖去見首相鮑尔溫先生。这位先生是壟断資本主义的極其狡猾、頑固的代表人物。他毫不躊躇地为他所代表的人們的

利益服务。不过他是我所接触过的最狡猾的老保守党员之一。表面上，他向来是一个朴素、诚实、率直的英国绅士，他关怀同僚的不幸遭遇，在和人说话的时候，他两只眼睛总是注视着对方，估计着他说话的效果。这次在唐宁街十号接见矿工的时候，他成了他们中的一个率直而忠实的朋友，他带着哭声对矿工说，情况的性质是这样，矿工们不得不减低工资，使我们得以摆脱困难，而这也就是矿工的贡献。有一个代表问他：“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要这样做呢？”

“是的，”“诚实的”斯坦莱回答说，“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必须减低。”但是在对矿业进行调查期间，他坚决地拒绝以任何方式的津贴来维持原来的工资数字。矿工们离开他之后，就去报告最高委员会。运输工会的干部按照最高委员会的指示，立刻向各该工会发布指令：“从7月31日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运煤。”这个指令对铁路公路都适用。如路上有装煤的车辆，就把它们丢在那里。不运煤，不装煤，也不卸煤。这是对英国统治阶级的一种空前的挑战。政府想不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时手足无措，只得立刻屈服，同意发给津贴，使现行工资延续九个月。在这时期内，由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现在是勋爵）领导的皇家委员会把矿业情况查明具报。

“每日先驱报”于次日早晨登载了一个惊人的标题：“红色的星期五”。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姆·斯威尔斯和副书记华尔特·西特林（弗雷特·布兰姆莱刚死不久，由他接替）发表文告，说明他们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会运动。同时他们又号召对于未来的岁月要保持最高度的警惕。麦克唐纳也发表他的意见，他在独立工党暑期学校演讲时这样说：

“政府让那些力量得到至少是表面上的胜利；而从健全



的、經過鄭重考慮并仔細檢定的社会主义的角度來看，那些力量可能是最大的敌人。”

保守党内政大臣、死硬派乔埃遜·希克斯把麥克唐納的思想化成另外一句話，他咆哮着說：“英國是由內閣來統治呢？还是由少数工会人員統治呢？”保守黨員和麥克唐納愈來愈接近了。礦工聯盟總書記阿·詹·庫克說得好：“这是第一个回合，現在讓我們准备决战。”不幸的是最高委員會就沒有做这种准备。

当这些事情正在發展的时候，独立工党玩弄各种机会主义的手法來蠱惑人心。当雇主們集結所有力量來大大削減工人工資的时候，独立工党竟主張由“一个委員會來决定一个公認的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标准”。这样就使独立工党脫离了斗争，从而得以發表各种空洞論調，而自己不負任何責任。比这更坏的——現在看來几乎不能使人相信的是：他們竟提出“福特主义”來解决我們的經濟問題。他們的主要發言人赫·納·布莱斯弗德对于那个偉大的新救主亨利·福特簡直崇拜得發瘋。好像馬克思是过去的人物，他的理論已經全部被这个美國的汽車制造商粉碎了。通过福特主义走向繁荣——这是布莱斯弗德和独立工党的口号。他們在这个緊急时期所制造的混乱以及这种宣傳所引起的惡果，現在是很难估計的。

要克服这种混乱，宣傳方面必須有新的進展。我們和一些急于要推行進步政策的工会領袖磋商之后，就决定刊行一种星期日报。这是一項繁雜而責任重大的工作，我們曾經向所有表示同情的各方去联系募捐，用尽一切方法來推动这个事業。1925年3月15日星期日，“星期日工人报”出世了。先在威廉·保罗、后來在華尔德·霍姆斯的領導下，这个报达到了高級星期报刊的标准。它的國際新聞、工業新聞、失業新聞、普通新聞和政治

指導等對於運動中所進行的討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這本書里面，我雖不能敘述“星期日工人報”的情況，但是可以說它所樹立的功績是工人運動最出色的成績之一。由於黨在創辦該報的時候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便代表黨在編輯部擔當了一個類似聯絡員的職務。

工黨會議就在這種情形下在利物浦召開，不過當時它對麥克唐納還有無限信心。全國鐵路工人工会的克蘭普擔任主席。他跟歐內斯特·貝文和我一樣，曾經是社會民主黨的黨員。由於左派的支持，他當選了全國鐵路工人工会的負責人之一，但是當選之後，他立刻轉向右傾，特別在這次會議上他盡量右傾。麥克唐納、托馬斯和斯諾頓都是反對共產黨人的。我也是出席會議的代表，我同另外一兩個人竭力阻止這種逆流，但是徒勞無功。結果共產黨人被壓倒的多數票排除了，工黨終於保全了鮑爾溫和保守黨。

在會議上除討論共產黨問題外，還有兩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對奧斯瓦爾德·摩斯萊（當時是工人運動中僅次於麥克唐納的有名人物）所表示的歡迎，一件是歐內斯特·貝文对被奉若神明的麥克唐納稍稍加以批評而得到的反應。貝文一時受了正義感的衝動，以為不妨把“泥腳”揭露一下——但是全場對他大喊大叫，立刻阻止了他。他不敢再批評這位大人物了。他被代表們大聲喝退的這件事，我敢肯定地說，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經驗。

麥克唐納抨擊共產黨人時，用他一貫的紳士姿態污蔑共產黨人伸手要錢。我演說的時候，就乘這個機會說明一個事實，就是：共產黨員是世界上最不會因金錢而受責備的人，他們關心的是工人階級，他們在工人階級隊伍里面，為工人階級而鬥爭，而麥克唐納那樣的人才會在敵人營帳里喝酒吃飯。第二天艾特肯·

福格蓀和我在會議廳走廊里，遇見了麥克唐納和當時“前進”周刊編輯湯姆·約翰斯頓。“喂，威利！”麥克唐納用最威嚴的神氣說：“你說領袖們在敵人營帳里喝酒吃飯，我希望你不是指我。”

“我当然是指的你，”我回答說。

“可是，對我說來，這是不正確的，”他對我說。“我討厭那些宴會，我可能偶爾到白金漢宮或者巴摩拉爾堡去，可是你不見得說這兩個地方是敵人的營帳吧。”

“你想我會說它是什麼呢？”我回答說，“你是不是要告訴我，你在那個地方遇見的是一羣無產階級呢？”

他有點着惱了，他那紳士態度也有些沉不住氣的樣子，但是他始終要裝出一種耐心、能忍受長時間委屈的神氣，所以他接着說：“你不知道實際情況。我告訴你下次我到巴摩拉爾堡去時，我想帶你同去，讓你親眼看一下。你願意去嗎？”

我說：“我去，可是我要保持在工廠里或者街邊上和那些年青小伙子相處時候的作風。我和你賭一先令，我去了一次以後就不要再被邀請，而你因為帶了我去也就不能再回到那里去了。”這一下把他的嘴堵住了。他哼了一下，就和他的酒友一起走了。他沒有帶我到巴摩拉爾堡去；內政大臣喬埃遜·希克斯比他先來，邀我去參觀溫茲華斯監獄。

---

---

## 第四章

自从共产党人被逐出工党以后，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新聞界感到莫大愉快，这也就是鲍尔温和他的政府所等待的一件事。兩星期之后，共产党总部被搜查，大批文件被劫去，主要領袖被逮捕。这时候我在培斯利，因为我在工党會議之后已經回到家里去了。有一天深晚，我同我的妻子回家，路上遇到了一個警察，他把我叫住說，本地的刑事偵察处的探員卡尔勃萊斯急于要見我。那时我离警察局很近，因此我們夫妻倆就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探員卡尔勃萊斯和他的伙伴探員高迪（現在是培斯利的警長）在那里，他們看見我突然一驚。他們告訴我，他們收到倫敦的电报叫他們逮捕我，現在我既然落在他們手里，就不能讓我走了。不过我說服他們讓我先把我的妻子送回家，于是我們便一道走。我同我的妻子走在前面，他們在后面謹慎地跟着。我等妻子舒適地安睡之后，又到了警察局。次日早晨移解到格拉斯哥总局，随后乘十点鐘的火車到倫敦去。我由培斯利的一个警官押解。到車站的时候，遇到了湯姆·貝尔，他也有一个格拉斯哥的警官陪着，他到倫敦去的原因和我相同。我們晚上到了弓街警察局，那里有一个倫敦警察廳派去的警長很狡黠地給我們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圈套。他對我說：“你是英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員威廉·加拉赫嗎？”我回答這個問題时，有着不可饒恕的天真，我說，“是的。”他就說：“我这里有一張逮捕你的拘

票，我不得不警告你，你無論說什麼話，都會用來做控告你的証据。”真是一位仁慈的好人！因為，請注意，我已經答复了將被用來做控告我的証据的問題了——就是：我是英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整個案件就是有關黨的執行委員會、事實上也就是有關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被認為應當負責的刊物。如果我有点理智，對第一個問題我應當回答：“我是威廉·加拉赫。這就是我準備說的一切話”。如果這樣回答，那末，刑事偵察處的人就摸不到頭緒了，因為他們無論在哪个法院都沒有辦法來證明我是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此外，還給我們安排了一個小圈套：我們的衣服被搜查了，所有里面的東西都被取出來了，他們在一張紙上把一件一件東西開了清單，然後包起來，上面寫上了我的名字。他們叫我看了看清單是否正確，然後很和氣地說：“你可以簽字，這樣手續就清楚了。”于是我簽了字，證明我私人物件的清單是正確的。不料我的簽字隨後被送到法院里去對証另外一個文件上的簽字。這裡的教訓是：不說話，不簽字。

第二天我們都被帶到弓街。總共逮捕了12個人。由一個頑固、陰險和極度妄自尊大的查德斯·比隆爵士審訊。法庭上提出了保釋問題。蘇格蘭保釋是用現款，英格蘭不同，不收現款而要擔保品——自己的或者別人的財產。為了找保，我問了幾個人，結果蕭伯納同意做我的保人。保人一定要到証人席上宣誓證明他的財產足夠抵付所保的數目。蕭伯納很愉快地走進証人席，他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紅鬍鬚，那時雖然已經現出一些白絲，但還像從前那樣挺勁。查德斯爵士顯然不喜歡他那樣子，他喃喃地說：“你值200鎊嗎，蕭先生？”

蕭伯納稍稍低下了頭，好像很憂郁的樣子搖搖頭說：“不值，我不大喜歡那樣說。”忽然，他面露喜色，愉快地尖聲說：“可是

我有200鎊現款，如果這就是你問我的意思。

法庭上鬨堂大笑。查德斯爵士老羞成怒，他喃喃地說：“要記得這兒不是舞台，這是法庭。”然而在蕭伯納看來，這是一個舞台。

我們被正式移到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由道格拉斯·霍格爵士（現在是黑爾什姆勳爵）提起公訴。我們被一班总算能干的陪審官“好好地、實實在在地”審訊了一番，這批陪審官被認為是足以和我們“匹敵”的人員。我們被認為有罪。有幾個被告自己辯護，其他被告則由律師辯護。這種辦法可以使我們從政治方面和法律方面充分進行辯護。五個被告——波立特、英克平、漢寧頓、魯斯特和我以前都被判過一次或幾次罪，因此被判了12個月徒刑。我們從被告席被帶走了，法官對剩下的七個人講話。這是一個驚人的場面，我肯定地說一句，法院里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他們和我們一樣，被認為犯了煽動罪（這是一種可重可輕的罪）。雖然他們被認為有罪，但審判官却說只要他們脫離共產黨，就讓他們自由。這裡要是准許“喝倒采”的話，他倒可以博得一個滿堂倒采。他們拒絕了他的這種“好意”，因此每人被判了六個月徒刑，分明不是為了煽動，而是為了拒絕脫離共產黨。又一次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司法方面，是可怕的，不可思議的東西。

斯萊瑟是有“國王顧問”銜頭的著名工黨律師，他是這次被聘請來的律師中的一個，他為一兩個同志辯護。若干年後，“每日快報”的“威廉·希凱”專欄里面有一段文字，評論斯萊瑟被委任審判官的事情。“希凱”說，斯萊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可是缺少幽默感。為了證明這一點，他說斯萊瑟曾經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為加拉赫辯護，結果加拉赫無罪開釋，但是在法庭宣布開釋

时，加拉赫回身对斯莱瑟说：“我不要开释，我要提起上诉。”斯莱瑟庄严地回答说：“不过你不能对无罪开释上诉。”我写信给“每日快报”，说这篇故事写得很有趣，不过除了斯莱瑟从来没有替我辩护过，我也从来没有被无罪开释过以外，这篇故事可以认为相当正确。“希凯”显然有点恼火了，几天之后，他又在他那专栏里评论哈里·波立特。他说：“哈里是世界上一个最好的人，他能和任何一种人相处，他可以拿起一杯啤酒喝，也可以不喝。比起他的那一位严格的禁酒主义者苏格兰同事来，是大不相同的！”我看了这段文字，无疑地知道他暗指的人是誰，我只得閉口不答。

再说我们12个人，共产党的领袖，被押解到布里克斯顿监狱，过了一两天，又移到温兹华斯监狱。在这里有一间很大的屋子，用作混合工场，主要的出品是邮袋。犯人一行一行地坐在那里缝邮袋，犯人和犯人之间大约有一码的距离。在工作的时候，犯人彼此可以略微谈话。房屋的最高处放着一个裁剪枱，做邮袋用的布就由那里裁剪。那张枱子有三个人工作，波立特、英克平、华利·汉宁顿幸运地被派到这里，这就使他们在没有奉到其他差遣以前可以在一起大谈特谈。靠近那张枱子有一个长凳，是做邮袋的箍带的，汤姆·贝尔和我就被派在这里，因此我们同波立特，英克平和汉宁顿三人是近邻。后来，鲁斯特——现任“工人日报”的编辑——同汤姆和我搞在一起。其余六个人在缝紉室，那是一个小地方，几乎没有听见什么人在那里谈话。

我们知道外面——尤其是政府方面——正在准备1926年5月开采煤矿临时协定满期后的斗争。我们渴望有人来看我们，带来一些消息。第一个有人来访的是华利·汉宁顿。这是在我们到温兹华斯之后大约两星期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一个看守

到混合工場來通知華利說有几个人來看他，把他帶走了。每次接見一般約20分鐘。半小時過去了，華利還沒有回來，我們開始感到不安。我們急于要知道最近外面的情況。後來華利終於回來了，我們看到他時嚇了一跳。他臉色轉白，目光含怒，很氣憤的樣子。他回到裁剪枱和他兩個同伴熱烈地談論起來。湯姆和我坐在靠近他們的地方，可是聽不到他們談些什麼。過了一刻，哈里·波立特從裁剪枱那邊走近我坐的地方，把事情全部告訴我，這次接見的房間里，有一張大桌子放在房間的一邊。華利被帶了進去，叫他坐在那桌子的一邊，這一邊是離門最遠的地方。看守隨後把他的妻子、小女孩和湯姆·曼恩帶了進去，叫她們坐在桌子的另一邊的椅子上，這一邊離門最近。那看守自己就站在華利和來訪的几个人的中間。華利向前走過去摟抱他的妻子和孩子，可是他得走過那看守。看守擋住他，他就和看守扭打起來，看守按電鈴叫人幫忙，把華利給治住了。這一次接見顯然是完全被他破壞了。華利被帶出房間，他的妻子和孩兒傷心痛哭，湯姆·曼恩在旁勸慰。哈里對我說他們枱上三個人決定要我第二天早晨去見監獄長提出這件事，並告訴他在接見時進行這種干擾是不能忍受的，如果再有同樣情形發生，我們就要鬧起來。

第二天早晨監牢門開啓的時候，我登記了我的名字要見監獄長。早餐后我們照例有一小時體操；體操以後，我沒有上工場，而被帶去看監獄長。房間里除監獄長以外，還有副監獄長和看守長，另外有一個看守站在我旁邊。我向監獄長講到漢寧頓的事情，告訴他我們要和他取得諒解，就是由他給我們一些照顧，否則我們就要設法使大家都知道我們所受的待遇。他對我說，不能到他面前去為別的犯人講話，而只能為自己講話。對於這一點，我回答他說，他盡可以打這種官腔，但是我們雖然願



意大家愉快地度过我們服刑的歲月，可是我們也會毫不遲疑採取共同行動，用種種方法和他搗亂，要是他逼迫我們這樣做的話。他似乎滿不在乎地說：“我們這裡有辦法對付搗亂。”

“那是可能的，”我回答，“可是你會知道，如果我們開始搗亂，就不會限于‘這個地方’，外面也會有各種搗亂，那你就沒有方法對付了。”

這就使他不得不考慮一下，因為那時候他對於外面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已經有些經驗：每逢星期日晚上，監獄外面總有一次大示威，高喊着犯人的名字，歡呼的聲音由外面經過門廳穿入，一支一支的歌不但鼓舞了共產黨人的心，也鼓舞了所有犯人的心。我們還繼續談了幾句話，然後監獄長說他將考慮這件事，隨即把我帶了出去，到工場里去工作。中午收工，我們排成單行穿過監獄中心回到各人牢房里去。當我們走到監獄中心的時候，監獄長和看守長站在那裡。看守長用手勢叫我走出隊伍。我就走到他和監獄長站立的地方。監獄長對我說：“我已經考慮過那件事，加拉赫。昨天那樣的事不會再發生。你可以告訴你的同伴。以後，假使他們中間任何人有什麼委屈要伸訴，你可以通知此地的看守長，由他來處理。”我向他道謝他的好意，對看守長微微笑了一笑，他也回了一個微笑。那時起，我就擔任溫茲華斯監獄的工場代表的職務。從此沒有再發生事故。有幾次，糾紛起來了，我去找看守長談話，問題立刻獲得了解決。有一次，我不能不去找他談談關於負責體操的那位看守。犯人們要去掉這個討厭傢伙。這傢伙有一次對約·魯·坎貝爾叫罵，坎貝爾在年老和殘廢人的小圈裡做早操，那傢伙向他喝道：“喂，你這個壞了腳的傢伙！不要說話！”

當我轉到他那裡的時候，我便走出體操行列，對他說：“你對

那边小圈里我的朋友嚷什么？”

他說：“你这里沒有朋友，你是犯人。”

我回答說：“不錯，我是犯人，但是我这里有朋友，那就是一个，你最好懂得这一点。”

“你沒有权利这样对我說話，”他高声說。我回答說：“我和你說話，还是你的福气。你再要这样干，我就不对你說話了。讓你受了罪还不知道为什么事。”我又說：“任何坏了脚的人你都对他嚷，看看你自己的脚吧，也沒有什么值得誇耀的。”

“归隊去吧，”他命令我。

“我回去，”我回答他，“可是你决不可以再那样干。”

一兩天之后，他对另外一个犯人喝道：“不要說話。”

那犯人轉过身來罵他：“滾你的蛋！”

当然他把这件事报告了監獄長。对于我，他却怕他自己的事敗露而不敢报告（我曾叫他去报告，他不敢，因此我才知道这一点）。被报告的犯人体操完畢时就被帶到監獄長面前。看守控訴他后，監獄長就問他有什么話說。他回答說：“看守說的話不真实，他一向找犯人惹事。那一天他坏極了，逼得加拉赫走出來，恨不得揍他一頓。”監獄長气得几乎癱倒在椅子上，他命令除看守長外，其他人都出去，然后叫犯人重新說明經過情形，犯人又說了一遍。过了不多一会，又請我把工場里的事擱下，去見監獄長。我進去的时候，看見監獄長和看守長都垂头丧气。“他对我說的話是真嗎？”他問我，喉嚨里差不多有点嗚咽的声音。我想知道为了什么事，他就告訴我他所听到的报告，并且埋怨我，說像我那样有經驗的人，居然在我們取得諒解以后，还作出这种空前的触犯規則的事。我竭力把事态緩和下來，向他解釋，說坎貝尔那小伙子是我的特別要好的朋友，我听到有人对他

喊叫的时候，我不知不覺地走向那看守說話，我当时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不过我說我能保證，这样的事以后不会再發生。監獄長又說了几句伤心的話，看守長在旁边听着搖頭，我就回去做工去了。同伴們又决定叫我去对看守長說，把这家伙調开体操职务。我就去和他談，他答应做这一个必要的調动。同伴們很高兴，他們知道很可能來一个較好的看守，决不会有更坏的來。但是，信不信由你，新來的却更坏！这里我可以說，一般說來，看守也像普通的人那样是有人性的，他們要执行他們的任務，也極力想要减少犯人的麻煩和他們自己的麻煩。可是，和別的职业一样，也常常有例外。我們这里有兩個例外；像我所說过的，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坏，簡直坏透了。他只來了兩個星期，“裁剪拾”的人又命令我再去找看守長要求再換。这一次換來的是監獄里一个最好的人，我們兩人一組地談着話走圈子，他全不管。事实上他要我們快乐，他自己只注意有沒有他的上司会想來看看体操。不但如此，他还时常自动請一兩個人离开走圈子的行列去和他閑談。監獄生活無疑地是艰苦的，可是也有輕松和比較舒適的时候。

这一方面我特別幸运，因为副監獄長(一位希尔頓先生)是蘇格蘭人，对于改良監獄頗感兴趣，他成为經常來看我的人，常常一次坐上一小时(当然是在我的牢房里)討論改進監獄制度的各种計劃。虽然他对于監獄准备作很大的改進，但他总是說我的要求过高，假使我能把我的主張放溫和一些，就比較容易办到。我辯論說，現行監獄制度会产生最坏的结果，我們的清規戒律太多，使得大家都有一个观念：犯人只要有了机会，就想破坏这种規章。犯人留心等待这种机会，看守一刻不停地注意着，防止他們犯規。这样，犯人和看守之間就繼續不断地有了互不信任

的气氛，仇恨越久越深，因而有时發生暴力行动。我建議的正与此相反，把規章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过应当鼓励犯人尊重規章，遵守規章。看守对待犯人，不能像管畜牲那样时时刻刻監視着，而是要把他們当人类看待，讓他們有机会在監獄里和外面普通人一样地好好做人，根据这个总原則，我提出一大套办法，例如：犯人在接見來訪客人时穿自己的衣服，增加犯人之間聚會的机会，准許表現好的犯人出去看他們的朋友，不必限定由朋友來看他們。我也建議每星期付給犯人一点工資，監獄里開設店舖，讓犯人買小量物品。对于这几点他認為是重大的改革，但他不准备同意。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在我們这些共產党人离开这个溫茲華斯監獄和那种令人不敢領教的招待之后，他被調到瓦克菲尔德当監獄長，負起那个監獄的完全責任。他到任不久，瓦克菲尔德監獄就成为一个模范監獄，因为他在監獄里实行了我從來沒有想到的改革办法；在这方面他很快地就远远超过了我。他把監獄制度徹头徹尾加以改革，把犯人編成若干組，每一組的人是否能維持秩序和尊重規則，由全組負責，看守的干預减少到最低限度。还組織足球隊，每星期六下午比賽足球，也組織了音樂隊和乐隊，采取了付給低微工資以及其他一系列革新办法，这就使瓦克菲尔德監獄產生了这样的情况：監獄的主要动机是要帮助犯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去恫嚇、懲罰和压制他們。

他后來被任命为監獄總監，我相信他現在还很勝任地干着这个責任十分重大的工作，因为1938年11月，塞繆尔·霍尔爵士提出監獄法案的时候，他告訴我希尔頓先生对他提起过我；塞繆尔爵士草拟这个法案时，希尔頓帮了不少忙。法案里只有一兩項監獄改進办法，因为塞繆尔爵士不准备去冒那种把計劃搞得太大的危險。他建議在一兩处監獄里付給犯人做工的低微工

資，使他們可以在監獄的商店里購買一些額外物品。他又建議由一兩處監獄里試行犯人穿着自己的衣服接見訪問者的辦法，不過他在法案里沒有說明所有監獄都可以這樣做。他不認為犯人可以去見朋友，可是他在法案里建議，如果有人訪問一個犯人，而監獄離犯人的家庭住址很遠，可以把這犯人移到離家最近的監獄里去接見訪問者，免得訪問者長途跋涉到監獄里來。整個法案的精神是遵循着這樣一個原則：將規章減少到最低限度，鼓勵監獄工作人員與犯人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保持良好關係。這個法案沒有我所希望的那麼有魄力，也一定沒有希爾頓所希望那麼有魄力。雖然如此，這個法案對於監獄行政已經作了很大的改進。

同時，我要回過頭來再敘述一下溫茲華斯監獄的12個共產黨領袖，他們一直過着沉靜的生活，間或從訪問者的口中得到外面政治動態的消息。我會和許多工黨領袖以及議會工黨議員來往很久，所以不斷有人要求內政大臣喬埃遜·希克斯發給他們到監獄來看我的許可証。有兩次值得略為談一下。我培斯利家鄉有三個合作運動的幹部正在倫敦出席會議。他們到了倫敦，立刻申請到溫茲華斯監獄來看我的許可証。因為有工黨領袖的幫助，他們毫無困難就領到了許可証。傳話到工場里來說我有人來找的時候，波立特、英克平、漢寧頓、湯姆·貝爾和威廉·魯斯特都在我鄰近做工，他們急切地要聽消息。我到平常接見的房間里去見他們，大家都高興得要命。這三位老朋友是直接從家鄉來的，我們談談這，談談那，一邊笑，一邊聊，感到非常痛快。半小時的接見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回到工場的時候還一直在笑。哈里·波立特低聲問我：“什麼消息？”

“消息？”我說，笑容由我臉上消逝了。“啊呀，我忘記問清

息了！”要是一个受难的人会被同伴咒罵的話，这次我就是一个例子。这件事是我們在監獄里始終沒有忘掉的。“这班培斯利來的莫名其妙的家伙，浪費了我的時間，却没有帶消息來！”

还有一次，我們收工吃过晚飯之后，我正在牢房里忙着寫东西，一个看守來告訴我有人訪問。晚上还有人來，这是很特殊的。我到会客室一看，不但接見的時間特殊，來訪的人也特殊。他是我所尊敬的、始終如一的老友戴維·寇克伍德。他帶來消息沒有呢？帶來了。他不但帶來了消息，还針對那些处理國內正在滋長的糾紛的有关方面提出極為尖銳的批評。当前就有嚴重的事將發生：对礦工的攻击又开始了，整个工会运动准备支持礦工。在下院已經提出一些問題，并提出了一些議案（或者已經有人建議要提出議案）。但是戴維却一概不贊成。“我对他們怎么說呢？”他帶着深刻表情的神气說。“我对他們說：你們可以把这种提案收起來，藏在像猴子藏胡桃的地方！”看守隔了桌子坐在戴維和我的对面。他從來沒有感觉到这样有趣，他好像在溫布尔頓看打網球，他的头轉過來轉过去，看看我，看看戴維，在整个接見時間內，他繼續不断地看了这一个，又轉过头去看那一个。戴維走后我們一同回牢房的时候，看守對我說：“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說，“你对他的了解还不到一半哩！”第二天早晨，我把許多消息告訴了工場里的那些同伴，这样我才稍稍恢复了我在我們那个小团体里的地位。

我們得到的消息很可怕。1925年11月我們進監獄的时候，塞繆尔委员会就已經行使职权。除了礦工領袖以外，所有工会領袖都急切地等待它的报告。礦工領袖吃了桑基委员会的苦头之后，不肯再受新的委员会的欺騙。阿·詹·庫克等礦工領袖到

各处礦場去喚起礦工，准备应付1926年4月30日鮑尔溫認可的九个月津貼期滿后很可能遭遇的攻击。但是，不管托馬斯等工会領袖怎样在拖延時間，等候塞繆尔的報告，竭力劝導采取“溫和”手段，政府方面却在積極准备，既不放松時間，也不放棄机会。这时候共產党領袖在監獄里，工党領袖麥克唐納又受鮑尔溫的控制。所以开始时的情况是对政府相当有利的。一个半官方機構——物資供应維持会建立起來了，并用各种方法宣傳，号召國內最惡劣的分子來参加这个機構。它的領導人物有哈定勳爵、杰利科勳爵、弗朗西斯·勞埃德爵士將軍和林敦·迈卡塞爵士等。1925年的法西斯同盟全体加入。乔埃遜·希克斯爵士代表政府加以贊助并劝告所有“愛國人士”参加。同时，报界組織了一种宣傳运动來分化工人階級的力量。可是正当这一切活动都在進行的时候，主要的工会領袖对于一旦礦主向礦工進攻时应当采取的态度，却还躲躲閃閃地不作明确的决定。他們开会，磋商，到議會去，到唐寧街去，但是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來組織力量以便应付未來的斗争。1926年初，塞繆尔報告公布了，这是一个拙劣而軟弱無力的報告，里面也唱一点高調，說什么“政府負責改組礦業”，但是又明确地建議：礦工工資应当減低，使貧窮和長期陷入困境的煤礦礦主渡过难关。就是最溫和的工会領袖阿瑟·普佛也竭力抨击这个報告。另一方面，充当鮑尔溫帮手的麥克唐納这个工党領袖，独立工党領袖，却說这篇報告是天賜的礼物，是应当接受的等等一套話。

这样，鮑尔溫就終於离間了工党領袖和工会执委發言人，使他們在意見上公开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直發展到“大叛賣事件”的發生。4月29日，星期四，所有工会执行委員都被召集到倫敦开会。第二天，4月30日，星期五，是决定性的日子。工会代表

在焦急期待的气氛中开会。当伦敦的领袖们在犹豫、规避、急于接受几乎任何解决办法的时候，全国的工人群众支持矿工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强。这个事实在执委开会时是很明显的。执委组织的协商委员会在杰·赫·托马斯领导下，到唐宁街和政府代表鲍尔温等商谈。因为等候他们回来，会议延续到半夜。可是商谈没有什么进展。星期五，矿工收工时就开始罢工。会议通过决议，命令所谓“前线工会”的执行委员号召他们的会员于5月3日星期一晚停工。

同时，5月2日星期日，空前伟大的五一示威在伦敦举行了。差不多全体工人群众都用各种方式参加了这次示威。成千的旗帜，成千的标语。到第二个星期有人来访问我们时，我们体会到，他们那种无限热烈的情绪。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等他们来才知道外面的情况，因为那天晚上监狱外面示威者的一小时又一小时欢呼和高喊口号的声音简直把房屋都震动了。监狱里的情绪也非常激昂，就是犯人中最落后的分子也承认有伟大的事在发生，他们用监狱里最通常的喊叫声来响应外面的声音。

协商委员会还在继续恳求鲍尔温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认为还有希望取得解决办法。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容易地超过了这些迟疑不决的领袖们，使他们不得不负起责任，率领队伍去打他们不愿意打的仗。这种事情就在那个星期日的晚上发生了。那时许多人在温兹华斯监狱外面示威，我们真想把门撞倒，或者把我们监房窗上的铁条拔掉；同时，在印刷所广场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整个问题的本质。那天的“每日邮报”已经排好版，它刊登了一篇社论，标题是“为国王为国家”。这是一篇冗长的恶毒文字，谩骂即将举行的罢工。当印刷工人看到校样的时候，他们掀起了极大骚动，结果在印刷工会开会，并议决：除非把这篇



文章抽掉，决不印報。從人民羣眾的觀點來說，沒有哪個決議案會比這次拒絕印刷“每日郵報”更得人心。但是，這件事却阻礙了協商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寫信給鮑爾溫否定印刷工人的舉動，然後又趕到唐寧街再次求見，於絕望之中希冀得到解決。唐寧街的人對他們說老斯坦（即鮑爾溫——譯者）已經睡了，他們要滾蛋可以滾蛋（雖然當時並不是用的這些字眼）。很明顯，政府已經計劃好了，它決定用它的權力來擊破工會的權力，強迫普遍減低工資。

“所有工人的工資都必須減低”。這是鮑爾溫在1925年講的話。現在這問題就擺在工人面前。工人知道這一點，準備堅持到底。報館關門了，政府在“晨郵報”原址又辦了一種報叫做“英國公報”，由丘吉爾任總編輯，他可以便宜行事。這個報借口保衛“憲法”，進行着“憤怒的、激烈的宣傳”，來對付“野蠻人”——杰·赫·托馬斯和歐內斯特·貝文等等。據丘吉爾說，這些人要想撕毀“憲法”，把它橫加蹂躪。罷工的領袖們為了對抗這個報，也辦了一個報叫做“英國工人報”。但是，丘吉爾雖然攻擊他們，他們却不攻擊丘吉爾；他們完全採取防禦戰略，保證他們對於“憲法”沒有惡意！必須指出，當時響應罷工號召的情況是非常熱烈的，簡直出乎意料；工人階級從來沒有團結得這樣堅強。政府要供應維持會展開活動，但是這個組織對於破壞罷工並不怎樣有效。有時有一列舊火車在行駛，但走得很慢，好像很少有希望到達目的地。偶而街上也看見運貨汽車，但除開為了運送食物到各醫院去的重要任務外，其餘運貨車都翻了身。因此大批軍隊開入倫敦，坦克車在街道上橫衝直撞。但是，很明顯地，政府的控制和地方行政已經相繼垮台，而漸漸地由罷工工人掌握在手中。全國各地區都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在許多地方它們接管

了地方行政的責任。事實上我們在憲章派起義之後這還是第一次遇到的“階級對立”。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集結在鮑爾溫政府的周圍；整個工人階級拒絕了鮑爾溫政府，不接受它的命令，只仰望着自己的領袖，自己的“參謀總部”。如果領袖們和工人同樣果斷堅決，鮑爾溫政府早就不得善終。不過鮑爾溫 and 丘吉爾知道工人致命的弱點所在，就向前直闖，他們知道偉大工人階級的“參謀總部”遲早要狼狽地走到他們面前去求和的。

各處罷工工人，只要有一點借口，就被逮捕監禁，他們繼續不斷地被帶到溫茲華斯監獄來。每天作“體操”的時候可以看見陌生的臉，聽到陌生的口音在操場上喊着“華利老好人”。在溫茲華斯監獄的那個時期內，華利·漢寧頓是最得眾望的人。新來的人里面，有特·阿·杰克遜，他是黨的建黨黨員，著名的黨“哲學家”。但當他到工場里來同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他沒有哲學家的心情了，他盡力咒罵了一番，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那樣厲害的罵法。但是，從他的咒罵中，我們對於外面所發生的一些事就有了很清楚的瞭解。

到第九天終了，“後備隊”——工程師和造船工人——加入戰鬥剛兩天，情緒正達最高峯的時候，罷工被撤銷了。這是在阿布·貝萊爵士——杰·赫·托馬斯的朋友——家中開會時作出的決議。這位爵士為了使工會領袖能完成他們所決定要做的事，答應供給他們環境適宜的開會地點。開會時討論的情況和出席人的一般態度，都嚴守秘密；不過會議通過了決議，分別用電報通知撤銷罷工。有些電報好像是說：“勝利已得，回去做工。”回去做工之後，才知道並沒有勝利，只是丟開了礦工，讓他們單獨去進行鬥爭罷了。

1926年9月我們出獄時，礦工還在進行強弱懸殊的激烈的鬥

爭。我休息了一个短时期之后,还没有回苏格蘭以前,就被邀到达拉謨地区一連串的集会上去演說。我到了达拉謨地区,在一个集会上演說之后,內政大臣乔埃遜·希克斯就下令禁止我在达拉謨郡演說。警察局的一个警長告訴我,說我已經完蛋,在他的境內我不能再開會。但是我早已約好要到各村庄去演說一星期,不管我怎样想法,那些青年同志們坚决要我在登过廣告的一切地方去演說。我就这样做——每次都是在礦工宿舍里挤滿了人的集会上演說,工会干部也都到会。我总是在开会的时候由人暗中帶進會場,立刻上台,講40或45分鐘,在警察未到之前又走了。他們从來不知道——我也从來不知道——下次我在哪里出現。警察坐着兩輛机器脚踏車各处兜尋,可是一直到那些青年同志所排定的日程完畢,从來沒有找到过我。

我由达拉謨到了費夫郡,参加了几次驚人热烈的會議。有一次是在默塞尔,會場拥挤不堪,我几乎不能从人叢里挤到台上去。我因为有点耽擱,到布克海芬的另一次集会的时候,已經迟了半小时。我進了會場,走上講台,那时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志——最要好的同志之一——吉米·霍普正在會場上演講。我到的时候,他說:“我不妨告訴你們,老威利來迟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能够在一個挤滿了人的會場講半小时。我知道,如果今天是因为我來演講而举行这个会,恐怕一半人都沒有。報紙上叫你們不要理會共產党人,說共產党人只是一羣不負責任的毛头小伙子。現在老威利在这里,他可不是不負責任的人。老威利和別的老头兒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老威利的精神永远是年青的”。每一次提到“老威利”的时候,听众总是鬨堂大笑,而我好像覺到有蒼白長鬚漸漸長到我的胸前似的。

我到劳克吉萊的时候,我的鞋底穿了洞。在这里負責的人

是另一个偉大的同志——詹姆斯·斯圖尔特，他是劳克吉萊的优秀兒女之一，也是使任何人真正感到驕傲的一位同志。作为一个礦工領袖和郡議會議員，他对礦工和党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1937年7月，他死了，他的死使我們損失了一位十分难得的好同志。我那次在他家里的时候，他發現了我的鞋子的情况，就說：“我們立刻把它修好。”他于是把鞋子送到他們会里的修理部，劳克吉萊有龐大的福利組織，不但办理公共食堂，还在許多其他方面照顧礦工的福利。他們替我的鞋子換底，做得很好，最后还在每只鞋上画了一面鮮明的紅旗。他們是一班好青年，他們像全國的礦工一样，坚持斗争到底。

我前面說过，我們由監獄釋放时，党的代理执行委員命令我們休假兩星期。这时候法國共產党在巴黎举行會議，当时决定由阿伯特·英克平和我出席，然后到布列塔尼海边作短期休假。英克平的妻子和我的妻子当然陪我們同去。我們在巴黎完成了所負的任务之后，阿伯特夫妇决定到聖馬罗去。我們夫妇倆因为倫敦的朋友介紹，去找“远道旅行社”的巴黎分社，他們送我們到聖布萊克該社的一所別墅。我們到了聖布萊克，才知道在这所別墅中除了住着一个英國教会牧师的妻子、孩子和女用人以外，再沒有別的人。这位太太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只管她自己，不和別人來往。她拒絕交朋友，照她自己的說法，她“拒絕降低自己的身份”到一个別墅女管家的“水平”。这个別墅的女管家是一个長得很好看的中年妇人，她有一个14歲的、身体長得很結实的兒子。我們夫妇到的时候，她对我們竭誠欢迎，我和她的孩子也馬上搞得很親热。第二天晚上，我們坐了閑談，她告訴我們牧师的妻子怎样不和別人往來，而她也怎样不去理她。她很瞧

不起这种人；对这种事她經驗得太多了。她說，“我在革命以前是俄羅斯的公主。我的丈夫，尼基的父親（尼基是那男孩的名字，是按照沙皇尼古拉的名字取的），是在內戰中和布尔什維克打仗時陣亡的。

她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時候，電鈴響了，按電鈕的人用指頭按着不放。這好像是一陣警報似的——她趕去開門，一個青年沖了進來，兩只眼睛睜得大大的。“我必須和加拉赫先生談談，”他說。他是巴黎“遠道旅行社”來的人。我陪他到隔壁房間里去，他告訴我說，他打電話給倫敦報告他的上司說他已經把我夫婦送到別墅，他的上司就說：“趕快去叫他們離開那個地方，天呀！什麼事都會發生的！”這個小伙子非常緊張，但我立刻叫他安靜下來，告訴他用不着顧慮，我們喜歡這地方，我們喜歡這裡的招待，我們要享受假期，他用不着擔心那個女管家——我深信我們會相處得很好。事實上，我們這次休假確實過得很好。每天早晨，我們走到一個風景幽美的小海灣沙灘上作海水浴，一個外人也沒有。我們到海灣去或者回來的时候，在路上總要碰到那位很了不起的紳士，還有好幾個很了不起的軍官陪伴着他。這是住在附近城堡里的大公爵。每天早晨，他微微地對我們行禮招呼，說一聲“早安，”我們照樣答禮。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休假。

---

---

## 第五章

七个月之后，礦工回到礦場，痛恨領袖們和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出賣他們。全体工人对于撤銷总罢工的詭詐手段以及后来对付礦工領袖的那种恶劣态度，都十分厭惡。从1926年快到年底时起，到1927年年初为止，工会运动可說一直遭到这次嚴重挫折的影响。鮑尔溫知道了这一点，决定進一步把工会的力量徹底摧毁。他怀着这个目的，便着手在下院設法通过那罪惡昭彰的劳資爭議法案，这个法案不但牽制着工会，使工会不能采取有效行动，進行同情罢工，不但使公教人員不能参加职工大会，并且对于工会募集政治活动經費引用了新的原則，把“不参加合同”的办法改为“参加合同”的办法<sup>①</sup>。最高委员会領袖們明知这种原則对工会运动的危害性，可是他們并不对它作有效的斗争。

1928年到1929年，因为巴勒斯坦問題以及据說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橫施暴行的新聞报道，倫敦东区掀起了無比激昂的情緒。我被邀請到东区在一連串的集会上演說，使人們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有比較明确的認識。

---

<sup>①</sup> “参加合同”和“不参加合同”是英国工会法規定的两种繳納政治性費用的办法。前者規定由工会會員签字，表示願意繳納工会各項政治性費用；后者規定在工会举行投票并取得大多数人同意征收政治性費用的情况下，全体會員都有义务繳納这笔費用，但會員也可以填寫一張表格，表示他不願意繳納这笔費用，同时不能因为他这种不参加合同的行为而使他在工会中的地位受到影响。

我遇見一個年青的猶太同志西格爾，他精通日爾曼猶太語。我們把幾種傳單用日爾曼猶太語散發，傳單是我寫的，他譯的。後來我們又想出一個主意，把日爾曼猶太語的文章登在“星期日工人報”上。這些文章的效果很好，這特別是由于非猶太人的報紙第一次刊登了真正猶太語寫的關於猶太人的文章。阿·詹·庫克是一個工會委員，他和我在工作上時常聯繫。他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演說家，說話富有情感和刺激性，可是常常不合理，有時竟自相矛盾。他為礦工鬥爭，從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正因為他那樣忠誠，他遭到了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領袖們的切齒痛恨。

約翰·韋特萊和我的關係也很密切，他要和庫克見面。他和馬克斯頓二人與真正的產業工人領袖之間一點聯繫沒有，這真是一件怪事。韋特萊有一個主張，認為把議會和產業工人的活動配合起來，有很大的好處，因此我把阿·詹·庫克帶到下院去找他。我們商討的結果，決定圍繞着庫克和馬克斯頓策劃一個宣傳運動，我們寫了一篇宣言，就是有名的庫克—馬克斯頓宣言，并使別的議員和產業工人代表給予贊助。我們又在格拉斯哥的聖安德烈大廳舉行羣眾大示威，作為這個運動的開端，“星期日工人報”是這個運動中的主要機關報，它進行了很好的宣傳工作。在示威的那天晚上，工人成羣地走到聖安德烈大廳去，大會剛開始不久，全場就擠得水洩不通，好幾百人進不了會場，只得回去。

聽眾情緒的熱烈是空前的。經過了一切欺騙和失敗，終於在這裡產生了新機，有了新的開端，使運動重振旗鼓，向前邁進，直到勝利。當主席台上的人出現的時候，全場表現出無限的熱情。喬治·希克斯的簡短致詞受到很大的歡迎，庫克的講話引起

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他的講辭適合工人的脾胃，替馬克斯頓開了路。工人所盼望的話，庫克都說了，他們知道他的立場。但是，馬克斯頓怎樣呢？他是不是要站在庫克同樣的立場上，把議會的活動配合產業工人的活動以保證工人階級獲得真正的進展呢？主席台上宣布由他講話的時候，成千只眼睛充滿了期待的神情注視着台上。馬克斯頓慢慢地站起身來。一個偉大的時機到來了，聽眾鴉雀無聲地等候着他開口。他慢慢地舉起手來把前額的一股頭髮慢慢地、小心地撻到耳朵後面去，然後他就說說這，說說那，可是沒有說出什麼內容。這是一種可怕的虎頭蛇尾的表現，示威完全失敗了。

韋特萊和我仍舊不出面，從講台的入口張望着，在那裡我們能看見別人，可是別人看不到我們。韋特萊幾乎不能相信他聽到的和看見的一切。我們走到后台的休息室。韋特萊在那裡走來走去，自言自語地咕嚕着——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生那麼大的氣。他要“東方旗報”（韋特萊的報）的經理威利·李庚在格拉斯哥各報刊登廣告，宣布在希特爾斯頓公共會堂開會，由韋特萊演說，來“收復失地”。會是開了，可是沒用。馬克斯頓的一次愚蠢、平凡、毫無價值的演說，已經扼殺了這個運動，不能用人工呼吸的辦法來挽救了。

在阿·詹·庫克進行宣傳的這許多艱苦的年月中，他的腿部得了嚴重的骨結核病，他被送到醫院，用愛克斯光看出腿骨差不多完全腐爛了，腿必須鋸掉。手術之後，有一個時期有些起色，可是他這個過度虧損的身體，經不起刺激，1931年11月2日，這位英國礦工最出色的領袖之一便長眠地下了。

在總罷工時期和礦工被資方停工的幾個月中，共產黨和少數派運動做了很多工作，它們尽可能地集結最大的力量來支援



礦工的斗爭。

在这个时期，黨員的人数大大地减少。1921年举行联合會議的时候，我們估計黨員大約有10,000人，1923年欧洲革命潮流低落的时候，减少到5,000人。我們感觉到在环绕着礦工罢工运动开展大規模的运动以前，黨員人数要超过这个数字是很困难的。到1926年年底，我們的黨員人数在11,000与12,000之間。1927年年底，人数又回到5,000人。当然，各地区都在很热烈地討論这件事，領導問題終于成为必須鄭重考慮的一个問題。討論越來越激烈，最后責成执行委员会改組領導机构。1929年党在里子召开會議之前，哈里·波立特被选为書記。他所接替的人是党成立以來一直担任書記的阿伯特·英克平。英克平以前是英國社会党的書記，年青的时候做过社会民主党赫·吳·李的助理書記。他早年担任这助理書記的职务，限制了他表現自己才能的机会，他始終是奉着別人的命令办事，埋头做各种不引人注意的工作，而他为之工作的那些人却無时無刻不在大众面前顯露头角。他干了九年共產党書記，这种作风已經習慣成自然了。他对党的忠誠和工作的热心，从来沒有人怀疑过，他是一直“忠于职守”的。所以从一个書記的技術观点(与政治观点不同)來說，他是精通他的業務的。但党对于这个責任重大的职位需要一个有卓越政治領袖才干的人來担任，我們都觉得哈里·波立特才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党内事务的發展証明了这种意見是正确的。但是应当指出，阿伯特·英克平由党書記調任“俄罗斯协会”書記新职，就使我們这位無疑具有巨大潛力的同志得以發揮他的才能。他証明自己是一个杰出的演說家，他能够作政治性的指示，使“俄罗斯协会”和它的刊物成为建立英苏友好关系的真实力量。他在1944年逝世，这是“俄罗斯协会”的一个重大損失，也是他所

忠誠地貢獻他寶貴的一生的黨和黨的事業的重大損失。

在这次1929年12月的代表大會上，黨不但批准了執行委員會派波立特擔任書記的決定，並且還有這種默契，就是一定要使他成為黨的一個名符其實的領袖。同時還作出了一個對黨和整個運動關係極為重大的決議，就是黨必須辦一個日報，因此，1930年1月1日，“工人日報”便誕生了。

但是，我在再往下敘述之前，先要回到1927年。那年快到年底時，我被派到莫斯科去，作為參加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的代表。我在紀念日的前幾天到了莫斯科，發現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伙非常忙碌。人們對於他們的意向傳說紛紛。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他在人民羣眾中有些聲望。不過他的這種夢想終於不是事實。他在1917年7月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時候，還帶着孟什維克的全部思想武器。當列寧還活着的時候，他曾和列寧衝突過幾次，有一兩次列寧不得不用非常強硬的态度對付他。列寧死後，托洛茨基更明目張膽地暴露他的孟什維克思想，不用說，他時常很狡猾地用革命詞句來掩蓋這種思想。黨當前的問題和必須回答的問題是：革命的俄國應當建立社會主義呢還是建立資本主義？孟什維克黨徒很率直地說：必須充分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然後才可以考慮社會主義。斯大林和黨的領導機構中以及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同志說：他們作為全世界工人的先鋒隊的任务是建立社會主義，他們擁有人力和物力，有列寧路線領導着他們去完成自己的偉大任务。托洛茨基站在孟什維克方面，和孟什維克黨徒一樣，他說：“你們不能在像俄國這樣落后的國家里建立社會主義”。接着就用革命術語來掩飾孟什維克的投降主義，他說：“你們不能在像俄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這要等到歐洲其他國家的工人革命成功，取得政權，

能够援助你们的时候才办得到。”

許多知識淺薄的人不懂上半句的意思，只注意下半句。他們力圖使自己和別人都相信托洛茨基是一个超級革命家。但是，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黨代表大會，以及在托洛茨基有着特別廣大勢力的蘇維埃報刊上，斯大林和他最親密的戰友粉碎了托洛茨基的“革命”假面具，並且在俄國羣眾面前揭露了他的真面目——布尔什維克黨的敵人，革命的敵人。

在十周年紀念那一天的早晨，紅軍部隊為了準備這次大遊行在紅場上集合。莫斯科工人羣眾帶着樂隊和旗子在工廠里集合，為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及當時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所獲得的成就表示自己的歡樂情緒和自豪感。紅場周圍擠滿了來自各地的代表以及和蘇聯保持友好邦交的各國外交使節。紅場中央靠近克里姆林宮牆垣的列寧墓本來每天都可以看到由蘇聯各處來的遊客，進去瞻仰他們敬愛的列寧的遺體；可是在這一天墓上沒有遊客，墓頂做了檢閱台，所有蘇聯的主要領袖都站在台上，接受紅軍和莫斯科工人的敬禮。斯大林在那裡，還有加里寧和布瓊尼等一些人，我這個英國代表也在那裡。我們面前的紅場上集合着紅軍兵士，擺列着大炮和坦克，氣象十分雄壯，頭上還飛翔着各種類型的蘇聯飛機。正十點的時候，伏羅希洛夫騎了一匹白色駿馬，由克里姆林宮大門出來，站在紅軍部隊的前面，與斯大林和其他同志互相敬禮。然後有幾個人作簡短演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說了幾句關於十月革命、關於建立社會主義以及這一切對其他國家的工人的意義的話。我還說了幾句——很少幾句——關於托洛茨基的話，說他企圖分化工人階級的力量，我號召紅軍驅逐他和他的私黨。我的話翻譯之後，台上的同志都和我握手，對於我說的話表示極大欣慰。演說完畢，伏

罗希洛夫率领着红军走出红场，工厂工人以50人为一列进入红场。好一场示威！多少旗帜和多热烈的口号！多么巨大的力量和多么伟大的意义！除了在苏联，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伟大的气象！

工人队伍刚开始迈步前进，有消息传到台上，说托洛茨基在附近莫卡瓦亚广场一个旅馆的窗口向游行队伍演说，企图进行破坏。当时有人建议由我绕到莫卡瓦亚广场去，针对着托洛茨基和他的破坏活动作一次演说。我由人丛中很困难地挤过去，最后到了目的地。可是我到的时候，已经用不着我来干了——工人们已经自己动手了。大批的工人拥进旅馆去找托洛茨基，要不是有一队红军兵士已经把他软禁起来，恐怕他早已倒大霉了。他的同伙普莱奥布拉亨斯基企图从德甫斯卡亚的一个旅馆窗口破坏游行队伍，遭遇也是一样。在这个历史性的节日——十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发觉他在红军和工人群众中已经毫无威信了。1927年11月14日他被开除党籍，一两天之后，我看见他被带到火车站，送出了莫斯科，从此他就脱离了苏联的生活。没有一个重要人物——工人中间当然没有人——对他的离开表示丝毫关切。

1927年，工会领袖正忙着“补救”以前总罢工的失败，可是他们却一头栽入了蒙特主义的泥潭。蒙特主义这个名称，采自阿尔弗雷德·蒙特爵士的名字，蒙特就是后来的麦尔契特勋爵，他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老板，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工业家和政客。他和他的一些同事认为工会领袖和资方同样害怕工人阶级的力量、精神以及他们随时准备举行直到胜利为止的总罢工。工会领袖不肯向劳资争议法案作斗争这件事，使他相信这种见解的正确，所以他们决定抓紧机会来“利用”工会领袖的胆小怕事这

个弱点。于是他們邀請工会領袖会商双方的关系和怎样獲得“工業界內部的和平”問題。会商举行了，率領資方代表团的是阿尔弗雷德·蒙特爵士，率領职工大会最高委員會代表团是本恩·滕納爵士。会商的經過是非常愉快的，阿尔弗雷德拍拍本恩的背，本恩也拍拍阿尔弗雷德的背，資方一点架子也沒有。不，他們簡直成了好朋友，杯酒言欢，站在一起对付工会中的过激分子。这些过激分子所要求的是工人們的階級組織的階級領導機構和階級政策。

他們会商的结果，就是1928年职工大会在斯溫西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掀起了和資方保持蒙特主义的和平而向共產党及少数派运动展开斗争的大旗。在蒙特—滕納会谈中有人發言說：“國外还有一派反对合作的思想，我們要并肩作战以对付这一派思想。”在蒙特主义成为职工大会的正式方針之后，市政和普通工人联合会的吳·薛伍德先生被派到美國的劳工联合会去，作为兄弟工会的代表。在他的賀詞中，他講述他的民主真諦說：“我們倫敦的各分会有15,000多人，他們拒絕执行职工大会最高委員會的命令。好吧，主席先生，我們就把这些分会剷除了。……我們的最高委員會里有兩個人，他們代表着我們國內兩個廣大地区的工人，可是他們却去出席少数派运动的會議。我們對他們說，‘在宣言上簽字，否則滾蛋。’这样，他們就只得滾蛋了”。

这篇宣言是根据职工大会最高委員會發出的“黑色通告”寫成的，“黑色通告”的內容是叫各工会禁止共產党或少数派运动分子担任工会的正式职位或担任出席职工大会的代表。这样，鮑尔溫政府的“反罢工公約”又增加了新的懲罰条款。工会运动在这时候是处在空前危险的境地，會員减少了，要不是共產党和少数派运动領導大家進行艰苦斗争，有許多工会恐怕早已瓦解

了。工会領袖誹謗和謾罵那些領導少数派运动和挽救工会的人，國內報界当然是支持这些工会領袖的，而且火上加油。最高委員會又劝告各工会修改它們的会章，不讓共產党和少数派运动分子在工会中担任职位。鍋炉制造工人工会执行委員會迫不及待地执行了最高委員會的这个命令，因为那班“老衛隊”知道若是沒有这个規定，向來以票數最多当选职工大会代表的哈里·波立特就会很容易地当选总書記。这样一來，鍋炉制造工人工会的哈里和其他青年活动分子就在該工会里被剝夺了民主权利，他們在工会里被禁止担任职务，也被禁止当选职工大会的代表。别的几个工会也跟着这样做，經過情况以拉納克郡和費夫兩处的礦工工会最有意思。在拉納克郡方面，一个聰明能干的青年共產黨員威利·阿蘭因獲得絕大多數票而当选为工会書記，使得会里的老干部、尤其是他接替的那个前任書記非常狼狽。他在工作方面，很少有得到別人的帮助或者鼓舞的机会。跟着这个选举的勝利还有一連串蘇格蘭礦工选举执行委員时的勝利。費夫也在选举，有兩個專职事务員出了缺，兩個共產黨員——約翰·麥克阿瑟和戴維·普勞德福特当选，代表老干部的候选人反而落选。蘇格蘭的礦工选举执行委員时，五个当选的候选人是共產黨員和少数派运动分子。为了了解以后發生的情况，現在先說明一下，蘇格蘭有六个郡工会，各有自己的書記，自己的事务員，自己的行政委員會。郡工会的各分会每年派遣代表出席全蘇格蘭會議，討論有关蘇格蘭礦工的一般性事务，批准由各郡工会平均选出的蘇格蘭工会执行委員會的人选。但是，虽然各郡工会已經举行了选举，并已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員，虽然各分会已經派定代表出席全蘇格蘭會議，會議仍应由原來的执行委員會負責召开，否則會議就不能举行。而一旦召开會議，大半原來的

执行委員就应自动离职而由新的执行委員遞补。因此，原來的执行委員會拒絕召开會議，他們向英國礦工聯盟的执行委員會發出呼吁，請該會支持他們。“老实的赫伯”(赫伯特·史密斯)和他的同伙竭力支持这种非法举动。費夫礦工工会行政委員會命令原來的执行委員會里的代表要求召开會議，但費夫礦工工会書記、議會議員威廉·阿丹遜拒絕执行这个命令。在正常情况下，他的工会書記职位是一个終身职位，書記并不定期改选，可是行政委員會因为他拒絕执行命令，就决定要停他的职，先由會員投票表决是否要撤換他的問題。阿丹遜知道这次投票对他不利，在举行投票的时候就糾集他的同伙，連同几个能够控制的分会一起退出去，另外組織新的工会。費夫礦工工会的全名是“費夫、金洛斯和克拉克曼南礦工工会”，聪明的阿丹遜先生把新的工会称为“費夫、克拉克曼南和金洛斯礦工工会”。原來的蘇格蘭执行委員會便干脆取消了費夫礦工工会的附屬关系，而接受阿丹遜分裂出來的工会参加蘇格蘭执行委員會。礦工聯盟的执行委員會批准了这种欺詐行为，从而孤立了費夫真正的礦工工会。由于費夫和拉納克郡兩处的事件，于是召开了一次會議，决定把它們的力量联合起來，成立蘇格蘭礦工联合工会。这些同志接連干了五年，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在蘇格蘭煤礦区保持了战斗的工会精神。直到最后，这个工会还是活躍而健全的。它的末期的書記是阿布·莫法特，事实証明，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行政人材，是全蘇格蘭最能干的礦工代表之一。1934年到1935年英國礦工聯盟执行委員會的人事方面有許多更动。書記埃比·愛德華茲和执行委員威尔·勞瑟尔迫切希望把蘇格蘭工会运动的裂縫弥补好，他們就和蘇格蘭礦工联合工会的阿布·莫法特和他的同事們磋商，劝他們解散自己的工会而回到那工会里面

去，并保證他們能受到公正平等的待遇。这件事經過各分会討論同意，蘇格蘭礦工聯合工会解散了，所有會員都加入了郡工会。阿丹遜和費夫郡工会的干部立刻收留了归併來的大批新會員，但是拒絕了蘇格蘭礦工聯合工会的干部，他們的借口是這班干部沒有在礦井里工作过，也沒有在礦井的附近工作过！受到影响的是阿布·莫法特、阿萊克斯·莫法特、約翰·麥克阿瑟和鮑布·艾迪。他們向埃比·愛德華茲和英國礦工聯盟執行委員會申訴，埃比·愛德華茲和執行委員們竭力設法使阿丹遜改變他的無理态度，但是阿丹遜和伙伴們堅決拒絕，一定要把這几个卓越的礦工代表摒棄于工会之外。他們不能加入工会，是因為他們沒有在礦井里面或礦井附近工作过，可是費夫的煤礦公司堅決不讓他到礦井里去工作，正如阿丹遜不讓他們在工会里工作一样。一直到阿丹遜死后一个时期，才由接替他的詹姆斯·庫克自动在克拉克曼南的一个偏僻的礦井里給了阿布·莫法特一个位置，因此才讓他做工会會員。后来的事情証明，这是詹姆斯·庫克为礦工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沒有多久，阿布·莫法特就成为費夫工会里卓越人物之一，再过一个短短时期，他就当选为蘇格蘭礦工工会執行委員會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对各郡工会的團結和組織蘇格蘭礦工統一的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做了蘇格蘭礦工工会的主席，这个职位責任重大，是許多工会干部所担任的工作赶不上的。其余同志也獲得了礦井里的工作，后来又会在工会里積極地担任了重要工作。在蘇格蘭進行的這場斗争可以說是全國各地進行斗争的一个典型，不过別处的斗争沒有这样激烈罢了。这种斗争挽救了工会运动，不讓它毀滅在蒙特主义的手里。

常常有人問我为什么劳工領袖們这样憎恨共產党人？为什



么劳工领袖中有这么多人背叛运动？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同他们在其中成为领袖的这个运动的推动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产阶级人士往往看到利用工人阶级迫使大资本家让步的好处，可是他们也往往担心工人阶级会难于控制。最合乎他们理想的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工人阶级，能服从“文化较高”的中产阶级人士的领导。因此，这些表面上满怀好意的正人君子，常常在公共集会上演说，表示他们的目的和愿望和工人们完全一致，因为唯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工人支持他们私人的目的和愿望。由于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受过比较高深的教育，他们来担任这方面的工作要适合得多，他们很愿意在议会里代表工人。但是，在定期集会之间的时期中，他们的社会生活却完全脱离了工人，也脱离了工人经过巨大牺牲而掀起的运动。他们的社会生活是那样舒适，那样有趣，在许多方面又那样怠惰逸乐，决不容许工人阶级的粗野放肆的行动来干扰。另一方面，如果大资本家过分贪得无厌，那就一定会引起冲突。所以他们有双重任务：在他们的劝导力量还能发生作用的时候，一面劝告大资本家节制剥削，一面控制工人。

共产党人威胁着这种不稳定的平衡，给中产阶级领袖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种骚动的因素。一方面他们被暴露在愤怒的工人阶级面前，另一方面他们由于不能控制自己的“黑暗势力”而受到大资本家的轻视。但是，有人会指出，大部分领袖来自工人阶级的队伍，是工会或工党地方组织的领袖。这是事实。我们都有一种愿望，要脱离工人阶级的那种多少有些单调而困苦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我们要阻止现在的巧取豪夺，才能有圆满的、自由的和愉快的生活。从这种思想出发，那就难怪他们这许多人早年热烈地要想提高本阶级的

地位，而到後來，由于經常受到那種長期存在的壓力，便想找機會跳進中產階級社會。人們常常說，一個“皈依者”通常要比在宗教中成長的人更為狂熱。進入中產階級社會採用中產階級社會思想方法的工黨黨員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粗野而難以捉摸”的工人階級與貪婪和無天良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平衡。

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和歐洲其他政黨里面都看到這一點。他体会到需要一個新的政黨。在這個新黨里，每一個黨員不但要付黨費，而且還要在黨內為黨工作。它要嚴格管理黨員，不准他們的社會生活墮落到違反黨的主張和政策；這個政黨由于嚴格地管理黨員，便使他們不至于墮入上述的泥潭，因而他們得以隨時隨刻都為推進工人的鬥爭而努力。

不但工會向蒙昧主義進行鬥爭，各產業部門的工人也在進行着鬥爭。1928年和1929年，活動越來越多。當時工人的處境之壞可說是從來沒有過的，工資被壓低了，管理人員傲慢專制，日益增加的失業工人羣眾在職業介紹所排着長長的行列。雖然如此，在總罷工被出賣而失敗之後，工人很快就恢復了他們的精神。最高委員會為了遷就鮑爾溫 and 資方的願望，宣布反對罷工而贊成產業界內部的“和平”。但是工人的意見不同，他們在產業界要求的是適當的生活條件和適當的工資，他們是準備為這些而鬥爭的。我在克萊德有過不少經驗，所以他們時常需要我干這種工作。在倫敦舉行罷工的服裝工人，約克郡的羊毛工人，蘭開夏的棉花工人，蘇格蘭的礦工，以及其他各種工人都在這時期內要我幫忙。我在一個地區剛剛完成任務，另一個地區又找我去。看到麥克唐納和工黨領袖以及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所採取的那種路線，我能來往于各種不同產業的工人之間，真是

一樁使人興奮的事。但是，不光是就業工人奮發起來，我無論走到哪個地區，還必然會被邀請到失業工人大示威的場合去演說。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最高委員會曾被迫承認了失業工人運動，並會同失業工人的代表組織了一個聯合委員會，來討論所發生的各項問題，尋求解決辦法，這些問題不但同失業工人有關係，也直接間接地同工會中的就業會員有關係。

但是，因為蒙特主義已經被有意識地採納，這個聯合委員會就成了一個“累贅”。最高委員會不得不把它去掉，換上了一個新的聯合委員會——由資方和最高委員會的代表組成。從此沒有口角，沒有鬥爭，只有和平，只有和諧。在這一點，讀者可能感覺到當時最高委員會的政策有點和共產黨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採取的政策相像，但是這僅僅是表面上相像。馬克思向來堅持：考慮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實際環境。1928年的環境和戰爭那幾年的環境是完全不同的。在戰爭期間，為了完成擊敗法西斯的任務，才提出產業界內部和平這個問題，而蒙特主義的思想和辦法則是犧牲工人階級來保證資本家的利潤。這一點在本書的後面要詳細敘述，在這裡，我只想使讀者不要把這兩回事混為一談。

原來的聯合委員會是不能不取消的，最高委員會的領袖們很容易地就發覺一向和他們共同進行工作的全國失業工人運動是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團體”，所以它應當受到“黑色通告”中所談到的種種壓制和征罰。因此，全國失業工人運動就被攆斥了。當然，他們的攻訐是毫無根據的。在組織失業工人和進行活動方面，共產黨員盡了很大努力，這倒是事實，因為黨完全支持失業工人運動的全部要求。如果各工會和工黨能同樣予以支持，各委員會裡面也就會有他們的代表。我在全國執行委員會

里代表党，但这并不是說我控制了委员会——决不是的。那里有著名的領袖如武德格林的布朗夫人，还有設菲尔德的侖·尤依勒。除了失業問題以外，在許多問題上他們都很強烈地反对共產党。要是有人告訴他們說他們受到我的控制，我倒真想听听他們的意見。華利·漢寧頓对于失業工人团体所做的工作是再好也沒有了，在他的領導下，我們極其密切地、友好地合作着。我們所关心的是怎样改善失業工人的生活条件，維護他們的福利。对那些專門做这个工作的人來說，这是一件不能有一点松懈的工作，必須时时刻刻对鮑尔溫集团保持警惕，这个集团代表着大財閥的利益，它不僅尽可能地帮助他們压低工資，甚至更加迫切地要降低失業工人的生活水平。

全國失業工人运动在華利·漢寧頓的領導下势力日漸擴大；1928年快到年底时，又在討論再度組織向倫敦進行大規模饑餓游行的問題。这计划在1929年2月和3月間实行了。各地区發出号召的时候，志願参加的人比所需要的多了一倍。苏格蘭隊作为第一隊首先出發，情景非常动人。这些优秀的青年有很好的組織和很好的紀律，步伐整齐。一个一个地区的隊員紛紛动身，進行游行，廣大工人羣众給他們送別，他們在途中到达每一个市鎮的时候，总有大量的羣众欢迎他們。在倫敦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这些游行者的示威大会——这个大会令人想起1926年發出总罢工号召以后的“五一”大示威。很明顯，在倫敦，正同全國各地情形一样，工人要在議會內外同資方進行斗争。罢工示威、飢餓游行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大示威，这一切喚起了各处的羣众，使运动有了新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麥克唐納和最高委员会的領導之下，这个运动已越来越死气沉沉了。这一次更加顯得重要，鮑尔溫政府本來已經决定采取一些过渡办法，要剝

夺20万失业工人的福利，他们看到饥饿游行所掀起的激昂情绪，就不得不撤销这个决定。

这一切活动使工人运动在全国活跃起来。这是极重要的事情，因为1929年将举行普选。如果不向最高委员会的蒙特主义政策作斗争，如果容许麦克唐纳的优柔寡断的政策控制工人运动，那末在1929年的普选中工党就不会有什么希望。但是党和少数派运动以及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本来不愿与闻的工人群众参加了投票，结果，工党以最大政党回到下院，得288席，保守党得256席，自由党得59席，独立党得5席；工党在下院虽还不是绝大多数，但是因为自由党给予一定的支持，他们就决定组阁，这就产生了第二届工党政府。这一回是我在西费夫参加的第一次竞选，当时保守党的候选人是米尔内，工党的候选人是可尊敬的威廉·阿丹逊——他是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对苏格兰并无显著的贡献，我已在此费夫矿工工会斗争中叙述过他的事蹟。1910年起，阿丹逊先生就担任代表，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他认为西费夫理所当然地是他的地区，认为我插进来简直是最不可饶恕的僭越行为。但是我和费夫也有相当长的关系，在整个地区的矿工中也有相当的声望。有几个由英国其他部分来参加竞选运动的同志，对下面这个事实感到很突兀：他们在进行宣传争取选民投票的时候，许多矿工虽然没有说要投我的票，但谈到我的活动时，态度却一直是顶友好的。不但阿丹逊先生是一个难对付的候选人，西费夫也是一个很难弄的选民区，要化费许多奔波，小的村镇有40几个，地面极宽。我是为了党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路綫而斗争的，这牵涉到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住房、矿产国有化、增加矿工工资、分派失业工人工作或给予整个生活上的照顾以及废止劳资

爭議法案等。阿丹遜先生那時候是麥克唐納的忠實信徒，完全接受蒙特主義，因此他不得不很謹慎地處理這些問題。阿丹遜和支持他的人有一個突出的論據——如果可以叫做論據的話，就是：“一個人在下院干不出什麼來的，所以你要選加拉赫，就是浪費你的一票”。毫無疑問這句話產生了很大效果，選舉之後他們還把這個論據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等到下次選舉再拿出來用。全國整個選舉的趨勢就在西費夫可以看出來。阿丹遜以17,688票當選，我得了相當令人鼓舞的6,829票。

在這種環境下我第一次的嘗試就能得到這樣多的票數，完全是因為有一批忠心耿耿的黨的同志和同情者事先在選區里進行了許多工作，以及競選時由其他地區來的許多同志對我的幫助。選舉的勝利不是由於候選人，不管他多麼重要，也不是由於競選時的演說和傳單。競選沒有演說和傳單就不能勝利，這是事實，可是黨員必須在幾個月、在幾年以前先在選區中奠定堅實的勝利基礎，若是忽視了這種工作，等到競選的時候，候選人和幫助他的人都將勞而無功。我在西費夫終於獲得勝利，是因為在整個地區的各村庄、各工會、各合作社和郡議會里長期進行了堅持不渝的工作。這種工作繼續不斷地進行的時候，黨和羣眾在日常生活、在鬥爭中就不怕失去聯繫。這就是走向勝利的道路。

麥克唐納的第二屆工黨政府有很重要的一點和第一屆不同：這次不容許他再來掌握外交部。大權在握的全國工黨書記阿瑟·漢德遜堅持要這個位置。很勉強地，麥克唐納不得不同意讓他接替。從保守黨貴族政治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可怕的、帶有威嚇性的轉變。因為這個位置，他們一向緊緊地掌握在手里。這個位置對貴族學校出身的人士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外交部一向只有“經過選擇和考驗”的人才進得去。現在，破天荒第

一次，一个明目張胆的社会主义者——其实比这更坏，是一个鑄模鐵工——他從來沒有進过公学的門，竟來把外交部接收了。“真正貴族”人士看到这个变化，抑不住心头的驚恐和憎恨。这种人怎么能够处理國際舞台上一向存在的微妙的和具有爆炸性的問題呢？一个鑄模鐵工怎样能够去見权貴和大人先生們，怎样会用外交界慣用的那套含糊而奧妙的語言呢？他顯然是不会的，他也沒有这样做，但是他却干得很好。他的确开始就走对了方向，如果給他時間，他可以在欧洲做出很好的工作。他在工党里的声望确实提高了，这使得麥克唐納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这位先生是不喜欢有人和他競爭的，他一定要做大人物，其他的人全都只能做助手。但是，在工党政府成立的时候，它的垮台就已經被遙远的美國所發生的事件决定了。在这一个日落的地方，預言家正陷入狼狽不堪的境地。很久以來，独立工党的領袖，包括“偉大的”明达人士布萊斯弗德在內，就提出要用美國來代替馬克思和社会主义。首先是福特主义，福特用一种美妙的合作精神（不容許工会存在）指出了使美國脫离貧窮的道路。其次是“工藝”时期，“工藝”是一个新的具有魔力的字眼，像“開門，芝麻！”这类呪語一样，它是用來开“人間天堂”的大門的。当英、德和一般欧洲國家遭受長期不景气痛苦的时候，美國却在漫無边界的繁荣之海里航行。因此預言家說：“美國的繁荣是永久的，如果你們要想从你們不潔的經濟疾病和艰难困苦中獲救，就看看美國的榜样，一切就会好了。”在这种哲学的——还不必說是財政的——非非之想中，响起了颯颯的風声，由美國的这一边傳到那一边。啪！好像被烈性爆炸彈命中了一样，整个經濟机构崩潰成一堆垃圾，經濟的風暴把美國的繁荣吹倒了，只剩下悲惨凄涼的痕迹。可是这还没有完呢，这个風暴又橫越大西

洋而猛襲早已破碎零落的歐洲經濟了。

只有一個國家——蘇聯——逃避了這次大爆炸。它真是一個充滿“奇蹟”、令人驚歎的國家。所有“高級權威人士”都曾認為，由於腐敗的沙皇政府所遺留的爛攤子和混亂情況，在幾個月徒勞的掙扎之後，這個國家就會毀滅。沒有一個政黨——特別是像布爾什維克那樣遭到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反對的政黨——會有希望經得起十月革命以後蘇俄那種毫無辦法的情況而且還能克服這種困難情況。英國的那些聰明人，正同別國的一樣，都知道這一點，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們不能叫布爾什維克黨員相信他們的話。“這是不可能的，”那些聰明人說。“也許可能，”列寧帶着微妙的笑容回答說，“但是不管怎樣，我們要這樣干。”在隨後的年歲里，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和在列寧的領導下一樣，布爾什維克黨屢次聽到黨外悻悻的怨言，黨內一些表示懷疑的人還時常附和着說：“這是不可能的，搞不成功的。”可是，他們勇往直前，終於搞成功了。1928年他們又着手進行一項新的艱鉅任務。經過工廠和工會長時間的討論之後，在廣大工農羣眾的支持下，他們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自從開天辟地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公布過這樣遠大的計劃。這個計劃要把蘇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短短五年之內，依靠自己的資源，變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它能由國外得到幫助和鼓舞的機會極少，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他們當然要給它鼓舞和幫助的。斯大林從來沒有低估這種鼓舞和幫助的重要性，沒有低估各國的工人階級這樣做時候在阻止（而事實上也的確阻止了）外來的襲擊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但是資本家和他們雇用的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國家若是不先發行公債，不給財閥們相當可觀的利息，就不能實施龐大的計劃。因此我們今天還是



有人在做沙皇債券的投机買賣，这种債券是俄國沙皇用來保持他对俄國人民的專制統治的。“我借錢給沙皇買鞭子，用这鞭子打你們。現在沙皇走了，請你們付給我鞭子的貨价”。好一班沙皇債券的持有人！但是，言归正傳，現在布尔什維克有这么一个从來沒有听到过的最大胆的計劃。的确，聰明人以前对布尔什維克的才能和毅力的估計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了，可是这一回总不会再錯了吧。这次的任务实在是不能完成的。他們哈哈大笑，这件事实在太可笑，簡直是兒戲，过一两个月以后，这个虚有其表的計劃就会垮台，那是毫無疑問的。“头等聰明”人还寫了文章，証明整个計劃是虛張声势，决不是真正能实行的。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話，“像頑固分子一样，他們不學習什么，也不会忘記什么。”英國也有少数的頑固分子。当布尔什維克剛剛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們知道这政权三个月就將垮台，時間不会再長，这就是他們給布尔什維克最長的期限了。無怪列寧只好对他們微笑！等到五年計劃开始实施，那班博学宏儒又來那一套，又說只有三个月寿命。是的，他們只給三个月，不能再多了，三个月之內，整个的痴心夢想的計劃就会垮台。但是，沒有垮台。斯大林、党和苏联人民向前迈进，并不知道那班大人物所“知道”的事，也不知道他們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他們不但完成了，而且，奇而又奇，他們还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就完成了。对于布尔什維克來說，沒有不可能的事。他們有人民做后盾，任何事只要动手就一定完成。这里是斯大林寫的一段文章，讀过之后把它記住，这肯定就是我們做無論什么事都可以勝利完成的竅門：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話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他名叫安泰，据神話所說，他是海神波賽东和地神蓋婭的兒子。他

非常爱慕他这位生育、撫养、教導他成人的母親。安泰很有力量，沒有哪一个英雄能与他抗衡。因此大家認為他是無敵英雄。他的力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与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即往生育和撫养了他的母親身上一靠，因而就取得新的力量。然而他終竟有一个缺点，就是怕別人用什么方法使他和地面隔开。敌人注意到他这个弱点，于是时时刻刻暗中窺伺他。后来忽然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并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赫尔克里斯。然而他是怎样战胜了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設法把安泰同地面隔开，把他举到了空中，使他無法再同地面接触，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為布尔什維克很像希腊神話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維克也如安泰一样，其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他們与自己的母親，即与那生育、撫养和教導他們成人的羣众保持着联系。只要他們与自己的母親、与人民保持着联系，他們就有一切把握始終是不可战胜的。”<sup>①</sup>

我們的頑固分子懂得这个嗎？他們犯了錯誤，得到什么益处沒有？沒有。布尔什維克似乎只有一件事不可能完成，那便是教育頑固分子。因为在1941年德國突然進攻苏联的时候，这班迷了心竅的紳士們怎样說呢？“三个月”（命中註定的期限），“三个月消滅紅軍，三个月苏联完蛋”。他們的預言叫得很响亮，对于未來的景象沾沾自喜，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要依靠紅軍的勝利。但是，不管他們怎样預言，三个月滿了，紅軍还是在那里打仗。

---

<sup>①</sup> 見斯大林“論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辦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0頁到61頁。——譯者

---

---

## 第六章

1925年鮑爾溫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审查失业工人救济金的情况。这个委员会——勃蘭茨堡委员会——于1927年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議把救济金大大减少。委员会里的三个工党委员——霍奇斯，霍姆斯，瑪格丽特·邦德菲尔德——都支持这个建議。这种事当时簡直叫人很难相信，可是确有其事，所以不得不由工人运动來应付。于是召开了一次工党特别會議，考慮应付这个置人死地的建議的对策。礦工执行委员会提出一个議案，譴責审查委员会里的这几个工党委员，但是議事規則不容許这种議案。會議照例隆重地决定：当下院考慮这个建議的时候，工党議會党团應該提出“有充分理由的修正案”。这样就完全迴避了这个問題，不幸的失业工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应战了。

威尔士山谷呈現了悲慘的荒涼景象。礦井荒廢了，人沒有工作——一年一年过去了，各处都沒有希望。人們跑來跑去，有时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工作，可是总找不到。妇女在家里也是在貧窮和失望中掙扎。一个个山谷里的人先后組織起來向地方当局示威。这里和英國其他部分一样，鼓励警察用最嚴酷的手段來破坏示威和恫嚇工人。有一次我在瑪迪一个露天集会上演說，講台是在一条小街上。这条街道和大多数山谷地区的小街一样，是由山下通往山上的。我站在台上，面对着大街远处的一个学院。失业礦工只能站在这学院的前面，因为他們和我之間

的街中心站着一个人，他的任务显然是要阻止他们聚集到台前。主席是当地的一个青年，他致了介绍词，我就开始演说。我讲了大约15分钟，就有一个人大模大样地由山上走下来，站在讲台旁边。他穿了一件薄薄的雨衣，里面可以看得出是警察的制服。他的一顶呢帽戴得很低，遮着眼睛，流氓似的，嘴角上咬着一支雪茄烟，把他自己装成电影上的暴徒样子。他没有把雪茄拿下来，突然歪着嘴叫：“停止！”

我看看他，对他高声说：“什么？”

“停止！”他又说。“我只准你们的主席开20分钟的会。”你不能同他为难——一个警察局督察，出乎他的伟大的、宽大的、民主的心胸，早通知了当地的青年们可以举行一次20分钟的集会！

我有没有提议向他致谢？我没有。我盯住他喊道，“走吧！走，走开！”警长在督察走近讲台的时候，也气势汹汹地从大街走来。我转过身去对他：“警长，这里有人要扰乱一个平静的公共集会，我请你帮忙维持秩序。”警长看了看那个气得几乎要昏倒的督察。他们准备逮捕我，不过警长一离开街心，路上就没有阻碍，矿工得以蜂涌而来，围住我们。从他们的沉默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敌愾。我知道我是安全了。“放老实些吧，”我对警官说，然后继续演说。那时警长和督察都走不出去了，只得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小时等候我演说完毕。然后他们垂头丧气地走下山谷。后来同志们告诉我这件事震动了整个隆达和附近的几个山谷。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是对失业工人粗暴的威嚇。

但是，尽管如此，示威仍旧继续举行。在勃兰茨堡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之后，人们在整个山谷地区号召组织游行队伍，向伦敦进发。响应号召的人很多，威尔士矿工联合会也支持这个号

召。可是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出来反对游行，指责它是“共产党的骗局”。请想一想——饿到半死的人，由荒凉贫瘠的山谷动身到伦敦去，作长途跋涉的游行，而另一方面，那班养尊处优的、舒舒服服的工会领袖们却尽力和他们为难。

这次游行和其他游行一样，由华利·汉宁顿领导，它激发了威尔士各地和通往伦敦的沿途各地的激昂情绪。伦敦对游行队伍的接待是再好没有了，市民非常关心他们，使他们感觉到这次游行确是有价值的。

第二年，1928年，苏格兰组织了一次向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进发的游行。这对于这个古老的城市的高傲的市民是一个刺激。世世代代以来，爱丁堡始终是无业的和游手好闲的贵族的注意中心，这次却被失业工人光顾了。游行队伍到了，秩序井然，而且像预料的那样，受到了爱丁堡工人的最热烈的欢迎，但遭到了所谓“社会贤达”的轻蔑。游行队伍在街道上前进，经过十字架宫（这是苏格兰有史以来发生许许多多丑恶事情的地方）的时候，在警卫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之前，突然穿过大门转进那宫里去了，失业工人占据了那里的庭院。“社会贤达”惊慌失措，不过这种空前的事故使他们感到的惊恐，比起游行队伍后来占据那有名的太子街并在那里睡觉的时候，他们发生的感觉还算不得一回事。

大多数读者都知道太子街一边是广大的新型商店中心区，另一边是城堡花园，在这花园的后面就是高高建筑在石基上的古堡。中间是以拍马屁著名的华尔特·司各脱爵士纪念碑，他是一个有名的小说家，不过人格卑鄙。爱丁堡当局并没有准备适当住所给游行队伍使用，因此，经过磋商之后，游行队伍决定睡在太子街靠城堡花园那边。试想那种情景——街道的整个

一边，躺着一長列的人，到了早晨，他們就忙着从附近井里汲水洗臉抹身，“厨房”忙着預备早餐！爱丁堡工人对于这些游行工人的精神，感到兴奋，不过“社会賢达”却感到恐怖。合適的住宿地方很快就找到了。

这些長途游行不过是全国各地進行的运动的突出事件罢了。各处举行示威，常常和警察發生冲突，到处有人被捕，然后又進行新的斗争。情緒的高漲使得鮑尔溫政府不敢引用勃蘭茨堡委员会的报告里最惡毒的一些規定，他們只敢把失業工人的救济金减少一先令。但是，他們虽然不敢任意進行正面攻击，他們却充分進行了側面攻击。1924年工党政府通过失業保險法案时，曾加進了一句，規定一个失業工人用完了他的法定救济金以后，若是“真正在找工作”，还可以領額外福利金。鮑尔溫政府抓住了这一点，用最惡毒的方法根据这一点行动起来。每星期有成千人被撤銷救济金。1929年普选的前一年，25万以上的人的救济金被取消了，借口是他們不是“真正在找工作”。550万人失業，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人們从这个工厂大門走到另一个工厂大門，沒有希望找到任何工作，然后到評判会去，經過盤問和威嚇，却被評定为“廢物”和“不想做工的人”，并非真正在找工作！

情况非常嚴重，只好决定再來一次——第二次——从全国各地向倫敦進行飢餓游行。鮑尔溫政府命令地方当局把游行的人当作“乞丐”看待，他們到达一处地方时就引用習藝所对待乞丐的規定。职工大会禁止游行，又通知沿途的工会理事会抵制游行隊伍。总之，用尽一切可能办法來阻止游行。

但是，不顧政府和最高委员会的联合阻力，游行的准备工作仍旧繼續進行。参加的人多極了，所有这些游行都是根据他們的精力和紀律性选出來的，因为“飢餓游行”是一件嚴重的

事，需要極高度的領導、組織性和紀律性。1929年1月3日，蘇格蘭隊在嚴冬的時候動身，向倫敦作400英里的長途進軍。最初，地方當局——有幾次還有當地工黨組織——要在中途設置障礙，由於英明的領導和遊行者的勇敢堅毅，這些障礙都被立刻掃除了，除了一二次因地方當局對於住宿處所故意刁難而有點小磨擦外，整個遊行取得了各方面的最廣泛、最堅強的支持。

2月24日，星期日，特拉法加廣場一帶擠滿了倫敦的工人，他們向各區來的高舉着旗幟的遊行隊伍歡呼。到齊之後，又聽到管樂之聲沿着斯特蘭德街傳來。這是蘇格蘭的工人到了。好熱烈的歡迎！人們何等興高采烈地為這班青年歡呼，他們不辭疲勞，由格拉斯哥遠道來到倫敦，為着生存的權利而鬥爭。這種景象，沒有一個遊行者會忘記的。不管他們完成了別的什麼任務，他們已經喚醒了全國，使羣眾痛恨鮑爾溫政府。他們到了倫敦以後，組織了代表團到唐寧街、下院和勞工部去，但是鮑爾溫政府拒絕接見，不肯讓步，然而過了幾個星期，在遊行隊伍回去之後，它還是不得不辭職，而全國又將舉行一次普選。

第二屆工黨政府是一個糟糕透頂的鬧劇，它使當初組織時所引起的希望——這種希望當然太高——全部粉碎了。可恨的鮑爾溫政府已經去了，一個“人民”的政府代替了它。這個政府在競選綱領和聲明中提出了保證，宣告要糾正前屆政府的所為，可是沒有多久，它也顯然走上了同樣的道路。麥克唐納首相和斯諾頓財政大臣都是依靠銀行家的，他們的政策都按照銀行家的願望而定。節約是他們最醉心的目標——這種節約始終是犧牲就業和失業工人的利益。蘭開夏紡織業的工頭們要求降低工資12%的時候，絕大多數紡織工人決定反對把已經太低的工資再減，準備應戰，反抗資方。工黨政府認為資方的理由有一定的

根据，就派了一个由麥克密蘭勛爵領導的委员会來仲裁。委员会在審查了“証据”之后，就作出了利于資方的决定，硬把蘭开夏工人的工資减少了6.5%。这不过是影响各級工人的許多事件中的一件，这些事件使工人們对工党政府大失所望。我特別提出这一件事，是因为那时蘭开夏工会的某些負責人赶到倫敦去見財政大臣斯諾頓，他們回去报告說，接見时对他們的态度很冷淡，比張伯倫那样的人还有过之無不及。他們本來指望斯諾頓是他們的朋友，可是他是他們的一个殘酷惡毒的敌人。他和麥克唐納兩人的态度影响了各“消費”單位。衛生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坚持鄉鎮当局繼續举办那种不光采的“賑工”，作为对于那班被職業介紹所擯棄的人的一种救济方法。現在沒有人再談“賑工”了，不过僅僅在几年以前，一个工党衛生大臣还强要那些被当做“不是真正在找工作”的不幸的失業工人去做“賑工”呢。

不但如此，格林伍德还坚决不准地方当局把礦工斗争期內積累的債款注銷。那次斗争拖延了七个月之久，地方当局看到許多家庭生活困难，就貸款救济，这就是獲得救济的人欠地方当局的債務。有几个地方官員寫信給大臣，建議注銷这笔債款。大臣断然答复他們說，不許他們这样做，否則就得“罰款”。格林伍德那样苛刻，还比不上劳工大臣瑪格丽特·邦德菲尔德和她的有点愚鈍的駐議會次官杰克·劳遜兩人的苛刻。这兩人在引用規則方面非常嚴格。几年前一个保守党劳工大臣曾接見過失業工人代表团，他虽然說只能談半小时，可是結果他却听了整整兩小时关于失業問題和失業工人情况的陈述。而瑪格丽特·邦德菲尔德拒絕接見到劳工部去的華利·漢寧頓率領的代表团。但是这个代表团想法走進了劳工部，上了樓，走進了一間很大的會議室。激怒的官員們問他們有什么事，他們說要見大臣。瑪格



特·邦德菲尔德不見。他們要見她的助理杰克·劳遜。杰克·劳遜也不願接見。“好吧，”他們說，“我們已經到了这里，現在要等兩人中有一个來見我們。”大隊的警察叫來了，一个警官走進房間，命令代表团出去，他們拒絕了。代表团共有15人，警察進來了30个，兩個警察拖一个代表，把他們拖到街上。保守黨員大喜，其中有几个（不是鮑尔溫——他是了解麥克唐納和斯諾頓的）本來对工党政府有点害怕，現在他們說：“呀！这班人对付失業工人的断然手段，比我們高明。”虽然麥克唐納奉行銀行家的命令，但赫伯特·摩里遜却告訴工人运动說，“麥克唐納是一个偉大的工党領袖”，还說“他在歷史上是不朽的”等等。

当然，这不过是赫伯特·摩里遜所犯的許多錯誤之一。現在麥克唐納死了只有几年就被遺忘了，他所留下的只是工人运动史上污穢的一頁。許多年前，我在克萊德班克的一次集会上把麥克唐納比作工党的彼克斯尼夫<sup>①</sup>，把斯諾頓比作工党的尤利亞·希浦<sup>②</sup>。我把这件事完全忘了，直到1931年的出賣事件發生后，我在格拉斯哥演講，一个妇人事后來找我，談起在克萊德班克的那次集会的事，我才回憶起來。她是那次集会的听众之一，当时听到我說那种話，实在覺得討厭。“現在我才知道你的話是正确的，”她說。

是的，1931年麥克唐納达到了他的目的。他是一个可怕的家伙，一生只关心他自己，只关心他自己一个人，对付他的同事却是橫行無忌。他利用他們，或把他們拋棄在一旁，一切都依照他的卑鄙無恥的計劃和他自己更其卑鄙的野心行事。他的同事

① 英国19世紀小說家迭更司所著小說“瑪丁·邱茲勒韋特”中的偽君子。

——譯者

② 尤利亞是迭更司小說“大衛·考伯菲尔”中一个醜矮瘦小、極端虛偽陰險的惡棍。——譯者

中玩弄这套手段的是这样多，所以这些同事就不敢揭破他。甚至到最后，他安排好了新的关系，破坏了工党政府的时候，他们对他的主要怨言并不是说他干的怎样不好，只是说他事前没有和他们商量罢了。他转到保守党的时候，只能带走有限的几个同事，这对于工人运动来说，可以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不幸。保守党想要内阁的大多数职位。麦克唐纳只能取得有限几个职位。有一两个著名的工党领袖没有跟麦克唐纳去是因为他没有带他们去，这是臭名昭彰的事情。其中有一人还神经过敏地等了两天，以为麦克唐纳会派人去请他，后来他才和其他一些不参加的人在一起，以忠心保卫工党的独立性自居。不错，第二届工党政府的结局恶劣，这是它一开始就采取的政策的可必然后果，这种政策是麦克唐纳和斯诺顿奉银行家的命令制定的，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每个工党阁员都没有表示异议。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个时期，斯诺顿已经和麦克唐纳散伙，他自己已成为贵族，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向全世界宣告：在工党政府垮台和国民政府成立的次日早晨，麦克唐纳到他那里去，兴奋地对他大声说，“你要知道，菲利普，伦敦每一个贵妇人今天早晨都要来吻我。”好家伙！他已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可是赫伯特·摩里逊说：“他是一个领袖，在历史上是不朽的！”现在他死了。我们真感激；他已被遗忘了。

就在第二届工党政府正要成立的时候，另外一个团体组成了。这个团体的任务是要对工人运动起一种比工党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大的作用。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筹备在1930年1月1日创办一种日报。这对我们、对任何工人团体来说，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党的星期刊物“工人周报”很久以来就在报头下面印了一行字：“工人日报的前驱”。我们逐渐把款项积聚起来，可是到

了創辦委員會成立的時候，我們距離所需要的經費還很遠。那是何等艱巨的任務！要找房屋，要找印刷工人，要作各種技術上的布置以及其他的一切，這些都歸納到一個總題目——錢，錢，錢，錢。人人都出動了，個個都找了，在工廠里和公共集會上募捐，找私人募捐——沒有一處遺漏。雖然捐款的主要來源向來是工廠，但一些有成千鎊富餘款項的同情者會屢次幫助我們渡過經濟難關，這也是事實。當然，赫伯特·摩里遜知道我們的經濟來源是在國境以外的，他在工黨會議上或者工黨的報紙上，每逢有機會時就渲染這一點。但是等到赫伯特·摩里遜做了內政大臣時，他就不得不放棄他這一套心愛的誹謗了。1941年“工人日報”被禁止發行的時候，有一樁可笑的事。已故的里斯·史密斯因為急于支持他的同事摩里遜，帶着一連串關於“工人日報”的問題跑到內政部去，他想找些材料，準備在議會演說進行抨擊時用。他把這些問題用書面交給英皇背后的權威、內政部辦公廳主任亞歷山大·馬克斯威爾爵士。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工人日報是否由國外得到財政援助？”里斯·史密斯想直接由有關方面找到秘密，可是有關方面卻沒有什麼秘密可以供給給他。亞歷山大爵士不得不愁眉苦臉地答复：“我們幾年來注意他們的信件，我們不能不承認共產黨人由國內支持它的人那里得到的款項，足夠維持它的報和它的組織，沒有什麼迹象證明它的錢有其他來源，它也並不需要其他來源的錢。”但是，你以為史密斯在辯論的時候會把這件事告訴下院嗎？不會的，先生，他完全避開了財政問題。但是我倒弄到一分問答記錄，使摩里遜狼狽不堪。他於是開始懷疑“內政部里有共產黨員”了。這對於赫伯特來說是可怕的思想！我根據文件和文件里面他所承認的話向他挑戰，他東躲西閃，避不應戰。辛威爾又追問他：“內政部有什麼證據證明‘工人日報’

得到國外財政接濟呢？”摩里遜有很好的機會了，因為，若是他經常說的這些話是正確的，那末，現在是抓住這一點不放的好機會。但是他坐在那里，既不站起來對抗，也不答复辛威爾的質詢。內政部和工廠里的人們一樣，都知道“工人日報”的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不過這種話在摩里遜和工黨領袖們的頭腦里又有怎樣的感想呢？他們現在所領導的運動，當初是全國成千成萬的普通人，為了他們全心全意贊助的事業獻出了他們的時間、精力、和不容易賺來的錢建立起來的。今天工人的品質還是同樣高貴，他們準備為了工人階級的解放而捐獻，大量的捐獻——但是工黨領袖距離工人階級太遠了，以致已經看不到這一點了。所以當他們看到共產黨不斷活躍，他們就問：“誰出的錢？”他們忘記了錢這樣東西，不管它有多大的腐蝕作用，却永遠也不能喚起像共產黨人所表現的那種熱誠。只有對於一種事業的信仰，不能動搖的信仰，才能說明共產黨人和幾十萬共產黨同情者的專心致志，他們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把“工人日報”和共產黨的其他活動維持下去。

儘管1929年困難重重，1930年1月1日到來的時候，“工人日報”創刊號發行了。我們找到了塔勃納格爾街（靠近舊街車站）的一所舊屋做編輯室，印刷所是距離那里很近的一家私營印刷舖。兩處房屋都需要經過各種改建才能合用。當我們進去編寫創刊號時，弗蘭克·杰克遜帶着一班建築工人還和我們撞來撞去，要我們讓出地位給他們工作。這些人是志願來的。他們干的工作好極了，平時人家不管給他們多少錢，他們總沒干得像這次那樣好。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做完，電燈還沒有裝好，可是我們得到許多蠟燭，天氣雖冷，我們仍舊在燭光下進行工作。我可以肯定地說，英國從來沒有一家報紙像我們在塔勃納

格尔街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創刊的。这在許多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终于渡过了这种困难。这主要要感謝華尔特·霍姆斯。我們的青年同志魯斯特担任編輯，他现在是这项業務的老手了，可是在当时他对于办日报也是一个沒有經驗的生手。我和其他几个同志也是同样沒有經驗，都做了該报的工作人員。我寫各种題材的文章，編寫各种零星的消息，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忙碌。我們常常有比篇幅多一倍的材料。華尔特·霍姆斯用他丰富的經驗把我們乱七八糟的長短稿件拼湊起来，成为齐整的版面。这只是由于他有高超的技術和坚忍的耐心才能办到。的确，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对華尔特·霍姆斯表示尊敬。

我在报館担任的各种工作中，嘗試了一下“專欄編輯”的工作。我用“硬面包”作这一欄的标题，編寫了一系列的短文章。我不知道讀者認為这一欄有多大意义，可是我的同事对我編的这一欄却感到很大兴趣。我們的报纸在1930年元旦創刊；就在这个元旦日，我的家鄉培斯利發生了大灾难，“工人日报”和其他各报在第二天都在首頁登載这项消息。这件事給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我一向热爱我的故鄉和培斯利的許多老“相好”。当我遇見他們时，我常常想起一只老歌，“他們有的高升，他們有的下降”，但是“升”也罢，“降”也罢，我見了他們总高兴和他們閑談多年前的乐天生活。其中有一位名叫鮑布·哈迪是当地一个商人（我們在小孩子的时候，在同一条街道上玩耍），他喜欢談1920年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在格拉斯哥的克蘭斯頓茶室里正和湯姆·約翰斯頓、馬克斯頓、韋特萊及其他几个人辯論，他走了过来对那班人說：“一句也不要相信他說的話。”我回答他說：“同志們，你們看看培斯利最后一个自由主义的样品。”当时我們大笑，現在我們也觉得好笑。是的，我喜欢我的家鄉，喜欢我的同鄉。現在，1930

年1月1日收到的电报是一件可怕的、悲惨的事。原来培斯利的一所古老的騎士廳出租，作为放映电影之用，元旦日为兒童放映日場，成羣的快乐兒童涌進去后就开始放映，当时不但把廳堂的門关上，外面的大鉄門也关上，并且鎖上了。电影开映后不久就失火，兒童冲到門口，可是門关着。在这种着火和驚惶的情况下，69个兒童丧失了生命。这是培斯利的一个悲惨的元旦。

我在“工人日报”大約工作了三个月，在这时期始終不断地有人叫我去开会或参加示威。当时全國各地，尤其是在失業工人中間，普遍感到驚恐。他們正面臨着新的攻勢。銀行家和保守党報紙嚷着要節約，但其方法不是牺牲富人而是牺牲窮人。我立刻把整个時間用來策动反攻，因此我的學習記者的生活就此結束。

驚恐是有原因的，欧洲本來就有慢性危机，不料美國方面的“經濟風暴”又横扫大西洋而襲來。究竟这种“慢性”危机或附帶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什么，沒有人去研究，人們所注意的只是怎样把富有的人掩藏在比較不幸的社会階層的背后，使他們不受可怕的風暴的打击。麥克唐納政府（叫它工党政府是完全錯誤的）是金融界人士掌中之物。由于这些大人先生們的要求，政府就指定梅委员会提出經濟方面的方案，使預算平衡。梅本人是万全保險公司大老板之一，对于这种任务确是適當的人选。他和各委員不久就提出方案，建議的節約方法是牺牲失業工人、保健事業、公教人員、警察和海軍。麥克唐納內閣的垮台就是因为削減失業工人救济金10%的問題。他并非不能使这件議案通过，工党領袖們也說只要麥克唐納的做法合理，就可以得到諒解。但是麥克唐納并不能做得合理，因为他已經准备参加鮑尔溫集团，所以必須去掉工党同事，这种情况后來大家都知道了。随着工党政府的倒台和國民政府的成立，全國又举行了一次选举。1931年的

选举是近年來最驚人的一次选举。兩年前，反对鮑尔溫的声浪很高，現在有了麥克唐納的掩护，鮑尔溫就乘机入閣。这次选举簡直糟糕透了，工党領袖們对此却責备人民，但事实上这决不是人民的过錯。麥克唐納政府存在的兩年之中，每一件事都使人民失望。工会和失業工人团体也同样感到失望。可是在整个时期之內，麥克唐納却被称为天賜的領袖，好像只有他能領導人們由資本主义的荆棘中走到山那边的社会主义福地。每一个和他有往來的人都知道他不好，可是他們爭先恐后地歌頌他，就是在选举期內，他們也不暴露他的反复無常、欺騙瞞哄的个性。他們給麥克唐納所造成的地位以及斯諾頓的狂妄的廣播演說（他在演說中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以为若是國民政府不能上台，人民的一点銀行存款就会受到損失），再加上他們本身的弱点和缺乏建設性的政策，終於使选举轉向國民政府方面。在这一次选举中，許多工党領袖“吃癩”了，內中有一个可尊敬的威廉·阿丹遜，他的失敗使他自己十分吃驚。保守黨員米尔內得到了西費夫的議席，另一个保守黨員、頑固的華萊斯打敗了威廉·華生先生而得到頓菲萊茵市的議席。我在西費夫的競选中增加了几百票，在此次混乱而悽慘的选举中已經是很不錯了。等到宣布結果的時候，頓菲萊茵郡長公署門前有成羣的支持工党的人聚集在街道上。郡長在中間，一边是華萊斯，那边是威廉·華生，报告选举結果之后，就介紹代表頓菲萊茵市的新任議員華萊斯。我站在他們背后的門口等他宣布西費夫的选举結果，靠近我的是警察署長。華萊斯对羣众演說——也可說他是試圖演說。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向來知道費夫的心是健全的。”他的演說就这样开始了。羣众喊鬧、叫罵。華萊斯想用很高的声音叫喊，來超出嘈雜的声音，他費了很大气力，臉和頸子都脹紅了，汗也流下來了。他隨

即放棄了演說，怒氣沖沖地回到休息室。我對他說，“你說費夫的心是健全的，但是你似乎不大喜歡這心裡發出來的聲音。”他瞪着眼睛看我，我相信如果警察署長不在那里，他會打我的。那時候他氣得鼻子里呼呼地發響，走開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和聽到華萊斯說話。威廉·華生在1935年才再次獲得他的議席。

國民政府在政府中大多數人的支持下，毫不遲延地使用它的“節約”利斧。它不但減少了失業工人救濟金，又實施了可惡的家計調查。但是工人對本階級是決不會感到有什麼慚愧的，他們一代一代地向前鬥爭，一次又一次地被擊敗，挨打，受苦，監禁，但始終在苦難中產生了新的力量，重新進入鬥爭。1931年起的幾年之內，都是如此；工人的活動範圍非常大。吃不飽的失業工人和衣冠整齊的公教人員，都在街道上遊行示威。這對於公教人員是身歷其境的事！他們以前對於失業工人向來袖手旁觀，其中有些人或許因為有着較好的地位，還要嗤之以鼻。但是，現在他們也舉起了旗子，喊着口號，還唱着歌，同工人一樣。遊行隊伍中間，有一句話使資產階級害怕的就是遠遠地由北面傳來的——“叛變！”“這不可能是真的。”“天呀！這多可怕！”但是，這是真的。海軍在茵弗戈登舉行一次會議，或者說舉行一連串的會議，水兵們万众一心，決定在削減救濟金的辦法撤銷以前——至少就這個問題進行磋商之前——不接受命令。一切威脅利誘都不能動搖他們。結果，削減救濟金的辦法就很快地撤銷了，還保證不犧牲任何人，這樣才使局勢轉危為安。可是所謂不犧牲任何人的保證很快的就被破壞了；被懷疑為這次事件的首腦的人都悄悄地從海軍中被開除。

失業工人的情況就不同。削減救濟金的辦法執行了，家計調查也毫無顧忌地實施了。在全國各地都用警察來破壞示威，



恫嚇人民羣眾。在柏肯赫特和貝爾法斯特，這種鬥爭達到了憤怒的最高潮。在柏肯赫特的街道上對示威隊伍進行襲擊，失業工人和警察搏鬥。許多窗戶被打破了！還發生一些搶劫。到晚上，警察借口搜查被搶去的東西，到失業工人組織的重要成員家里，挨戶搜索。當然，大家知道這班人並不是搶劫的盜匪，警察也明明知道當示威者和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並非示威者而是另外一些利用這個機會的人在順手牽羊地撈點東西。警察走進失業工人家中以後的情景惡劣到無法描述。遭難的人陳述經過的情形非常可怕——好像成羣的納粹黨徒在柏林襲擊猶太人一樣。

貝爾法斯特的情況更壞。警察開手槍，幾個失業工人被擊死。湯姆·曼恩到貝爾法斯特去參加其中一個工人的喪禮，他上岸時貝爾法斯特的刑事偵察處就嚴密地注意他。喪禮後，他本來要在一兩處集會上演說，可是他被刑事偵察處逮捕，押回原船。這就是北愛爾蘭當局對這種事的處理方法。

英國每一部份都發生事故和搏鬥。我談兩處。我們在寶塔橋舉行示威，我們動身遊行時就被騎巡隊由一條小街襲擊，他們毆打我們這班人，撕毀我們的旗子。婦女中有一位偉大的人物，正如她的丈夫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一樣（他是國際縱隊的一個將領，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戰鬥中陣亡），出其不意地把一個警察從馬上拖了下來，用一根折斷了的旗桿用力痛打。另外一個騎警舉着警棍朝着她奔來，準備打她，我跑過去剛好把她拉开。可是她並不知道拉开她的原因——她只知道我把她從她揍着的警察那里拉开了，於是她狠狠地罵了我一陣！

一兩天之後，倫敦接到消息，說格拉斯哥街道上發生衝突，哈里·麥克善被捕。我乘夜車趕去，在第二天遇見了伙伴們。哈

里·麥克善已在早晨上过法庭，不准他交保。我們决定兩天后再举行示威，并决定由我設法把哈里保出來領導示威。我找到了我的多年老友湯姆·克尔議員，他說若是准許交保，他便去設法筹款(蘇格蘭与英格蘭不同，保釋金要繳現款)。我又去找檢察官，向他說明來由。他說他决不能同意，并且說损坏的东西价值几千英鎊，应由示威者負責，而我却指出这应由警察負責。“我們举行过几百次示威，”我說，“你找不出有任何损坏，連一塊窗戶玻璃都沒有打碎过，除非警察來干涉并破坏組織。我們示威的时候，若是警察不在街道出勁，我們保證沒有糾紛。”好了，我們辯論很久，最后他同意了。于是把湯姆·克尔叫了進去，繳了現款，哈里立刻就被放出來了。我告訴他要他領導示威，又說檢察官讓他交保出來时也知道这一点的。他簡直不相信這句話。他說：“这种事从來沒有过。”不管有沒有这种事，他的确又領導了一次示威，这是当他由于領導前一次示威被捕而剛剛交保釋出以后。后來審訊上次案件的时候，他判个無罪釋放。

可是別人沒有那样幸运。華利·漢寧頓在一个短时期以前被捕，審判員叫他具結，要在六個月內不鬧事，并交 500 英鎊的保。華利拒絕具結，就被判一个月監禁。因为他决定要在監獄里組織示威，就被獄方从倫敦的一个監獄送到另一个監獄，移來移去，最后被解到梅德斯頓監獄，直到坐滿了一个月为止。但是，比这更坏的是阿瑟·霍尔納，現在他是礦工工会一个杰出的領袖。他和其他一些人在隆达阻止了一个失業工人家庭被驅逐出屋。这种事件在蘇格蘭也發生过几次。現任蘇格蘭礦工工会主席席阿布·莫法特就参与过这种事，可是在蘇格蘭被控訴的人到了審判員面前，不过被判十天至一个月的監禁，而霍尔納和伙伴們却被帶到巡迴裁判所，各种罪名都加到了霍尔納的头上，說他

“陰謀暴動和革命”，說他是“外國的代理人”。凡是可以用來指控的話都說了，這一切都不過是因為他想阻止一個不幸的失業工人家庭被趕到街上去。霍爾納被判15個月徒刑，別的人也遭受同樣重的處分。他們為了要把一家人平安地留在住所里，總共被判了七年的監禁。

那是1932年春季的事。1932年秋季，蘇格蘭隊由格拉斯哥動身，作第三次到倫敦去的偉大飢餓遊行。全國情緒又一次高漲，每個人都密切地注意到失業工人的困境以及麥克唐納的國民政府的暴虐政策。當遊行隊伍到達倫敦後，產生了許多動人的場面，因為有許多次示威和公教人員的示威同時舉行。他們組織代表團到唐寧街、到勞工大臣那里和到下院去請願。到下院去的代表團還帶着全國各地羣眾簽字的強有力的請願書，反對削減救濟金，反對家計調查。麥克唐納拒絕接見遊行隊的代表團。前一年，1931年，他同意接見由戴維·柯克伍德和詹姆斯·馬克斯頓陪着去的失業工人代表團，這是由於柯克伍德的勸告，麥克唐納才同意接見的。在接見代表團的前一兩天，職工大會在卡迪夫召開大會，主席本恩·滕納以大會名義向郡長（或者這種地位的人）、市長以及其他高級權威人士致敬。可是失業工人派代表團到大會去請願的情況就大不相同。大隊警察用警棍的棍頭向他們“致敬”，失業工人代表團想闖進會場，被警察痛打一頓，率領代表團的華利·漢寧頓頭上受了重傷。他到唐寧街找柯克伍德、馬克斯頓和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共同去見麥克唐納時頭上還裹着紗布。柯克伍德和馬克斯頓帶他們到十號，那里又生了枝節。麥克唐納見了代表團的名單，他固執地不准代表團有漢寧頓在內，經過了長時間的磋商，華利說服了其他代表，他說這次主要的事是趁此機會說明失業工人的問題，至於他本人是否在內，沒

有多大重要性。因此代表团去掉了它的領袖華利·漢寧頓之后，見到了麥克唐納，提出了失業工人的問題，可是从这一个沒有骨气的家伙那里，沒有得到什么滿意的結果。在整个接見的过程中，麥克唐納很清楚地表明他不喜歡失業工人代表，他們的等級比他低得多，事实上他說的話大半是通过柯克伍德或馬克斯頓而对工人們說的，好像他是接見一个外國代表团，用柯克伍德和馬克斯頓做翻譯似的。很明顯，他覺得那一次接見已經够了，因此1932年3月，他就絕對拒絕接見游行隊伍的代表团。

但是游行隊伍有請願書要呈遞。議員約翰·麥克戈溫告訴几个新聞記者說游行隊伍託他把請願書轉交下院。游行隊伍的理事会否認这个說法，說他沒有權說這句話；失業工人要求自己有权到下院去呈遞这份請願書。第二天下午，麥克戈溫在下院發表談話，嚴重地損害了游行隊伍的立場，他說游行隊伍沒有遵照憲法手續，“只是仗着他們人多的力量強迫議會准許他們的代表团進來”。“晚報”幸災樂禍地說：“麥克戈溫先生把漢寧頓先生和麥克善先生‘剔’了出去，这是应当向他祝賀的。”後來这位麥克戈溫先生自己也在一年前的工党年会上被工党“剔了出去”。<sup>①</sup>那时格拉斯哥市工党組織因为对他的行为不滿，提起控訴，执行委員會向大会提出的报告里有这样一个建議：

“全國执行委員會茲特報告：1930年補缺選舉时在希特爾斯頓舉行選擇候選人會議上發生了不合規定的事情，当由格拉斯哥工党組織及希特爾斯頓党分部組織聯合委員會進行調查，又經蘇格蘭执行委員會代表全國执行委員會進行調查，并將全案轉獨立工党的全國行政委員會，現在決定批准蘇格蘭执行委員會調查后所得的結論如下：

<sup>①</sup> 麥克戈溫已經脫離了獨立工党，并已重入工党。

‘本委員會鑒于上述事件所查明的事實，認為議員麥克戈溫在議會里代表工黨，既不適合，也不相當，應請全國執行委員會予以適當處理’。”

已故市工黨書記威廉·蕭發表演說支持這個議案。他在演詞中對於負責選擇接替約翰·韋德萊議席的候選人集會上所發生的不正常情況，有非常特殊的論斷，這些論斷在1931年工黨會議的報告里面已經完全敘述了。麥克戈溫所屬的獨立工黨的領袖戴維·柯克伍德和詹姆斯·馬克斯頓竭力替他們的同事辯護，但是會議却接受了威廉·蕭的意見，批准了上面的提案。

當然，這次失業工人的“揭發”和他們想不顧“憲法手續”的舉動，使得警察對他們更加注意了。警察出動，把守着每一處戰略據點，準備防范。唐寧街和政府各部都派有警察，準備行動——他們已經布置妥當。在這種防區以外，似乎有成羣的遊行隊員竭力要去見那些顯要人物。但這不過是聲東擊西的牽制行動，遊行隊伍的主力聚集在下院的公共休息室里面，華利·漢寧頓正在和議會里一兩個工黨議員談笑。等到一切準備好了，就發出信號，遊行隊伍用最快速度，立刻整隊，組成了一個堅強的人羣，向着那通往內休息室和下院大廈去的路上的障礙進行猛攻，在警察沒有集合以前，他們已經差不多完成任務了。這是議會歷史上非常緊張的一個時刻，屋內的議員能夠聽到外面的戰鬥聲音，他們焦急地注視着門口，遊行隊伍會沖進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區嗎？雙方曾一度勢均力敵，不過增援的警察很快就趕到了，於是憲法得救了，議員又可以呼吸自如了。為了這次擾亂的事，華利被禁止進入下院。這個禁令直到1936年才撤銷，那時我以議員身份向負責官員交涉這件事，終於使華利有權進入下院內部并可進行活動。

---

---

## 第七章

失業工人就这样不断地斗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们冒着夏季的酷热，冬令的严寒，跋涉长途，游行示威，走过雨水泥潭或者是雪冻冰滑的道路，直到大战爆发，那时国家又需要这批被遗忘已久的失业大军了。

德国发展情况不同。我们说起德国时，常常联想到“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及它在德国历史上起的邪恶的作用。可是，虽然“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残暴力量过去已经是很可怕，更坏的还在后面呢。普鲁士人的力量建筑在土地占有上面，普鲁士的军队是由贵族地主的子弟率领的；在1848年以前，军队统治了普鲁士全国。事实上军队就是国家，国王是军队的统帅，也是国家的元首。

1848年是许多欧洲国家（包括普鲁士在内）发生革命的一年。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被自己面前的任务吓倒了，虽然有勇敢的工人在守着防御工事，还是背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向贵族地主投降。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起普鲁士历史上这件事的时候是十分痛恨的。普鲁士军队保住了它的统治权，军官队成为普鲁士的领导的、统治的阶级。俾士麦以普鲁士为中心而统一了其他日耳曼国家的时候，军队仍旧保有它的权力，但是有一种默契，就是：军队取得优越地位，其交换条件是它们为德国新生的真实力量——迅速发展中的工业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第一次世界大

战便是一次挑战。普魯士軍國主义有几百万日耳曼人归它支配，就开始摧毁那些和德國竞争的帝国主义國家所筑的障碍，使德國工業有殖民地市場，穩穩地有大量利潤可得。普魯士軍國主义失败了，它暂时偃旗息鼓了。1918年它被击败，几乎被毀滅——几乎，但是沒有完全毀滅。在战争那几年，德國使用的軍备力量逐漸减弱，但德國工業的潛力却非常迅速地增加。新的工業，新的科学生產方法使歐洲的动力有了最大的集中。

大战結束，普魯士軍國主义被粉碎了，被击败了。可是这时德國工業家相信他們所拥有的是歐洲的主導工業。这时的一个問題是：他們怎样建立起足以充分表現这种工業的力量。首先，必須鎮压工人，随着 1918 年的革命潮流在德國許多地区所成立的苏維埃必須予以剷除。总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黨員，总理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黨員，反动势力有了甘心情願的工具，他們的初步工作也因而完成了。在清除苏維埃的过程中，許多勇敢的無產階級战士牺牲了生命，其中有兩個最著名的革命領袖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薩·盧森堡遭到了一群普魯士軍官的殘酷殺害。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領袖虽然能够替他們鎮压工人，却不能替他們解决他們所面臨的更大任务。那时他們需要一支新軍，要一支比普魯士貴族地主軍隊更蛮橫、更殘忍的軍隊。优秀種族的思想漸漸生根，因为培植这种思想的基礎已經准备好了。軍人总是認为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优秀，別人也是这样看待他們（学校里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所以在那时候这不过是把一种已經被廣泛承認的思想傳播得更廣泛些罢了——把“优秀集团”改为“优秀種族”。优秀種族一定要先在德國國內、然后到國境以外把主導工業的一切障碍完全去掉；共產党人、犹

太人、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合作运动者——都要驅逐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組織了納粹运动；不过对这些人的進攻还只是初步訓練。加于國內人民的慘無人道的殘忍行为，只是准备用來对付別國人民的行动的一种嘗試而已。但是我們英國的反动分子却看不出这一点，他們用巨大的財力和政治权力抑制德國民主力量和柔弱的德國民主政府，同时还竭力加强和促進德國的工業。

共產党在德國的势力很大而且在不断地壯大，可是这种势力大部分是在几百万失業工人之間。社会民主党在有組織的就業工人中間还有極大势力。若是這兩支力量联合起來，德國的歷史会完全改觀。但是这种联合当时不可能做到。关于这一点，人們总是責备共產党。英國工党領袖总是喜欢談論共產党的錯誤。的确，他們是有錯誤的。哪一个政党沒有錯誤呢？列寧常常談布尔什維克的錯誤，而且不是私下談論，而是公开談論。他时常告訴同志們說，我們必須在人民面前公开承認錯誤。但是，有些人說，要是我們承認錯誤，人民就要不相信我們。这些人又說，孟什維克從來不承認錯誤。列寧回答說：“不，人民不会不相信我們。他們会知道我們是嚴肅的政治家，因而他們会完全信任我們。”于是他談了布尔什維克的錯誤和反对者的錯誤。布尔什維克的錯誤是在实施工人階級的政策时犯的錯誤，反对者的錯誤是由于脫离工人階級的政策而犯的錯誤。他簡單地比喻說：“我們的錯誤是屬於二加二等于五这类性質的錯誤，这是很容易改正的。但是我們的反对者說二加二等于蠟燭，这就不可能改正了。”

德國共產党主張組織由下而上的統一战線，他們誠懇地要組成它。但是，据說他們虽然有这种主張，而由于他們攻击了



社会民主党領袖，这个主張就沒有实现的希望了。这可能是如此，但是要注意，他們执行着一个正确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容易改正的錯誤。如果社会民主党的領袖为工人階級公然挺身而出，对于改正这种錯誤，就能有所帮助。不过他們更关心的是脫离工人階級，因此使改正錯誤更加困难。这种情况令人难于相信，也难于解釋。等到希特勒的影子越來越黑暗地籠罩德國和总统选举到來的时候，社会民主党自己沒有候选人，也不支持共产党領袖总统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反而号召工人去支持貴族地主軍閥兴登堡。你說这不会是事实吧。唉，这太确实了！“选兴登堡，他会把你們从希特勒手里拯救出來。”这就是对德國工人的号召。“二加二是蜡燭！”这次还不止这样，“二加二”是把德國工人、最后把整个欧洲投入“一团漆黑”。兴登堡不會把他們从希特勒手里拯救出來，而是把权力交給了希特勒，这种权力就被用來毀滅德國的工人階級运动。这次选举不准共产党参加，專后社会民主党人在克諾尔戲院出席國会的會議，声明自願站在忠心的在野党立場上。为了表示他們的忠誠，在全場向他們注視着的时候，他們全体站起來行了一个納粹敬礼。納粹党徒笑他們这种卑鄙墮落的举动，禁止他們再到國會去。在他們行納粹敬礼的同时，共产党人、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工会主义者都受到迫害，成百的人被殺害，被关進了集中營。“优秀种族”的殘酷的訓練已在大力進行。

选举之前，納粹党徒完全处于不利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事实上有力击败他們的力量。納粹党徒并不企圖僥倖。由于希特勒做了总理，納粹党徒就有極大权力，只要有所借口就可以使用这种权力。因此，他們放火焚燬國會，然后却拚命叫喊，說是共产党人干的事。共产党党部被搜查，成千成万的

黨員，連恩斯特·台爾曼在內都被逮捕，成百的人被殺害。共產黨被禁止參加選舉，選舉的結果是納粹黨勝利。既然已經指責共產黨放火焚燬國會，所以不得不用一種方法來加以證明，這並不完全是為了德國人民的視聽，更重要的還是為了國外的視聽。納粹黨現在當了權，就需要朋友了——他們找到了許多朋友。但是各處都在懷疑他們對共產黨的譴責。在許多地方，有人懷疑說，關於國會縱火案，納粹頭子們所知道的要比他們所承認的還要多，因此又一連串地逮捕了許多人。一個呆頭呆腦的荷蘭人叫范·德·盧貝在國會大廈被捕，據納粹說他身上有共產黨的黨證。這是納粹得意的第一炮。托格勒是一個很安靜、很安分守己的共產黨議員，有人看見他在放火的那天傍晚臂下夾着公事包從國會走出去。雖然其他許多議員也由議會走出去，卻沒有引起注意。他們到托格勒家里去逮捕他，他不在家。托格勒回去聽到有人找他，他並不躲避，反而親自走到警察局去問為什麼要找他。無論經過情況怎樣，他總不能相信他的生命會發生危險。他們看到了他就把他拘留起來。除他以外，他們又逮捕了三個保加利亞人，這就是他們這一網的收穫：一個呆頭呆腦的荷蘭人，一個安分守己的議員，三個“無知的、野蠻的外國人”。這對於納粹頭子們是何等好的機會呀！他們要開庭審訊，使全世界都相信他們。戈林和戈培爾要走進証人席，向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贊助者暴露共產黨人的“惡毒陰謀”。他們怎麼會不這樣做呢？怕什麼？反正荷蘭人不能講話，他只會結結巴巴地咕嚕一氣。托格勒要聘一個律師替他辯護，但是這樣的律師很容易受威嚇。至於那三個外國人——那末他們除了對納粹德國的威力屈服之外，又能干些什麼呢？是的，審訊國會縱火案將是一個偉大的場面，其間戈林和戈培爾要競爭一下明

星的地位。這是一個偉大的場面——從來沒有過的最偉大的、最富於戲劇性的審訊——可是戈林和戈培爾都沒有爭取到明星的地位，並且差得太遠了。他們扣住了一羣羔羊——這是他們的看法。他們把這羣羔羊放在羊圈里七個月才在來比錫法庭審訊，出乎他們意外的是他們發覺在那羣羔羊中有一頭獅子，這頭獅子決不是他們自誇的力量所能馴服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是一個堅強的、具有英雄氣概的人物，他蓬著頭昂然走進法庭，把他的手腕露出，給全世界來的新聞記者看，他的手腕已經像畜牲似地被鐵鏈縛了七個月了；可是他的精神並沒受影響。這種精神是毀滅不了的。只要看一看當時審訊的經過情況，看他怎樣向法庭挑戰，怎樣向戈林和戈培爾挑戰，怎樣駁斥他們的謊話，控訴他們放火焚毀國會，辭嚴義正地斥罵他們，表示對他們和他們所維護的一切的憤恨和蔑視。庭長三番兩次地命令他退庭，但是他每次回庭的時候又繼續譴責他們，法庭上沒有人能敵得過他。他掉過頭去看著那個不幸的范·德·盧貝說，“這位可憐的浮士德在這裡，可是靡非斯特非勒司卻不見了。”<sup>①</sup>當戈林出庭的時候，季米特洛夫毫不費力就證明他是“幕後人”。戈林發怒，面色蒼白，他咆哮著說：“等著，等著，你這個共產黨的豬，我到法院外面去找你。”他的意思是要殺害他，但是連這一著他也沒有能做到。這次審訊變成了審訊納粹黨徒，季米特洛夫變成了檢察官。整個自由世界在旁觀，在鼓掌喝采，聽他宣布他的信心：

“我承認我說的話是激烈而尖銳的。我平生的鬥爭向

---

<sup>①</sup> 浮士德是歌德所著詩劇中的主人公，他是一個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感到煩悶，甚至企圖自殺。後來遇到惡魔靡非斯特非勒司，受其引誘，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他。——譯者

來就是激烈而尖銳的。但是我的話是誠實坦白的。我對於一切事物向來是實事求是的。我不是一個律師由於職責攸關而在这里替當事人辯護。

我是為我自己這個被控訴的共產黨員辯護。

我是為我自己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的榮譽辯護。

我是為我的理想、我的共產主義信仰辯護。

我是為我的生活的意義和內容辯護。

所以，我在法庭上說的每一句話，正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每一個字都表示我對這不公平的控訴，對於把這反共產主義的罪行歸咎於共產黨員的事實所表示的最強烈的憤恨。……”

“17世紀首創物理這門科學的加利萊奧·伽利略，曾被帶到宗教法庭受嚴格審訊。法院要把他當作傳布異端邪說的人而判他死罪。他懷着堅強的信心和決心，大聲叫喊：‘地球依然在轉動！’這個科學定理後來成為全人類的財產。我們共產黨人現在可以和老伽利略一樣堅決地說：‘它依然在轉動。’歷史的車輪是不斷地在轉動，朝着一個蘇維埃歐洲、朝着一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轉動。”

除了不幸的、呆頭呆腦的范·德·盧貝被判死刑而槍斃外，其餘的人都釋放了。關於國會縱火案，納粹黨所能提出的人証只是這個可憐的獸子。而專家們所提出的證明已經不能隱瞞：這次共有12處不同的地方同時起火，而且從戈林的住宅（他的官邸）到國會大廈有一條地道。其他的人無罪開釋就等於宣判納粹黨是犯了罪，他們燒了國會，這一點現在已經沒有人懷疑了。托格勒被扣押，後來也被處死了。蘇聯表示願意接待季米特洛夫和他的保加利亞戰友。在全世界人士注視下，戈林不得不讓

季米特洛夫走，当时他只能咬牙切齒，怒在心里。

季米特洛夫不能不被开釋，但这一事实并不是說納粹党野獸般的怒火从此平息了。后來的几个月里，他們窮凶極惡地对几十万無辜的人民使用野蛮的酷刑，并把他們置于死地。除了工人羣众以外，还有共產黨員、合作运动者、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犹太人所受的虐待超过了早年的瘋狂的野蛮时代的任何暴行。不久就有大批的难民設法避难到比較自由的國家里去。英國和美國也到了很多这种难民。这些不幸的人和成千成万流浪在大陸上的人，都需要援助，迫切的、緊急的援助。

难民工作是反納粹斗争中最重要的政治工作之一。党用全力進行“难民”运动，同时派了它最优秀同志之一伊莎貝尔·布朗組織一个有代表性的全國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驚人的成績，它不但救济和照顧难民，还做了一种更有永久性的工作，就是暴露了納粹政权的真实性質和它要把德國人民拖進去的那个可怕的深淵。英國有几次空前的大示威是伊莎貝尔·布朗和救济委员会組織的。虽然工人运动干部沒有支持这个委员会，可是台上演說的人常常足以代表廣大階層的人民。各党派和各团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工党和工会运动著名的人物在內，都信任伊莎貝尔·布朗。

委员会在里契福尔德街的一个犹太同志阿勒克斯·藍恩那里找到了屋子做会所。藍恩本有一套房間，这一來他只保留着一間房自用——实际上还是他和我兩人共用。我既和他同在一个房間，因此我和救济委员会以及会中的工作保持着極密切的关系。在党推進运动的初期，伊莎貝尔、她的丈夫欧尼和我常常在一起工作，伊莎貝尔和我有一个时期是很著名的講台上的合作者，等到欧尼加入，我們合作得更好。当然，救济委员会成立

后，因为我經常在这間屋子里，关于委员会的事便时常和我商量，我对于这个优秀的工人隊伍，只要我能力所及，無不乐于帮助。他們工作做得極好，成千成万的人由于委员会的工作而得到了新的希望、新的勇气，因此他們非常感激地永远記得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但是阿勒克斯·藍恩对于和他一同工作的同志，稍微有点命令主义。这就產生一种情况，就是同志們开会时如果有人反对他的意見，他就会抵制这种反对，說“我已經和加拉赫同志商量过，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这話就等于最后的决定。直到后来他在政治局补缺选举当选时，有一个有名望的同志寫信給党中央，請求哈里·波立特向他提出批評，他才改变了这种作风。他的确改变了这种作风，以后他便不得不依靠自己了。

納粹的出現和進展，使整个國策和欧洲政策問題变成了最迫切的問題。情况一天比一天清楚：德國國內的屠殺就是國外屠殺的前奏。1938年初向奧地利的進軍使許多政治家驚駭異常。希特勒的下一步要到哪里去呢？

不过希特勒有适应时机的技術。他在進軍奧地利之后，和進軍萊因蘭之后一样，發表了演說，宣布他的願望已經滿足，他所要的只是对建立欧洲和平和清除犹太布尔什維主义有所貢獻。

因此，英國的保守黨人和別國同类的人物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要和平”——他們在報紙上和講台上都替他大吹大擂。如果他在考慮战争，也不是对英法而是对苏联的。祝他順利！这件事成为他們歌頌的主題和他們政策的决定因素。这种信心促成了1935年英德海軍条約，这个条約是英國沒有和盟邦法國協商就簽字的，准許希特勒德國建立特別强大的潛水艦隊。关于

这一支力量，商訂这个条約的塞繆尔·霍尔爵士竟在下院說：“它决不会在大西洋里威脅英國。”当然不会，它將在波罗的海威脅苏联，至少这是英國那些贊成这个条約的人所坚信的。他們拊掌自得，希望德國能用它的一切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把他們所憎恨的苏联毀滅，而使英國的資源得以絲毫不动，“称霸”歐洲。

西欧和平、东欧战争，这成为保守党政策的总綱。簽訂四强（英、法、德、意）公約这个主張在这几國政府里越来越得到提倡。同时，納粹一面好像很注意傾听英國保守党向它拉瀧的話，一面实施它自己的政策。意大利通过反对共產國際的公約而和德國联盟。墨索里尼是慣于学獅子吼的人，到这时他变成了希特勒的走狗。但这究竟是一个反共產國際公約，很明顯是对付苏联的，还值得保守党說几句好話來祝賀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捧为当代最偉大的人物。曾經建立英國法西斯同盟的摩斯萊，看到德意兩國的法西斯主义得到支持而感到鼓舞，因此更加囂張，叫他的黑衫党在倫敦和各郡游行。

1934年7月7日，他在奧林比亞示威，使反对他的人預先尝尝如果法西斯來到英國是什么味道。男男女女都被黑衫党流氓棍打脚踢。这种殘忍行为激动了全國。如果工党和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参加斗争，法西斯早已完蛋了，但是工党和工会領袖不肯参加反对摩斯萊的斗争，摩里遜等只是空談“言論自由”，好像容許手里擎着短棍、手指上套着鉄箍的有組織的暴徒就是“言論自由”，就是“集会自由”。

摩斯萊企圖洗刷奧林比亞的一段臭史，便在海德公園举行法西斯示威。党号召工人成千成万地集合起來在公園里把摩斯萊逐出去。工党領袖劝告工人避开示威，以免擾乱秩序。工人

不听，他們由倫敦各部分走進海德公園，舉行空前的大示威。摩斯萊和他的黨徒在警察的嚴密保護下，只開了一次短促無力的集會便忽忽地溜走了。工人證明他們能夠壓倒法西斯分子，只要有堅強的領導，他們就能夠壓倒各式各樣的反動分子——但是他們缺少堅強的領導。在偉大的無產階級中心格拉斯哥，工人們防備着——準備在摩斯萊敢于進城的時候對付他。他沒有去，有幾次他先派人去試探，并說摩斯萊要到格拉斯哥來演講，但是當局知道只要他走近格拉斯哥，市內所有的警察全部出動也救不了他。摩斯萊和他的黑衫黨也知道這一點，他們以小心謹慎為上策，遠遠地避開了克萊德河畔。

可是，工黨領袖鑒于大陸上存在着威脅，英國也面臨着日益加甚的威脅（“每日郵報”報道：大財閥和保守黨議員都日益支持摩斯萊），于是實施了破壞工人階級運動的政策。他們沒有把德國的教訓放在心上。他們發表一篇文告，攻擊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來對付共產黨為了聯合各種力量而作的努力；他們說要反對獨裁，不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獨裁。這個文告和社會民主黨人在德國所發表的一樣，但是社會民主黨人後來却在克諾爾戲院里建議接受法西斯獨裁，只要法西斯容許他們存在。

他們甚至更進一步，在1934年工黨會議上竟把救濟委員會放在被禁團體名單之內。工黨黨員不得參加這個委員會，可是有幾個黨員不顧禁令，仍舊參加。事實上工黨黨員都不准參加有共產黨員在內的政治活動。可是英國沒有一種政治活動沒有共產黨人參加，因此各種禁令的增加等于使工黨及工黨黨員放棄所有的政治活動，如反法西斯鬥爭，為失業工人、領取养老金的人、房租、住屋以及其他迫切的實際問題而進行的鬥爭。

反對法西斯和反對鮑爾溫政府的情緒這樣高漲，工黨應當



能够在全國獲得極大勝利。我們進入 1935 年这个选举年的时候，是何等好的机会呀！在市議會选举中工党已經取得了極大的勝利，保守党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对于鮑尔溫來說，情况很不利，而且越來越不利。新訂失業工人救济金等級定2月份开始实行，这就是說，在尽量嚴格地進行家計調查的同时，还要把每星期的各級救济金削減二先令到九先令。我在格拉斯哥演說，又在拉納克郡各地演說，回到倫敦时我告訴党部同志，各地情緒的高漲为从來所未有。事实証明确是如此。在南威尔士，工人运动中各方面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把禁令忘了。貧困的山谷不分彼此，南威尔士礦工联盟、各工会理事会、失業工人、共產党和当地美以美会各教堂都参加示威，震动了全威尔士，使國民政府吓得發抖了。其他地区也都踴躍参加。全國每一地区的警察都出动了，但他們沒有能力阻止这种正在高漲的、坚决有力的运动。

地方当局面臨着羣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一筹莫展，这压力有着“翻山倒海”之势。有几个中心区的市政廳被侵入。不但白天，即在深晚羣众也还在街上，怒吼声越來越高，要求撤銷削減救济金的办法。華利·漢寧頓代表失業工人全國委員會寫信給职工大会最高委員會要求召开會議，討論关于撤銷削減救济金問題的共同方針。西特林代表最高委員會寫信答复，拒絕召开會議，信尾还說明“貴会再有信來恕不作复”。西特林先生的社会地位正在提高。几年前，最高委員會和全國失業工人运动組織了一个共同协商的团体，現在西特林因为不久就要成为英帝國的最高勳爵，他已經要离棄他的窮親戚了。他得到勳爵地位是由于他的工作成績——并不是为失業工人做的工作成績。但是，羣众在沒有最高委員會的帮助之下仍旧完成了任务。下院因为政府的請求，同意了救济金削減案，这是最后的裁

決。不，先生，這還不是，最後的裁決是人民，幾次三番英國人民憤怒地起來迫使政府照他們的意志行事。在美國內戰時期，英國政府建議承認南方的奴隸主政府，並且支持南方對抗北方。當時人民沒有代表在議會里，可是他們並不因為沒有援助而躺下不動。由北到南，由東到西，全國人民起來反對政府。卡爾·馬克思當時為維也納的“新聞報”寫稿，對於英國人民和他們在必要時進行政治活動的迅速大加讚揚，他說：

“因此，工人階級完全認識到政府只是在等待一有羣眾要求干涉的呼聲，一有外來的壓力，就去阻止美國的封鎖，解決英國的苦難。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頑強地保持沉默，而一旦開口，就高呼反對干涉，支持美國，這種堅決的態度是值得欽佩的。這是一個新的、確鑿的證據，證明英國人民羣眾有不可磨滅的美德，這種美德就是英國的偉大性的內在因素。”

1935年2月的情況也是這樣的。政府幾乎手足無措，匆匆地下了一个“休止令”，停止削減救濟金，并把已經削減的補發。這是失業工人的一大勝利，可是這次勝利並不澈底，因為家計調查仍舊保留着，仍舊在實施。雖然如此，這是一次偉大的表現，說明工人能做些什麼，同時也說明只要他們團結起來，就可運用壓倒一切的力量。

同時，由於工黨通過了一種新的議事規則，規定工黨的所有組織必須服從多數人所作的決定，獨立工黨就退出了工黨。斯塔福特·克利浦斯爵士、安奈林·比萬、喬治·斯特勞斯和他們的同伙所發起的社會主義同盟，也在工黨外面活動。經過幾次協商之後，獨立工黨、社會主義同盟和共產黨的代表共同組織了一個聯合委員會，從事團結運動。從開始起，這就是一件困難的

事。哈里·波立特用極大的耐心竭力想使这事進行下去，可是这是一种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出席过一次委员会的會議，因此知道当时运动的情况。我們本來是为了团结工人运动而斗争，它的意义就是要争取工党。独立工党的代表对于一切問題都采取極左的态度，常常提出非常極端的建議，这种建議使得和工党接近成为不可能。哈里用一种溫和的說服态度向他們解釋，可是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員似乎处在一种政治麻醉状态中，从这一面看到那一面，对于当时的發展情况并不能理解。我們从來沒有真正取得諒解的共同基礎，也沒有取得使共同的斗争成功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互相信任。有一次宣布克利浦斯、布罗克威和我定于某星期天到东里和南安普敦去开会。我們三人从滑鉄盧同乘火車出發，不过不在同一節車廂里。这是什么团结的表現！我时常猜想当地人們在車站上等候我們的时候，看到我們分着三条路向他們走去，不知有何感想。他們沒有說什么，而且非常热烈地欢迎我們三个人，随后陪着我們到一家小旅館；在一个整潔而舒適的小餐廳，已經摆好了丰盛的滾热的午餐。烤牛肉（烤得真好），煮洋山芋，烘洋山芋，蔬菜，最后是放了很多果汁的棕色水菓布丁。我擦了擦手，准备动刀叉。“呀，我的乖乖！”我說，“这簡直是医生叫的菜。”我的两个同伴臉上帶着很厭惡的神情瞧着我。你們相信嗎？他們两个都是素食者，我只好拚命地吃。說句老实话，我吃得連站都站不起來了。我吃不下那个布丁。我告訴主人把它留在那里，等會議完了再來吃。克利浦斯感到不快，他說，“你胃里裝滿了脂肪是要害病的。”我笑了，閑談了一回烤牛肉和几次革命的事，可是我始終在怀疑，这两个人只吃一点素菜，怎样可能有热情？

法西斯和战争的烏云，在1935年的选举年越来越密了。1931

年日本侵略中國的东北，所用的技術和它後來襲击珍珠港一样。这件事在國際联盟提出的时候，英國政府派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为这种侵略行为“辯解”，他辯得真好，連日本代表也觉得用不着补充了。西蒙爵士处理日本的事比日本代表自己处理得还好。無論如何，日本的侵略已得逞，其他地方的法西斯狼也饑涎欲滴，躍躍欲試。羅馬的墨索里尼用他最美的（其实是最难看的）好萊塢式姿态大搖大摆起來，不断地由威尼斯宮的陽台上对愚蠢的黑衫党徒叫囂，这班党徒却没有先見之明，一点也不知道已經在為他們安排的苦杯。

德國納粹党徒正在操練着，并且已經开始蠢动。在前一年，1934年，苏联参加了國際联盟，全力支持保衛國際和平的斗争。它的外交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成为各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一大希望。他时常为爭取諒解与和平而進行辯护。他揭露了关于國联可以閉着眼睛不理会的局部战争的謬論。他說：“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在一个地区破坏了和平，整个世界迟早会被卷入漩渦。为了拯救世界和平，他努力工作——沒有人比他更辛苦。國联的失敗，我們不能責备他，也不能責备苏联。國联的失敗，我們必須責备英國。鲍尔溫和他的政府虽然口头上拥护國联，同时却削弱了它阻止侵略的力量。法西斯分子知道对國联不必恐懼，便往前直闖，好像國联并不存在。他們对每一个欧洲國家(除了苏联)愈來愈狂暴，愈來愈帶挑衅性。但1935年他們在法國和西班牙遭到阻碍，因为这两个國家的团结运动都很成功，它們都开展了偉大的人民陣綫运动，其中包括社会党人、共產党人和急進黨人，他們决定在1936年参加競选。若是英國也有这样的成績，整个欧洲的歷史早就改觀了。但是我們不能突破工党領袖的“彈性防綫”。有一个时期，他們認為我們是“不足

道的少数分子”而不值一顧，在另一时期，或者甚至在同一时期，又譴責我們，說我們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包办整个工人运动与工会运动。他們不顧当前可怕的警号——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仍旧不肯把進步力量集結起來；他們参加1935年競选时思想上也沒有取得勝利的打算，他們只想做一个“忠心的在野党”就滿意了，事实也証明他們确是如此。共产党因为急于尽量避免內鬨，以免削弱反对鮑尔溫政府的斗争，决定除了在隆达东競选的哈里·波立特和在西費夫競选的我之外，把所有其他候选人都撤回。西費夫的競选非常剧烈，同志們日夜工作。他們在礦井里、村庄里、礦工工会支部里、鄉区里、小鎮里工作，連任何小村落都不遺漏，同志們努力工作的效果不久就在整个选区里見到。

全國选举結果宣布后，鮑尔溫政府的連任使許多人覺得沮喪。隆达方面哈里·波立特得了13,665票，可是沒有当选。西費夫的結果是在最后一批里宣布的，在宣布的时候，党内同志和同情者欢天喜地。頓菲萊茵郡長公署計算票數，等到宣布共产党候选人獲得勝利时，引起了驚惶的現象，郡長赫姆弗遜是監票員，他更不高兴。他的职务是朗讀票數，把当选議員介紹給在外面等候的羣众。以前我看見他做过几次，他讀了票數后，和当选人握手，等当选人和落选人向監票員和他的同僚致謝并向羣众說几句话。但是这次对于我，他匆忙地——非常匆忙地——讀了票數，然后，竟一眼都不望我，很匆忙地溜开了这个(对他)不愉快的場合。但是这对于聚集在那里的工人却不是不愉快的。工人們不断欢呼。我們集合了六輛汽車，出動一次选区的勝利游行。选举的結果是下午很早就宣布的，勝利游行差不多到半夜才散，这是一个偉大的日子的偉大結果。我这时成了議會議員，

对党、对工人階級負着一切責任。电报和信件由全國各地來到費夫，第一批中有一件是和我素來很親暱的萊脫表弟兄們从培斯利寄來的，还有許多党外朋友的函电，其內容大半是政治性的，其中有一封是我的老友、很親密的同志赫倫·克勞福德寄來的，充滿了热烈的祝賀。

但是，在勝利游行之前曾經有一个挫折。我的競选事务代理人、市議員阿勒克斯·莫法特和彼得·柯里根在外面和羣众一同等候，准备把我高高举起，抬到等着的汽車那边去。我認得的有些同志性情要比阿勒克斯和彼得溫和，虽然他們不比这兩人好些。这兩人听到我已經由公署的旁門出來，并且已經在汽車里等他們的时候，你可以想像到他們覺得多麼不痛快，会講些什麼話。他們狠狠地責备我弄坏了他們認為是一次有意义的示威。不过更坏的事还在后面呢。高大、誠懇、精力充沛的彼得动身到格拉斯哥去，留給我嚴格的命令，叫我必須在第二天乘指定的一次火車到格拉斯哥去，有一个大規模的工人示威在皇后街車站等着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無从知道，可是我誤乘了另一次火車，到格拉斯哥的时间早了一个半小时。等到我应当乘的那一次火車要到的时候，車站上來了大批的人，警察在示威羣众和收票处之間的月台上，清除出一塊空地。那时我在附近徘徊，火車到了，我溜过那段空地轉到收票处，折回過來对着示威者走去，好像我剛下車的样子。我立刻被示威羣众認出了，他們發出了巨大的欢呼声。收票处的那一边是彼得、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彼得很急切地注意着乘客，可是找不到我这个新議員，后来他和新聞記者听到了欢呼声，赶到乘客的出口处，看見示威隊伍已經向附近的街道移动。我們在那里开了一个簡短的会，然后我們又走到我回培斯利去的公共汽車站。彼得这时对

我說的話是不能寫在這本書里的，他後來對這件事時常呵呵大笑。我回到培斯利家里之後，就等候在11月份第一次以西費夫議員的身分出現於議會。

---

---

## 第八章

在競選期間，我的對手感覺到潮流不利于他們，想扭轉這種潮流，因此故意惋惜地說我的當選是勞而無功的。“他將是孤立的，600人里面的一個，一個人在下院做不出什麼事來。”一個人沒有什麼用處這種說法或許有點道理，但是一個人有黨支持他，尤其是共產黨，那就大不相同了。因為共產黨員一旦當選，進了代表性的團體，黨仍是控制着他們的。批評黨的人時常說他們反對控制。但是他們現在却通過各種方式認識到控制和自由這兩個字面上相反的東西，却是相互為用的。如果我們要有自由，我們必須控制土地、工業和銀行，否則我們將聽憑壟斷資本家支配。甚至我們政治家里面的最反動分子，有時也認為有採用一些控制的必要。你也許會問這種控制對共產黨員怎樣實行，對個別黨員又怎樣實行？控制可以阻止置身公共團體中的黨員和不好的組織發生關係，使他們得以“自由地”執行選舉他們出來擔任的工作。

關於這種控制的必要與價值，只要了解一下工黨議會黨團的地位就可以知道。議會里有幾個工黨黨員與十分仇視工黨的組織有聯繫——有金錢的聯繫。很明顯，這種黨員在緊要關頭的時候是不可靠的，因為到那時候，他們就要為出錢給他們的組織說話而不會替工黨說話。這和某些工會允許它們在議會里的代表報銷費用不同，因為他們若是忠實地為自己的工會說話，不



会犯多大錯誤。我所說的是別种大不相同的联系。可是工党領袖們对那些人不聞不問，成了一个“人各为己”的情况，不管你謀取什么好处，你怎样干，都可以隨便。

共產党決不容許这种态度。任何公众代表不得受党外的組織牽制。党的控制保証代表不会有不良的牽連，使他們随时都能“自由地”为工人階級進行斗争。但是，除了讓他們自由地执行任务外，党还坚持要他們貫徹执行这种任务。这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公共团体里，会产生一种見了有敌意的場合便畏縮不前的困难情况。可是大家总是知道，党盼望党员在这种場合能采取行动，因为工人的利益要求这种行动。不但如此，你也知道，不管气氛对你有怎样敌意，在你离开这种場合之后，只要尽了你的責任，党是会把經過情况告訴工人的，所以不論你到國內的那一部分去，工人都願意鼓舞你、支援你，使你經得起未來的一切考驗。工人、党、代表——这是一个不会腐化的、不可征服的組合。任何腐化分子都不能参加这种組合。

我的对手說我在下院將陷于孤立这句话無論如何是錯誤的。我做了40年的鼓动者，我和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老前輩都很友好，有些人还和我有密切关系。有些年青的成員以前沒有見過我，但从別人那里听到过我，所以1935年11月26日我進下院就职时，有許多老友和不少新朋友都來欢迎我。老友之中有当初克萊德工人委員會里的坚毅勇敢的伙伴戴維·柯克伍德。我就坐在工党議席中戴維旁边的座位，从此我們这两个老搭擋又尽力活动起來了。尽管工党議會党团的某些反动分子怒形于色，尽管各方面竭力离間戴維，叫他反对我，我們这个搭擋愈來愈坚强，几年之后又添了生力軍——阿勒克斯·斯隆，他是亞尔郡礦工的代表，不但对苏格蘭的礦工和苏格蘭的人民立了功，就是对各殖

民地國家的一切被剝削人民也是有功的。

我被介紹給下院及議長之后，又參觀了地圖室<sup>①</sup>。這是下院圖書館的一部分，曾有一個時期被愛爾蘭黨占用，現在被工黨議員用作文書室。每當下院氣氛沉悶的時候，我們自己常常在地圖室開會——有時候會中的秩序非常紛亂。在這些討論會上最得眾望的主要人物是已故的杰美·華克爾，他年輕時是一個健壯的無產者，身高足有六英尺，很是魁梧。他是最有力最頑固地反對團結的人之一，他是貝文—達爾頓集團的支持者。但是由於他和我同是無產階級出身并具有同樣的無產階級意向，因此我們兩人在一起還是互相照顧，互相尊重的。1937年2月他雖然在工黨議席上發表了關於工黨的集體安全政策的一篇最出色的演說，但是集體安全事實上就是國際間和平力量的團結這一層，在他看來好像是和他的反對國內和平力量的團結并不矛盾似的。

地圖室開會時的討論技術要經過長時期的刻苦實習才能學會。你站在火爐前面，有人要你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某個問題或者關於蘇聯革命的某一方面。你老老實實地開始答復，但是他們却全在等着找你的岔子。你說了五六句話，他們就由每一個角度來駁斥你，你應付了這方面，可是在另一方面被拖住了。你的頭腦眩暈了，你的兩膝軟癱了，你想竭力站穩，可是沒有用。你只得走下來，完全被這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弄昏了。

不過我們并不是一直討論共產主義的，我們同伙里有幾個堅決相信靈魂的人。已故的歐內斯特·馬克洛就是最熱烈的信

---

① 現在這屆議會開幕后，我們被遷出了地圖室。這個房間現在已改為圖書館的參考資料室了。

徒之一。还有些人，比較不大热烈，也可以說不大虔誠。我們都很敬重欧內斯特，可是我对他們所談的“幽灵”掌故，从來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同志們中間有一个礦工編造——也可以說他想編造一个特別牽强附会的“神秘”故事。他說在他住的村庄有一个青年礦工，他和守寡的母親相依为命。有一天下午，这个青年在礦井工作的时候，發生了倒塌的事情，他和几个同事險些被压死，倒塌的地方离他們只有几英寸。試想想，煤往下塌时巨大的响声，震耳欲聾，灰沙使人窒息，而这个青年怎样呢？他轉过身去問一个同伙：“什么时候了？”就这样問：“什么时候了？”

他的伙伴好像在酒館里身体靠着酒吧櫃上似地回答說：“現在是3点50分。”（是的，先生，他就是这样回答的。我想他看了他的手表，或者从他褲子的表袋里掏出了他的金表。）好了，等到值班完畢，这个青年回家去。他一走進家，他的母親就跑到他面前，握住了他的手，盯住他的眼睛看，問他：“你在3点50分的时候出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問这句話，媽？”这青年避而不答。

“因为，”他的母親回答說，“3点50分的时候，我听到你在喊我。”

你看，故事就是这样的。講的人逗我說，“你能說明这个理由嗎？”

“当然能够，”我回答說，“你是在讀‘科西嘉弟兄’这本书。”

但是，这件事使我想起了星期六晚上我在犹斯敦路散步，等待星期日去开会，那时我没有主意，不知到哪里去好。我走到公誼会門口看到一張很大的告白，說那里即將开会討論“幽灵”。

在許多演講的人中間，我只認識一个人——漢寧·斯華弗。我看見告白上有“問題与討論”字样。我想这对我很合適，我要

進去和漢寧談几句。我在里面找到了一個座位——我是早到的人之一——很快會場就擠滿了，大多數是婦女。稍為等了一會，台上的人露面了，唱了讚美詩，先有幾個人講了開場白，然後主席介紹第一個演講的人，大大地替他捧了一下場。但是他似乎還不满意，開頭就告訴我們他在这門行業里是怎样一個偉大的人物，他所參加的核心組織有着怎样優良的質量，他還說他出版了關於高深的靈魂學的非常重要的書籍，然後他又在歷史和政治方面給了我們一點啓發。為什麼德國常常要戰爭？為什麼它是這樣一個粗暴殘忍的民族？他就會說明這些問題，而且他的話准會使我們吃驚。他說我們是否知道德國還在活燒女巫，而別國已經廢除了這種習俗。他說這些“女巫”事實上就是靈魂的媒介，德國活燒她們就是燒燬精神生活，因此只剩下粗糙拙劣的唯物論了。我听他講，看看听众的臉，對我自己說：“是這班人傻呢，還是我自己傻？”好比吃東西，他們坐在那里吞吃台上所講的話——要是說他們狼吞虎嚥地吃更恰當。這是怎麼回事！

其他演說的人一個個講完之後，漢寧·斯華弗發言。他用最優美的歐尼·梅恩式的姿態，一只手臂橫放在胸前，另一只手輕輕撫摸着下顎。他責備一些听众不該埋怨靈魂沒有感應。他說看來似乎他們應當責備自己。他們鼓舞靈魂沒有？他們談論靈魂沒有？替它們宣傳沒有？如果他們不替靈魂宣傳，它們就會不高興而不來了。他說：當我到薩伏埃去吃飯，有些人就到我桌上和我談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知道我會替他們宣傳。靈魂也是一樣，你替它們宣傳，它們就會來找你。

又經過了一些這樣的演說後，主席就告訴我們說：今天晚上對我們很有益處，很有啓發，在散會之前，我們再唱一首讚美詩。

“喂，”我插嘴說，“還沒有提問題呢？”

“沒有問題了，”主席告訴我。

“可是外面告白上說有問題和討論，”我說。

“你弄錯了，”他告訴我，“那說的是早會，不是說的晚會。”

我出去再看了一下告白，一點不錯，有三次集會，早晨、下午、晚上。只有早會才有問題與討論，我气得低声咒罵，恨不得把我的頭往牆上撞。一個晚上就這樣浪費了。

我在熟悉地圖室的一套花樣之前在議會里作了初次演說，這是比較容易得多的一件工作。在平常辯論的時候，你要碰機會，等議長叫你——你可能站在那裡一整天而還沒有引起議長的注意，但當你作初次演說時，你可以有機會去和議長安排你在什麼時候、用什麼題目發表你的初次演說。我和議長排定在1935年12月4日作首次的貢獻——對全國闡明英王的演說詞。在這個歷史性的(?)事件的前夜，當我正在下院吸煙室僻靜的角落里仔細地翻閱我的演說稿時，有兩個人來找我，一個是哈里·波立特，另一個是非常有修養的約翰·斯特拉徹。

我和哈里一同看我的演說稿，他提了一些建議來充實它，有一處我對哈里說：“這裡保守黨要插嘴，我將用下面的話來反駁。”

“但是，”哈里說，“他們可能不插嘴。”

“他們會插嘴的，”我說，“當我說到‘我們替工人說話’的時候，他們不會把這句話放過的。他們始終爭辯說他們是代表工人的，因為他們曾欺騙了一部分工人投他們的票。”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別人作初次演說時插嘴是違反下院公認的規則和禮貌的，我不知道初次演說應該簡短而避免引起爭論。不管怎樣，我在約定的那天被准許發言之後，我還沒有講

多少話，保守黨員就開始露出反對我的迹象。等我講到我曾指給哈里看的地方，他們居然不出我所料，不管是不是初次演說而出來插嘴。這一部分演說如下：

“我們在下院這一邊的人是代表本國工人，那些勤勞的流汗的人們，並且替他們說話的。（議員們說：‘我們也是這樣。’）噢！你們是替工人說話的，是嗎？（議員們說：‘是的。’）很好，我們倒要來瞧一瞧。礦工的領袖說，他們的工作在我國是最辛苦、最危險、待遇最低的工作。有人能否認這句話嗎？礦工們提出了一個要求。他們曾投票表決這個要求，贊成票之多是空前的。替礦工說話並代表礦工的我們要求把礦工的工資每天增加二先令。我們在議席上提出這個要求。現在輪到你們了，現在請你們說吧。你們自稱是代表礦工的人，請說吧。……”

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保守黨員願意替礦工說話，無論如何不肯給礦工每天增加二先令。他們不聲不響地坐在那里，工黨議員們在笑他們，嘲弄他們。

這是我第一個成績，得到工黨議員們的讚許，工人運動的許多老同志都誠懇地向我祝賀。

下院里的這種演講雖然重要，但當時還需要其他東西。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匪徒已經侵入阿比西尼亞。他們用重炮、飛機、毒氣屠殺準備不足和武器不良的人民。國際聯盟被迫譴責這種殘暴的侵略，宣布對意大利實施制裁。但是墨索里尼的英國朋友竭力破壞國聯的措施，保證制裁不起什麼作用。當時“石油”是一個大問題，是最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問題之一。墨索里尼有了石油才能進行屠殺，進行征服。若是沒有“石油”，他就無能為力。可是英國政府堅決反對制裁適用於石油。墨索里尼

獲得了石油的供应——要多少有多少。英國政府不但对于石油的制裁加以反对，而且我們忽然看到这样一件事：外交大臣塞繆尔·霍尔爵士（现在是坦普伍德勋爵）已經同陰險的賴伐尔拟定了一个文件，建議把阿比西尼亞的最大、最好一部分土地割讓給墨索里尼，以解决阿比西尼亞“事件”。这个“霍尔—賴伐尔公約”引起了全英國的憤慨，我們的党在各地举行集会时目觀群众日益旺盛的怒火，我在許多大示威的場合演說时也感覺到全國空前的憤怒狂潮。一方面在庄嚴的國联會場上宣布墨索里尼犯了無故侵略罪，随后又建議把被害國家的領土交給他，这是徹頭徹尾为侵略和暴力辯护，因此一般男女無不深感痛心。

我和党对这个問題采取了坚定的方針，因此我被邀去見阿比西尼亞駐倫敦代表馬丁斯博士，他对于霍尔—賴伐尔提案感到非常痛心。我向他保證这种提案决不会被接受，并說全國的情緒激昂是長期以來所沒有的，政府面臨着各处的反对呼声，也决不敢接受外交大臣的提案。关于这一点，我是正确的，可是在另外一点上，我說政府对于國联和石油制裁問題將采取更坚定的方針，我就錯了。我低估了鮑尔溫和他的伙伴的欺騙手段。他們把霍尔摔开了，表示仍旧效忠國联，可是拒絕遵循可使國联的意旨發生效力的唯一路綫。大量的石油还是供应給墨索里尼，并用种种借口掩飾这种支持侵略者的政策，这一國不可靠，那一國也不可靠。但是真正的理由始終要在英國去找——墨索里尼在英國的达官貴人中有很多朋友，他們害怕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旦垮台可能產生的后果。你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說，“如果法西斯垮了，共產主义就会抬头。”对于英國的一些寄生虫來說，共產主义的危險比法西斯要厉害千倍，因此，他們寧願要法西斯。

在这一切荒謬的論点中，以霍尔在不得不放弃外交大臣职位时所提出的为最荒謬。他被迫辞职的时候，像别人被迫辞职时一样，得到一个机会解釋他的措施。下面是1935年12月19日他在下院的告別辞中的一段：

“看來很顯明，如果石油被禁运，非會員國也有效地参加禁运，那末石油的禁运就可能迫令战争終止。假定石油的制裁因非會員國全部参加而發生效力，那末，从意大利抗拒的观点來說，情况会立刻轉变得更加危險。根据我們从各方面所得的报告，意大利將認為石油禁运是軍事制裁或是一种对它的战争行为，这是沒有一个負責的政府所能忽視的。”

霍尔承認石油的禁运“可能迫令战争終止”，这意思顯然就是沒有石油墨索里尼就不能繼續战争。但是，他又說墨索里尼要把这件事看成战争行为。那末怎样呢？他將會把整个欧洲卷入战禍。这样，我們得到一个論据，就是墨索里尼要是被剥夺了石油，就不能繼續对阿比西尼亞進行战争，这就会惹得他瘋狂地对英國、对欧洲發动战争！

恐懼，对战争的恐懼——这就是法西斯和他們的英國朋友手里最有力的武器，这种武器一次又一次地被法西斯侵略者利用，直到我們几乎陷入完全毀滅的境地。只是由于患着勝利狂的希特勒鑄成了大錯，我們才从鮑尔溫和张伯倫政府的罪惡政策里被救了出來，沒有被牺牲。

墨索里尼在英國具有法西斯思想的朋友的維護下，“征服”了阿比西尼亞，小家伙維克托·埃曼努埃尔做了新意大利帝國的皇帝。这一次冒險的成功給了欧洲各國法西斯力量新的鼓舞。所以在1936年初，他們便認為可以放心地侵略西班牙，來推翻由



民主选举所產生的人民政府，建立一个西班牙法西斯政权來代替它。法國和西班牙的進步力量鑒于周圍情况的發展，決定團結起來阻止法西斯威脅的進逼，為人民群眾尋求真正的進步。兩國的人民陣綫在競选中都得了勝利，各自組織了人民政府。法國政府領袖是利昂·布魯姆，他是一個非常懦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非常怕得罪有勢力的人，尤其是英國有勢力的財閥。西班牙人民政府有共產黨參加，它開始進行掃除窮困和文盲的偉大工作。這是一樁極難的工作，但是在它短短的存在時期中，毫無問題它已經為西班牙人民做了很多事。若是它能順利地繼續工作，它早就能使西班牙走入進步國家的前列了。但是這一點沒有實現。佛朗哥和他的法西斯黨徒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公開援助下，用一切近代武器襲擊人民政府。這些武器，以及陸軍和空軍，都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恣意供應。人民政府因為專心于提高西班牙全國人民的生活和教育水平，沒有能夠建立裝備精良的軍隊。但是人民響應號召，起來進行了戰鬥，雖然困難重重，但是如果他們有武器，還是能得到勝利的。人民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按照國際公法有權購買國防所需的一切武器。不過英國政府的政策非常狡猾，它陰謀援助法西斯分子而暗害西班牙的民主力量。“不干涉”——這是他們所用的虛誇的名詞。他們取得了其他各國（包括德、意、蘇在內）的同意。但幾個月之後，蘇聯鑒于德意兩國公開供給佛朗哥人力物力，就廢棄了協議，並聲明要竭力援助西班牙人民政府。不過，因為地理關係，蘇聯的物資供應遲慢而且困難，而另一方面，供給佛朗哥的各种物資却源源運到。

可是那時任外交大臣的艾登仍舊遵循鮑爾溫的“不干涉”政策，最不幸的是工黨在這個問題上也支持鮑爾溫政府。恐懼——

对战争的恐懼——被用作借口。格林伍德在工党會議上便唱这个調子。欧內斯特·貝文嚴厉地責罵那些主張援助西班牙人民的人。他說“不干涉”政策是利昂·布魯姆贊助的政策。這句話有几分是正确的。布魯姆不够坚强，应付不了已發生的危机。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一旦西班牙人民政府垮台，他自己的地位和他的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可是他还不准备对抗英國政府和它背后的有力的財閥。不过他也知道当德、意兩國公开地、窮凶極惡地在許多人和許多國家面前進行公开干涉的时候，这种“不干涉”不但在西班牙，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是背弃進步力量的。因此法國社会党里面的和他最接近的同事之一讓·朗格到英國來向工党領袖說明布魯姆的困难地位，恳切要求他們利用自己的声望使英國政府改变它的政策。但是“对战争的恐懼”支配着工党領袖們，因此他們在18个月的重要时期中，都緊緊地躲在英國政府政策的后面，讓法西斯在西班牙胡作非为。

共產党不是如此，党把它的一切力量用于支持民主西班牙的运动。我們屢次想联合工党“拯救西班牙”，一再想讓他們了解，讓全國人民了解，“保衛馬德里就是保衛倫敦”。后來他們認識到这个口号的正确意义。党內外的英勇的青年反法西斯分子受了党的感召，投效西班牙政府。这种投效的人不僅英國有，各國都有。一个正式“招募”站很快就成立了，由此出現了偉大的、永远光荣的战斗团体——國際縱隊英國大隊。关于这一个反法西斯的英雄隊伍对西班牙法西斯凶手联合力量的斗争情况，本書另有記載。这里我只想对那些用他們的热血使西班牙土地增光和那些回國后用其他方式仍旧繼續斗争的人表示敬意。沒有喇叭吹奏，也沒有無綫电和報紙宣揚，他們这些英雄們長途跋涉到西班牙戰場上去，有时要走过鄉村田野，有时要穿山越

嶺。法西斯已經在西班牙向歐洲的民主力量挑戰。而那些英雄們為了自由，最先給敵人以打擊；他們為法西斯的墳墓挖了第一撮土。

工黨正式的政策虽然是“不干涉”政策，但是很多工黨黨員，包括議會里的許多工黨議員在內，却全心全意地參加支持人民政府的運動。其中一個杰出的人物是著名的政論家赫·勒·布萊斯弗德，他領導組織國際縱隊，籌措款項，鼓舞并協助招募事宜。（不幸他在第一次緊要關頭時所作的貢獻，由于他在第二次緊要關頭採取的態度而化為烏有。當他活躍的時候，誰也摸不清他的頭腦。布萊斯弗德是一個偉大但是不可靠的人，他有那種人所公認的才能，但是沒有更大的毅力來配合，這是很可惜的。）

人民群眾都贊成西班牙人民政府，但是下院的景象完全不同。懦弱是工黨領袖的信條，狡猾欺騙是政府的政策。一些最囂張的保守黨員如亨利·佩奇·克羅弗特爵士、倫諾克斯一波伊德和其他許多人都公開支持佛朗哥。

西奧多·羅斯福有一次提起湯姆斯·潘恩，說他是“一個污穢渺小的無神論者”。但是潘恩非常潔淨，身高六英尺，是一個信奉自然神教的人，因此琪·威·福特用諷刺的口氣批評羅斯福那句話是“三個字三句謊”。亨利·佩奇·克羅弗特爵士提起佛朗哥將軍時說他是“一個勇敢的基督教君子”，這正和羅斯福前後媲美。當德國的俯沖轟炸機把奎爾尼加炸成平地時，詹姆斯中校費盡心機向下院說明法西斯野獸的高貴品質，企圖感動下院，他把奎爾尼加的毀滅歸罪于防守者。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把閃擊戰歸罪于倫敦市民。是的，在保守黨員中間，有不少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朋友。

麥克辛·埃利奧特的姪女塔文森·希漢有一次到麥克辛在曼

納的家去拜訪。當麥克辛的舞台名聲達到高峯時，年青的溫斯頓·丘吉爾和他的朋友弗·埃·史密斯都公開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放棄舞台生活後，成為同樣有名的交際花，先是住在她的罕普郡家鄉，後來在晚年住在曼納。她雖然並不熱心於政治，但時常有許多保守黨政客在她家裏，常去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丘吉爾。希漢曾在西班牙當一家美國報紙的記者，他完全同情人民政府。他到曼納後（當時西班牙戰爭還在進行），發現他結交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關於這件事，他寫了一本很有趣的書，書名叫做“雷聲與太陽之間”。我在這裡只談一件事：他的妻子極關心運送牛奶到西班牙去給西班牙兒童吃；她籌募款項，成績很好。有一天他們談到一艘裝載牛奶到西班牙去的英國輪船被擊沉的事，文森·希漢的妻子很憤怒，她激烈地發表她的意見，她要知道英國對這件事是否準備採取行動。同伙里有一個是保守黨男爵，同時也是議會議員，他很婉轉地對她說，“我們對於餵養赤色兒童不感興趣。”那時還有別的人在座，可是除了希漢夫婦之外，竟沒有一個人反對這種無情而殘忍的話，他們都是一些腐化分子。

但是，英國國內突然發生了一場大風波，使我們立刻丟開了別的事而來注意這場風波。財政大臣依照慣例把他的預算案送交內閣會議。第二天，在他還沒有發表預算演說之前，倫敦已經鬧得滿城風雨，那些投機分子已經發了一筆大財。下院起了恐慌，據說有一個內閣閣員洩漏了預算的秘密。這是指詹姆斯·海·托馬斯閣下，他曾經做過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總書記，並且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工黨領袖之一，後來在1931年和麥克唐納一同投入保守黨的懷抱。以前在“黑色的星期五”（運輸工人、鐵路工人和礦工的三角聯盟垮台的日子），共產黨的週報曾譴責過詹姆

斯·海·托馬斯和这件事的关系。他控訴該报誹謗。一个臉色嚴肅的審判官用非常嚴肅的口气宣布說：譴責一位議員背弃工人階級，明确地証明是誹謗。現在人們又責备他和他的朋友、議員埃尔弗萊德·勃特爵士洩漏秘密給“投机分子”，使他們有机可乘。这件事应当提起公訴，可是政府不采取这个办法。如果这件案子交給法院办理，可能有許許多多事情被揭露出來。詹姆斯·海·托馬斯必須辞去政府和議会的职务，勃特也必須辞去議員的职务。兩个人都自称沒有故意犯錯誤。等到离別的那天，上面提到的那位嚴肅的審判官对于嚴肅的鲍尔溫和下院的嚴肅程序都沒有說什么。鲍尔溫站了起來，他一时講不出話來——了不起的老家伙！他站着的时候，下院死气沉沉，好像禮拜堂中央放着棺材的情景。他說話断断续續，对已經發生的情况表示遺憾。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們只得分別了。然后他慢慢地、悲切地、把头向左右移动，他坐了下來，抹抹眼泪。

詹姆斯·海·托馬斯也玩了他的一套把戲。他的眼泪倒不假，是真眼泪——因为他不願意脱离政府和下院，事实上他曾几次企圖找个机会“回來”，但是，就是保守黨員現在也不要他了。他和首相講完話的时候，工党領袖、自由党領袖、独立工党領袖对于这件不幸的事都淌了几滴眼泪。于是我开口發言，想打破这种局面，一个保守黨員竟插嘴制止我，还罵我是“猪”。代表蘭納利的工党議員杰姆·格里菲斯跳起來要他道歉，并坚持要他道歉。那个保守黨員站起來对議長道歉。但是格里菲斯不滿意，逼着他和議長，直到他作了比較滿意的道歉才罢手。我那篇演說当时由党印成小冊，現在把有关部分摘錄在下面：

“若是你們不預备对他們兩人提起公訴，那就沒有一个人应当关在監獄里了。情况証据沒有像这件案子多的人还

被判处了絞刑。你若是能够否認这句话，尽管否認。否則就提起公訴；提起公訴的时候，你得知道这次所提起的公訴是暴露也是結束國民政府的統治，这种統治的基礎是貪污和背弃工人階級。（有人插嘴）你們笑你們自己干的好事吧，前殖民大臣今天走出議會的时候沒有笑，另一个人在那里坐下來的時候也沒有笑。（一个議員說：‘只有你一个人笑。’）

是的，我有权可以笑。多年來他做种种騙人的事；每当責难他的时候，他总是閃避着說，‘这是共產党人做的。我沒有做什么錯事，这是卑鄙的共產党人傳播的。’可是共產党人沒有傳播泄漏預算的消息，他今天不能利用共產党人來逃避責任了。要是这一次他能站起來，不那样哭哭啼啼地（这是他的老一套伎倆），而說：‘呀！这是卑鄙的共產党人傳播的故事，’那他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人呀！然而今天他却不能这样做，他現在是完了。我要說的是如果提起公訴——

一个議員說：‘猪。’

杰·格里菲斯先生說：‘遵守会场秩序。一个議員是否有权把另一个正在發言的議員叫做猪？’

議員們說：‘撤回。’

副議長（蓬納上校）說：‘这当然不是議會所許可的。’

議員們說：‘撤回。’

杰·格里菲斯先生說：‘我可否請求宣布那位用非議會所許可的辭句的議員名字？’

梅遜上校說：‘我向你道歉，先生，我用了那个非議會所許可的字。’

杰·格里菲斯先生說：‘先生：这位議員軍官先生已經向你道歉了，我可否請你要求这位議員軍官先生对下院道歉呢？’

副議長說：‘这位議員軍官先生必須正式撤回那句話。’

梅遜上校說：‘遵从你的命令，先生，我此刻就撤回那句話。’

加拉赫先生說：‘我知道我的态度很激动，所以我自己对于那种話并不覺得需要反对。既然这种話是对我說的，这就可以說明我沒有什麼貪污腐化的行为。我要求提起公訴……若是提起公訴，这一个政府，建筑在貪污腐化基礎上的政府，將腐蝕整个英國并把它毀滅的政府，很快就將罪有应得地垮台。前殖民大臣已經走了，我很高兴，如果他的伙伴也走，我將更高兴，一千倍的高兴。’”

詹姆斯·海·托馬斯走了，華尔特·倫西曼爵士來了。倫西曼在后來几年中在那些引起战争、促成战争的事件里起了很坏的作用，所以讓我們先來談一談他。他当时是貿易大臣，他提出一个議案，建議对那些沒有固定航綫的輪船的老板給予津貼。他本人和他的父親都从航运業發了几百万鎊大財，他的家庭也和其他航运業主的家庭一样，在第一次大战中和战争剛結束的几年里獲得了巨額利潤。船老板从航运業里榨取的每一文錢都用來擴充家產，而使航运業陷入病态和貧血狀況，不能应付危急情况，所以不得不找津貼。去年(1935年)曾經發給津貼，現在1936年再來一次。这笔津貼不向船老板——如倫西曼家族、埃勒曼家族、或休斯頓家族——取回几百万來付給，而是由群众掏腰包來挽救那岌岌可危的航运業。关于津貼，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不使用“家計調查”。利潤不論多寡，每一个船老板都可以得到一

份，只有对付“下層階級”才必須实施“家計調查”。津貼案二讀時，我發表演說，對於倫西曼一家所做的買賣，說了下面一段話：

“有一个公司名叫西郡輪船公司。1919年初，西郡輪船公司和穆尔輪船公司談判以1,804,000鎊購買后者所有的船隻——計共82,000噸，每噸合22鎊，這筆交易成功了。1920年3月西郡公司又買進苏瑟蘭輪船公司的輪船11艘，計每噸價格24鎊5先令。從這筆款項中，倫西曼公司——穆尔公司本來隸屬倫西曼公司——付給穆尔公司的股東每股（票面是一鎊）14鎊。西郡公司因為以高價從倫西曼公司買了穆尔公司、又買了苏瑟蘭公司的船隻後，就陷於破產。這些傢伙就是被說成是建立了這種偉大事業並且要我們對之表示尊敬的人。西郡公司破產的時候，倫西曼公司把當初以每噸22鎊的代價賣出的船隻，用每噸四鎊的價錢買回。這種事我們能容忍嗎？”

這些事發生的時候，倫西曼本人是否與公司有關係，我說不出來。但是我發言的時候，他坐在那裡不動聲色，眼睛向前看着。我當時說他“好像是一個泄了氣的菩薩，睜眼望着來世，對於當前發生的事却一點也不知道。”這句話使大家鬨堂大笑，可是倫西曼沒有表示。這位倫西曼後來成為勳爵，張伯倫曾經利用他去毀滅捷克斯洛伐克。

船老板領到了津貼，輪船仍在海上航行。沒有多久我也登輪航海——不是乘沒有固定航綫的輪船而是乘坐一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船。我到加拿大去，趁我的第一次暑期休會到那個大自治領去作巡迴演講。

在渡洋途中，和我同桌坐的是一些非常愉快、非常有趣的人。其中有兩個是溫布尔頓來的牧師夫婦，這位牧師的教堂雖



然在倫敦，但他們兩人都是蘇格蘭人，而且他的妻子的原籍是費夫。當我定艙位的時候，我叫船公司不要寫我是議會議員等字樣，因此船上沒有人知道我是什麼人——也可以說我自己這樣想。直到最後一天，我的那位牧師朋友提出這個問題，他說在我們分別之前，我們應當互相認識一下。“你不反對吧，若是我告訴他們你是誰？”他問我。

我說，“你認識我嗎？”

“喔，認識的，”他回答說，“我夫妻倆向來知道你，但是我們覺得你不喜歡遭麻煩，所以我們一直保守秘密。”

“好，”我對他說，“我想這是我生平听到的最愉快的事，這一次旅行我覺得很愜意，承情不少。”

他就把我的職業告訴了其他的人，我從他們的眼睛里看出他們的熱情。他們問了我幾個問題，我盡我所知回答了他們，可是時間太晚了，不能充分地討論這些問題。第二天我們到了蒙特利爾。

我離船上了碼頭，受到了盛大的歡迎，碼頭工人停了工，向從老家來的工人階級代表歡呼。一位青年同志來找我，他說，在人群的背后站着警察署長，他等歡迎場面完畢之後，要和我談談。我對碼頭工人講了幾句話之後，就走過去，看他為什麼要找我。原來他是蘇格蘭同胞，他要和我握手，歡迎我到加拿大來。我在蒙特利爾的一次大示威集會發表演說，可是看到一群猶太民族主義者在發傳單，說加拉赫贊成屠殺猶太人。真是荒謬！我設法在第二天會見了猶太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物，才把事情弄清了。不過他們寫的那傳單實在可怕，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傳單，後來我也沒有看到過。

我由蒙特利爾到了多倫多。這裡有一大群人在歡迎我，向我

高声欢呼，真像回到了格拉斯哥！我见到了党的组织部长赛姆·卡尔，他安排了我的行程。还见到了温哥华来的一个了不起的老同志伊文和其他许多人。这里和别处一样，有许多苏格兰男女同胞，他们用热情的苏格兰口音叫喊着，欢迎我到加拿大来。

那天晚上在馬西大廳有我的姊姊和姊夫，他們是从芝加哥来的，坐在場地前面座位上。由于不准我进入美国，因此她们不得不到加拿大来。后来我家族中的其他一些人也从芝加哥来到这里，另外两个极知己的老朋友由底特律来，他们和我很愉快地在温莎（在底特律渡口的对面）住了两天。我在馬西大廳周围一看，看见阳台上有家乡培斯利隔壁邻家的两姊妹，我用手指下面，她们就往下看，看见我的姊姊，我的姊姊也正向上看。她们赶到下面来，拥抱了一下，洒了一两滴眼泪，然后我们才开会。

横穿大陆到温哥华，路上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见到了多年的老友，他们这时候都有了新的家庭，但都一直渴望看到祖国的“亲热的面孔”。我在西费夫的时候，许多年中曾受到一位矿工同志乔迪·斯托特夫妇的招待；他们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天早晨刚过六点钟我到了埃德蒙顿。这样早的时间就有许多工人在火车上等候我，站最前面的就是乔迪·斯托特和威廉·寇克尔，这两人都是几年前离开费夫到加拿大来的。当地的同志告诉我在麦克唐纳旅馆里有一套房间留给我——不但有卧室和浴室，还有接待室；要来找我的人非常多，因此他们还安排了一个接见客人的时间。但是乔迪·斯托特不让我到麦克唐纳旅馆去。他说，“我的妻子已经为他准备了早餐。让他跟我去吧，我负责叫他按时到旅馆去接待客人。”这件事就这样办了。1919年，我曾为了乔治广场的事要受审讯，因此就去找目前已经去世了的老友华尔特·李奇曼律师，请他做我的顾问。审讯的前后我时常到他的

事务所去。他有一个很好看的速記員——身材高、溫柔、真正美丽，可惜有点高傲，她当时的确具有使一个女子自負的一切条件。1920年初她脫离了李奇曼事务所到远东去找她的未婚夫。她和她的丈夫就是这次在埃德蒙頓的麥克唐納旅館里最受欢迎的客人——这时他們又在“远西”了。世界是很小的。还有几个客人使我化了很長時間接待的是一个三人小組——一位老太太，她是阿尔伯达著名的政治人物，一位是阿尔伯达省議会的“社会貸款問題”委員，还有一位是关心石油業的英國軍官。他們要談一件关于美孚油公司和埃伯哈德的了不起的事件，阿尔伯达大片油田快要荒廢，美孚油公司对这些油田已經取得購買之权。真的，有一天晚上我到梳楼口礦区去时，別人把那片油田指給我看，我看見油田正在着火。但是我不願意牽連在油公司的微妙的政治关系里面，因此我不願参加他們的討論。

在尼亞加拉瀑布城附近的苏罗尔德，几个培斯利來的老友已經住在那里多年，自从1914年初以后我沒有見過他們。有一天晚上，我要到安大略省的哈密尔頓去演說，第二天晚上，又要到离苏罗尔德几英里的聖加薩琳去演說。賽姆·卡尔接洽好用汽車送我到哈密尔頓。这是一輛矮矮的双門篷車，司机是一个喜欢开快車的，这条路是駕駛汽車的人个个喜欢的路——又直又寬。我們开着車一点不顛簸，賽姆坐在司机旁边，我坐在他們后面。賽姆回过头來对我說：“我們現在的速度是60公里，威利，你覺得怎样？”

“很好，”我回答說，“像坐在一張安樂椅里一样安穩。”

过了一兩分鐘，他又回过头來对我震震眼睛。“現在我們开70公里了，威利。”

“噢，”我說，想挖苦他一下，“你能开80公里嗎？”

“当然能，”他回答说，“我们这位是加拿大最好的司机。”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警笛声，一个骑摩托车的巡警在后面追赶我们。我们停下来，他停在我们的旁边。“你知道你干的事吗？”他问司机。司机装做莫名其妙的样子，回答说，“不知道。”“你开73公里。”

“决没有，”司机说。

“不要强辩，”巡警训戒说，“我检查过了，你没有理智吗？胎要是爆了怎样？那时候你怎么办？”司机向他说明车上有一副新胎。“可是新胎也会爆的，”巡警很聪明地说。“拿去吧，”他又说，同时给了司机一张字条，第二天早晨司机不得不到市政厅去付十元罚金。他这样做是想给一个英国议员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恫吓他一下。可是那天晚上开会之后，我建议不必回多伦多，也不必在第二天晚上再从那儿到圣加萨琳去，我要他们送我到苏罗尔德，到我的朋友那里住一夜，然后由那里到圣加萨琳去。他们同意了。我们在半夜里到了苏罗尔德，经过打听才找到了我要去的屋子。多热烈的欢迎啊！不但如此，我听说圣加萨琳的同志们知道我有朋友住在苏罗尔德以后，就早已到他们那里去请他们在我到达圣加萨琳的时候来见我，可是我赶在他们前面了。我各处走完之后，就回去看他们，承他们殷勤招待，使我在离别时恋恋不舍。

我到温哥华的时候简直精疲力竭了。在中途，差不多在每一个城镇我都发表了演说。以前在多伦多火车站迎接我的伊文同志已经比我先走一步，他准备同所有那些年青小伙子一道在温哥华欢迎我。晚上的集会是在一家戏院里举行的，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这里的情况也很像格拉斯哥，戏院里到处都是苏格兰口音的叫喊声。我受了听众的感动，把我所能讲的话都

講了出來，講完之後躺在椅子上，疲乏極了。我聽到主席請聽眾出去，越快越好，因為還有一批聽眾等着要進來。請想一想我聽到這話時的情緒吧。我只得僵立着從頭再講一次。那是星期六晚上的事。星期日我擺渡到溫哥華島，下午我在坎伯蘭演說，晚上在南納莫演說，星期一晚上在維多利亞演說。星期日晚上我睡在南納莫一家旅館里，旅館主人是考頓畢斯人。兩年之後，當我在考頓畢斯的大街上走的時候，街那邊有一個人對我叫喊。我掉頭一看，吃了一驚，原來他就是南納莫我住的那家旅館的主人，他是回家來探望兄弟的。

這是一次長途旅行。在這時期內，我不斷聽到關於英王的消息。事實上，我在離開加拿大之前就看過一些美國的小報，它們公開討論英王和華莉·辛普生夫人的婚事。美國全國都知道這件事，可是這件事卻對英國人民小心翼翼地隱瞞着，不露一個字。我回國後到各處去問是否有人知道這件事。有人說這完全是虛造，一點事實沒有。然而這件事忽然在全國暴露了，這是約克郡的一個牧師燃起了導火綫的。我們皇室的高貴道德傳統和准則因為一個離婚的婦人要做皇后而顯然受到了威脅。這樣的事叫人想到就覺得可怕！若是讓這樣褻瀆神聖的事發生，礦工就不能挖煤，工程師也不會製造渦輪機了。要挽救國家大難，英王必須遜位。把他驅逐嗎？呵，不能那麼野蠻，一定要講些禮貌。因此，年老的斯坦萊（鮑爾溫），這個最忠於皇室的斯坦萊，在擠滿了人的下院里站起來講述這件可怕的事。下院里忠心耿耿的大人先生們，在1935年宣誓效忠英王，在1936年就忘了宣誓的話而對他下解職令了。現在，他是溫莎公爵，他和他的夫人——以前的華莉·辛普生夫人——成了地球上的流浪者了，但他們決不會沒有生活費用。就在流浪的時候，他們也可以考慮

一下鼓舞着我國資產階級的忠誠的本質。資產階級只有一個神、一個皇帝，他的名字就叫財神。英王在遜位之前，曾經到過威爾士，目睹礦工的生活，並且為了他們的貧困和缺乏照顧，曾經高聲疾呼地抗議。這件事對於他的遜位實在比約克郡的牧師所提出的“道德”問題重大得多。

---

## 第九章

我由加拿大回國，還來得及到愛丁堡去看看10月5日開幕的工黨會議。我相信這是工黨召開的最壞的一次會議，集體票從來沒有這樣惡意地被濫用過。西班牙的戰爭正在極端殘酷地進行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經公開參加戰爭，問題已經不僅是供應軍火給佛朗哥了（他們還在這樣做）。墨索里尼已經派了意大利軍隊到西班牙，由意大利軍官（不是西班牙軍官）指揮。希特勒也派了納粹空軍肆無忌憚地轟炸平民，情況之慘現在是我國人民所熟知的了。蘇聯也運送少數軍用飛機到西班牙，但是它們是由西班牙政府管理和指揮的。關於這些飛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而且的確是事實。一些同情人民政府的英國議員到西班牙去竭力鼓舞西班牙人民，其中有幾個是工黨議員，也有一兩個是年輕的保守黨員。當納粹轟炸機空襲馬德里，飛機在低空飛行時，忽然出現了兩架戰鬥機，速度極快。因為在低空飛行，所以機上的紅星很容易識別。其中一個年輕的保守黨員喊了起來：“這是我們的！”他看到它們迎擊的時候，口氣里面頗有引以自豪的意思。

工黨會議的代表對於西班牙情況非常關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經向全歐人民挑戰，只有蘇聯已經應戰。但是，前面已經說過，蘇聯的物資要經過半個世界才能到達西班牙。鮑爾溫政府拒絕承認西班牙政府為了保衛自己而有購買軍火的民主權利，

工党領袖都支持鮑爾溫。在愛丁堡會議上，阿瑟·格林伍德站起來發表演說，為主張繼續執行這個致命政策的提案辯護。他竭力強調對戰爭的“恐懼”，至於他所宣揚的政策事實上就會使戰爭不可避免這一點，他卻沒有那種智慧去領會。唯有在這一時期和蘇聯聯盟，採取強硬而堅決的行動才能制止戰爭。查爾斯·特里維廉爵士在辯論時說，“今天若對西班牙採取明哲保身的政策，就是等於要在歐洲再建立一個法西斯國家，使戰爭不可避免。”可是找不到強硬而堅決的人。代表們努力爭取改變政策，但整個執行委員會的有力人物都反對這種意見。最後，集體票以壓倒一切的力量為執行委員會和鮑爾溫帶來了勝利。表決結果贊成執行委員會的有1,836,000票，反對的有519,000票。

兩天之後，西班牙的兄弟代表們到了，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們發了言，把局勢以及遭到的犧牲和痛苦情況對大會代表們清楚地說明以後，會場上引起了高度的激動，許多代表要求重新表決。執行委員會驚惶失措，艾德禮和格林伍德匆忙趕到倫敦去，因鮑爾溫不在而見了代理首相張伯倫。他們回來之後，就通過決議，要調查破壞不干涉協定的情形，如果証實，就廢止這個協定。請想想吧！意大利軍隊已經在西班牙，納粹轟炸機在摧毀村鎮，而他們卻要求“調查”所謂破壞協定的情形。什麼都可以，只要避開現實，避開因為現實而需要擔負的責任。他們竟說要“坐在政府的門階上”，直到他們滿意為止。想想看，這些對共產黨人那樣傲慢無禮的仁人君子卻寧可坐在唐寧街的石階上！這就是這些人所認為的政治果敢精神，而就在這個時候，國際縱隊的青年們因為真正了解西班牙的局勢的意義，而在戰爭中獻出自己的生命去和黑暗的力量鬥爭！



西班牙的兄弟代表們使执行委員會感到为难，但同时它却利用他們。議程上有共產黨參加工黨的問題，許多代表準備就這個問題發表演說。但是执行委員會援用議事規程，借口要留出時間讓西班牙兄弟代表發表演說而中斷了辯論。集體票再一次解決了這個問題。結果反對共產黨參加工黨的有1,728,000票，贊成的有592,000票。這次表決和對西班牙政策的表決的相似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愛丁堡會議不但在西班牙問題和參加工黨問題上遭到失敗，它還故意破壞了經過多年艱苦努力而建立起來的青年運動。工黨青年團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樣一個運動是有充分希望成為一個對全國青年具有很大吸引力的聲勢浩大的青年運動的。但是，正因為他們年青，所以工黨青年團是進步的，而對於工黨执行委員會，“進步”只有一種意義——青年運動漸漸“沾染了共產主義色彩”。投集體票的辦法這一次又用上了。青年運動的全國諮詢委員會被解散，他們的報紙“新民族”被停刊，整個青年運動被消滅了。在一次會議上做了這樣多的壞事，可以說是一個記錄——壞到不能再壞的記錄。

我不知道工黨領袖是否考慮過他們在愛丁堡究竟干了些什麼，是否考慮過他們若是走了別的路綫，就可以避免後來的不幸和苦難。

工黨領袖不但破壞了青年運動，而且若不是工會經常繳納政治經費，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就會把工黨也破壞。工黨在黨員人數大大減少的時候，就是依靠這種繳納的政治經費來維持的。他們對共產黨的恐懼以及在遇到一切政治活動時就患上嚴重的精神病使他們的判斷力受這樣大的影響，以致他們不惜使自己的運動陷入政治上萎弱無能的狀態。他們不惜一切

代价要保持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友好关系，而且始終表現出他們作为溫和的、完全正統的政治家的可靠性。因为和共產党人發生任何联系都会危害这种友好的社会关系，所以只要能使工党避开这种沾染，無論用什么办法都是許可的。这使得全國各地的工党区組織的組織部長不是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推动黨員的活动，而相反地是不断奔走來阻止黨員活动。譬如說，有一个地方組織了一个房屋委員會，当地工党組織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工作，而区組織部長一听到这件事，就立刻要求把代表撤回。为什么呢？因为委員會里面有共產党人。所有其他类似的活动也会有同样情形。而在工人运动的初期，这些活动是工党取得羣众支持的方法，現在所有这些活动都成了“忌諱”。工党地方組織决不可以参加共產党有份的任何政治活动，而由于共產党在一个地区內是每一种政治活动都参加的，結果工党地方組織就不得進行任何政治活动。有些人常常抱怨黨員在不断减少，这有什么奇怪呢？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它們的活动即是沒有真正死亡，也已經到了垂死状态，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就拿領养老金的人來說吧。1936年12月，費夫的劳克吉萊有一个人叫約翰·格雷，一生致力社会福利事業，对于老年的艰难困苦，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决定联合几个坚定的支持他的人（連他的朋友劳克吉萊的魯·彭曼和凱尔蒂的彭曼夫人在內）把养老金領取者协会維持下去。爱丁堡有一个全國性的委員會，可是很不活躍。約翰·格雷在費夫把事情推动之后，又到爱丁堡去活动。因为我在競选时談过养老金問題，他就請我帮助他在費夫組織一个領养老金的人的团体。我全力协助他和他的伙伴。这是一个完全非党派性的組織，我從來不知道究竟約翰·格雷是自由党还是工党——我從來沒有問过他。工党支持他嗎？不。費夫的工党組織事实上想自

已建立一个領养老金的人的团体，但并不是因为他們需要这样一个团体而是为了要破坏另外的一个。他們的企圖悲慘地失败了。我們組織的团体在費夫發展得極快，它發展到蘇格蘭別的部分，然后又發展到英格蘭和威爾士。老年人做了巨大的工作，他們進行宣傳，會見議會議員和內閣閣員。养老金的增加就是他們工作的成果。虽然許多工黨議員替老年人的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幫助他們組織起來，工黨本身却從來沒有对养老金領取者協會正式給予一点幫助。1944年加的夫發生的一件事情就突出地說明了工黨官方不容許这种事的态度。我有一次到南威爾士去出席週末會議，又被邀請于星期一下午到养老金領取者協會分会演說。講完之后，一个工黨市議員動議向我致謝。当地工黨負責人就提議开除他的黨籍，但是因为这事引起了大騷動，他只好撤回他的意見。羣眾屢次舉行大示威，并派代表團到下院去。可是总有人在背后說：“避开他們，这是共產黨組織的。”

在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就有和共產黨人發生关系的危險。只有运动死亡，才能使工黨里的神經病患者覺得安全。

在工黨舉行了暗淡的10月會議之后，共產黨、獨立工黨和社会主义同盟(斯塔福德·克利浦斯爵士等一班人的团体)开始會談進行联合斗争來爭取工人运动的團結問題。1937年1月，它們向報界發表聲明，說明團結的必要以及可能達到的目標。2月24日放了第一炮——在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廳舉行大示威。這一個壯嚴的集會場所往年也有過許多了不起的政治示威，但是决沒有比這一次更有希望和更加热烈的了。哈里·波立特、斯塔福德·克利浦斯爵士和馬克斯頓各自提出團結的保證。全國各主要中心城市接着也舉行了同样的示威，它們所得到的支持

無疑地證明工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是要求結束使工人或多或少地變成無能的那種分裂狀態的。

沒有多久，共產黨和獨立工黨之間發生了糾紛，而且隨着西班牙戰爭的發展而尖銳化。共產黨竭盡全力爭取支持人民政府和加強國際縱隊，而獨立工黨却聯合了巴塞羅那一個反對政府的團體，用一個古怪的“聯合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黨”的名義活動。他們里面當然和獨立工黨一樣不會有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們趁人民政府十分英勇地抵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打擊的機會，用各種牽強附會的口號，在後方打擊人民政府。獨立工黨的發言人說，人民政府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府，所以他們拒絕支持它——這就是每當張伯倫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讓步時都堅決支持他的人說的話！在西班牙問題上，麥克戈溫先生有一個特別臭的記錄，這件事獨立工黨當然也牽涉在內。他是作為那個莫明其妙的政黨的代表到西班牙去的，他的兩篇報告都被接受了，而且被大張旗鼓地宣傳了一下。1936年12月，麥克戈溫第一次到巴塞羅那，回國後於12月13日（星期日）在格拉斯哥市政廳報告。這個報告後來用“主教們為什麼要支持佛朗哥”做標題印成了小冊子。這個報告和小冊子給西班牙政府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它按照反動的天主教報紙的願望把重點放在宗教方面，使許多天主教徒的情感非常激動。下面是摘自麥克戈溫先生報告里的一兩段，他描寫了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的一些恐怖行動之後，就這樣說：

“這些罪惡行為有西班牙的主教和神父推動。我有確實證據。這張照片是由一個摩爾人那里繳來的步槍，上面有一個聖心標記。這是一個彈藥袋，上面畫着一顆聖心。”（報告第四頁）

“教会本身已經成为資本家所有和進行剝削的机构了。”(第六頁)

“現在你懂得为什么西班牙的教会要和法西斯分子联合起來嗎？其中的真理是：法西斯运动就是由教会產生的。”(第八、九頁)

1937年1月9日“天主教先驅报”这样說：

“麥克戈溫的政治主張  
異乎尋常地暴露了他的無能  
对狂妄說法的檢查和答复

格拉斯哥在啞剧季節(聖誕前后——譯者)轟動一时的次要人物之一，就是代表希特爾斯頓的議員麥克戈溫扮演的角色。如果他不是無知，那就是他故意欺騙羣众。”

1月16日“天主教先驅报”又說：

“麥克戈溫以为羣众是無知的。

麥克戈溫不能清楚地思想，他故意用無聊的字句來迷惑和欺騙人。

能不能設想一个議員竟是这样一个騙子？”

上面不过是摘自天主教報紙的寥寥几段話，当时麥克戈溫把这些報紙称做“無賴報紙”。

在倫敦的錫爾弗鎮也准备举行一次集会，廣告上說明由麥克戈溫主講，講題是：“西班牙的教会”，但是他沒有能去，就叫同事馬克斯頓替代。馬克斯頓剛走上講台，會場上立刻大乱起來，他連說一句話的机会都沒有，人們乱叫乱喊，会只好不开了。后来在克萊德班克集会时，他們不但在會場上表示抗議，而且据報紙消息，許多听众还跟着麥克戈溫到公共汽車站，用嚴厉的威脅态度对待他。全國各地也有同样的抗議。看起來情况对独立工

党非常不利，似乎他們曾經答应了什么——当然那是独立工党所不願意的。現在我要請讀者特別注意1937年1月2日的“前進”周刊里的一段話和麥克戈溫报告里的另一段話。下面是“前進”周刊里的一段：

“一个声音宏亮的人高喊：‘談吧，約翰。这是你最后一个聖誕節了。我們會送你到以前送約翰·希南去的地方。’麥克戈溫傲然回答說：‘随你們的便！我就是有一千个議席也願意为这件事全部放棄。在我看來我的自尊心要比國內的任何席位重要。’”

下面是麥克戈溫报告里的一段：

“就是过最低的生活，每天也需要十个比塞大(西班牙銀幣——譯者)——而教会只給这些農民兩個比塞大。每当人們为了改善生活而積極斗争时，教士就罵領導人是莫斯科收買的人。反动分子时常用‘共產党人’字样來引起偏見。”

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麥克戈溫是怎样利用这个竅門的。他又到巴塞罗那去了一趟，从“联合馬克思主义者工人党”的領袖那里听到了一个新的故事，这故事載在麥克戈溫第二次回來之后所發表的一本名叫“西班牙的恐怖”的小冊子里面。这种“恐怖”应当由誰負責呢？是不是麥克戈溫所說的在西班牙產生法西斯主义的教会呢？是不是替摩尔人祝福还答应替他們在天堂里保留一处特殊地方的主教呢？不是的，先生。这是小冊子的里封面全文：

“西班牙的恐怖

共产国际

如何破坏工人阶级团结，

中伤反佛朗哥斗争，

并压制社会革命。

議員約翰·麥克戈溫著”

接下去是一則驚人的故事，里面說到秘密監獄、秘密酷刑、暗殺，一切全是由莫斯科直接派來的秘密警察干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秘密警察最初企圖用誹謗來破坏每一个正直的工人階級領袖的名譽，然后就進行逮捕、綁架、酷刑和暗殺。被这个殺人托辣斯殺害的人現在都埋在巴塞罗那、瓦稜西亞和馬德里。”

你不得不承認这种故事很生动，那末結論是什么呢？麥克戈溫又說开了：

“根据我对共产党策略的研究和經驗，我深信要是帮助他們在工人运动中獲得立足点，就是一个罪惡而愚蠢的行动。至于我，我不能寬恕他們的行动或者替他們的行动說情。人类的尊嚴要求揭露他們的殘酷手段。……社会主义如果就是莫斯科强加在別人头上的那些东西，我就不要它。”

下院的保守党反动分子看到这个卑鄙的作品發表的时候，簡直高兴得狂叫起來。藍姆賽上校站了起來，拿起这本小冊子搖晃一陣，要求每一个人讀一讀它。阿斯特夫人穿过大廳走到我坐的地方，手里拿着小冊子，她說：“你看过这本揭露共产党人的書嗎？”我說：“走开！走，快走。”她四面望望，对杰·杰·戴維遜說：“我不过要他看看这本小冊子。”戴維遜回答說：“你为什么不守在你那一边，你知道他不願意和你打交道。”她回到自己的地方，手里还握着那本“揭露共产党人”的小冊子。被麥克戈溫称作“無賴報紙”的“天主教先驅報”对回心轉意的麥克戈溫大捧

起來，他現在不是“啞劇季節轟動一時的次要人物”，也不是一個“蠢物”或者“騙子”了，他突然成了一個開明人士，他在看出了共產主義的危害性以後，想法要他的同胞提防它。在第一本小冊子里麥克戈溫說：“反動分子時常用‘共產黨人’字樣來引起偏見。”第二本小冊子却得到各處反動分子的支持。不久，他竟能訪問納粹德國，竟能“榮幸地”見到一些納粹官員，據他對下院說，其中有一個官員請他（麥克戈溫）代向卡扎勒特—凱爾夫人問好；卡扎勒特—凱爾夫人是保守黨議員，和那個納粹官員有朋友關係。

1937年復活節我趁休會的機會到前後方去看看國際縱隊。我由加泰羅尼亞到巴塞羅那，看到一班無政府主義者和“聯合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黨”的人高視闊步，好像他們是上帝一樣。他們最關心的事就是宣布加泰羅尼亞獨立，使加泰羅尼亞脫離戰爭，儘管整個西班牙的命運要取決於愈來愈靠近馬德里的前綫。加泰羅尼亞同西班牙隔着一條山脈，向來堅持它有獨立權，對馬德里的君主政體一向有憎恨情緒。就是因為有了這種情緒才使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在加泰羅尼亞廣泛地發展。“聯合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黨”也正是利用這種情緒來使人民政府的繁重的任務更加難於完成。我經過巴塞羅那的時候，那地方好像是擠滿了人的度假勝地，而不像是進行着激烈戰爭的國家的後方。（在這個戰爭里使用着新的、可怕的法西斯技術；在後來的年代里人類所不得不忍受的苦難都是西班牙已經經歷過的。）加泰羅尼亞的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在西班牙戰爭爆發之前，已經舉行過一次聯合會議，把它們的力量合併成為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這一個聯合政黨對無政府主義者、“聯合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黨”以及所有的分裂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它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可以



由那些力量后来企图在巴塞罗那发动的叛乱来证明。叛乱很快就失败，就是这些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巴塞罗那进行工作的结果。但是，这个所谓“起义”的寿命虽短，却造成了极大损害。政府正需要每一个人在前线的时候，不得不抽调一些极其需要的而且受着强敌牵制的部队去防御后面来的攻击。毫无疑问，这次的所谓“起义”是配合当时马德里前线法西斯的强大攻势的。

我由巴塞罗那坐了汽车穿过山岭沿着一条宽阔平滑的公路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瓦稜西亞去。一个同志开车，还有一个同志坐在他的旁边，把一枝步枪横放在膝上。他们告诉我路上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可是在我们一路开过去的时候，我却忘记了那枝步枪和它的用意。这是西班牙汽车旅行的一个很理想的日子。在路的一边是一丛丛的橘树，金黄的果子被太阳照得閃爍耀目；那一边是地中海的碧綠的海水，向科西嘉和意大利的方向伸展着。我向來认为苏格蘭的高地和島嶼的“風景之美無与倫比”，但是这种信念现在是第一次有点动摇了。西班牙的山岳和地中海沿岸風景的秀丽是不亚于任何國家的。

我在瓦稜西亞遇见几个党内同志，他们都担任着负责的工作，这使他们很少有什么空闲的时间。战争问题，即令是在法西斯破坏中也必须解决的建設问题，运输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居很重要地位的教育问题，这一切都需要不断的努力，不许有一刻松懈。我们有一次半夜开会，到会的人里面有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她是西班牙人民的卓越领袖之一，有着流露出刚强性格但很美丽的女性的脸，一对热誠而富于吸引力的眼睛。她说话的时候，可以听得出在有力和悅耳的声音中有着充沛的精神。这样就很容易使人体会到她为什么在西班牙全国各地以“热情之

花”著名。現在，她和其他的人將回到西班牙去，以便完成他們在法西斯利用西班牙作為第二次大戰的序幕之前已經開始的偉大的任務。

我在瓦稜西亞耽擱了兩天之後，又被用汽車送到國際縱隊的總部和根據地阿爾巴塞特，路上我們經過幾個村莊，看到一些狹窄的街道；古老的刷了石灰水的房屋，有許多因年久失修而幾乎要倒塌。不錯，有工作，有許多工作要待人民政府去做，如果有可能去做的話。我在阿爾巴塞特遇見許多青年，他們有的在戰壕里呆了很久時間之後正在這裡休息，有的已經休息完畢，正準備回到前綫去。他們都是了不起的青年。有一個著名的電影明星——銀幕上的一個作威作福、殺人越貨的道地的海盜——曾經來看過他們，他們在談到當時那種情況的時候，不由得盡情大笑起來。靠近總部的一所舊房子已經拆掉，屋基已經挖掘好，準備重新建築。那位電影明星叫幾個青年和他一起站在挖掘過的地方，眼睛向敵人的方向注視着，大拍其照。這真是很好的戰壕代替品！

但是還有一位同志，他的名字在我們黨的歷史和英國歷史上將永垂不朽。的確，正像人們常常說的一樣，在英國政府正在諂媚法西斯的時候，國際縱隊英國大隊的青年們挽救了英國的榮譽。其中最傑出的是華爾特·塔普塞爾，他的勇敢、機智和同志友愛精神，使他受到全縱隊每一個人的器重。他是一個政治委員，最優秀的政委之一。遇到青年們有什麼不如意的事，他隨時都準備和他們談談。最重要的，他隨時準備和他們共危險，冒只有最勇敢的人才敢冒的危險。到最後一戰的時候，法西斯軍隊擊敗了力量弱得多的人民政府軍隊，有人目覩“塔比”（塔普塞爾的暱稱——譯者）被法西斯圍住，戰到最後一息。待英國和西班牙

情况好转之后，人們將永远記着“塔比”，尊敬“塔比”，因为“塔比”对偉大的自由事業作出了貢獻，为它牺牲了生命。

我和弗萊德·柯普曼及“塔比”三人离开总部到战壕里去。战壕就在附近一座矮山的山脊上。上山时偶而听到隆隆的迫击炮声，也不断听到子彈掠过时的嘶嘶声。对于初次听到的人說來这是一种恐怖的、不愉快的声音，我本能地把我的头垂到兩肩中間。柯普曼笑了，“怎么回事，威利？”他問。

“我不喜欢这种子彈發出來的声音，”我回答他。

“不要理会，”他說，“你如果听到它們的声音，你就沒事。坏事的倒是你沒有听到声音的子彈。”

我們走進战壕，受到青年們的热烈欢迎，这使我深深感动。消息傳了出去，他們全都來到了山腰，圍成一个半圓形，这时候我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这是一次痛苦的經驗——背后是一排十字架，我們許多勇敢的青年就埋在那里；在我面前是正在進行着战争的人們，但是有許多人是永远不会离开西班牙的了。我講話的时候，心里始終覺得十分沉重。我講完后，大家唱國際歌，然后青年們高呼，保證斗争到底。我永远記得这次的情景和那些勇敢的青年同志。

在英國大隊旁边的战壕里，是由美國來的“林肯”大隊。我走过去和他們談話，隊長告訴我下星期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將举行支持人民政府的大示威，發起人已經打电报來要求林肯大隊对会场作廣播演說。他問我在我第二天到馬德里之后，能不能替他們去接洽一下，我答应尽力而为。我到馬德里后就到主持無線电廣播的赫伯特·克萊恩住的旅館里去。我作了自我介紹以后，說明了我的使命。他热誠地欢迎我，立刻表示願意安排这次廣播。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并不是单独在那里。同他在一

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那个“硬汉”——无论如何这就是那些读过他写的一些书的人对他的看法。我想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他那样使人失望的人。我有一个很不错的意见，我建议海明威把这些美国青年介绍给美国听众，这意见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海明威的想法不同。我用尽我的全部说服力量来劝他，可是没用，海明威先生不能照我那样去看问题。好吧，硬汉，我希望你的读者会始终对你客气。我回到加拉马向青年们报告的时候，关于海明威先生我说了（他们也说了）一些不便发表的话。

我由加拉马到几处医院去访问，有机会对几个受重伤的孩子说几句安慰的话。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在他们那里多耽搁一下。但是“塔比”是作主的人，他坚持我应当及时赶回去参加预算案的辩论。我尽量延长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回到伦敦去干我在下院的工作。

---

---

## 第十章

財政大臣張伯倫創議了一種新稅，他稱之為“國防獻金”。坐在過道後面的一個角落里的溫斯頓·丘吉爾一有機會就提請大家注意正在歐洲發展的危險局勢。丘吉爾的不斷攻擊促使首相鮑爾溫決定提出準備整頓國防的議案。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對下院“坦白”說明他在大選時所以沒有提出重整軍備問題，是因為他知道這是最能使他在競選中失敗的一個問題。這是保守黨在政治上玩弄投機手段的一個驚人自白。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準備征收一種特別稅來彌補“虛擲的歲月”。

財政大臣向例是在星期二下午發表預算案演說的。他講完後，反對黨領袖就會起立發言，對演說詞讚揚一番，照例要等到第二天再對預算案進行批評。當天就這樣散會。接着舉行兩三天討論，要求發言的議員中只有少數被邀發言，很多人是得不到機會的；但是在發表預算案演說的星期二那天，下院一般是在四五點鐘散會而不是把會開到十一點鐘。這似乎是對預算案發表演說的絕好機會，因此萊依的工黨議員喬·丁克爾和我都決定利用這個機會。我們往往在沒有能夠動議散會之前，就跳起來要求發言，結果不得不讓我們發言。在最初兩次只有我們這樣做。漸漸地別人也相率效尤，到了現在，有很多人都準備在第一天發言，以致把全部時間都占滿了！

在提出國防獻金案的時候，我沒有來得及從西班牙趕回來。

張伯倫發表了演說，反對黨工黨和自由黨的領袖照例予以讚揚。可是倫敦城却發出了恐怖的叫聲。向來被看作正統財政最可靠的保衛者、倫敦城所信任的公僕張伯倫，現在已經背棄他們了。怒火醞釀了一整夜，到了早晨倫敦城已經變成火舌四射的火山了。倫敦城的喧叫得到報紙的響應，穩定的財政基礎被保守黨財政大臣毀壞了！我由西班牙回來，看到了這種別開生面的景象，認為这里面一定要給工黨造機會。現在倫敦城和保守黨，至少是和保守黨財政大臣之間，在財政問題上發生磨擦，我不由得想起了“惡漢也有爭吵時”那句古諺。對於工黨這是何等好的機會呀！但是，唉！人類是容易走入歧途的。阿·維·亞歷山大當時是合作運動的領袖，也是工黨的權威發言人。他在第二天上午的辯論中起立發言，並不支持國防獻金案，反而極力反對。他批評保守黨六年來沒有能夠平衡預算，沒有使財政穩定。他反對這種捐稅的理由是它會鼓勵在軍火工業中謀取暴利的行為。他說，“容許投機商人隨便要價，然後對一部分利潤課稅，這是自欺欺人的辦法”。這種可怕的捐稅，對經紀人和投機商人威脅極大，必須撤回。因此工黨就帶頭為倫敦城辯護，整個保守黨忠心耿耿地支持它。在議會600多名議員之中，只有一個人——我自己——擁護張伯倫所創議的新稅。

造成這樣一種威脅性風潮的是怎樣一種稅呢？這是一種所得稅。這並不是過分利得稅（由於戰爭，或者因為戰爭迫在眉睫的關係，政府訂購大批貨物而使過分利得幾乎不可避免時，就有過分利得稅）。過分利得稅從來沒有遇到強烈的反對，雖然總是有許多方法逃避它。但是張伯倫所提的和這種稅完全不同，它是一種真正革命性的捐稅。他建議定一種“標準利潤”（他擬定的是6%），所有超過“標準”的利潤都課以重稅，供國防的

需要。如果实行了这个原则，如果保守党财政大臣能把标准利润定为6%，对超过部分课税25%或30%，来满足军事的需要，那就没有办法不让社会主义政党财政大臣把标准利润定为5%或者2.5%，对超过部分课税75%或者竟课100%，来供给和平时期迫切的社会需要，这不是很清楚吗？正当他们大声疾呼要求撤回这种捐税的提案时，我插身进去。我被获准发言，我坚决支持拟议中的捐税。只有我一个人单独支持那个被搞得十分狼狈和感到很难过的财政大臣。我的发言本应当引起工党领袖方面的一点反应。他们没有理由不作表示，也不能说不懂。不过他们已经有了既定方针，要保卫伦敦城所认为也是所需要的“财政上的稳定”，所以他们坐着，一声不响。可是保守党不是这样，他们的意见由布斯比说明，他在辩论时接着我发言。我相信布斯比与银行界有些关系，他以财政权威自命并以此自豪。在这次异常片面的辩论中，他的开场白是：“这位刚坐下的议员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演说，但我还不能肯定他的这种坚决支持使我对这种捐税增加了多少信心。”

事情很快就明朗化，要撤回这种税。但是怎样能在不损害张伯伦和不损害政府的情况之下撤回，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伦敦城已经声明它愿意——事实上它希望——对国防有所贡献。他们是经营证券交易所的热心的爱国人士，他们全都赞助张伯伦所追求的一切。代表团到唐宁街说明他们的愿望。“我们要付一种税，”他们说，“可是不是这一种。”这情形延续了两星期之后，就到了要作决定的一天了。下院外面挤满了人，议席全部坐满，所有能站的地方也挤满了。先由几个不重要的人辩论一番之后，丘吉尔发言了，这显然是预先安排的。他发表了一篇非常谨慎、狡猾而巧妙的演说。我们听着，渐渐懂得他的

使命何在。他是在很有技巧地建筑一座桥樑，使張伯倫能由革命性捐稅的危險境地回到安全而穩固(?)的正統財政的立場。他說完的時候，保守黨議席中間發出一種感到放心的松氣聲。等到張伯倫站起發言，會場上寂然無聲。他從來沒有像這樣要吃人的樣子。他的又長又瘦的頸子，鈎形的鼻子，時常使我想起一只兀鷹來。現在他除了撤回提案無路可走，他偏偏還得感激丘吉爾給他準備了撤回的台階。他不喜歡丘吉爾，一點也不喜歡。他慢慢地陳述提出國防獻金議案的理由——為了使英國能在保衛歐洲和平中起日益重大的作用，就有建立我們實力的需要。在這一方面他相當會說，但是議員對這囉囉唆唆的一套很少加以注意，他們在等待，等待，屏息等待。他的聲音越說越低，低到能使人有一種寂靜的感覺。當然，他也有這種感覺。他說了差不多20分鐘，然後，他很快一竄就過了橋，稅案撤回了，我被扔在一邊，下院再一次松了一口氣。敦倫城十分感謝這位財政大臣並提出了支持他的保證，因為不管他是怎樣走入歧途，當他看出他的錯誤時，還是悄悄地回到他的家裏來了。那些經紀人和投機商人很可以重重地報答他，因為他保住了他們的財富的源泉。

當然，新花樣的國防獻金必須提出。倫敦城全都贊成。但是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看到新方案，就已經到了暑期休會的時候，下院議員們照例離開議院去度暑假了。

休會前幾個星期，有一個年青婦人來找我，要求我幫助她的姊姊。她們姊妹曾到蘇聯許多音樂廳去演奏，在各處都很受歡迎。她姊姊嫁了一個立陶宛人，後來發生搜捕“破壞分子”的事，這位立陶宛人也被捕了，他的妻子因有嫌疑而被拘訊。這件事是在她們旅行終了並且剛剛完成回英準備之後發生的。妹妹被准許離境，已婚的姊姊被扣留了。自然，妹妹回國之後，就找人幫助



她的姊姊。她的父親也是一個歌舞團的藝人，他是一個老社會主義者，所以他們想到我或者也可以幫一點忙。剛巧我要在休會期間到莫斯科去，和幾個同志談談歐洲形勢的惡化的情況，我答應那個年青婦人去查問她的姊姊，盡力設法使她回國。我到列寧格勒的時候，看到了幾個政府工作人員，他們告訴我他們確信那個女人毫無不軌的地方，他們已經安排好送她回倫敦。當然，報社知道了這件事，並且盡量利用它。船載着她到倫敦時，記者已經在等候，要聽她被嚴刑拷問的驚人故事。但是記者失望了。她並沒有告訴他們所希望聽到的故事。她告訴他們，她受到很好的待遇，蘇聯政府工作人員對她很有禮貌。後來，我回去之後，杰美·華克爾和我同到布里克斯頓帝國戲院去找她們，在中場半小時休息的時候愉快地交談了一下。她那次到蘇聯去非常成功，雖然最後碰到這樣一個不愉快的事情，她卻沒有因此而感到沮喪。

我到莫斯科去時和彼得·柯里根同志同行。彼得和我在海斯碼頭上船後，就向船上的“二等艙”走去。但是船主和船員知道我在船上以後，就派代表團來看我，邀我搬到一個特別保留的客艙里去。我不願去，可是對於代表團所表示的誠意，又未便堅辭，而且彼得有一隻手在發炎潰爛，非常疼痛，我知道這對他有利，所以我在彼得可以同去的條件下接受了邀請。這樣，彼得和我只花了“二等艙”的錢而坐了“頭等”艙位。兩個蘇格蘭人還能要求比這個更好的待遇嗎？旅伴中有各方面的人物。我們有音樂、歌唱，偶而也聽演說，伙食很好，情緒很高，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航行。

我們按時到了列寧格勒，又由那里搭乘“紅箭號”（特別快車），在極端舒適的條件下到了莫斯科。我和許多同志談了話，其中有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我看出來他們對於鮑爾溫政府都

非常怀疑。他們的怀疑是有理由的。1935年英德海軍条約准許德國建造潛水艇，塞繆尔·霍尔爵士对下院保証这个条約（和这些潛水艇）决不会用來对付英國。那末用在哪里呢？顯然要用在波罗的海來对付苏联。毫無疑問，就是这种思想促使英國政治家簽訂了这个条約。希特勒关于“布尔什維克”的叫囂越是厉害，英國政府和拥护它的保守党員們就越支持他。凡是对苏联或者对德國的工会会員、社会主义者以及共產党人表示憤恨和狂怒的人，就是一个好人。在西班牙方面，鮑尔溫和张伯倫不但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便于活动，而且竭尽全力要訂一个“四强公約”（德、意、法、英），以便在“整頓”东欧的时候保持西欧的和平。有几个英國政治家已經明白表示他們同情德國对“生存空間”的要求，这就說明“整頓”东欧是意味着怎样一回事了。事实上只要希特勒和他的納粹党徒能約束他們自己，不触动西欧，他們就可以自由处置东欧的一切。当然，这就使莫斯科方面起了疑心。但是，希特勒这个集团一方面固然要苏联的領土和宝贵的礦產，另一方面也要摧毀与德國工業有矛盾的其他國家的各种工業。他們所以被捧上台來，正是为了去完成这件事。德國已經有了“主導工業”，其他欧洲國家除了輔助工業之外就不需要什么了。“优秀民族”已經准备好，訓練好了，他們要扫除一切競爭，歼滅所有多余的人口。这是我們的親希特勒分子所沒有了解的一件事，也是几乎把我們毀滅的一件事。

我这次到苏联去了一趟，对于國際局势以及納粹德國的真实意义要清楚得多了。我决心用全部力量使非常明顯地威脅着欧洲和全世界的大灾难不至于發生。議會开会时我們有了一个新的首相。鮑尔溫已經下台，他退出了是非之地而又在上院出現。“兀鷹”張伯倫接替了他，而財政大臣的职位則由約翰·西蒙

爵士(現在是勳爵)接替。西蒙負責提出新的國防獻金案，現在他有倫敦城的支持，也有工黨的擁護。工黨的“財政專家”佩蒂克·勞倫斯是1914年以前一派的老自由黨人，他說這種新的國防獻金比較舊的要公允得多。但是，立刻就有人狂呼反對——這一次不是倫敦城而是合作運動反對，因為新稅對合作運動打擊極重。亞歷山大拯救了倫敦城，可是合作運動必須償付拯救倫敦城的代價。當時我寫了一本小冊子：“合作運動與國防獻金”，說明根據第一次的擬議，合作運動用不着付一文錢的稅，而照第二次的辦法，就有很重的負擔。我引証了亞歷山大在第一次討論會上為倫敦城辯護的話，也引証了佩蒂克·勞倫斯在第二次討論會上說明它是“比較公允的捐稅”那些話，這些事使兩位“財政專家”對我產生很大的惡感。艾爾弗雷德·班斯在其他幾個合作運動者支持下大力反對新稅。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支持第一次的創議，再加上亞歷山大的反對，結果他們徒勞無功。真正使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他們提出這樣一件事來責問西蒙：幾年之前，合作運動曾經聘他辯護（他的確辯護了），說社員所分的股息並非利潤，可是現在他支持新稅，把股息作為利潤而徵稅了。但是，西蒙在合作運動雇他做律師來辯護時，和他做財政大臣時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現在他的任務是籌措款項同時還要照亞歷山大所要求的那樣“盡量避免打亂我們的財政制度”。

我是一個終身致力於合作運動的人，我對新稅作鬥爭，一步都不放鬆。但是倫敦城及下院里的強大的保守黨多數使得事情無可挽回。張伯倫在西蒙的幫助下又成為那些強盜財閥所信任的辯護者了。

我們因為聖誕節休會而各奔東西，但是對於今后的局勢并非毫無憂慮。那年是一個凶年。人們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

11

班牙的野蛮行为熟視無覩。共和軍情况日益惡化，他們購買武器自衛的權利被否認，又不得不抵抗日益增強的納粹和法西斯空軍及裝甲部隊。張伯倫和他所代表的保守黨已經公然希望法西斯取得勝利。他們對歐洲各民主政府的仇恨和背信棄義是沒有止境的。

英國人民不但對張伯倫政府久已不信任，就是對於工業的情況也愈來愈不滿，失業工人的鬥爭情緒不斷增強。此外，還有一個使人不滿的新原因——也可以說是“舊病復發”。倫敦和內地幾個城市發生一系列的拒絕繳納房租的事件，整區整區的人都加入了這個鬥爭，成千的家庭婦女第一次舉行示威，加入性質非常激烈的代表團。這說明以前對政治很少或者簡直毫無興趣的許多婦女在政治上覺醒了。礦井和工廠工人，街道上的失業工人，家庭婦女，全都齊步前進，全都為生存的權利而鬥爭。為了這種權利，西班牙的青年們也在對同樣的保守黨—法西斯敵人展開鬥爭。

“送舊迎新”。舊的一年過去了，沒有留下多少值得讚揚的事。新的一年來到了，這是怎樣的一年啊！1938年為世界大災難鋪平了道路，人面獸心的張伯倫在製造災難的機器上加了油。

1938年3月，奧地利滅亡了。3月11日，星期五，奧地利的納粹黨徒起事；3月12日，星期六，德國軍隊在空軍掩護下開進維也納，奧地利變成了納粹帝國的一省。吞併奧地利的條件早已成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哈布斯堡帝國（即奧匈帝國）分裂成一連串的獨立國家。奧地利只剩下600萬人口，大半是農民，來維持一個費用浩繁的首都維也納。維也納是以皇族多、主教

多而著名的城市，那里的生活（按照一贯的传统）是接连不断地举行宴会招待宾客——有佩勋章的官员，挂绶带的大使，在“蓝色的多瑙河”乐曲声中寻欢作乐的美妇人。维也纳是一个音乐城，纸醉金迷的城，也是一个充满欺诈、诡骗、权谋的城——这个维也纳已经过去了，一个红色的维也纳，无产阶级的城，真正的城已经站立起来。在动乱的战后最初几年内，奥地利这个由国联负有责任的國家陷入绝望地破产的境地。国联因为急于想要奥地利能自力更生，给了它一连串的贷款来保持它的财政平衡。奥地利这才开始有了经济复兴的迹象。在维也纳，社会主义政权正在实施各种改革，尤其在房屋方面，这是各处行政人员一致讚扬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多么誇獎红色维也纳的成就啊！而最初这些年的成就还不过是一个开端，再等长久些，等十年、二十年，你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政权对维也纳、对整个奥地利意味着什么。但是在全国拥有势力的是一个天主教总理，他所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或解放工人阶级。塞貝尔主教是一个瘦臉薄唇的禁慾主义者，一点沒有憐憫心。如果他有人类的仁慈天性的話，也在他的血液中久已冻僵了。他一心要使皇族、地主和主教复辟，要毀滅他的政敌——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事实上是奥地利最大的政党，但是别的政党联合起来，使塞貝尔当了权。1924年国联贷款落到他的手里，因而他能够进行他所要做的工作。他很狡猾地利用英国和其他國家財閥的恐懼心理。戈培尔曾从塞貝尔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这样说：若是不帮助我，我们就倒向德國，給德國一条到巴尔干和近东去的通路；若是你们不支持我，不使奥地利恢复旧观，羣众就会走向共产主义和苏联方面。他总是唱这一类調子。他怀着惡意，假冒为善，在公开场合滿口民主，在幕后却不断地陰謀破坏民主，奴役羣众，

使他們为腐朽的貴族政治服务。他始終利用他作为天主教中的顯要人物而拥有的巨大权力，把政治上落后的農民或工人赶到毀滅他們自己的組織里面去，这些組織就是后来証明是毀滅奧地利的各种組織。社会主义工人要求前進，塞貝尔却要往后退——回到这种日子：寄生虫們愉快地佩戴着勋章，浪費財富，在浮華淫乱的生活中消磨生命；另一方面，羣众备受窮苦、文盲和各种本來可以避免的疾病的折磨。这就是他的最大的野心。为了实现这种野心，他集中他所有的力量來策动陰謀、奸詐和背信的行为。1934年2月，民主奧地利被毀滅时，矮子总理陶尔斐斯声明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偉大的前輩塞貝尔主教的任务。是的，陶尔斐斯于1934年完成了他的主人塞貝尔的工作，这样就为自己不久以后被納粹暗殺作好了准备（他自己的衛隊还做了帮凶），也为1938年奧地利的被扼殺鋪平了道路。讓这些宗教的保衛者考慮一下：如果当时鼓舞工人向前進，那將是怎样一种不同的情况？如果維也納的偉大工人区沒有被天主教独裁者的大炮所毀滅，而是效法社会主义者的榜样，把全國土地和資源都用來为人民服务，又將是怎样一种情况？

陶尔斐斯走了，許士尼格上了台。他也是拥护天主教劳資协会主义國家的。可憐的幻想。强大的納粹德國一眼盯住奧地利，希特勒很快就“發現”奧地利境內的一些效忠于德國的德意志人受到奧國政府的不堪忍受的待遇。这是一个信号，表示迟早納粹軍隊就要進軍。这是一种伎倆，在未來的年代中要經常应用。納粹暴戾殘忍地蹂躪奧地利的一切。許士尼格的任何阻止这种行动的企圖都会引起柏林方面的怒吼。这种情形一直繼續到1938年，那时候掠取奧地利的时机成熟了。張伯倫、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一班人都被試探过了，希特勒确信这方面不会來干涉

——他确信英國首相和英國外交部不会阻撓他。相反地，他們还会保証其他方面也不來干涉。这里可以說明，英國外交部的人員要是原班不动，欧洲就要不断地处于危險中。应当把这班人排除出去，他們并不执行真正符合英國利益的政策，他們对英國國策不感兴趣。英國的人民要求進步，他們是要向前進，而不是要往后退，他們也要欧洲向前進。但是英國外交部的人員都是一些相信皇族和主教的神聖权利的人，每一个駐外使館都是按照这种方針孜孜不倦地工作。希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这会造成怎樣的后果。丘吉尔在下院說，在希腊采取的行動是为了避免大屠殺。当然，屠殺工人从來不能算是大屠殺，只有在少数特权分子受到威脅时才用得到这种詞句。讓任何一个沒有偏見的人來讀一讀希腊的歷史事件，想一想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站在幕后的就是李普尔大使和英國外交部。他們在任何可能的場合都要讓君主和地主复辟，他們和希特勒一样，会制造事件來適應时机。我們若是要使我們自己和欧洲在將來免受灾难和痛苦，就必須由外交部和駐外使館里面清除所有的親法西斯分子。

1938年2月，当意大利援軍还在源源开進西班牙的时候，格蘭迪伯爵來找外交大臣艾登，建議商訂英意协定。張伯倫希望締結这样一个协定。这件事在內閣里發生爭吵，結果艾登和他的副手克蘭波恩勳爵辞职。他們的辞职虽是由于張伯倫对墨索里尼态度軟弱，但在提出辞职的时候，也正是希特勒要求撤換艾登的时候。

艾登和克蘭波恩到下院來說明危机，并解釋他們决定辞职的理由，他們的語調非常激烈。克蘭波恩形容墨索里尼对英國的政策是一种訛詐政策。但是艾登一走，張伯倫就完全控制了

对外政策，他可以毫無阻碍地执行他的姑息法西斯的政策了。当然，我們在下院竭力阻止这种危险的作法，不过有压倒多数的“应声虫”在支持他，因此他对我們其余这些人就不放在眼里。他这个“纸老虎”在这个时期表现的卑鄙的、狂妄自大的神气，是从來未有过的。他对丘吉尔也像對我們这些人一样瞧不起。可是等到他自己替英國招來的危机臨头，你看他又是怎样一个可憐、軟弱而無用的东西。要是和他所藐視的一班人比較起來，他是差得远了。艾登在2月份辞职之后，張伯倫首相成为外交政策的負責人。一个月之后，1938年3月，希特勒派人叫許士尼格到貝許斯加登去，这又是怎样一个場面呢：一方面，奧地利的总理，一个天主教勞資协会主义國家的元首在發抖；另一方面，希特勒在盛怒之下，瘋狂地尖声喊叫。据說許士尼格离开那里时含着眼泪。他的眼泪有一滴是为了在維也納大街上被屠殺的工人而流的嗎？他或者也想到过这些工人，因为他回到奧地利之后，提出建議，要和社会主义者取得諒解，恢复他們的权力，恢复一定程度的民主。太晚了，唉！是的，他已經認識了一个國家真正國防是由哪些因素組成的，可是太迟了。如果他能恢复工人階級坚强的組織，他也許还能有所作为。可是時間不够了。他已經被迫讓塞士—英夸特参加他的內閣，現在希特勒又要求讓这个塞士—英夸特接替他总理的位置。当塞貝尔和后来的陶尔斐斯应当对在維也納大街上的大屠殺工人的事件負責的时候，他們捏造事实來解釋，至少是企圖解釋他們的行动，硬說工人進行暴动和想要革命。現在請听德國進兵时許士尼格对奧地利的臨別贈言：

“我向全世界声明，外面散布的关于工人騷动、血流成渠的消息，以及政府已經不能控制局势的說法，都是徹头徹



尾的謊話。”

是的，許士尼格，這是希特勒的謊話。不過在這以前，它是塞貝爾的謊話，是陶爾斐斯的謊話。而現在希特勒已經在奧地利譏笑那些居然想統治國家的“矮子”，他自誇和這些人比較起來，他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人物。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下院裡有些人想叫政府採取一些行動。可是張伯倫很放心。希特勒並沒有對這邊望，我們為什麼要耽心呢？事實上希特勒已經對我們說過，他得到奧地利之後就心滿意足了，他要坐定下來建設國內的生活和經濟，使它成為一些附近國家的模範鄰邦。這中間當然要有一個默契，就是他決不容忍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好了，張伯倫和外交部對於猶太人並不特別關心，而且如果希特勒把他的正在擴充的軍事力量指向蘇聯，當然不會使他們感到不安。保守黨員相當公開地在開始討論這一點。納粹德國和蘇聯的衝突，是“非常合乎心意的事情”。因此，不要在希特勒的路上設置障礙，這就是英國外交政策的方針。

但是，看看這個好鄰邦吧。奧地利剛被吞掉，捷克斯洛伐克就發出了叫苦聲。得意的伎倆又施展出來了。納粹團體一齊發動——挑釁、暴動和屠殺。政府——歐洲最民主的政府——想要控制它們。柏林方面狂叫起來：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的同胞受到了不可容忍的虐待，必須阻止卑賤無賴的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的這種行為。事態繼續這樣發展着，希特勒假裝憤怒而大喊大叫，所有納粹報紙都在報上刊載通欄標題，大肆渲染。

不過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同盟國，蘇聯又和法國是同盟國。這對於納粹的計劃是一個重大的障礙。可是10月里，希特

動一槍不發就把苏台德搞到手。这是怎样搞到的呢？

5月里，在奥地利被强占后短短几个月，張伯倫到克萊夫頓去，在著名的反动陰謀的巢穴艾斯脫夫妇家里度周末，并且邀請美國和加拿大的新聞記者在那里和他見面。随后一星期，加美兩國報紙發表消息說，張伯倫認為苏台德地区应当割讓給德國。在5月里，在希特勒还没有提出要求之前，張伯倫就已經建議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了。乔弗萊·曼德爾对这个报道提出責問时，張伯倫以極其高傲的态度譏笑他，說他是一个“挑撥离間的人”，又說“我对于这个报道拒絕加以証实或否認”。他背后的一些保守黨員为他的希特勒式的傲慢态度而欢呼。另一方面，我們这些人向他抗議，要求他答复曼德爾所提的問題。但是他已經自命为全國的主宰人物，所以对我們的抗議置若罔聞。但是，对他來說，不幸的是長舌妇楠西·艾斯脫也参与了这件事，因为她是那次記者招待会的女主人和贊助者。她覺得她一定要說明她在这里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倒很費了一点唇舌。張伯倫并没有接見加拿大和美國記者，他只是和他們談了一次話。要是你願意仔細研究一番，也許可以弄清其間微妙的区别。不过談話也好，接見也好，他已經給了希特勒一个暗示，而那位先生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暗示。但是你又可以在問，9月份和10月份飛來飛去是干什么？如果在5月里他就已經声明苏台德要归德國，所有那些“恐慌和奔走”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有使法國脫离它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必要——这种联盟阻碍了張伯倫和外交部达到締結四强公約这个主要目标。他們要英、德、法、意結成联盟，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出賣西班牙，出賣奥地利，出賣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進行一切誹謗和陰謀，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四强公約。

这些人在各大使館里所編造的謊話，全是为了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够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國毀滅，使君主貴族这些寄生虫得慶更生。“他們說謊——他們的牧师，他們的教皇，他們的聖徒，他們的——他們所恐懼的一切和所希望的一切，都是說謊。”布朗寧這句話可以用來指外交部和駐外大使館——其中最坏的当然是駐在莫斯科的那一个。駐莫斯科大使館究竟帶來了些什么东西來讓我們了解苏联呢？1939年冬季到1940年芬蘭戰爭正在進行时，我們英國的人民和政治領袖对于苏联的威力知道些什么呢？英、德、法三國最优秀的工程师所建筑的曼納林防綫三个月不到就被攻破了，可是还有人在傳布关于紅軍作战力薄弱的最荒謬的故事。就連应当知道得比較清楚的丘吉尔，也和別人一样被“在場的人”所欺瞞，正式發表了关于共產主义和紅軍的最愚蠢的荒謬論調。在这一方面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工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芬蘭去親自看看那里正在發生的情况，三个代表之中有一个是菲利普·諾埃尔—貝克。他是一个仁慈的、心胸寬大的、受过教友派教育的人，有帮助人的願望。不过他是一个“体面人物”，一直生活在“体面人物”中，与工人階級并没有真正联系。他和兩個朋友到了芬蘭，見到了偉大的民主主义者(?)曼納罕，由他那里得到許多情报。他們又見到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唐納先生。唐納在芬蘭拥有產業；諾埃尔—貝克的妻子在希腊拥有產業。这两个都是“体面人物”，無疑会相处得很好。他們由唐納先生那里也得到許多情报。不但如此，还拿出一些紅軍俘虏給他們看看。就是好萊塢的做法也不过如此，所以由好萊塢回去时——对不起，我是說由芬蘭回去时——他們对于紅軍的优缺点已經完全明了了。

諾埃尔—貝克向工党議會党团做了一次报告：紅軍情况很

慘，他們是很可憐、很可憐的人，沒有裝備，衣衫襤褸，沒有靴子。在快到1941年年底德軍猛攻莫斯科大門時，我站在下院一個走廊里和悉尼·錫爾弗曼談話，諾埃爾正走那里經過，他停下來問我對局勢的看法。這並不單是他一個人這樣。議員們開始覺得雖然英國有一個工作人員很多的大使館在蘇聯，他們卻一點不知道蘇聯的實力怎樣，以為我或者能夠給一點使他們得到安慰的消息。我好像是一個蘇聯的新聞處那樣，許多人都需要我。諾埃爾開口問我，“莫斯科會怎麼樣，威利？”他問。

“他們決不會占領莫斯科，”我回答。我對這一點很有信心，因為攻勢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銳氣。

“你想他們守得住嗎？”這是他第二個問題。

“你看他們打得怎樣？”我反問。

“我看他們打得好極了，”他突然熱烈地叫了起來。

“對了，”我說，“雖然沒有靴子。”

他滿面通紅。悉尼·錫爾弗曼後來把這次對話非常得意地談了好幾次。

但是，莫斯科英國大使館——一個反蘇聯親法西斯陰謀中心——在工作方面最大的特征是：它能夠不斷輸送有偏見的消息，使英國政府和丘吉爾無從知道蘇聯人民的真正精神。這種不正確的消息使他得到一個錯誤的結論，以為蘇聯抵擋不住納粹的攻勢，很快就要打敗而退出戰場。他簡直不知道蘇聯人民在作軍事退却的那些艱苦的年代中賴以支持的真實力量和無敵的精神，這種精神激起了他們的几乎是超人的力量，使他們取得了最後勝利。我們對這些與人民為敵的人還要容忍多久呢？在我們英國這樣一個國家，工人階級和小自由職業者占絕大多數，然而我們的對外政策以及我們和其他國家人民的關係却由一小

撮反动分子來決定，這些反动分子始終為了寄生的敵人的利益而出賣一般人民，這是不能容忍的事。

艾斯脫夫人不但是一个“女政客”，而且是一个我從來沒有遇見過、說話聲音極大的婦人。有一天我陪着兩個加拿大士兵來到下院的休息室，遇見她和一个加拿大軍官。她叫住了兩個士兵，可是我还是往前走。“看他，”她大聲嚷道，“他的階級意識太強了，簡直不屑和我說話。”

“你……說得非常對，我是這樣，”我也大聲回答她。

加拿大軍官盯着看我，他的態度很明顯地說明他認為應該由一个行刑隊來槍斃我。我是有階級意識的，我將始終保持階級意識。我想，我一向這樣想，工人是生產的、進步的階級，只有他們前進，文明才会有真正的進步。只有他們才能够建立一个組織和創造各種條件，來控制因最近的科學發現——分裂原子——而造成的局勢。他們走向这一目標所依據的指南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能譏笑這句話，可是他們將認識到，他們一直在設法說成是神秘的事，在實際应用中是很容易為積極活動的工人所了解的。

艾斯脫夫人和這種知識分子一樣，一點不相信關於“階級”的這種說法，她想一網打盡一切。她有一个習慣，只要有很小的借口，就對我大叫。有一次，大概在大戰前一年，一个著名的美國女電影明星和我們夫婦倆在陽台上喝茶。有人要我到中央大廳去迎見由費夫來的客人。我到了那里，看見艾斯脫夫人正和兩個女客談話。她一見我就喊：“你們看他，他現在和女電影明星跑來跑去，应当要有人去告訴他的妻子。”有一个議員走過去對她說我的妻子在陽台上。她就趕到陽台，找到了女電影演員，走到她身旁的一个人面前問道：“你是加拉赫夫人嗎？”

我的妻子回答說：“是的。”

“請你和我握手，”艾斯脫夫人伸出手要求說。我的妻子握了她的手。“你是一个勇敢的妇女，”艾斯脫夫人說。

我的妻子覺得驚奇，問她為什麼。

“因为你能够和你这样一个丈夫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她得到的驚人的答案。“他对我粗魯極了。”

“我听你說這句話，覺得很奇怪，”我的妻子說，“因为常常有人說他对女士們是很有禮貌的。”

楠西有一个还嘴的好机会，她原可以說：“但是我不是一位女士呀。”

又有一次在第二戰場就要开辟的时候，“工人日报”派馬尔科姆·麥克埃湓到这边來看看究竟“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他和我兩人向聖斯提芬廳走去时，走过这位“貴夫人”的身边。“嗨，”她喊了起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蕭伯納呢？他要和你談話。”这倒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記得已故的蕭伯納夫人在遺囑里留下一筆錢准备用來讓可憐的爱尔兰人有机会学一些文化或学一些禮節。我虽然只有一半是爱尔兰血統，我怀疑我不是第一个成为試驗的对象。我把这件事想了一兩天之后，就寫信給蕭伯納，說明如果他要看我，我很喜欢到他那里去找他。我当然知道他不太高兴人家去找他。我又說若是他不高兴浪費時間，我就把这件事丢开。他回信邀我随便哪天下午到他阿約特·聖勞倫斯家里去。所以有一天下午我就和他的老友蒙塔古夫妇一同去看他。我們談的虽然大部分是电影（他寫的“凱撒和克利奧佩特拉”正在攝制影片，他經常到制片厂去），但是我們也把在运动早期的各种經歷当做談笑的資料。而我們覺得最好笑的是“自由思想者”的編輯查普曼·柯恩在集会上的演說。查普

曼·柯恩是一个精明的辯論家，頭腦非常敏銳；他把宗教看作社會進步的大敵。大約35年以前，他在培斯利的銀行街大廳演說，當地的青年請我當主席，我立刻就答應了。等他講完了那篇生動、幽默而有力的演詞之後，我站起來問有沒有人要提問題。有一個宗教信仰的維護者非常憤怒地跳起來對我們說：“我本來要提兩個問題，但是這位演說的人並沒有照我所盼望的方式談這個題目，因此我的問題提出來不合適。”

柯恩站了起來，看他似乎有點為難，“我很抱歉，”他說，“很抱歉。”然後，他又高興起來，他說，“我告訴你一個辦法，下次我到培斯利來，你把你的問題交給我，我就發表演說來配合這些問題”。在聽眾的笑聲中，這個憤怒的人哼了一聲，走出了會場。

在影片方面，蕭伯納嚴厲地批評新聞記錄片拍攝名演說家的方式。開了燈光，一張桌子後面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形象，形象上的一個洞張開了，發出了說話的聲音。觀眾厭煩得要死。呸！新聞片應該舞台化，它的人物一定要照舞台上的方式出現。一個名鋼琴師（我忘記了她的姓名，她是蕭伯納的朋友，和他一樣熟悉這一套）表演獨奏。聽眾在等候，幕升了上去，露出一座台，邊上有一架大鋼琴，後面有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個花瓶。等了幾秒鐘——對於聽眾這是焦急的幾秒鐘——這位偉大的婦女上了台，可是她並不坐在鋼琴的座位上。不，她帶了一大束鮮花，慢慢地走到桌子邊，又慢慢地把花插入花瓶。聽眾望着她，有點迷惑了。然後她再走到鋼琴那里，開始由手指上除下戒指，由手腕上除下手鐲，很仔細地放在鋼琴頂上。這一切以後，聽眾情緒已經到了頂點，她這才轉過身來面對禮堂，鞠躬行禮，然後坐在鋼琴座位上，開始向已着了迷的聽眾演奏。新進的鋼琴師應該學學乖。

从这椿事又談到蕭自己一段經歷。在他88歲生日那天，新聞片攝影師要來把他攝入鏡頭，那个主拍的青年說：“你站在那边，蕭伯納先生”。

但是蕭伯納先生不加理會。“我不想站到那边去，”他对那个青年說。“你管你的攝影机，我干我的，这是我的行当”。他又对攝影師的同伴說：“你到这边來，我指給你看花園里美丽的地方。我說完之后就走开。你叫我回來，我就轉过身來，然后你問我可不可以为新聞紀錄片講一兩句話，我將很和藹可親地答应你。”

“好了，”他繼續对我說，“那就是我們用的方法，非常成功。事实上在美國放映时它成了一部短片，沒有和新聞片放一起。”接着，他又說：“你要知道，加拉赫，若是我的一生能再重新开始，我就不想再参加公共集会了。我要利用新聞片，你听我的話吧，拍新聞片，这是我們最大的宣傳媒介。”

对这一点我回答他說：“我很喜欢被拍入新聞片，但是新聞片老板不想把我拍進鏡頭，那我又有什麼办法呢？”

他笑着說：“啊，那倒真是一層困难。”

我們在一起非常愉快地消磨了一个下午，我的朋友和我向他告別，蕭伯納送我們到大門口。他的身体或者沒有壯年时那样矯健，但他的头腦却和从前一样灵活机敏。

这时在奧地利方面，塞士—英夸特和他的有組織的嘍囉，已經替希特勒准备了進軍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康拉德·韓倫也在扮演同样的角色。他为苏台德的日尔曼人提出了最荒謬的要求，基本的調子始終是要使苏台德併入德國。德國对苏台德有什麼可以要求的呢？什麼都沒有。虽然那里有很多日尔曼人，但是它从來沒有隸屬德國，一千年來它是波希米亞的一个堡壘，現在还是屹立在那里，从东面阻擋着希特勒。韓倫和他的伙伴



已經有幾次暗示德國要來侵略。1938年5月21日德國軍隊開始向邊境移動，這是第一次嘗試，但是它遇到了迅速而有威脅性的反應。捷克斯洛伐克立刻下了動員令，軍隊和坦克雷鳴似地開往邊境，準備抵抗德國的軍隊。相當強大的捷克斯洛伐克空軍也待命出動。法國政府闡明了它的立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被攻，它就履行條約，參加戰爭。蘇聯也同樣準備行動。若是英國政府也在那時採取同樣立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所有那些漫長的苦難或可避免。但是英國保守黨人，尤其是保守黨首相，要把東綫向德國開放，所以不去加強反而去削弱抵抗的力量。

不過希特勒暫時只好不動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行動迅速，又有法蘇做後盾，這種聯合力量，比他那時所準備應付的力量強大。德國軍隊因此向後撤退，來讓破壞分子有更多時間進行活動，而破壞分子也就繼續行動。韓倫在蘇台德和柏林之間飛來飛去，和他的暴徒們一次又一次製造事件，政府幾乎無法保持平靜狀態。捷克政府作了各種努力，盡量讓步，來解決日爾曼少數民族可能有的真正痛苦。可是韓倫並不需要解決問題，他要惹事，他要製造一種足以引起德國侵略的糾紛。人人知道張伯倫已經曉得這一點，可是7月25日他還派倫西曼勳爵到布拉格去，在民主政府和作為德軍前哨的納粹黨徒之間進行“調解”。他到布拉格的時候，政府代表在車站歡迎。他是一個民主大國的代表，所以應該受到很客氣的招待。雖然如此，他們懷疑他，正像他們懷疑他的上司張伯倫一樣，這種懷疑因為這一事實而加強：韓倫黨徒在他到達時舉行大示威，但是倫西曼非但不表示同情民主政府，反而說他來的立場是大家的朋友，而不是任何一方的仇敵。韓倫在有意識地組織力量來毀滅捷克斯洛伐克。我們如果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政府的朋友，那又怎麼能成為他的朋友呢？從來

沒有一個政府會像英國政府那時候執行這樣卑鄙的政策。我們首先勸捷克政府再向韓倫讓步。等到作了讓步，韓倫又聲明讓得太晚了，他們現在又決定提出新的、影響更遠的要求了。我們回過去要求再作讓步，同時也始終很清楚地知道韓倫的最終目的就是替希特勒的侵入打開道路。在打好了基礎之後，就公開要求德國必須取得蘇台德。希特勒確信，張伯倫的獻媚與四強公約的幻想，大大削弱了法國的力量。于是他裝腔作勢，發出威脅，逼得張伯倫不得不跳上飛機到貝許斯加登去看他。希特勒熱烈地歡迎他，伸出了雙手迎接他，張伯倫是他非常稱心的人。可是對於蘇台德的割讓問題並沒有立刻達成協議。他們必須更謹慎更巧妙地進行。9月21日，希特勒在哥德斯堡把他對這個問題的最後文件交給張伯倫提出。這個大堡壘必須完整地移交給德國，不准移動一尊炮、一輛坦克、一架飛機、一台機器。一切東西，所有炮壘和所有大小武器統統留下來等候希特勒去接收。世界上有史以來從來沒有人在和平時期提出過這種要求。他不發一槍就打算以勝利者的姿態進軍。張伯倫看了這個文件，裝得很震動的样子。他說他未便勸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這種要求，至多只能把文件不加評論地轉交給它。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和希特勒怎樣相視而笑。忠心的遞信員張伯倫要把文件送交捷克政府，並且不預備鼓勵它加以拒絕。這是在順從希特勒的心意方面跨了一大步，但是還有更多的事要做，事實上也的確做了。張伯倫以“大難預言者”的姿態回到英國。早一刻天空還是蔚藍一色，全世界寧靜無事。過一刻就是“一片黑暗籠罩全球”了。不知實情的人民突然發現戰禍已經臨頭。海軍開到作戰崗位，後備兵員應召入伍，散發防毒面具，挖掘戰壕，採取了一切措施以應付立刻會發生的侵略。一種出乎意外的感覺，也可以說是恐慌，

突然遍及全國。下院就在這種情況之下舉行會議。會議的氣氛是大家感到前途凶多吉少，議員們瞪目相對，幾乎不敢開口。他們不知道在開會之前，希特勒已經接到張伯倫一封信，表示全部同意希特勒所要求的一切而且“不用戰爭，也毫不遲延”，還答應由英法兩國政府迫令捷克政府屈服。达拉第已經被說服同意那個使張伯倫非常“震驚”的哥德斯堡文件。因此進行大出賣的准备工作已做好了。

在下院的緊張而沉默的空氣中，張伯倫開始發言。他為了挽救和平，已經盡了最後努力。他已經寫信給希特勒。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下面就是那一封信，他忽忽忙忙地讀了一遍：

“我看了你的來信之後，覺得你一定可以不用戰爭、可以毫不延遲地得到一切主要的東西。我準備立刻親自到柏林去，同你和捷克政府代表討論移交的安排問題，如果你願意的話，還可以會同法國和意大利的代表討論。我深信我們能在一星期之內達成協議。不管你对布拉格政府的意圖多麼不信任，你不能懷疑英法兩國政府的力量足以保證諾言會順利地、充分地立即履行（着重點是我加的）。你知道我已經公開說明我們準備保證這樣來履行諾言，我不能相信你會因為在解決這個久懸未決的問題方面有幾天的遲延，而甘願擔負發動一次可能毀滅文明的世界大戰的責任。”

（1938年9月28日議會會議事錄）

墨索里尼拍了一封電報表示願意出面調停。朋友們，為墨索里尼歡呼吧，那是一個好人。他現在等待希特勒的答復。這時後面有些騷動，什麼事？有人送了電報進來，議員們急忙把它傳遞過去。張伯倫重複說，“我在等……”電報交到他的手里。他拆開了電報宣讀的時候，整個下院用一種特殊的、期待的疑慮

目光对着他看。和平挽救過來了。希特勒已經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当作“祭品”來接受。向东的門戶已經洞开。但是“和平挽救過來了”。这就是下院的想法。保守黨員“雀躍”起來，晃着手里的文件。一个傻家伙大喊“为了我們的首相感謝上帝”。上帝为了許多事情受过責备，这樁事我却不能認為是他的罪过。有这样一個首相一定另有原故。可以說，真正的原因后來已被發現，那就是作惡多端的保守党多数已經被嚇倒了。“到慕尼黑來，”希特勒在电报里說，“我們將解决这件事情。”“下院要原諒我，”張伯倫說，“我不得不到慕尼黑去。”

艾德禮以反对党領袖的地位站了起來，可是他沒有提出反对。不，他希望張伯倫把事情办好，为了他这一趟去干絕頂背信棄义之事而祝福他。工党剛剛犯了支持張伯倫在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錯誤之后，又犯了這個可怕的錯誤。怪不得張伯倫要譏笑反对党力量“薄弱”。但是你可以把工党的歷史，从头至尾查一查。你在任何地方从來看不到工党在政策上有什么錯誤。工党領袖能不能看出一个錯誤來呢？只有共產党人犯錯誤他們才看得出。是的，先生。他們那时候就能看到錯誤，爬到屋頂上去大声宣傳了。他們从來不檢討自己的錯誤，所以从來不会糾正，結果到了發生危机的時候还是繼續犯錯誤。而准許張伯倫到慕尼黑去是最大錯誤之一。若是工党議會党团提出反对，虽然为时已迟，局势还可能挽救。但是，它沒有反对，却“祝君一路平安”。不錯，在張伯倫回來之后，英國人民知道他犯的罪惡时，工党領袖就竭力反对慕尼黑协定。可是在他动身以前，他們就知道，或者当他們听他讀了那封信之后，原也应当知道他就是为了簽訂这样一个协定而去的。代表自由党的辛克萊跟着那个可憐虫艾德禮，而已故的乔治·蘭斯伯雷又跟着辛克萊，然后馬

克斯頓代表獨立工黨對於帝國主義強國要支解一個民主小國這件事，表示不值一文的謝意。只要讓我們太平無事，愉快地過着游手好閑的生活，什麼都可以答應。

我覺得一定要提一種抗議，在狂怒之下，我高聲喊叫，要使大家聽到。幸而我的嗓音響亮，壓倒了保守黨擾攘之聲。我講話的時候，看到丘吉爾坐在過道後面的角落里，愁眉不展。他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他沒有歡呼，也不表示“祝君一路平安”。在他應當說話的時候，他却坐在那里不聲不響。這是英國歷史上百年難遇的一刻，他錯過了——因為他究竟是一個保守黨員，他不預備和保守黨鬥爭。後來，他完成了他一生最重大的任務之後，就是這種關係使他遭到失敗。所以當時只有我們共產黨人反對。張伯倫終於到慕尼黑去了，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達拉第簽訂了協定，斷送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共和國的生命。

我們走到休息室去的時候，辛威爾走到我的面前握了我的手說：“只有你一個人還有理智，知道當前發生的是什麼事，有勇氣提抗議。”

“我已經帶回來和平，”張伯倫回國時聲明。啊，他真的相信這一點呢。西綫和平，東綫戰爭。對於保守黨員和他們所代表的人，這是一個快樂的時期。張伯倫和希特勒“稱兄道弟”，英德兩國之間不會發生什麼差錯。希特勒得到蘇台德之後，已經不會再有領土要求，我們可以安定下來，專心致志建立西方資本主義力量，來應付永遠存在的東方布爾什維主義的威脅。情況若是不變，這（對於保守黨說來）倒是一首美麗的田園詩。保守黨還把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代表帶到柏林，會同德國的同類人物擬訂滲透整個世界的計劃。可是這個“肥皂泡”沒有多久就破裂了。1939年3月，兩國強盜壟斷資本家剛剛在柏林簽訂了一個協

定，德國就進軍布拉格，把慕尼黑所訂文件視同“廢紙”。情況已經變得很明顯，只有用最大努力才能阻止這種併吞方法，這種併吞的方法和分解原子一樣，每一次“分裂”都可以得到一個新的能的來源。但是對於這樣大的努力來說，張伯倫就是當時有這樣的願望，也是完全不頂事的。他是一個無用、愚蠢、糊塗的老人，心目中只有四強公約和對蘇戰爭。如果英國和全世界要想免于遭受威脅着要到來的浩劫，那就應當急速行動，把他逐出他的職位。

共產黨是了解到這一點的，它發動了一個強有力的“和平陣綫”運動，它的堅強程度要足以打倒張伯倫政府，換一個能夠團結歐洲的和平力量來阻止納粹實現其野心的政府。丘吉爾和艾登竭力主張和蘇聯結盟，組織一個強大的和平陣綫，所以我們建議讓他們參加英國的和平政府。工黨領袖都不贊成這一點，他們譏笑黨，表示在任何情形之下決不和丘吉爾那樣一個人民的敵人團結。貝文、摩里遜、艾倫·威金遜都為了保持自己的純潔而提出抗議，絕對不肯為了這種團結而使自己有被玷污之虞。直到經過了戰爭和戰爭帶來的一切恐怖，才促成了團結——這種團結若是及時組織成功，可能已經把和平挽救過來了。

在這個時期中，我在下院發表一次演說，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必須用和平來包圍德國。”後來在討論的時候，丘吉爾提到這句話，把這意見向下院提出。下一個星期一，克萊門特·艾德禮告訴我，前一天晚上他在凱萊的一次大示威的集會上講話，他提起我說的那句話。“當我說出你的姓名，提起了你所說的話的時候，”他說，“情緒的熱烈達于極點。他們差不多把屋頂都掀掉了。”但是，若是我自己，而不是我所說的話，和他一起在講台上，表現團結的精神——作為團結和平力量的第一步，那末，情

緒的热烈会高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全國羣众都响应这个号召。我和党的其他領袖一样，在星期日总是到各地去在工人階級大集会上演說。离开了下院的渾濁空气回到工人里面，是何等痛快的一件事。要是工党議員能認識到这一点，并和羣众保持接触，那就好了。可是只有很少几个人这样做。因为其他的人在兩次競选的中間沒有值得一談的活动，結果他們被“下院的气氛”所影响，而且往往被这种气氛所懾服。若是“下院”反对他們，那就等于全世界在反对他們，因为下院就是他們所知道的天地。在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那个冬天芬蘭战争在進行的时候，“下院”像一个瘋人院一样，我被認為是全人类的公敌，被諷刺、痛罵。戴維·柯克伍德在这个艰苦时期常常安慰我，他常常在喧鬧中高声喊嚷：“一个人对付整个下院”。当然，他这样叫喊却証明我并不是真正一个人对付許多人，还有戴維自己，有阿勒克斯·斯隆、約·丁克尔(最好的人之一)和其他一些人，他們随时准备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來支持我。虽然如此，下院相当一致地反对我，因此使我在激烈紛擾中度日。有一兩個議員向我提出他們所認為的忠告：“最好保持沉默，威利，讓事情自己平息下去。你不能这样下去，誰也經受不住的。”

对这一点，我回答說：“去他們的，他們要怎样鬧就鬧好了。到了周末我就和工人在一起。工人决不会对我鬧，他們將支持我，給我新的力量，使我又可以干一个星期。”

是的，这就是真理。在最艰苦的日子，無論講台上報紙上怎样誹謗，我总是得到工人的支持，不論他們在芬蘭战争的問題上多么模糊，有一件事他們是絕對清楚的——他們支持我，支持党，他們反对下院的这一伙保守黨員。我在每一个周末离开下院人为的空气，回到自己人当中，他們從來不遺棄我。

但是在芬蘭戰爭期內，并不單是保守黨這樣狂妄，許多工黨議員也跟他們差不了多少。歐內斯特·塞特爾就是一個極端狂妄的实例。塞特爾因為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是一個一知半解的、非常“可敬”的無神論者），有時為唯理主義的報紙寫稿。他對保守黨員總是用仁慈而容忍的字眼。他對共產主義的憤恨却使他寫出怪誕的論調。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里他對首要的“慕尼黑人士”之一阿諾德·威爾遜爵士大加讚揚，就是對張伯倫也說了許多贊許的話，而對共產黨的意見則可以看下面的典型例子：

“我懷疑任何政黨的歷史里面，是不是還有比這更黑暗的事蹟。”

“他們不但遺棄我們，而且當我們正在戰鬥的時候，還設法由背後暗害我們。”

“……這是一個關於黑暗的背信棄義和失敗主義的故事，漫長而可厭。”

另外一個多少是相同類型的人是和平主義者里斯·戴維斯。他和許多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一樣，對共產主義極端反感。在戰前，他只要遇到機會就要對蘇聯和共產主義大肆攻擊。尤其在全國送貨和同業工人工會會議上，他的激烈的攻擊往往使青年代表大吃一驚。事實上有一次一個青年代表問我，“他是瘋子嗎？”不，我並不認為他是“瘋子”，他不過是像歐尼那樣痛恨共產主義而已。可是在芬蘭戰爭期間，英國正在準備派兵參戰時，里斯·戴維斯和其他著名的和平主義者沒有一個對這件事明白表示反對。

其他工黨黨員雖然不像這兩個人那樣狂暴，但是在這時期也表現得很壞。有幾個曾經做過蘇聯的“朋友”，但是是共安樂的朋友而不是共患難的朋友。幾年之前，尼爾·麥克里恩組織了議



会英苏委员会，目的是为了随时把苏联的情况通知议会，并促进两国的友谊和联系。芬兰战争爆发的时候，有几个委员急忙退出委员会，其中有一个现在是工党政府的一员，还劝尼尔撤销这个委员会，但被尼尔拒绝了。他说：“我创立了这个委员会，就是要我自己单独来干也要维持下去。”那时我得到尼尔精神上的鼓舞，非常高兴。可是戴维和山尼·斯隆才是我真正的最后依靠。几年之后，苏联工会代表团到了英国，什维尔尼克和他两个同事由华尔特·西特林爵士陪着到下院来。（这里我要说明，这个“爵士”称号使我发怒；每当我必须用这种称号的时候，我就会像塞特尔一样狂暴）。他们在休息室里，我就去和他们谈一两句。正谈的时候戴维来了。我叫他过来替他介绍。“这一位，”我说，“真正是苏联的朋友。”

“对了，”戴维说，“我向來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不是那种装作朋友的样子而当苏联有了困难就掉过头来反对它的人。”这句话在西特林看来恰恰是指了鼻子说他，当然，这时候他心里并不怎样舒服。

慕尼黑事件前一个星期，我们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在格拉斯哥的圣安德烈大廳举行极大的示威。极大，不但是说人数，而且是说会场上始终表现的情绪和精神。我是主讲的人，可是其他几个演讲人也配合得很好，有一个是奥菲斯合唱队领队休·罗伯顿爵士。大会结束时，我们在场外排队，在街道上游行歌唱，向捷克领事馆高呼口号。休爵士、约翰·维·勒基（我讲台上的老伙伴）和我领导这次游行。休爵士一路不断高呼口号，他振奋了我们大家的精神。工人坚强地在我們后面游行，迅速地响应我们，高喊口号。的确，在患难中工人是可以依靠的。我们虽有許多禍患，都不能責备工人。只要有明确的领导，他们总是准备进入斗

爭的。

希特勒接收苏台德的时候，英法兩國政府保證对这个被分割了的國家的新國界予以保护。不但如此，英國还建議給予該國政府經濟援助，使它自己能穩定下來。希特勒逐出了貝奈斯和他的政府；在他的要求下，一个他比較喜欢的政府上台了。我在下院声明这是一个傀儡政府，送給它的錢是要落到希特勒手里去的，西蒙——当时的財政大臣——不同意這句話，可是一星期之后只好承認了。坐在工党領袖席上的威治伍德·貝恩回过头來对我說：“你向來走在我們的前面，而且你始終是正确的。”不过，虽然提出了这个警告，不久以后英格蘭銀行却經由國際清算銀行，通过傀儡政府，交給希特勒600万英鎊的黄金，等于1,200万英鎊的紙幣。西蒙想为这件事辯护，但是丘吉尔給了他毀滅性的打击。“到德國去的是黄金，”他大声叫道，“回英國來的是炸彈了。”一年多一点以后，倫敦由一次慘痛的經驗中了解了这个預測的正确性。除納粹領袖外，还有些人也应当作为战犯而予以審訊。就在这种情况和战云密布之下，举行了1939年的工党會議。我們的党和它的同情者为团结和平力量而拚命斗争，工党領袖就动用他們的一切力量 and 影响加以反对。他們在表決上獲勝，击败了共產党，覺得愉快之至。可是代表們簡直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由人民手里把防止当前浩劫的有力武器剥夺去了。

一个希望，只剩一个希望，就是和苏联締盟。艾德礼力促張伯倫政府这样做，丘吉尔也力促它这样做，人民也要求这样做，但是張伯倫和他的伙伴却决心阻止它成为事实。不过贊成同盟的情緒这样坚决，使他不得不出來做作一下。他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去商談結盟的可能性，可是代表本身的身分就是对苏

联的侮辱。他不派一个有权作决定的內閣閣員，而派一个毫無权力的文官。这个青年名叫斯特朗，他的任务是在張伯倫和墨索里尼策划締結四强公約的时候，維持和苏联領袖的談判。这是一种卑鄙勾当。每星期四在質詢之后，休·达尔頓总是問張伯倫：“关于莫斯科談判有沒有什么可以报告的？”張伯倫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我們已經收到我們代表的报告，并且已經給了他新的訓令。”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在張伯倫照例答复了之后，我站起來問他：“这次的新訓令是不是比上星期發出的更新一点？”丘吉尔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拖延。“苏联的建議应当加以接受，”他說。他無疑非常急于締結这个联盟，張伯倫所玩的危險把戲，他知道得太清楚了。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他發表了一篇激烈而帶嚴厉批評的演講之后，站起來离开下院，那时保守党多数——張伯倫的“应声虫們”——大声叫罵，把他噓了出去。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景象。他低下头走出來的时候，他的一个忠实的信徒布蘭登·布拉肯同行。那人走到門口，四面看了看保守党多数派，眼睛冒着憤恨的凶光，心里怀着殺人的念头，如果此刻有人給他一支实彈的白倫式輕机槍，保守党多数就要血濺下院了。可是做了五年战时首相之后，丘吉尔还是毀在同一个保守党多数的手里。他們想要赶快举行选举。他們以为——而且他真笨，他也滿以为他个人的影响能够克服多年來人民对保守党的根深蒂固的憤恨。工党領袖反对这种急促的选举，保守党員付之一笑。选民击破了他們的乐观，丘吉尔由波茨坦回來时，台上人已变成了台下人，由其他的人把他所經手的任务完成了。丘吉尔为了击败工党而强使全國举行选举，他犯这样大的政治錯誤，这样不了解人民的心理，在英國歷史上的确是从來未有过的。

可是在1939年8月最后的生死关头的几天，他却为了阻止可怕的战禍而坚决斗争。若是他有实权，和苏联締盟这件事早就可以有效地完成了。但是不是丘吉尔而是張伯倫有保守党做后盾，他玩的把戲太清楚了。我們既然看得清楚，苏联領袖顯然也看得清楚。他們从革命初期起，就是在革命以前，也已經証明他們自己是头腦清醒的政治家。他們懂得張伯倫在干什么，所以德國人向他們建議訂立互不侵犯条約时，他們就利用机会破坏張伯倫为組織对付他們的集团所作的努力。他們除此以外別無他路可走。那时候我們处在什么地位呢？張伯倫的“姑息”政策就是出賣民主國家的政策，这种政策已經使我們在欧洲找不到一个可靠的盟國了。

1938年10月，我在下院發表演講时說：“德國現在統治着欧洲，它在統治欧洲中，已經使法國处于無法容忍的地位……英國政府現在并不是在使苏联孤立，而是在孤立英國自己。”

1939年9月3日我們参战了。到了1940年6月，我們陷于孤立，在欧洲一个盟國都沒有。这就是張伯倫的政策の頂点，就是保守党的政策、背信的政策の頂点。

战争，可怕的毀滅性战争，已經降臨到人民头上。法西斯野獸已經任性行动起来，正在猛攻文化的心臟。可是我們的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对情况的發展不大了解。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所沒有的反法西斯斗争歷史，它准备用最大力量摧毀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倫敦和各郡反对摩斯萊的斗争中，尤其是在西班牙反抗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联合力量的斗争中，我們已經証明我們对和平事業的忠誠了。

但是不久就很明顯，張伯倫集团并非为自由斗争。他們完全是为了帝國主义的目的而斗争，他們覺得和法西斯联盟比跟

法西斯战争更容易达到这些目的。所以他们开始和墨索里尼及佛朗哥谈判，不断地谈论要把“战争转向”苏联。

1939年12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英国实况”，这是张伯伦政府的一员劳埃德勋爵撰写的，由当时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写了一篇序，推荐书的内容。为了使美国反动力量安心，作者煞费心机把德国的希特勒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加以区别，并且证明后者已经使意大利人民得到无法估计的利益。佛朗哥也和欧洲的其他法西斯分子一样得到赞扬。劳埃德勋爵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很急于要美国大企业相信我们不是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相反地，我们整个愿望是使帝国主义老一套的把戏，在双方同意的分赃基础上继续进行。1940年8月8日，我在下院发表的演说里面，把党的基本路线加以说明如下：

“英国需要一个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府：他们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人民的福利。这个政府要接收全国的一切——土地、土地上的财富、一切保卫人民的東西。这个人民政府和强大的苏联友好并团结起来，便能永远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可怕的战祸，并且会给英国和欧洲人民带来持久的和平与远大的希望。”

那时候张伯伦已经下台，丘吉尔已经接任他的位置。这一次更迭是工党、自由党及一部分保守党员的联合起来促成的。这几种力量不是通过形式上的联合而是通过实际上的联合把张伯伦打倒的。形式上的联合接着也实现了，联合政府组成了，以前拒绝与丘吉尔联合起来阻止战争的工党领袖，现在是他进行战争的盟友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当天晚上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讲，宣布我们一向主张与苏联同盟。

情况完全改变了，“轉移”的可能沒有了。同墨索里尼及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妥协的可能也沒有了，因为在1940年5月，当大局似乎已定的时候，墨索里尼忽然跳到他的朋友希特勒的一边而参加了战争。与苏联同盟意味着与法西斯主义打到底。但是丘吉尔和联合政府施行我们的政策时，批评我们的人却提出了一个驚人的指責：“共產党人又改变他們的政策了。”罢了，罢了，这班人干的紆迴曲折的事情，是沒有法子加以說明的。

但是，支持一个和苏联締結同盟的政府，怎样会被描寫成共產党改变政策，完全使我莫名其妙。

大轟炸來的时候，我住在劳埃德廣場，靠近金斯克劳斯。在劳埃德廣場的住戶可以使用附近一条小街上的地下室。每天晚上大約八点鐘我們到那里去过夜。这是很慘的生活，只是偶而可以睡一会。大炮狂吼，炸彈爆炸，突然間一切又平靜了。完了嗎？唉！沒有。炮又砰然响了，一样一样又來了。有一天剛过半夜我睡着了。三四点鐘时我醒了，万籟俱寂，我一直等着，想听那飛機的嗡嗡声和大炮的怒吼声。我在床上翻來复去，始終在听着。因为要听，所以不能再睡。但是当我早上起身时我才知道三点鐘已經“解除警报”了，試想我的心里多么懊惱。

使我更懊惱的是另一件事。下院每星期集会三天，我們星期一晚上去，星期四晚上回來。下院在星期四的質詢時間之后，宣布下一星期的任务。有一个星期四我在議員質詢完畢以前出去見一个來賓，因而沒有听到下星期是什么工作。晚上在火車上別人都沒有提起，我們沒有想到工作，我們只想离开硝烟。星期一晚上我照例去，不知道为什么別人都沒有來乘火車。但是我終於去了，大約十点鐘我到了友斯登，又乘公共汽車到白厅。在路上的时候拉了空襲警报。我穿过皇宫大院时，一

枚炸彈落在廣場里，炸倒了一棵樹。我冲進屋內，里面似乎沒人，經過內廊時遇到赫伯特·威廉斯爵士。“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問我。

“怎么回事，”我反問他，“人都到哪里去了。”

“你不知道下院这个星期不开会嗎？”这就是他的答复。我是为了委员会开会才來的，”他又說。“星期四宣布我們要到下星期二才开会。”

請你設身處地想一想，我听到这消息时是多么懊惱。別人都在北方安閑自在，無憂無慮，而我却在这里，又置身于火坑中。砰一声响，又一个落在那一边。我真想打自己兩下。我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之后，不得不去受考驗——去等候九点十五分开出友斯登的火車。这是一次考驗，車站上漆黑一片，照例我們大約九点鐘到車站上火車，我們那些坐头等臥車的要占一些便宜，因为百叶窗关着，电灯亮着。但是我們总是坐在彼此的臥舖上等候車开。“什么时候了？”

“九点。”

又等了大約一小时，四面的爆炸声都沒有了。“現在什么时候？”

“九点零五分”。

时針爬到九点十五分，可是——火車沒有开，可能是半小时，也可能是一小时之后，火車很費力似的扯着拉着，非常緩慢地走了几百碼，又停下了。怎么一回事！阿勒克斯·斯隆有一个很妙的想法。他时常坐聖潘克拉斯的九点半一班的火車，这班火車十点五十分在凱特林停車。下院五点鐘散会，他建議我們先乘五点半火車到凱特林，等到九点半的火車到凱特林的時候，就搭上我們的臥舖。我贊成这个建議，做起來也很好。我們

在凱特林兩三夜，晚上都是在勞工俱樂部度過。考文垂被炸的那天晚上我們也在那里，聽到天上接連不斷的飛機嗡嗡之聲，看着高射炮射擊時炮彈爆炸的情形。

有一天晚上，大約在半夜，我們的火車還沒有來，但是附近叉道上的另外一列車開進了月台。站長在月台上走着叫喊：“往北去的乘客都上這列車。”阿勒克斯和我對他說，我們在等九點半從聖潘克拉斯來的車。這里我順便提一句，馬克斯頓和坎貝爾·斯蒂芬也等這趟車。“你們只好乘這列車了，”站長說。“今天晚上只有這一列車往北去。”我們走進了一節三等車廂，又黑又冷。我們一路遇到許多艱難困苦，到了格拉斯哥，才知道九點半鐘的時候月台上落了一顆炸彈，我們本來要乘的火車損壞了幾節，死了六個人，還有許多人受傷。

但是炸彈離我最近的一次是有一天剛到一點鐘，我在友斯登路行走的時候。那時我已經在一家小飯館里用過午餐，我吃的時候聽到“解除警報”。天氣很好，除了泰晤士河那邊有些白雲以外，滿天蔚藍一色。我恰巧經過全國鐵路工人工會的總部——團結大廈，聽到可怕的嘍的一聲，一顆炸彈在我耳旁飛過。落彈的地方是團結大廈外的路邊，離我和對面來的一個青年交臂走過的地方只有幾碼。我們兩人本來要被炸得骨肉紛飛，不過炸彈鑽進了地面，碰到總水管，把它炸破了。水管的破裂和炸彈的爆炸就在同一時刻，水力極猛，把一切碎片石子，卷上半空，像一個大噴油筒似的。雖然就在門外，團結大廈連一塊玻璃都沒有破。這真驚人，一輛出租汽車在炸彈落下時離得最近，一直開進了彈坑，車在坑里好像大海里一座孤島。我旁邊的青年弄成一付怪模樣：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幾乎要凸出來，臉色怕人——黃中帶青。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在照鏡子，因為我覺得好像他



那样惨的脸色正和那时我自己所感觉到的驚駭情緒一样。跟着第一顆炸彈又來了一顆，可是這一顆落在友斯登車站前面的花園廣場，把廣場四圍的窗戶全震破了。是的，天气很好，我知道已經解除警报后感到很高兴。不幸的是还有一架德國飛機躲在白云里面似乎并没有被發覺。

不过最坏的是另外一次，那时我还以为已經由一次空襲里逃出了性命。我由倫敦到利物浦去看一个被捕的車間代表。我到的时候，一个和我很要好的老友开了汽車到火車站來接我，又把我送到車間代表被監禁的营地。我訪問完畢，知道了全部案情(不久我就使他獲得釋放)之后，杰姆就送我回城。那时候利物浦經常遭遇夜襲，所以杰姆說我可以乘四点半的火車到格拉斯哥去，这样就避开了大轟炸。但是，如果我要等一下，他的家里可以和往常一样招待我。我說我要到格拉斯哥去，大轟炸我碰到太多了，若是可以避开，我还是避开吧。“你真机警，”杰姆說——他竟还說我机警。我走了，覺得很愉快。我們到了卡斯泰尔斯，电灯熄了，这是快要出事的信号。我們到麥忒韋尔时，可以听到隆隆炮声，看到炮彈爆炸的閃光。避开了！我是直往上碰！这就是星期四晚上克萊德班克的大轟炸。11点40分我們到中央車站，那里有为利物浦和倫敦的旅客开往戈洛克去的一列專車。我穿过黑暗的車站進了車廂，同車有一个到格林諾克去的水手。我們坐了下來，互相安慰。直到12点半，火車才慢慢地开出，到了桥上又停了。是的，先生。多少地方不停，單單停在桥上。右边有一个棧房中彈，火焰越來越高。这是一个清明的月夜，如同白晝一样。我們可以看到救火員和警察穿过牙買加桥赶到着火的地方去。我們坐在克萊德河上，炮彈炸彈震天撼地，我的胃不住地往上翻。水手像一只关在鉄籠里面的野獸。

“糟透了，比敦克尔克还糟。我們在敦克尔克还可以有办法，可是我們在这里却毫無办法。怎么停在这种地方。”

我想打起我的精神，我說：“司机和司炉可能到防空洞里去了。”

但是說这話沒有用，那位水手認真起來，他指着天痛罵，說不該使我們处在这种尷尬境地。我們整整坐了一小时，才發現我們所欢迎的事——火車在动了，这說明又开始向家鄉前進了。我在培斯利下車时，三个鐵路工人在我前面一个車廂里出來。我由他們旁边經過时，听到有一个說：“嗨！我覺得今天晚上可真够受。”这也不僅是他一个人这样。那天晚上利物浦平靜無事。若是說这里有什么經驗教訓，我可說不上來。

不过最艰苦的时期，当然要算1944年的7月和8月間，飛彈在倫敦及其四周爆炸。这一时期之內，人人神經緊張，目視耳听，准备随时鑽進最近的屋門。正如当时我对有些人說的，这种情形好像音乐椅的遊戲，只是沒有什么好玩罢了。你听到了“憂、憂、憂”的声音，这声音一停，你立刻就鑽。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在邦寧頓旅館，我是偶而到那里去找伙伴消遣一下的。我的老友山尼·斯隆<sup>①</sup>、还有兩個乒乓球健將、目前工党政府的低級人員納斯·爱德華茲和福斯特、正忙着搞礦工小冊子的乔治·达格尔、領养老金人們的維護者乔·丁克尔以及他这种有价值的活动的繼承人湯姆·布朗，这一班人和埃利斯·史密斯、鮑布·泰勒以及工党議會党团的督導員韋尔·韋特萊，对于任何人說來都可以算是一伙良伴。就在这一天晚上，我們聚集在后面大厅中，談話中間听到了“憂憂”之声，这是不速之客到了。似乎到了头上

<sup>①</sup> 阿勒克斯·斯隆于1945年11月16日逝世；他的死使蘇格蘭工人失去了他們最优秀的战士之一。

时，窸窣的声音就停了。嗤的一声。不，这可不是炸彈。原來大家都在这一刹那間臥倒了。大家从來沒有演習过，却行动这样整齐，这种怪事我是少見的。实际上炸彈在头上經過，落在格雷斯印路，很不幸地炸中了皇家免費医院的耳房。

它們晝夜地來，可是工人还是繼續工作。任何讚揚對他們都不会过分。就是工厂中了彈，他們扫清瓦礫，还是使能用的机器在最短時間內恢复生產。就是在情况最坏的时期，也很少有减低生產的事，相反地，大部分时候总是在不断增加生產。这些工厂的代表团屢次为了生產問題到下院來找我，我对这些人感到敬佩。我从來沒有听到他們有人說过一次一直出現在頭頂上的危險，也从來沒有听到他們有人訴过苦。他們都准备了意見，積極地提出建議，保證各該工厂產量达到最高額。老实說，每当接見这种代表团时，我总是感到內心的慚愧，因为我在有一个星期四晚上竟那样急于乘火車离开友斯登北去，而这些人却一声不响，勇敢地坚持工作。

与苏联締盟决定了战争的進程，也决定了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毀滅。日本襲击珍珠港又把美國拖進战争，促成了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團結。一个新世界正在形成中。在黑暗陰沉的日子，在我們需要竭尽全力使我們的軍隊能在戰場上坚持的时候，就連保守黨員也准备談談團結問題。可是等到最危險的时期已成过去，最后勝利已經有了把握，他們就完全丢开这种問題不談，而一心去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甚至像丘吉尔这样能跟國外的共產党人相处得來的人，也压抑不住他對國內共產党人的仇恨。我常常听人說，他由一个有共產党人参加的會議回來之后，他在下院中对我就更加惡毒。但是，正如競选运动所表現的，他也准备把保守党的全部惡意轉向工党領袖。他这是何等愚蠢。



2 032 1523 4

他多么不了解人民。比維布魯克勳爵更其如此。他在他的“大众化”的日报登載的是一些多么惡劣的东西。工人看了就罵，完全說謊！是的，那是競選中的一个特征。人民羣众不相信报纸，不相信保守党政客，尤其不相信丘吉尔和比維布魯克。保守党想用使人措手不及的选举來巩固他們的权力，保守党地主的权力，保守党財閥的权力。他們用丘吉尔做賭本，可是他們失敗了。

这給工党一个好机会。若是它抓住这个机会而加以利用，保守党在英國就永远不能抬头。但是这是一个对國內外反动力量的真实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共产党的精神、忠誠和明确的政治判断力是绝对重要的。因此我对競選做了一个預測：“工党不是和共产党联盟，就是要悲慘地投降保守党。”工党政府走上了后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这是对英國人民和欧洲人民的大不幸。这一个所謂社会主义政府竟和殘酷、腐化、橫暴的美國壟斷資本家站在一条線上，進行一个反对第一个工人共和國及东欧新起的民主國家的歇斯底里战争宣傳运动，使得許多支持这个政府的人都覺得驚訝和遺憾。美國在欧洲复兴計劃——事实上是資本主义复兴計劃——掩護之下，越來越多地干与欧洲事务，而英國和西欧國家变成了恭順的奴才，准备把國家和人民交給美國战争机器支配。

但是，在每一个國家里，在美國也和和在別國一样，人民都在向前迈进。听呀！你們可以听到“雷声隆隆”。这是千百万双脚的坚定步伐。一切黑暗的惡势力已經集結起來堵住了道路，但是，長期遭受剝削的工人大軍要把他們打退，冲出一条走向新的、美好的时代的光明大道。

我們共产党要担任前鋒，我們高高地、越來越高地举起旗帜，走上前去迎接曙光。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